

# 历史规律的客观性

(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若干问题)

沙 夫 著

郑开琪、叶元龙、祝百英、柳光青 译

叶 林 校

(内部发行)





2 037 8348 7

# 历史规律的客观性

(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論的若干問題)

沙 夫 著

郑开琪、叶元龙、祝百英、柳光青 譯

叶 林 校



Адам Шафф  
ОБЪЕКТИВНЫЙ ХАРАКТЕР  
ЗАКОНОВ ИСТОРИИ.  
(Некоторые проблемы марксистской  
методологии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9  
根据苏联外国书籍出版社 1959 年版译出

历史规律的客观性  
(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若干问题)  
(波) 沙 夫著  
郑开琪、叶元龙、祝百英、柳光青 译  
叶 林 校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大街 320 号)  
新华书店(内部)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2\frac{1}{2}$  · 插页 2 · 字数 295,000

196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6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002·363 定价(七) 1.30 元  
印数 0,001—2,000

## 序

历史規律和历史客观規律性的問題与历史真理客观性的問題有着密切的联系，說得更确切一些，它是后一个問題的一部分。同样，作为規律問題基础的决定論也与唯物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只有唯物主义者才能站在彻底的决定論的立場上，或者反过來說，誰与信仰主义和唯心主义——不管是客观唯心主义，还是主观唯心主义——进行彻底的斗争，誰反对把反科学的超自然力的因素(上帝、絕对精神等)引入我們的世界，誰反对把客观世界溶化在我們的“我”之中，誰就应该捍卫彻底的决定論的立場。

弗·伊·列宁正是这样对待这个問題的，他用最紧密的方式把决定論的問題与唯物主义联系了起来：

“由此可見，費尔巴哈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規律性，承认被人类的秩序、規律等等观念仅仅近似正确地反映着的客观因果性。費尔巴哈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規律性，同他承认我們意識所反映的外部世界、对象、物体、物的客观实在性是分不开的。費尔巴哈的观点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而所有其他的观点，說得更确切些，在因果性問題上的另外一条哲学路綫，即否认自然界的客观規律性、因果性、必然性的路綫，被費尔巴哈公允地列为信仰主义的流派。因为事实上很明显，因果性問題上的主观主义路綫，即不从外部客观世界中而从意識、理性、邏輯等等中引出自然界的秩序和必然性的主观主义路綫，不仅把人类理性和自

自然界分隔开来，不仅把前者和后者对立起来，并且把自然界作为理性的一部分，而不是把理性看作自然界的一小部分。因果性問題上的主观主义路綫就是哲学唯心主义（休謨和康德的因果性理論是它的变种），也就是或多或少减弱了的、冲淡了的信仰主义。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規律性和这个規律性在人脑中的近似正确的反映，就是唯物主义。”①

列宁在这里談到的是整个自然界，是自然界的客观性和規律性。但是，很明显，凡与整体有关的东西，也与部分有关；凡一般地与自然界及其发展有关的东西，也与自然界的那一部分，即人类社会的发展完全有关。承认社会发展及其历史的客观規律性就是唯物主义，而否认这种客观規律性，就是陷入了唯心主义的信仰主义立場。

列宁在另一处又說：

“排除科学的規律，事实上只能是偷运宗教的規律。”②

但是，正因为在規律性的客观性問題与历史真理的客观性問題之間，在因果性和規律性問題与唯物主义之間存在着这种不可分离的密切联系，現代唯物主义，即辯证唯物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的斗爭，在意識形态和政治上的全部尖銳性，都与历史决定論的問題，即历史規律客观性的問題直接有关。关于历史規律的性质問題的斗爭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爭。正因为如此，历史規律的問題，即規律的存在及其客观性的問題，就成了十九世紀末叶史学上主要的方法論問題之一。同时，上述問題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論意义，而且还具有实践意义和政治意义。这一情况使得斗爭更加尖銳化了，把这里所談的問題变成了两个明显形成的思想陣营相互冲突的范围。

① 《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6—157頁。

② 同上，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5頁。

十九世紀中叶，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給史学奠定了严格的科学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被用来作为历史研究方法的历史唯物論。

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立在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决定論的基础之上的。正由于从唯物主义的立場来发现和系統說明社会发展規律，以及在历史研究过程中运用这些規律，才使史学变成了名符其实的科学。

与这种科学地理解史学的任务和方法相反，資产阶级的史学，特别是它的理論基础，即继承資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傳統的历史哲学，則提出了完全对立的观点。这首先表现为否认历史規律，要求把历史看作是：对事实的純記述（兰克有句著名的口号，号召史学家：“如实直书地”記載〔so, 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sup>①</sup>，是对随时发生的事件的研究（爱·迈耶<sup>②</sup>），是与研究一般事物的自然科学相对立的对个别事物的研究（文德尔班<sup>③</sup>、李凯尔特<sup>④</sup>），是与研究一般規律相对立的对个别联系和“数列”归納的研究（謝尼奧博斯<sup>⑤</sup>、賽諾波尔<sup>⑥</sup>，就某种意义來說还有伯恩罕<sup>⑦</sup>）。十九世紀历史哲学的模仿者們今天仍在繼續走这条把

① 列·馮·兰克：《1494—1514年罗曼斯和德意志民族史》，全集第33卷，莱比錫1885年德文版，序言第7頁。

② 爱·迈耶：《史学理論与方法論》，哈勒1902年德文版。

③ 威廉·文德尔班：《序曲》中的《史学与自然科学》，圣彼得堡1904年俄文版。

④ 亨利·李凯尔特：《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圣彼得堡1903年俄文版，同一作者的：《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圣彼得堡1903年俄文版。

⑤ 沙尔·郎格路亚、沙尔·謝尼奧博斯：《历史研究入門》，利沃夫1912年波兰文版（Ch. V Langlois, i Ch Seignobos, Wstęp do badań historycznych, Lwów 1912）。

⑥ A. D. 賽諾波尔：《历史基本原理》，巴黎1899年法文版。

⑦ E. 伯恩罕：《历史方法与历史哲学教科书》，慕尼黑1914年德文版。

作为科学的历史来消灭的路綫，在这方面新实证主义的最低綱領主义(如包勃尔<sup>①</sup>)給了他們积极的帮助。

在同一个唯心主义陣营的另一翼拥护者中，还有些资产阶级学派怀着同样的目的攻击規律論的史学(如果这里可以用傳統的術語把科学划分为規律科学和个别科学的話)，这些学派用虛假的“发展規律”的思辨結構(从奥古斯特·孔德向圣西門抄襲得來的从“三个发展阶段的規律”起，一直到法西斯的史学和現代英国史学界像湯因此这样的“巨匠”为止)来代替細致的研究。这些虛假的“发展規律”实际上只是为資本主义阶级社会辯护的思辨結構；这些結構違反了它們科学性的形式上的外表，其目的在于推翻科学和关于規律的科学概念。因为它們的作者在建構自己的先天“律”(a priori)时，往往是从形而上学的和政治上反动的前提(“高等人种”、“統治的民族和永恒的无产阶级”等等)出发，来創造思辨的“永恒真理”的，这种“永恒真理”是与科学地理解历史主义和历史上的变化无穷直接相对立的。

由此可見，近百年来资产阶级史学对历史研究的科学态度进行了正面的攻击，事实上这只是否认历史是能揭示社会发展規律并依賴于这些規律的科学的一种形式而已。不言而喻，这种情况是和资产阶级史学的出发点与科学沒有任何共同之处分不开的。但我們不能把整个問題只归結于理論的因素，因为理論观点与政治、与思想領域中的阶级斗争，以及与资产阶级科学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对馬克思主义产生日益增强的反应有着密切联系的。巴黎公社、1905年的革命，以及最后还有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偉大的革命事件，就是资产阶级科学对馬克思主义的反应，在各个相互交替的阶段日益增强的根源。

---

① K. R. 包勃尔：《开通的社会及其敌人》，倫敦 1952 年英文版。

在这里明显地起作用的規律是：階級斗争越尖锐，资产阶级就感到自己越危险，对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科学理论即马克思主义，反应的程度也就更大了。结果意识形态的斗争在史学中也就变得更加坚决和更加自觉了。

资产阶级由于巴黎公社事件而受到的震荡，在哲学领域中是以“回到康德去”的口号反映出来的。巴敦学派的个别论正是与这个潮流有着联系。当时由于害怕革命而堕落到极端反动的理论立场上去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伊·布尔哈特的转变，就是那个时代的政治事件和资产阶级史学的立场相互依赖的无数例证之一。

对波兰的资产阶级史学来说，1905年的革命是一个有力的震动。当时谁要是不去参加革命，谁就不仅反对革命，而且还一般地反对科学发展中的进步路线。像科尔逊和斯摩棱斯基这样一些史学家转到反动的立场上去，就是明显的证明。

但是，对资产阶级思想家来说，最有力的震动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伟大的十月革命以后，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资产阶级史学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反动性越来越增强，并达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一方面是主观主义的浊流；另一方面是神秘主义和信仰主义，一齐充塞着资产阶级史学的方法论。资产阶级史学不仅否认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公开地反对历史事实，把历史事实宣称为主观臆造的结果（如狄奥多·莱辛、比尔德、貝克尔等人），资产阶级史学求救于宗教神秘主义（如别尔佳耶夫、莱因浩德·尼布尔等人）并杜撰出符合帝国主义扩张目的的神秘化的“规律”（如施宾格勒或近代的湯因比）。这些理论上的路线当然是陈旧的，但是它们是以一种新的，荒谬到足以证明资产阶级科学完全堕落的形式出现的。



資產階級史學對科學，對馬克思主義的反應是近百年來整個時期的一個富有特徵的過程。但是，隨著革命運動的發展，隨著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隨著資本主義危機的加深和資本主義的瓦解，這個過程正在明顯地加深、擴大和加強。<sup>①</sup>

\* \* \*

關於歷史發展規律的爭論這一類問題是屬於意識形態的領域的。這裡所指的意識領域的現象，它們與階級，與階級的利益和鬥爭有聯繫，因而也就是具有階級性的現象。大家知道，思想是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其觀點則是為基礎服務的；因此，史學方面為基礎服務的理論（歷史規律理論之類）也屬於上層建築。

對階級鬥爭以及參加這一鬥爭的各個階級的利益來說，社會發展客觀規律，即歷史客觀規律的存在的問題，怎樣在理論上得到解決，並不是毫無關係的。上面說到的關於圍繞着歷史規律問題而進行的意識形態的鬥爭就證實了這一點。革命的無產階級把自己的活動建立在承認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特別是承認必然導致資本主義崩潰和社會主義勝利的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基礎之上。揭示這些規律就能科學地預見社會發展的趨勢，從而也就能把工人階級鬥爭的戰略和策略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保證鬥爭的最後勝利。而且以認識這些規律為基礎的對勝利的信心（列寧曾經強調指出，馬克思主義理論使無產階級獲得對勝利的信心這一事實，是馬克思的功績），也是在與資產階級進行的鬥爭中動員和組織無產階級的力量。同時，不論從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客觀趨勢是反對資產階級統治的意義上來說，或者從闡明這一事實就會對資產階級陣營產生瓦解的影響的意義上來說，這些規律的存在本身就是反對資產階級及

<sup>①</sup> 在本書中我們不能夠更充分地研究這個非常重要的論題，因而只好僅限於作一般的評述。

其利益的。

显然，各个阶级对这些問題不可能漠不关心，因为这些問題的解决同他們的願望和利益决不是毫不相干的。既然存在着馬克思主义的意識形态，它揭示出历史的規律，并把这些規律变成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思想武器，那么，一方面，无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利益，在关于历史規律的問題上，能够而且也应该保卫科学的观点，这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驅使资产阶级歪曲现实生活的客观景象，也就是說，在这个問題上也促使资产阶级拒絕科学观点，甚至直接反对科学观点，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历史規律是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它想永远保存资本主义制度和本阶级統治的欲望的，因此，需要否认历史規律的存在，需要歪曲现实生活的客观景象，资产阶级史学就是从这里得出它的結論的。这个結論决定了近百年来资产阶级史学在理論上所作的努力的基本趋势，不管个别的资产阶级学者在这方面的認識达到了什么程度。资产阶级史学已經陷于决定“封閉”美洲的謝德林式的官僚主义者的处境。然而應該指出，资产阶级史学是十分认真热心地完成“封閉美洲”这个徒劳无益的任务的。从这里产生了数十种“理論”，这些理論企图用各种方法来論证一条道理，即历史規律是不存在的，或者制造一些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規律”，来“論证”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虛假的永垂不朽和无产阶级革命志向的毫无希望。所有这些“理論”上的努力都是沒有任何价值的，将来科学不会由于它們被人遺忘而感到遺憾和損失。如果說，我們現在还要研究它們，这首先是因为它們还活在资产阶级的科学中，还是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的一个組成部分，而我們还需要同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进行斗争，一直到彻底消除它在我們现实生活中的殘余为止。因此，这不仅是一个理

論上的任务，而且也是一个政治任务，这个任务是在我們的社会中进行的階級斗争的一个組成部分。我們研究这些“理論”，还因为它们长期以来对整个資產階級史学的研究产生过影响，它們在罗列事实 and 材料方面曲解和歪曲了一些宝贵的成果，而这些資料是我們不可能，也沒有理由拒絕的。这就是說，必須对許多事实 and 从史料中得出的材料进行重新估价 and 新的闡述。为了在批判地整理过去的史学成就的过程中，不致失去其中在发现和收集事实方面的有价值的东西，这种重新估价只有自觉地在科学的方法論的基础上才能进行。

\* \* \*

我們所談的关于史学領域中一般來說相当激烈的方法論斗争和这一斗争政治上的內涵，今天在我們波兰的条件下，在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条件下，有着独特的看法。

大家知道，在过渡时期，階級斗争变得尖銳化起来，階級斗争的一切形式 and 表現也变得尖銳化起来。思想領域中的階級斗争具有特別尖銳的性质，这首先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得到越来越充分发展的社会中，这个社会所固有的經濟規律的作用范围也随着越来越扩大，社会发展的客观規律按照新的方式起着作用，社会意識因素也开始在质的方面起着新的作用。因而，为思想斗争規定一个适合需要的方向，这个任务就更加重要了，因为社会过程的加速或延迟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个方向的。

在我們的条件下，使史学获得适合需要的方向的斗争也具有特別的意义。这是和历史科学的社会职能有关的。当然，这种职能并不是什么絕對新的东西，不是只有在新的社会制度下才出現的东西。即使是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史学的思想也在形成人們的理性。但是在社会主义經濟形态的条件下，这种思想

的影响不断增长着，达到社会意識的因素的影响普遍增长的程度。例如我們史学就提出了这样一些問題，如怎样符合历史真象地指出波兰文化的独特性（与资产階級反动的世界主义的史学所宣布的相反），怎样符合历史真象地来描述（与资产階級史学“英雄主义的”观念相反）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怎样符合历史真象地強調指出（与帝国主义关于西方和东方“永恒的敌对性”的理論相反）波兰的社会革命运动和俄国社会革命运动兄弟合作的傳統；怎样研究波兰民族形成的規律性等等。在科学的基础上解决这些問題，弄清历史真象，揭示一定的发展趋势，都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会对群众的意識和創造力产生巨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资产階級史学才竭力散布历史謊言，正因为如此，馬克思主义史学才这样努力地揭穿这种謊言，并为历史真象而斗争。而这也正是問題的本质：即要得到历史真象是与科学的方法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

波兰史学在方法論的領域中已經向轉变的方面前进了一大步。波兰大多数史学家現在已經同意應該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論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工作。在大多数場合，我們史学家都是努力走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道路的。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但是这个成就并不意味着事情到此結束，斗争已經停止了。因为不管某些科学家的主观信念和良好願望如何，旧的方法論至今还支配着不少波兰史学家的工作。一方面，这表现为把历史过程归結为各种因素的作用的傾向，这种傾向的根源是“純記載”历史的个别論的主張；表现为杰出人物的作用不正确的概念，这种概念是“英雄主义的”史学的同感反响的表现；表现为某种理論估价，这种理論估价的根源是把思想解釋成自动地起作用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对旧方法論的眷恋也表现为以“社会学化”和“現代化”的經濟主义精神使历史过程的景象庸俗化，表现

为对待事实的反历史的态度。

可見，斗争仍在继续着。不过现在，斗争是在有利于科学进步事业的条件下进行的。所以自觉的方法論分析具有特殊的意义。整个問題在很大的程度上在于要向史学家表明控制着他們的资产階級方法論残余的虛伪性和危害性，讓他們与科学的馬克思主义方法論及其在實踐中运用的优秀典范——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所提供的典范——进行对比。

\*     \*     \*

本书是关于历史規律客观性以及历史規律对史学的意义的一部专门著作。但是按照本书的计划，它只是篇幅更大的著作中的若干章节，在那部著作中将要探討关于真理及其在史学中的客观性的問題。因此，这本书里不得不略去了許多問題，如历史科学中真理的标准，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涵义等；这些問題将在篇幅更大的著作的以后部分加以闡述。由于沒有涉及到这些問題，我們对历史規律客观性这一題目所作的論断可能是不完备的。但是如果同时探討所有这些問題，将会漫无限制地扩大一部著作的篇幅——即使从一部著作可能允許的范围的观点来看——而且，也会大大地延迟著作的出版。作者注意到規律的客观性問題对方法論的首要意义和迫切性，所以决定把題目局限在这个問題以內。其余的問題，我打算在另一部专门著作中再进行探討，那时也許会有必要，就可以把两部著作合并成一部完整的作品。

# 目 录

序 .....	1
---------	---

## 第一編 馬克思主义和把史学变成一門科学

第一章 馬克思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規律是史学上的一个变革 .....	1
第二章 馬克思主义历史規律的理論对历史研究的实际意义 .....	27

## 第二編 对资产階級史学否认历史規律客观性的批判

第三章 资产階級史学否认历史規律的理論意义和实践意义 .....	51
第四章 对个别論的批判 .....	61
第一节 个别論的方法論否认历史規律 .....	61
威廉·狄尔泰的观点是个別論概念的基础	
第二节 論所謂个别科学 .....	70
(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概念的批判)	
第三节 被理解为偶然性的彙集的历史 .....	91
(迈耶的概念的批判)	
第四节 在史学实践中否认历史規律 .....	102
第五章 对历史規律的唯心主义神秘化的批判 .....	160

第一节 客观唯心主义派	163
(把历史发展规律神秘化地說成是客观精神发展的規律)	
1. 黑格尔及其追随者	163
2. 循环发展和阶段发展論	185
第二节 主观唯心主义派	194
(用个人心理或个人心理創造的发展規律的形式来使历史規律神秘化)	
1. 实证主义的社会規律学說	194
2. 瑪·韦伯的“理想典型”学說	212
3. 社会規律的心理学說	219
4. 作为思辨公式的規律	225
第三节 历史規律的神秘化和史学实践中的公式主义与社会学观	229
<b>第三編 从历史客观規律理論中得出的几点方法論上的結論</b>	
第六章 从社会发展客观規律的理論来看历史中的个别对一般的关系	247
第一节 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	265
第二节 历史过程中的个人和群众	283
第三节 对史学家創作的結論	295
第七章 从历史客观規律的理論来看历史預見	316
第一节 历史規律的客观性是历史預見的基础	316
第二节 历史預見和历史类比	326
第三节 历史預見和历史可能性的問題	337
第四节 历史預見对工人階級政党革命活动的意义	346
参考书目	353

# 第一編

## 馬克思主义和把史学 变成一門科学

---

### 第一章

#### 馬克思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規律 是史学上的一个变革

恩格斯在自己的偉大朋友墓前演說中指出，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規律是馬克思的主要功績之一：

“正如达尔文发现生物界的发展規律一样，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規律，即发现了直到最近还被思想体系的积淀所遮盖的一个简单的事实：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而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物质生活資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所达到的經濟发展的一定程度，形成一个基础，人們的国家組織、法律观点、艺术以致宗教观念便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因此也就必須由这一基础来加以說明，而不是像先前那样作得相反。”<sup>①</sup>

正是由于发现了人类历史的規律，史学才能成为，而且也是

---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6頁。  
(着重点是作者加的。——譯者)



第一次成为名符其实的科学。这是因为科学与这一方面研究领域中规律的揭示和系统说明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这里我们不打算详细分析科学概念的定义，只是要证明，科学是反映现实的，这种反映已经归纳成系统并经过实践的考验。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客观联系，以科学规律的形式反映出来。只有在揭示和系统说明了客观规律的地方才会出现科学的认识，才会创造科学预见的可能性。这个原理对任何科学都是正确的，而对史学来说，更具有特别的意义。这是由于关于历史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的问题(下面再详细谈)首先与包括着重复性的各种社会现象的范围有着联系(而这也与制约人们存在本身和决定这种存在特点的必然性有着联系)，也就是说与创造物质生活资料 and 条件的范围有着联系，与生产的范围有着联系。只要唯心主义还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只要还没有彻底使用唯物主义的概念来研究人类社会历史，那么在这个时候，真正的重复性和规律在历史上是没有地位的。在那个时候，史学只能是对一些未加分析的材料或好或坏的记载、积累，有时它也可能成为某种科学式样的臆断的集成，但是还不是科学。因为我们不否认关于重整事实的研究工作(例如在考古学、古生物学、地理学以及在某些场合的史学等这样一些科学中的实际作业)的科学性，但也应该确认，科学不能只限于这一类的研究。这种研究在史学中起着辅助的作用，而且在这个范围内得到普遍的公认。然而把史学局限于记载性的工作，从史学中排除发展的规律，那就是意味着注定要使史学家在考察历史事件的时候把它们看作是杂乱无章的偶然性，从而勾销了史学的科学性。由此可见，揭示历史规律，把史学变成科学，是与把历史研究工作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有着密切的联系。

弗·伊·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清清楚楚地着重指

出了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现有关的这个变革，一般說来在社会科学中，而特别是在史学中的意义：

“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說，彻底发挥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一切历史理論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一切历史理論，至多是考察了人們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发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規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論恰恰没有說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們能以自然历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搜集了片断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經濟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历史，但人們即人民群众的动机由什么决定，各种矛盾思想或意向間的冲突由什么引起，人类社会中有所有这些冲突的总和究竟怎样，造成人們全部历史活动基础的物质生活生产的客观条件究竟怎样，这些条件的发展規律又是怎样，——馬克思对这一切問題都注意到了，并指出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途径，即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滿矛盾但毕竟是有規律的統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sup>①</sup>

馬克思主义以前史学的非科学性是由于原則上的原因，即这种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所造成的。这一情况曾經有利于論证那种宣称必須从科学的領域中取消史学的观点(如叔本华)。后来——由于与意識形态斗争有关的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資产階級史学自己也反对把历史作为一种科学了，它提出了一个綱領性的原理，說史学研究的只是个别現象，而不是規律。似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8—39頁。

乎史学应该是艺术的一个部門(柯罗齐、文德尔班等人的观点)。这种观点在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对史学的科学性这一題目进行大辯論的时期甚为流行，它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资产階級史学的立場的反动性和反科学性。

为了把史学变成一門科学，必須击破那种认为思想决定历史发展的唯心主义偏見。为此，就必须重新审查迄今为止所有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观点，并为此目的揭示出支配历史的客观規律。馬克思完成了这一工作。他在所著《政治經济学批判》一书的著名序言中扼要地叙述了社会經济形态及其发展規律的理論。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理論系統說明了社会发展規律，这个規律成了科学的历史研究的基础。列宁說，这个理論尚未被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对資本主义社会所作的分析证实以前，还仅仅是天才的假設，但是这种假設“第一次使人們有可能极科学地对待历史問題和社会問題”<sup>①</sup>。这种可能的产生是由于新的理論打击了社会学中的唯心主义。在这以前社会現象的研究者不了解社会发展的机制，停留在現象的表面，把行为的精神动机看成是发展的真正动力。他們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場上，歪曲个人——思想的体现者——的作用，从而对自己了解現象的重复性的本质，也就是了解发展的規律封閉了道路。

“在此以前，社会学家总是难于分清錯綜复杂的社会現象中的主要現象和次要現象（这就是社会学中的主观主义的根源），不能找到这种划分的客观标准。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它把‘生产关系’划为社会結構，使我們有可能把主观主义者认为不能应用到社会学上来的一般科学的重复律应用到这些关系上来。当他們还局限于思想的社会关系(即通过人們的意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19 頁。

識\* 而形成的关系)时,始終不能发现各国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規性,他們的科学至多不过是記載这些现象,收集素材。一分析物质的社会关系(即不通过人們意識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人們在交换产品时彼此发生生产关系,他們甚至沒有意識到这里存在着社会生产关系),立刻就有可能看出重复性和常規性,就有可能把各国制度概括为一个基本概念,即社会形态。只有这种概括才使我們有可能从記載社会现象(和从理想的观点来估計社会现象)进而极科学地分析社会现象,譬如說,划分出一个資本主义国家和另一个資本主义国家不同的东西,研究出一切資本主义国家所共有的东西。

“最后,……这个假設之所以第一次使科学的社会的出現成为可能,还由于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結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結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沒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例如主观主义者虽然承认历史现象的規律性,但不能把这些现象的进化看做自然历史过程,这是因为他們只限于指出社会思想和人的目的,而不善于把这些思想和目的归結于物质的社会关系。)”<sup>①</sup>

我們从弗·伊·列宁的著作里摘录了这样长的一段引文,是因为它对理解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中,因此也在史学中所完成的变革的实质具有决定的意义。弗·伊·列宁在这里发展了这样一种見解,即“社会經濟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基本思想”<sup>②</sup>是馬克思基本的社会学思想。弗·伊·列宁在与司徒

---

• 列宁原注——这里当然始終說明是社会关系的意識,而不是其他什么关系的意識。

①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0—121頁。

② 同上,第117—118頁。

卢威爭論时再一次深入探討了這個問題。列宁在这次爭論結束时写道：

“主观主义被把社会过程看作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代替了，沒有这种观点，当然也就无所謂社会科学。”<sup>①</sup>

列宁在分析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时，得出了如下的結論：

(甲)馬克思主义根据唯物主义原理研究社会現象，制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識这一基本原理，并将生产关系范疇运用于社会科学，这才使我們有可能把重复律用于社会科学，而沒有重复律就不可能发现发展規律，从而也就不可能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

(乙)馬克思主义根据唯物主义原理研究社会現象，把个人的行为看作是受一般規律制約的行为；

(丙)因此，馬克思主义把社会发展看作是与自然历史过程(由此产生了“自然历史过程”的術語)完全相似的客观过程。从而使我們有可能建立关于社会的科学。

可見，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領域中所完成的变革，首先表現在馬克思主义与它以前的学派相反，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是以彻底的辯证唯物主义为依据的。列宁在着重指出这一变革的意义时，把揭示历史过程的客观規律性(作为这种变革的結果)提到了首位。只有揭示出这种規律性并系統說明反映其本质的科学規律，才使我們有可能建立关于社会的科学，建立科学的史学。

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十分有力地着重指出揭示并系統說明社会发展規律对建立社会科学和把一切具体的社会科学变成真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9頁。

正的科学的意义。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文中摘录了一段評論文章，他认为这段从結束語中得出的結論正叙述了自己的方法，因此，我們可以认为这篇評論的观点是与馬克思的观点一致的。評論的作者写道：

“在馬克思，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从事研究的現象法則。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各种現象具有一个完成形态，并保持一种可以在一定期間看到的联系的限度里支配着这各种現象的看法。对于他，更重要的，是現象之变化的法則，发展的法則，由一形态到他一形态，由一种联系的次序，到一种联系的次序的推移的法則……馬克思把社会的运动，看为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支配它的法則，不仅和人的意志，意識和意图是独立的，却宁說是决定人的意志，意識和意图的……”<sup>①</sup>

恩格斯也曾屢次強調規律的发现对科学地研究社会生活的意义。例如，他在《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一书中写道，尽管在自然界和社会之間存在着种种差別，社会現象也和自然現象一样，是受一定的内部規律支配的。“全部問題仅在于要发现这些規律。”<sup>②</sup>

斯大林在总结馬克思主义的理論研究和工人运动这方面的实际經驗时，能够在《辯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写道：

“由此可見，历史科学底首要任务是要研究和揭示生产的規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規律，社会經濟发展的規律。”<sup>③</sup>

斯大林并指出，應該到什么地方去寻找支配历史进程的規

---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15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89頁。

③ 斯大林：《列宁主义問題》，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2版，第709頁。

律，應該到社会經濟中去寻找。由此可見，历史科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揭示和研究社会經濟发展的規律。資產階級史学給自己切断了树立科学观点的途徑，把自己的任务局限于記載个别的和不会重現的事实，它只願使自己成为艺术，而不願成为科学，最后，它从极端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立場来否认历史認識的客观性质，馬克思主义与資產階級史学相反，它第一次把史学提高到“狭义的”科学的水平，揭示出社会历史发展的規律，为科学的史学的发展奠定了穩固的基础。

为了了解馬克思主义在史学中完成的变革，也就是說，为了了解推論的今后的进程，特別是在批判資產階級方法論的一些章节里，必須着重指出馬克思主义的轉折性与它的党性之間，以及与它和資產階級科学“客观主义”立場的坚决破裂之間所存在的有机联系。<sup>①</sup>

馬克思主义的起源与无产階級的階級斗争及其要求有着最密切的联系。不仅在关于人类的世界知識上、而且在无产階級階級斗争上，都会产生馬克思主义，并且已經达到了一定的、相当高度的发展水平。无产階級作为社会发展要求的最彻底的表达者，对于发现社会发展規律并且为了社会利益而运用这些規律的科学也表示关心，使其进步不致受到任何限制。馬克思主义是作为无产階級斗争在思想上的反映，作为这一斗争經驗在理論上的总结而产生的；正因为如此，它才能成为階級斗争的思想武器。馬克思主义的創造者——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后来的列宁——都不是抽象的理論家，而首先是积极的政治活动家，是在无产階級階級斗争的基础上，并为了这个斗争而創造理論

---

① 这个重要的方法論問題將在我准备要写的关于历史科学中真理的客观性一书中，辟出专章来作更加广泛的闡述。这一章將闡述真理客观性对科学中党性問題的关系問題。我們在本书中就只能限于稍稍提到这个問題。

的战斗的群众領袖。馬克思主义是帶有明显的階級性和党性的理論，它所以是党的理論还在于这样的意义：即它是自觉地站在一定社会階級利益的基础之上，它是在科学上的进步陣营与反动陣营的斗争中，在唯物主义陣营与唯心主义陣营的斗争中站在党的、“有偏袒的”、“反客观主义”的立場上的。正因为如此，馬克思主义才是客观真理。在社会科学中，客观真理与站在表达革命階級利益的階級的、党的立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现在只有从无产階級的立場出发，才能客观地、毫无偏頗地反映现实。

列宁教导說，馬克思主义包含着党性。馬克思主义的創造者正是在这种党性的基础上才能揭示和系統說明历史的客观規律。这一发现标志着社会科学史上的变革，这种发现之所以成为必要，是从无产階級階級斗争的实际需要中产生的。为了胜利地进行这一斗争，必須科学地預見社会发展的趋势，并以这种預見为基础，科学地制定无产階級斗争的战略和策略。从工人运动自发性的发展中，从它的胜利經驗，特别是它的失敗教訓中成长了向斗争的高級阶段，即自觉斗争的阶段过渡的要求。馬克思主义在一般社会科学領域，特别是在史学中所完成的那种变革的最深刻的原因，正是起源于无产階級的階級斗争。

有关馬克思主义在史学中完成的变革实质的知識是评价社会科学著作，特别是评价史学著作时的重要的方法論結論的基础。客观地認識现实生活，要求站稳革命階級的立場，站稳“反客观主义”的立場。这个結論允許把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及其学生們的科学成果看成是无产階級階級性和党性的結果，反过来说，它也允許把资产阶级学者著作中的錯誤看成是他們的階級立場在科学上的結果。这个結論也使我们能够領会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新的职能，用日丹諾夫的話來說，馬克思主义史学像



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一樣，已成為“無產階級群眾為擺脫資本主義壓迫而鬥爭的科學武器。”<sup>①</sup>

隨着對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原理與無產階級鬥爭實踐的深刻理解，越來越要求党性以及與“客觀主義的”觀點進行鬥爭，這種要求對史學家說來還有這樣的意義，那就是它能使史學家武裝起來，去反對反科學地制定歷史“規律”。正是這種要求教導我們，不能光是在形式上承認歷史規律的存在，而且還必須研究這樣的問題：即所談的是怎樣的規律，這些規律是根據科學中哪一個黨派的立場制定出來的。這個極其寶貴的原則性指示，首先是在反對唯心主義把規律神秘化的鬥爭中具有重要的意義。關於這個鬥爭我們在以後的論證中還會談到。

馬克思主義將科學的史學建立在歷史發展規律的基礎之上，把這些規律看作是客觀的規律。科學規律，因而也包括歷史科學所依據的那些規律，都是客觀地在歷史過程中出現的必然聯系的反映。馬克思主義把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看作是揭示歷史過程規律性的起點，始終不渝地把政治經濟學的規律解釋作客觀的規律，或者換句話說，它認為相應的科學原理是客觀的社會現實（即存在於人們意識之外，並且是人們社會意識外在源泉的現實）的反映。這一點無論是對史學的理論問題，還是對與社會發展預見和人類自覺改造社會生活有關的實踐問題，都會得出深遠的結論。按照馬克思對這些結論的提法：社會發展的理論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的理論。列寧發展了這個問題，並深入地探討了這個問題。

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社會發展規律的理論在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進一步具體化了。

<sup>①</sup> 日丹諾夫：《在關於亞歷山大洛夫著〈西歐哲學史〉一書討論會上的發言》，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頁。

斯大林首先反对主观主义地歪曲社会发展规律的问题，他简明地分析了规律客观性的这个概念。他精确地说明了客观现实规律（客观规律性）以及科学规律（客观规律性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的概念，为的是消除对这些概念的多义性，顺便说一句，主观主义者就是绊倒在多义性上面的。我们现在也从简明地分析这些概念的意义来开始我们的探讨。

“规律”这一术语具有多种意义。我们可以把“规律”理解为法规，也就是由国家政权机关颁布和废除的各种法令等等。我们不打算在这里深入地探讨法规的客观基础问题，但是我们应该把法律与现实发展的客观规律明确地区别开来。即使从狭义来看，“规律”这一术语也还包含着两方面的意义。因为我们在谈到规律时，有时是指过程的客观规律性，有时是指反映这些规律性的科学规律。

关于在社会制度下经济规律的性质问题，斯大林写道：

“某些同志否认科学规律的客观性质，特别是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经济学规律的客观性质。他们否认政治经济学规律是反映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的规律性。他们认为，由于历史所赋予苏维埃国家的特殊作用，苏维埃国家及其领导者能废除现存的政治经济学规律，能‘制定’新的规律，‘创造’新的规律。

“这些同志是大错特错了。显然，他们把下列两种东西混为一谈了：一种是科学规律，它反映自然中或社会中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另一种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它是根据人们的意志创造出来，并且只有法律上的效力。但这两种东西无论如何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马克思主义把科学规律——无论指自然科学规律或政治经济学规律都是一样——了解为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

过程的反映。”<sup>①</sup>

我們在另一处地方又讀到：

“是不是在我們身外客观地存在着不以人們的意志和意識为轉移的經濟发展的規律性呢？馬克思主义对这个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經濟学的規律是存在于我們身外的客观規律性在人們头脑中的反映。”<sup>②</sup>

这种說法使我們能够从認識論的观点来区分科学規律的概念和客观现实規律(規律性)的概念。

斯大林从馬克思列宁主义反映論的前題出发，肯定科学規律是不依賴于人的理智而存在的客观規律性在人們理智中的反映。

斯大林的原理是列宁在《哲学筆記》中所制定的观点的具体化。列宁在摘录黑格尔《邏輯学》的要点时，在书頁的空白处写了許多評語，这些評語光輝地闡明了馬克思主义对客观现实規律和科学規律的理解。

列宁在自己評語中着重指出規律对認識现实的意义：

“(規律是宇宙运动中本质的东西的反映。)”<sup>③</sup>

在紧接着的地方我們讀到：

“……規律和本质是表示人对現象，对世界等等的認識深化的同一类的(同一序列的)概念，或者說得更确切些，是同等程度的概念。”<sup>④</sup>

从上述的評語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結論：列宁把規律看作是客观过程的反映，而且是高級的、合理的認識阶段上的反映，

---

①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2 頁。

② 同上，第 64 頁。

③ 列宁：《哲学筆記》，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第 2 版，第 160 頁。

④ 同上，第 159 頁。

这种認識能使我們从現象的表面下面发现它們的本质。正因为如此，列宁強調指出，規律和本质是表示人对现实更加深刻認識的同一类的概念。

因此，我們在解决关于科学規律的客观关系这个从哲学观点看来是原則性的問題时，应该闡明我們是怎样理解科学規律所反映的規律性的。

在这里我們的目的是用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規律概念的意义，我們不打算分析和批判資產階級的著作中所有的各种解釋和分类。資產階級的著作把自然規律同經驗規律对立起来，把因果規律同結構規律对立起来，以及諸如此类，經常歪曲和誤解問題。我們的任务也不包括要詳尽无遺地分析这个复杂的問題。这是一个重要的問題，在我国的文献中尚很少进行过研究，这是需要加以專題研究的。我們的分析只限于从我們对史学，特别是对历史規律問題进一步討論的观点来看是絕對必要的一些問題。

讓我們先来明确一下，我們所談的关于过程和現象的規律性倒底是什么。这里所指的是出現在这些过程和現象中的必然重复的联系。在这里我們并不希望解决必然性这个困难的問題，而只是运用这个概念的一种意义：即这种联系不仅会在一定的条件下出現，而且决不能不出現。因此，它們在这些条件下是理当出現的，这个詞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得到了实践的证实。

我們在这段上下文中使用的“規律性”概念，有两个不同的、但相互之間又有最密切联系的意义。首先我們談的規律性是指出現在过程和現象中的必然重复的联系这一意义而言。这些联系通常包括在一定的过程之中，并說明这些过程是根据某种規律(或根据一整套規律)进行的过程，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些联系是有規律的。我們在談到共存的規律性时也是这样，共存

的規律性本身也是一定的原因作用的結果，它說明了当时一定过程的状况。因此，我們在某些場合談到过程的規律性时，把規律性理解为必然在其中出現重复联系的过程的特点或特征。

从問題的这样提法来看就很清楚，不應該把“規律性”的概念局限于因果关系的規律性，即局限于必然的因果联系。辯证法有一条基本規律与此相反，认为因果联系只是事物和現象普遍联系和相互依存的一部分。在过程中出現的联系其基础往往是因果联系，但又不局限于因果联系。規律性是和一切类型的联系和关系有关的，但它只應該是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出現了，而且是在該种条件下必然会出現的。因此，我們完全有权来談論因果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間的对抗性矛盾是社会經濟形态衰落的原因的規律）；共存律（結構的）即指一定的事物、現象或特点必然共存的規律（如证明对抗性社会中总是存在着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的社会学規律）；职能律、相互依存的規律，以及其他的必然联系和关系等。由此可見，不能把现实客观規律的概念限定为因果律的概念。不論在什么場合，因果律总是其他各种規律的基础（例如共存就是由于引起这些事物或特点等等同时存在的各种原因所发生的作用），因为每一个过程都是原因和結果的客观继承联系，这又是另一回事。

在这里我們也想談談关于因果律这个意义上的規律，也就是证实因果继承的必然性的規律。要知道，历史过程是建立在这种继承性之上的，而历史規律正是首先与历史过程相联系的。只有在客观地出現因果联系，即因果交替的必然性的地方才能确定因果律，因为因果律所讲的是，当原因以及与原因同时发生的条件的一定綜合出現的时候，便总是会出現一定的結果，而这种結果表現为一定的結果与一定的原因相适应，如果原因改变了的話，則結果便会相应地改变。

可是这样一来，在分析因果关系，特别是在分析“原因”这个概念时所出现的一切困难，也就转到规律这个概念上，因为规律所谈的是各种事件（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然而，如果正如我们大家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已经知道的那样，因果联系及其要素，是现实的抽象化和简化的结果，那么是否能在这种基础上建立起自以为能起科学基础作用的规律呢？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答复：科学规律——因果联系也是这样——是现实景象的简化，然而它们却能反映（虽然是简单的、片面的反映）客观现实。当然，问题还不仅在于把现实景象加以简化，科学规律也像每一种科学的抽象一样，同时能够使我們更深刻地认识现实，能够使我們通过现象的表面发现本质的联系。科学规律的实际价值正在于此。

列宁曾一再强调指出规律的概念对科学地认识世界的意义。但他同时又警告不要把这个概念加以绝对化，并着重指出这个概念和现实比较起来又具有它的局限性和片面性，现实总是更全面、更丰富的。

列宁在评注他称之为“晦涩难懂的”《逻辑学》中的一段文章时写道：

“但是，看来也有活的思想：规律的概念是人对于世界过程的统一和联系、相互依赖和整体性的认识的一个阶段。黑格尔在这里热中于对词和概念的‘加工琢磨’和‘穿凿雕镂’，这是反对把规律的概念绝对化、简单化、偶像化。”①

列宁接下去又指出什么是反对把规律的概念偶像化的斗争，并着重指出了这个概念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黑格尔写道：

---

①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版，第158页。

“……規律的王国是現存世界或現象世界的平靜的……反映。”<sup>①</sup>

而列宁在書頁边上写道：

“規律＝現象的平靜的反映”

他又在特別标出的意見中补充道：

“这是极其唯物主义的、极其确切的（从“平靜的”这个詞来看）規定。規律把握住平靜的东西——因此，規律，任何規律都是狹隘的、不完全的、近似的。”

再接下去，列宁又同意黑格爾的話：因为同一个內容会再現，所以現象比規律丰富；而規律，即已經變样的規律还包含有規律和其他东西，列宁在書頁边上写道：

“（現象、整体、总体）（（規律＝部分））。”（“現象比規律丰富”）。<sup>②</sup>

現在我們再来談一談关于規律客观性的原理。

承认过程規律性的客观性是唯物主义观点的結果，从而也就是承认现实的客观存在（即现实的存在不以認識的理性为轉移）。

馬克思主义与一切主观主义相反，始終一貫地认为規律性是客观的，而科学規律就其能向我們客观地有条件地反映客观过程这个意义來說也是客观的。

規律性——无论是自然界的規律性，还是社会的規律性——都是不以理性，即不以人們的意識和意志为轉移的。我們在这里把意識理解为比較狹义的理性認識。过程的規律的出現是不以人們是否已經認識了它們为轉移的。即使人們已經認識了过程的規律，它們还是不以人們的意志和願望为轉移而表

① 列宁：《哲学筆記》，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版，第159頁。

② 見同上，第160頁。

現出來。

从这个原理得出的第一个結論是人們能够認識規律，但是却不能改造規律，既不能消滅規律，也不能創造規律。

我們不能創造和消滅規律，而只能認識和利用規律，或者限制它們发生作用的範圍。当产生某些規律的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的时候，这些規律就会消失和让位給新的規律。

关于規律客观性的这些原理有着不仅仅是抽象的，理論的，与实际隔絕的意义，而且还有着非常实际的意义。斯大林在指出这个問題的實際方面时写道：

“当然，人們能发现这些客观的規律性，認識它們，并且依靠它們，利用它們来为社会謀福利。但是人們既不能‘創造’，也不能‘改造’它們。

“假令說，我們暫且采取不正确理論的观点，否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經濟生活中有客观規律性的存在，并宣告可能‘創造’經濟規律，‘改造’經濟規律。結果会怎么样呢？这就会使我們陷身在混乱和偶然性的王国，使我們处在奴隶似地依賴于这些偶然性的地位，使我們不仅失去了解事情的可能性，而且簡直会在这偶然性的混乱中瞎摸……

“归根到底，我們就会听凭那班不理解和不考虑客观規律性而决心‘消滅’經濟发展規律和‘創造’新規律的‘經濟’冒險主义者任意摆布。”<sup>①</sup>

然而，斯大林一面尖銳地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对規律的理解，強調指出規律的客观性，同时又反对規律自发性的崇拜。斯大林从自由是被認識了的必然性这个辯证法的著名原理出发，指出发现和認識規律就可以使我們掌握規律，把它們引上所希望

---

<sup>①</sup>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64 頁。



的軌道，限制它們發生作用的範圍。因此，我們對規律的作用並不是無法防范的。

“這是不是說，例如，自然規律發生作用的結果、即自然力發生作用的結果是根本無法避免的，自然力的破壞作用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都是以自發的、無可抑制的、不受人們影響的力量而出現的呢？不，不是這個意思。當然，在天文、地質及其他某些類似的過程中，人們即使已經認識了它們的發展規律，也確實無力去影響它們。如果把这些過程除外，那末在其他許多場合下，就可能影響自然過程這點來說，人們決不是無能為力的。在一切這樣的場合下，人們如果認識了自然規律，估計到它們，依靠着它們，善於應用和利用它們，便能限制它們發生作用的範圍，把自然的破壞力引導到另一方面，使自然的破壞力轉而為社會造福”。<sup>①</sup>

當然，這不僅與自然界的規律有關，而且也與社會發展的規律有關：

“對於經濟發展規律，對於政治經濟學規律，——無論指資本主義時期或社會主義時期都是一樣，——也必須這樣說。在這裡，也如在自然科學中一樣，經濟發展的規律是反映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經濟發展過程的客觀規律。人們能發現這些規律，認識它們，依靠它們，利用它們來為社會謀福利，把某些規律所發生的破壞作用引導到另一方面，限制它們發生作用的範圍，給予其他正在為自己開辟道路的規律以發生作用的廣闊場所。但是人們不能消滅這些規律或創造新的經濟規律。”<sup>②</sup>

可見，我們能夠掌握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能夠控制和利用它們來為社會謀福利。這一點只有通過認識這些規律和自覺地利用它們才能實現。但是我們不能創造、改造以及消滅這些規律。

---

① 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2 頁。

② 同上，第 3 頁。

关于人能够掌握和利用社会发展规律的道理是以规律的可知性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社会发展规律的问题上也像反对主观主义一样，始终不渝地反对不可知论，其实，不可知论也不过是主观主义的一种变体而已。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是认识这些规律的源泉和标准。

人们能够利用社会发展规律和掌握这些规律，正是因为这些规律是可知的。科学规律就是这些客观规律的反映。至于科学规律是怎样反映客观现实的，它们是在怎样程度上的忠实的反映，那正是社会实践所要说明的。

根据上述，还必须扼要地谈一谈人的认识以科学规律的形式来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性质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导说，认识永远是向完全的、绝对的认知不断接近的过程。这条道路上的各个阶段是局部真理，如果局部真理包括有对相应的有一定范围的问题的答复，那么它们也能具有彻底的，因而也就是绝对的性质。但即使这种局部的绝对真理，也仍然是相对的，因为它们只有对一定范围的内容来讲才是绝对的，要是超过这个范围，如果我们进而研究比较广泛的联系和依存关系时，它们就失去了绝对性意义。因此，只有对完全和彻底的认知的永恒的追求才是绝对的。这种永恒的追求是各个局部的、但又是客观的真理积累的过程。我们对客观现实的知识是经常不断地增长的，虽然我们的知识永远达不到——也不可能达到——最终的界限。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这些一般原理也完全适用于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些规律是可知的，因为我们正在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认识它们。但在这方面，如果注意到事物和现象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客观性，我们的认识也就永远不是绝对的，而且也不可能是绝对的。即使我们在回答内容有一定限制的问题时获得了绝对真理，我们的认识也不是绝对的认知。因为还存

在着別的联系和依存关系，关于它們的知識还在不断丰富着我們的認識。社会发展規律是一个整体、一个体系。我們的認識使我們能了解这个整体的一部分。我們認識的部分越多，我們的知識就越丰富，掌握客观现实和利用客观现实的規律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但我們永远不能获得，而且也不可能获得全面的、絕对的知識。我們对社会现实及其規律的認識也是一个过程，并且是一个无限的过程。然而，这絲毫也不会縮小越来越順利地影响客观现实的可能性，也絕对不会减少使我們的知識不断改进和完善的必要性。恰恰相反，这正是反对一切教条主义和停滯現象的最大的动因。

社会发展規律的客观性問題与規律的特点問題也有密切的联系。

我們知道，馬克思主义把史学变成了科学，它揭示出社会过程重复性的客观基础，从而創造了研究社会过程的基础，并依靠这种研究作出社会发展規律的公式。从社会发展規律的客观性来看，它与自然規律没有什么区别。因此，馬克思也曾強調指出在历史、社会过程中出現的必然性的自然性质。但社会发展規律同时还具有与自然規律不同的某些特点，对这种特点需要加以比較詳細的探討。

斯大林所指出的第一个差别是自然規律的永久性和社会发展規律作用的相对暂时性：

“政治經濟学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的規律与自然科学的規律不同，不是长久不变的；政治經濟学規律，至少是其中大多数，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发生作用的，在此以后，它們就让位給新的規律。”<sup>①</sup>

---

①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3 頁。

我們在分析斯大林的这个意見时，只限于这些規律对它們在其中发生作用的一定条件的綜合体的依存性問題。

我們知道，規律是規定必然重复出現的联系的，因此它不是只指某一种情况，也不是只指某一个一定的时刻，而是指某一类型的每一种情况，即不仅是某一时刻所发生的某一情况，而是任何时候只要它是在一定的条件綜合体下产生的每一种情况。

历史决定論的敌人把这一无容置疑的事物原理的規定，用来作为攻击对历史規律的探討的出发点，根据这种探討意見，历史規律总是与一定的时期相联系的，它們所談的不是什么始終不以条件为轉移的东西，而是在一定时期中以具体条件为轉移的必然的东西。

有一位署名为卡尔·摩斯博士者在《反馬克思。关于馬克思主义經濟学內容的研究》(«Anti-Marx. Betrachtungen über den inneren Aufbau der Marxschen Ökonomik»)写道：

“自然規律的本质中包含着一点，即規律的意义 (Geltung) 具有絕對性。

“如果某一因果关系的意义 (Geltung) 是受一定的时期所限制的，那就意味着一般地对任何規律涵义的曲解，因为那时規律已不是支配现实及其运动的因果力量的体现者，但现实的发展即历史的发展是决定規律性及其稳定性意义的因素，我們只是用結果‘本身’来代替因果性。在自然規律概念和所謂历史‘規律’之間也存在着无法解决的合乎邏輯的矛盾”。<sup>①</sup>

摩斯在注解中引用了宗巴特的文章。宗巴特在那篇文章中把馬克思主义的历史規律观称之为他永远也不了解的“齷齪的玩笑”，因为他认为，自然規律應該具有永恒的意义。

---

① 引自卡尔·考茨基：《唯物史观》，第2卷，第678頁。

历史規律有不同程度的共同性：既有屬於一切社会的規律（如說明社会意識依賴于社会存在的規律），也有屬於一定社会經濟形态的規律（如資本主义积累的規律），甚至还有屬於一定社会經濟形态某一时期的規律（如現代資本主义基本經濟規律）。

必須指出，从方法論观点来看，对具体的历史研究最重要的不仅是最一般的社会发展規律，而且还有——这是首要的——屬於各个經濟形态和时期的局部的規律。然而所有的历史規律，無論是最一般的規律，还是局部的規律，都是受到時間的限制的：最一般的規律受到人类存在的限制；而局部的規律受到一定經濟形态、一定时期等等因素存在的限制。难道这同規律“永远”有效的要求沒有矛盾嗎？

規律“永远”有效——这是什么意思呢？要知道，規律意味着是一定过程和一定条件下特有的一定联系和关系的經常和必然的表現。十分显然，这种限制也具有在時間上限制的形式。如果說非气体稠度的物体在地球史上的出現比較迟这一假設是真理的話，那么适用于液体的自然規律在地球上就受到時間的限制。無論如何，这种限制实际上与最一般的历史規律所服从的因素沒有区别，而最一般的規律既适用于一切人类社会，但同时却受到人类社会存在的限制。

恩格斯在《自然辯证法》一书中曾強調指出了这一点：

“永恒的自然規律也愈来愈变成历史規律。水在摄氏零度和一百度之間是液体，这是永恒的自然規律，但是要使这規律成为有效的，就必须有：（一）水，（二）一定的溫度，（三）标准压力。月球上是沒有水的，太阳上只有构成水的元素，这个規律对这两个天体是不存在的……我們現在所有公认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都是絕對地以地球为中心的，只是为地球打算的……因此，如

果我們想談談那同样适合于从星云到人的一切物体的一般自然規律，那末剩下給我們的就只有重力，也許還有能量轉變說的最一般的公式……但是如果把这个理論徹底地应用到一切自然現象上去，那末这个理論本身就会变成某一个宇宙系統从产生到消灭中一个跟一个地发生的变化的历史表現，就是說，会变成在每个阶段上由其他的規律，即同一普遍运动的其他現象来支配的历史，而且这样一来，只有运动才具有絕對普遍的意义。”<sup>①</sup>

因此，自然規律也具有历史性，它們的作用取决于一定的条件，它們在時間和空間上也具有一定的界限。但是与社会发展規律比較起来，自然規律具有长久的性质。这只是因为社会发展規律、历史規律发生作用所依賴的条件，要比自然規律发生作用所依賴的条件更加活动、更加善变。

自然科学規律与社会科学規律的第二个差別涉及到認識和利用社会发展規律的階級內涵：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一經濟規律，早已在資本主义国家中为自己开辟道路。它之所以还没有給自己开辟出道路，还没有获得发生作用的广闊場所，是因为它遇到了社会衰朽力量极强烈的反抗。在这里，我們碰到了經濟規律的另一个特点。在自然科学中，发现和应用新的規律是或多或少順利地进行的；与此相反，在經濟学領域中，发现和应用那些触犯社会衰朽力量的利益的新規律，却要遇到这些力量极强烈的反抗。因此，必須有能够克服这种反抗的力量，社会力量。在我国，已經有了这种力量，其形式就是占社会絕大多数的工人階級和农民的联盟。”<sup>②</sup>

这里所提到的問題与斯大林在《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

① 恩格斯：《自然辯证法》，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99—200 頁。

②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5 頁。

一书所阐述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論題，特别是与科学对上层建筑的屬性这一論題，有着直接的联系。各个階級都不能对科学所宣布的东西漠不关心。不同的階級对不同时期不同科学領域的态度所以具有重大的区别，首先要取决于这些科学領域的規律对各个階級的利益处于怎样的关系。从这个观点来看，就产生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間的重大差别。自然科学規律原則上是没有階級性的，它們在应用时是直接与生产发生关系，而不是与基础、不是与生产关系发生关系，但是也不应该忘記，如果是具有重大世界意义的自然科学的发现，或者是能够使生产力与占統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冲突加深的发现，那么这里的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我們可以从資产階級对待米丘林生物学和巴甫洛夫生理学的态度上看到这一点）。因此，斯大林写道，发现和应用自然科学新規律是“或多或少順利地”进行的。而社会科学的規律，正因为它們与社会发展問題，与階級斗争的問題有着直接的联系，在階級关系上不是漠不关心的，所以它們应该属于上层建筑。处于资本主义瓦解时期的資产階級不可能用科学来客观地反映社会发展規律，因为社会发展規律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因而它們只能成功地用来反对資产階級，成为組織和动員群众的力量。因此，資产階級的社会科学为了統治階級的利益就要歪曲现实景象。因此，資产階級就要消灭以无产阶级为体现者的客观的社会科学，千方百计地抹煞这种科学存在的可能性，否认社会发展規律、历史規律的存在和作用。了解自然科学規律和社会科学規律之間的这个极其重要的差别，对于認識社会科学規律的階級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認識思想領域中階級斗争的必要性，有着很大的意义。特别是斯大林的指示能够使我們武装起来，进行反对資产階級否认历史規律，力图消灭科学的史学，以及根本消灭研究社会現

象的科学基础的斗争。懂得斯大林的论点，对于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个斗争的任务就是要动员那些能够摧毁阻挠应用新发展规律的阶级的反抗的社会力量。

我們已經談到了以发生作用的时间长短不同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等类；因为既有在社会生活整个存在时期发生作用的规律，也有只限于在一种经济形态的范围内、或者在更短时期的范围内发生作用的规律。

从另一个观点来看，还可以把社会发展规律并列起来放在同等的地位。每一个社会事件都具有非常复杂的特点，它总是以某种方式与其他许多社会事件联系着，对它们发生影响，同时本身也受到它们的影响。社会生活也构成一个伟大的整体，无数事件都处在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之中，各种发展规律的作用是相互交错和同时发生的。分析每一个社会事件，即使是最简单的社会事件也可以表明，它是大量规律相互影响的结果，因为并没有孤立的事件，每个事件都以某种方式与其他事件联系着，而且是处在与其他事件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之中的。

由此可见，社会生活中有许多规律在发生作用。我們弄清了规律的意义，特别是它们对实践活动的意义，还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即是否所有这些规律都是同一种等类的，在某种方式上都是具有同等意义的，是否在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依赖关系，等类关系。对这个问题可以从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概念中找到答案。

我們现在来谈谈基本经济规律。显然——这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中得出的，——由于经济对社会发展总和的决定性作用，基本经济规律对社会发展各部门中的一切规律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我們是怎样理解基本规律的呢？



基本經濟規律就是決定生產的一切方面的規律，因此它也是其他經濟規律所服從的規律，這並不是就它們演繹上的根據來說，而是就基本規律決定一切其他規律的社會傾向，決定生產的目的來說的。

發現和系統說明一定社會形態的基本經濟規律，不僅對政治經濟學，而且對一切關於社會的科學，其中包括史學，都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由於歷史唯物主義揭示經濟在整個社會生活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我們便可以獲得一個決定性的環節，抓住這個環節就可以用科學的方法來解釋最複雜的社會過程。

基本經濟規律的概念對史學家來說具有多么重大的意義，這是不難明白的。如果從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可以指明，我們在說明歷史過程時，應該把社會經濟作為社會發展基礎的出發點，那麼，只要指出某一社會形態的基本經濟規律決定該種形態的整個發展，通過這種指示，這個原理就可以加以具體化。

## 第二章

### 馬克思主义历史規律的理論 对历史研究的实际意义

史学在新的理論和方法論基础上的发展，用馬克思主义方法进行研究的科学的史学方面的成就，是評價馬克思主义在史学領域中所完成的变革意义的尺度。我們对这个問題将通过扼要的分析，并且将只用对实例的分析来結束对馬克思主义把史学变成科学这个問題的探討。

我們已經知道，馬克思主义在史学領域中所完成的变革的中心問題是发现和系統說明历史規律。然而，馬克思主义所談的历史过程的这些規律是怎樣的呢？

我們也記得，历史規律的概念是与社会发展規律的概念相符合的。因此，要发现和分析馬克思主义所解釋的历史規律，就意味着必須把辯证法的一些主要范疇作为最一般的社会发展理論和对整个现实的研究方法来加以分析，同时也必須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主要范疇作为最一般的理論和对社会发展的研究方法来加以分析。当然，我們在这里并不打算扼要地叙述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只是談談問題性质的最一般概念，談談为了用具体例子来实地檢查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效果而創立基础的問題。

历史規律从最广义来讲，不仅包括人类社会所特有的发展規律，而且也包括整个现实发展的最一般的規律。这里首先包

含着辯证法的規律，它們作为整个现实的发展規律也与社会生活有关。当然，事物和現象普遍联系和相互依存的規律，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永恒性規律，量变到质变的規律，对立物的統一和斗争的規律——这些既是社会发展規律，即历史規律，同样也是自然界发展規律或人类思維发展規律。由于方法取决于发展的理論，史学家應該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利用从这些規律中得出的原則性指示，即辯证法的一般原則性指示。

最一般的社会发展規律是历史規律等类中的一个阶段，这些規律在所有的社会經濟形态中或者至少在几种社会經濟形态中发生作用。作为最一般的社会发展理論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总结社会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实际材料的基础上，系統說明这些規律。当然，我們不打算在这里詳尽地分析这些規律，只想举例來說明其中最重要的規律。属于这类的規律中必須包括：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識起决定作用的規律，生产关系必須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規律，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規律，階級斗争是对抗性社会发展动力的規律等等。由于方法对发展理論的依賴性，史学家應該在自己研究工作中利用从这些規律中得出的原則性指示，即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一般的原则性指示。因此，在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历史的时候，我們應該首先——关于这一点前面已談到——在科学中站在党的、无产階級的階級立场上，應該坚决地拋棄“客观主义”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歪曲现实景象，只限于核驗事实，好像是把对发展方向起决定影响的现实的社会力量和这些因素的实际作用加以抽象化；我們在科学中站在党的、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还应该从研究一定时期的經濟来开始我們的研究工作，因为經濟是社会生活全部发展的基础；为了了解一定社会經濟形态的过程，我們應該研究在这个形态中产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間的联系；我們應該研究各个階級的力

量和它們之間的鬥爭，以便說明社會發展的動力等。

最後，我們認為支配一定社會形態發展的規律也是歷史規律。史學家在這裡首先應該注意到把一定社會形態的基本經濟規律看作是這樣一種規律：它決定生產的目的和性質，決定這一社會形態所有其他的規律，其中也包括服從於基本經濟規律的一些規律。

歷史規律，社會發展規律的類型大體上就是這樣。研究社會生活各個部門的歷史也可以在這個基礎上進行，這些部門除了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作用以外，還受到特殊規律的支配。然而，現在首先使我們感到興趣的還是一般歷史規律、是社會發展規律。根據這些規律我們試圖用具體事例來檢查馬克思主義方法的效果，並與資產階級的史學方法進行對比。

\*     \*     \*

我們拿關於德國農民戰爭史的兩種說法作為對比的基础：一種說法是恩格斯解釋的歷史<sup>①</sup>，另一種說法是列奧波爾德·馮·蘭克解釋的歷史<sup>②</sup>。第一本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經典著作，第二本是資產階級記載史學的經典著作。我們只選擇幾個因素進行這種對比，目的是為了生動地表明使用這兩種對比的方法的一般結果，證明馬克思主義方法的優越性。

恩格斯在其著作的序言中明確地規定了他所採用的方法論原則：

“在我的論述中，我企圖以只是大致闡明鬥爭的歷史進程，來說明農民戰爭的起源，所有參加這一戰爭的各種黨派所採取的立場，這些黨派借以企圖弄清自己地位的那些政治的和宗教

---

① 弗·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或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83—483頁。——譯者）。

② 列·馮·蘭克：《宗教改革時代的德國史》，維也納1934年德文版。

的理論，以及戰爭結局本身，作为是从当时各階級所处社会生活历史条件中必然产生的后果；換句話說，我是企图指明：当时德国的政治制度，反对这一制度的起义，以及当时那个时代的政治和宗教的理論等，并不是当时德国农业、工业、海陆交通、商业和貨幣流通发展程度的原因，而是这一发展程度的結果。这个唯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不是由我，而是由馬克思創立的〔……〕”<sup>①</sup>。

因此，恩格斯的著作是自觉地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建立在承认发展客观規律和历史必然性基础上的历史著作。这本著作無論从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之間的爭論中所站的立場来看，还是从进步的革命階級立場对历史过程作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的意义来看，以及从坚决駁斥資產階級伪客观主义来看，都是具有党性的著作。对于实現在研究者面前所提出的这一要求來說，恩格斯的著作提供了一个范例；《德国农民战争》的主要意义之一就在于强烈的党性，在于理論和政策的正确結合。

恩格斯在其序言中接下去写道：

“德国一五二五年革命和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革命間的类似处，是異常显眼的，以致使我当时不能完全不談到它。”<sup>②</sup>

恩格斯这部著作的指导思想就是建立在这种类似之上的。关于这一点我們还将在最后一章中加以闡述。恩格斯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是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并且正是从这种立場出发，来研究农民运动即革命后备軍的問題，闡明过去的錯誤，力求从这些錯誤中为正在进行中的当代階級斗争吸取教訓。恩格斯是作为一个无产階級的領袖和思想家，从階級的、党的观点出发来观察每一个分析的要点的。序言的最后几頁好像就是自己著作对当时站在最前列的德国无产階級的献詞。由此可見，恩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16頁。

② 同上。

格斯是从明显地制定的党性原理来开始自己的論述的。

甚至只要浏览一下作品的结构，也就可以表明，这里所谈的不仅是宣言，因为事实上恩格斯是在实现自己构思。

《德国农民战争》是从概述十六世纪初叶德国社会的生产关系以及建立在生产关系之上阶级结构开始的。然后，恩格斯在第二章中指出，那个时期的阶级关系是怎样反映在意识形态之中的，在第三章中则分析了发生于农民战争以前的十五和十六世纪大转变时期的农民运动；最后，在末了的几章中则叙述了农民战争的进程。

因此，作品的结构表明，作者是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用经济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发展必然性——根据序言中所宣布的原理——来解释社会运动及其意识形态的。

让我们就从阶级结构来开始，分析阶级结构可以使我們了解农民战争的动力、进程以及在当时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失败。

十六世纪初德国的各个等级具有自己的历史传统，所以能够从历史上去弄清楚它们的起源。然而，恩格斯看到自己的任务——正是作为一个时代的史学家的任务——不是列举和采用统计方式来评述这些等级，而是从进程中去考察它们，指出它们发展的倾向，它们成长或必然衰落的基础。因此，在阐述当时社会各个等级之间的关系时，是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等级是一定生产关系的结果。但恩格斯对它们都是同时从历史观点加以考察，即从它们的进程，从它们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的发展中加以考察的。

当时德国在历史上形成了以下的一些等级和阶层：诸侯、骑士、包括贵族和平民集团的僧侣、分为城市贵族以及市民反对派和平民反对派的市民阶级，最后是农民。可见，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结构，其中各个等级和阶层都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着

斗争，与其他的等级和阶层有着联系，既影响它们，而本身又依赖于它们：

“可见十六世纪初叶帝国各种不同的等级——诸侯、贵族、僧侣、城市贵族、市民、平民和农民形成一种极其庞杂的人群，他们的要求极其悬殊而又错综复杂。每一等级都妨碍着另一等级，都不免与所有其他等级处在继续不断的明争暗斗中。整个民族分裂为两大营垒的情形，在法国第一次革命爆发时曾经出现过，在目前最先进的国家中也正在以更高的发展阶段的形式出现，但在当时德国的条件下乃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只有当被所有其余等级剥削的最下层人民——农民和平民——起来暴动的时候，那种分裂为两大营垒的情形才略有可能出现。”<sup>①</sup>

在分析社会发展过程时，如果不运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就不可能从事件的混乱状态中摆脱出来。要想知道像农民战争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过程，我们就应该抓住参与其中的阶级力量的消长，以及这种消长在物质上的制约性。

在十五世纪的德国，我们可以看到工业、农业和商业的迅速发展，这是冲破封建主义范围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具有自己的特点，而与英国和法国的发展不同。在人口不密、发展并不那么猛烈和均衡的德国产生的工商业的中心，并不是遍满全国，而只是出现在几个省份，结果就导致了一些独立的诸侯邦的出现和统一帝国的解体。

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个过程的解释，这个在农民战争时期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的过程，就是诸侯势力的巩固和壮大，骑士阶层和僧侣集团的衰落。

“……归根结底从农民战争取得好处的只有诸侯。本文一

---

<sup>①</sup> 弗·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98页。

开头即已談到德国农工商业的发展很差，使德国人統一为一个民族国家沒有任何可能，只可能有局部的和省区的中央集权化，因而在分裂割据状态之下代表这种局部的中央集权势力的諸侯，形成了从当时社会政治关系的任何变动中都必能得到好处的唯一等級。当时德国的发展水平是这样低，而同时各省区的情况又这样不同，致使世俗諸侯邦之外，还有独立自主的僧侶轄区，城市共和国以及独立自主的伯爵和男爵能够同时存在；虽然这种发展很緩慢很拖沓，但是是趋向于省区的中央集权化，这就是說，要使其余的帝国等級从屬於諸侯統治之下。因此在农民战争結束的时候只有諸侯能够有所得。事实也正是如此。”<sup>①</sup>

騎士阶层日益貧困下去，因为軍事技艺的发展使他們无用武之地，而經濟关系又导致他們的破产。僧侶的情况也是这样；社会的发展使他們越来越不為人們所需要，并取消了他們对教育的壟断，而他們从事剝削的趋向引起了整个社会对他們的仇恨。

在农民中間革命風潮日益增长。农民虽然受到駭人惊聞的压迫，但是还无力举行起义，这主要是由于它的分散性以及对束縛的根深蒂固习以为常。而經濟情况也使农民不可能与其他等級結成联盟：

“农民只有与其他等級联盟才能有胜利的机会；但是既然所有其他等級一齐剝削农民，农民如何去同他們联合呢？”<sup>②</sup>

因此，恩格斯根据对当时德国經濟结构的分析，进行了对階級结构的分析，指出了各个階級发展的可能性和趋向。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他才能分析当时的思潮，研究社会运动发展的性质和可能性。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80頁。

② 同上，第398頁。



恩格斯在序言中提出了不能把思潮作为一定制度統治的原因，而要作为其結果来研究的原理。他說这种研究方法就是唯物主义的方法，并用这种方法具体地去分析路德和托馬斯·閔采尔的学說。这种历史分析的力量和意义只有与研究同一对象的唯心主义分析进行对比时，才能得到充分的評价。

受到打击的和相互爭吵不已的各个等級在思想斗争的基础上結成了比較大的集团。在这里出现了三个营垒：反动天主教营垒、路德营垒即市民宗教改革派营垒以及革命营垒，这个营垒的思想家是托馬斯·閔采尔。正确了解当时所发生的思想斗争及其性质和背景，是了解整个时代及其社会运动的重要因素。恩格斯坚决反对把那个时代的思想斗争看作仅仅是神学上的爭論的唯心主义理解，因为思想斗争是当时所发生的階級斗争的表現。

“16 世紀的所謂宗教战争也根本是为着十分明确的物质的階級利益而进行的。这些战争，同稍后时期英国和法国的国内冲突完全一样，都是階級斗争。如果說这許多次階級斗争在当时是在宗教的标志下进行的，如果說各階級的利益、需要和要求都还隱蔽在宗教外衣之下，那末这并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而且也易用时代条件来加以解釋。”<sup>①</sup>

恩格斯接着解釋，为什么中世紀所有的社会运动都采用異端邪說的形式，这些異端邪說的内容取决于作为利益体现者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宗教改革时期的运动也披上了異端邪說的外衣，在这里不同的階級的内容也与不同的学說相适应。

“在三大营垒中的第一营垒即保守的天主教营垒中，聚集着所有希望維持现状的分子，即帝国政府，僧侶諸侯以及一部分世

---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400 頁。

俗諸侯，富裕貴族，高級僧侶，城市貴族。聚集在市民階級溫和派路德宗教改革旗幟下的是反對派中的有產分子，大量低級貴族，市民階級，甚至有一部分希望沒收僧侶產業以肥己并欲乘機脫離帝國羈絆而擴大獨立地位的世俗諸侯。至于農民和平民則團結在革命派中，其要求與理論都由閔采爾最鮮明地表現出來了。

“路德和閔采爾，就理論說，就性格說，就出現姿態說，都各為其黨派的十足的代表。”<sup>①</sup>

可見，路德和閔采爾的學說各自代表著一定的階級，而它們的創始人也各自領導著一定的黨派。

托馬斯·閔采爾代表誰呢？處於當時上層社會以外，沒有財產和特權的城市平民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先驅者。平民的地位說明，它為什麼不僅會要反對封建主義，而且要爭取進入剛剛誕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範圍，并懷疑階級社會各種形態所固有的體制和觀點。當時的社會條件說明，為什麼這種向前跑得太遠的最初幾次實際嘗試以後又必然會回到當時社會的狹窄範圍里去。這樣，我們就找到了平民傾向的代表——閔采爾必然失敗的原因。

徹底運用辯證法和唯物主義來解釋歷史，使恩格斯不僅能揭示出宗教改革時期思想鬥爭的實質，而且能說明當時社會運動的精神，衡量運動的可能性，并指出這些運動失敗的必然性，這些運動或者代表著屬於過去的力量，或者代表著向前跑得太快的力量，這些力量取得勝利的條件還沒有成熟。

在弗蘭茨·馮·濟金根和烏爾利希·馮·胡登領導下的貴族想要取消諸侯特權的企圖，就是那種想使不可阻擋的歷史進

---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5—406頁。

程向后倒退而遭到失败的运动的例子。貴族一面想消灭諸侯，沒收僧侶财产，同时力求建立貴族的民主，并在此基础上把正在崩潰的国家統一起来。济金根于 1522 年所开始的斗争以失败而告终，决不能有其他的結果。为什么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就特别明显地表现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力量，以及科学方法对史学家研究工作的意义。貴族的意图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他們的意图与当时生产关系的发展是背道而馳的。

“以农奴制为基础的貴族民主制，例如波兰的貴族民主制，又例如被日耳曼人侵占的各国在最初几百年間所存在的那种形式略有不同的貴族民主制，都是属于最原始的社会形态中的一种形态，以后都很自然地发展成为完备的封建等級制度，而封建等級制度显然已經是更高的阶段了。所以純粹的貴族民主制在 16 世紀的德国是不可能的事。貴族民主制已不可能建立了，因为在德国已存在着强有力的城市。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建立像英国那种使封建等級君主制轉变成資產階級君主立宪制的低級貴族和城市的联盟。”<sup>①</sup>

不仅城市不信任貴族；农民也把貴族看作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除非完全廢除农奴制和依附农制，取消一切貴族特权，才有农村人民和貴族联合的可能。但是貴族和一切特权等級一样，絲毫不願自动地放棄特权，放棄特殊地位，放棄其收入来源的絕大部分。

“于是到斗争爆发的时候，貴族毕竟是以孤軍与諸侯搏斗。諸侯在过去两百年間不断夺取貴族的地盘，在这一次当然也就輕而易举地制伏貴族，这是早在意料中的事。”<sup>②</sup>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438 頁。

② 同上，第 439 頁。

諸侯确实战胜了貴族。但是使貴族失败的那些社会发展条件也决定了革命党派的失败，虽然貴族和革命的平民分子是处于极端对立的地位的。

恩格斯在分析农民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和平民运动，特别是分析运动的最高表现即繆尔豪森事变以后閔采尔在图林根的活动时指出，为什么这种运动注定要失败。这正是因为当时社会条件对运动的胜利来讲还没有成熟：

“这是一个极端党派的領袖所难于应付的最糟的事情了。如果这样一个領袖在自己所代表的阶级进行統治的时机还未成熟，为了这个阶级統治必需贯彻一些措施的时机还未成熟，而这个領袖在这种时期中被迫出来掌握政权，这是最糟不过的事了。他所能做的事，并不取决于他的意志，而是取决于不同阶级的矛盾尖锐化的程度，取决于历来决定着阶级对立的发展程度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的发展过程。他所应做的事，他自己的党要求于他的事，又不取决于他，但也不取决于阶级斗争及其条件的发展程度；他为他一向鼓吹的理論和要求束縛住了，这些理論和要求又不是从当时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地位得出来的，也不是从当时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的或多或少是偶然的水平中得出来的，而是从他对于社会政治运动的总趋势的几分远见中得出来的。于是他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无可救药的进退維谷之境：他所能做的事，是和他一向的整个主張，他的原則，他的党的直接利益不相容的；他所应做的事，則是无法实行的。总而言之，他是被迫而不代表自己的党，自己的阶级，却去代表当时运动使其統治条件已成熟的那一阶级。他不得不为运动本身的利益而保护異己阶级的利益，他不得不以一些空話、諾言来应付自己的阶级，硬說那个異己阶级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任何人陷入这样的苦境，都是无可救药，注定要失

敗的。”<sup>①</sup>

恩格斯对闵采尔及其党派的历史命运的叙述是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来分析社会运动的最好的典范。从这种分析来看就很清楚，为什么农民战争会这样进行，而不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为什么农民战争会以革命政党的失败而结束，——而且也必然是这样结束——这个时期的革命风暴又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这种分析说明，为什么特鲁赫泽斯能够各个击败分散的，虽然数量大大超过他的军队的力量即农军。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德国的分散性——这是当时生产关系状况造成的结果——是革命运动和济金根领导的贵族起义的失败的原因；同时它又是诸侯政权胜利和进一步加强的原因。因此，唯物主义的分析使恩格斯能够从事件表面的混乱现象中找出它们的深刻规律性，从而摆脱了记载的框框，进入概括和科学预见的范围，而科学预见后来又能为制定当代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服务。这就是科学的史学成为真正生活的教师 (magistra vitae) 的令人信服的范例。

恩格斯在举出德国 1525 年革命和 1848 年革命之间的类似之处指出分散性和闭塞性在两次事件中都帮助了反革命时，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谁要是在 1525 年和 1848 年两次德国革命及其结局之后还会梦想联邦共和国，那末他没有别的地方，只配送到疯人院去。

“然而这两次革命，即 16 世纪的革命和 1848—1850 年的革命，尽管完全类似，却也大有本质的区别。1848 年的革命如果没有证明德国的进步的话，那末却证明了欧洲的进步。

“从 1525 年的革命中得利的是谁呢？诸侯。从 1848 年的革命中得利的是谁呢？大诸侯，奥地利和普鲁士。站在 1525 年的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468—469 页。

小諸侯背后的，是用捐稅鎖鏈把這些小諸侯束縛起來的小市民，站在 1850 年的大諸侯背後，站在奧地利和普魯士背後的，是很快就通過國債制服了這些大諸侯的現代大資產階級。而站在大資產階級背後的是無產階級。

“1525 年的革命是一次德國地方事件。當德國人進行農民戰爭的時候，英國人、法國人、捷克人、匈牙利人都已進行過他們的農民戰爭了。如果德國已分崩離析的話，那末歐洲就更加分崩離析。1848 年的革命不是德國地方事件，它是偉大的歐洲事件的一個部分。在 1848 年革命的整個進程中，它的動因並不是局限於一個國家的窄狹範圍之內，甚至不是局限於一個大洲的窄狹範圍之內。可以說，曾為此次革命舞台的這些國家，對於此次革命的發生，恰恰起作用最少。這些國家或多或少是一些不自覺又無心無意的原料，要在現在全世界都參加的這一次運動的進程中被重新塑造一番。這一次運動在我們的現存社會制度之下看起來當然只能是一種外來的力量，但它結果正是我們自己的運動。因此從 1848 到 1850 年的革命就不能像 1525 年的革命那樣結束。”<sup>①</sup>

恩格斯由於運用辯證唯物主義方法，由於他本着党性立場而得到了什麼呢？

他首先得到了客觀歷史真理。他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性指示，把所研究的事件與一定的社會經濟形態及其發展規律，以及這個經濟形態範圍內的激烈的階級搏鬥密切聯繫起來加以考察。因此，恩格斯才能從思潮對生產關係和階級衝突的依賴性來正確地解釋思潮的意義。這種分析能夠揭示出所研究過程的規律性，發現歷史發展的相應動力——人民群眾和他們在一

---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482—483 頁。

定条件下的斗争。

恩格斯指出，非常有必要根据对封建主义形态经济基础的分析，来分析整个封建主义形态的发展及其解体的因素。恩格斯在这里不仅说明了一般的规律性，而且也说明了15和16世纪德国形势的特点：这就是在德国出现的外省地方中心没有普及全国，结果就导致了帝国的解体，并对阶级斗争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恩格斯接着指出了分析各个阶级及其利益对理解社会发展规律性的意义。他同时还说明了当时德国在全国经济和政治分崩离析的影响下所形成的阶级状况的特点。

恩格斯分析了为瓦解封建主义而进行的思想斗争的意义，解释了这种斗争的神学外衣，说明了反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什么要采取异教邪说的形式。同时他也说明了与阶级力量分布有关的德国思想斗争的特点。当时分成了三个思想营垒：即反动天主教营垒、路德宗教改革的营垒和革命营垒，这对革命斗争的进程起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最后，——这也是最重要的——恩格斯分析了作为反封建主义革命动力的社会力量。恩格斯对诸侯、贵族、僧侣、市民阶级、农民和城市平民的地位所作的分析，对封建社会形态中社会运动的整个问题说来，是经典的分析。恩格斯在这里也揭示出了德国的特点，而这个特点是与市民阶层、骑士阶层和农民的特殊地位有关的，是与使农民——当时德国决定性的革命力量——不可能与其他阶级结成联盟的地位有关的。

恩格斯是站在党性立场上进行分析的，他是为平民运动讲话，表明自己拥护当时最革命的立场——平民运动的立场。但这也不妨碍他了解平民运动的局限性，及其在当时条件下失败的必然性。在这个背景上就明显地出现了一个对恩格斯来说是

主要的問題——农民是革命后备軍的問題。

正由于恩格斯的党性立場才有可能把过去和現在联系起来。要知道恩格斯是由于民主革命——这对当时來說是一个新的革命——問題而注意到农民战争的問題的。恩格斯拋棄了錯誤的、机械的、庸俗的类比，不是用今天的眼光去考察昨天，所以才从过去的历史中找到了力量，分析这些力量就能理解現在，并在这个基础上制定行动的原則。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与农民联盟的問題。因此，他的作品具有巨大的现实性，作者的意图也正是这样。今天的階級斗争得到了闡明，并由于过去的經驗而得到了丰富，反过来說，过去的事件由于揭示了其中的規律性，而使現代的讀者感到亲切，因为这些規律性也广泛地出現在現代的事件中。結果就出現了一本战斗的、具有鮮明的階級性的作品，这本作品是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动員无产階級的重要因素，是論证工人革命必須与新的农民战争結合这个論題的理論根据。

我們說，《德国农民战争》描繪了一个时代的客观的真实景象，是把作品的客观真实性与作品的党性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作品的高度科学价值正是作品无产階級的党性和战斗精神的結果，作品的客观性乃是与資产階級假客观主义坚决划清界綫的結果。对一个史学家来讲，这大概就是从分析恩格斯的作品中所得出的最重要的結論。

\* \* \*

現在我們再来看看另一部作品——兰克写的长达数百頁之多的篇幅巨大的《宗教改革时代的德国史》。作者是怎样看待德国农民战争史的呢？他采用了哪一种研究方法？获得了怎样的結果呢？

我們先从总的評述开始。兰克这本书是德国資产階級文献中崇尚淵博的典型著作，因为它的規模龐大，細节繁多——包括



需要的和不需要的，是一本与其說是具有分析和解釋性质的著作，还不如說是一本具有叙事小說性质的著作。这种文体是由兰克的綱領性前提所决定的，他认为历史應該 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sup>①</sup>（按照对这个公式的独特的解釋）。應該承认，兰克具有卓越的讲故事者的才能，他书中的有些章节（如对馬克西米利安一世命运的描写）讀起来就像一部历史小說。

但兰克使用的是哪一种方法，記載哪些事实，他又是怎样看待各种事实之間的相互关系，并从其中得出了哪些結論呢？

我們知道恩格斯在自己的作品前面写了一篇序言，在其中明确地闡述了他解釋历史的唯物主义方法的原理。但兰克只写了一篇具有綱領性的方法論声明，把史学的任务局限于“如实直书”地来記載和描写事件。然而，历史唯物主义教导我們，不應該相信不論階級的或是个人的主观印象和評價，更不應該过分相信这些階級和个人談論他們本身的东西。他們的实际行为才是标准。而兰克所做的正和他所宣揚的完全相反。馬克思在1864年給恩格斯的一封信里写道：

“这个飞跃的深刻的小研究家兰克所謂精神的東西——游戏的軼事的整理、一切大事的微細和瑣碎的溯源——对于国中这些青年人是严加限制的。他們只限于做‘外表的东西’，至于精神当留給他們的主人。”<sup>②</sup>

兰克宣揚的是客观主义，而自己所作却是极端的主观主义；他鼓吹超党性，而自己却無論从好战的唯心主义、或是从对人民革命的反动的敌对态度來說，都是站在极端的党性的立場的。在他的解釋中“如实直书”这个公式具有特殊的意义，即这个公式應該是用来为极端主观主义選擇事实服务的幌子，應該作为他

① 如实直书(德文)。——編者

②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18頁。

所采用的唯心主义方法的幕布。“客观主义”和“超党性”不过是被用来掩盖兰克及其学派十分明显的党性而已。宣揚“純記載”史学的兰克否认客观規律性，是为了用有意識地选择符合于他的观点的事实的方法，使自己便于对历史进行普通的伪造。因为兰克与自己的声明相反，他具有一定的历史过程的概念。这就是根据大日耳曼帝国沙文主义，仇視民主的一切表現和仇視人民群众运动的资产阶级—容克貴族的概念。兰克认为雅各宾派的統治是“一群野蛮人的統治”。他特別仇恨革命的农民运动。正由于他对革命的农民运动抱着反对的立場，也就是使他站到諸侯方面去的反对立場，所以路德就成了他最喜爱的英雄和“大丈夫”。可見正和表面現象相反，和他的声明相反，兰克是懂得农民战争的反对封建性质的，正因为如此，他才仇恨农民战争，并照例（ad usum）对进行中的阶级斗争加以伪造。兰克作为普魯士君主制度——在这方面繼續了浪漫主义学派可耻的傳統——的保卫者，在反对日益迫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斗争中起了十分显著的思想上的反动作用。

那么，我們要再談談他对农民战争所作的党性的评价，同时談談与恩格斯的观点直接对立的評價。正是應該在兰克所采取的资产阶级容克貴族的党性立場中，去寻找他歪曲历史景象的更深刻的政治根源。关于这一点我們在分析的过程中还会談到。

兰克違反了自己的声明也是从一定的哲学前提出发的。这个前提就是黑格尔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关于人民精神的概念与主观唯心主义地把个人看作历史創造者的概念折衷的結合。他的“小說性”的历史也就是帝王将相和思想家的历史，而自作解釋的这些人物的活动，在兰克的解釋中是历史的同义詞；因此，群众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而且正如我們所知道的群众运动也消失了。兰克的历史是思想和观点的历史。他认为社会存在是由

社会意識所决定的。神秘的“人民精神”和神的意志駕凌于一切存在之上。这整个复杂的唯心主义机构只是为一个简单的目的服务：即为了兰克所維護的資產階級—容克貴族的階級利益而伪造历史真理。这在他对农民战争史的解释中表现得十分清楚，他的解释是对有关德国人民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頁的历史真理所作的普通的无耻伪造。其实，这就是唯心主义史学所宣揚的“客观主义”口号的涵意。这也正是兰克的方法論观点使他得出的与科学不相容的結果。

我們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經看到，恩格斯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分析农民战争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态度的要求，应该从揭示經濟原因开始，因为是經濟原因引起社会运动、階級搏斗的一定变动，以及它們在思想上的反映。这一切就是他的几十頁书的内容，但是这几十頁书却是这本著作的基础，沒有它要了解和解释农民战争的事件是不可能的。

兰克花了三百多頁的篇幅来闡述农民战争以前时期的历史。然而我們在那里却找不到关于当时經濟的任何解释，找不到当时階級結構的任何分析，找不到对当时发生的階級搏斗及其与思想斗争的联系的任何暗示。我們从兰克那里什么东西也沒有找到。相反地，我們所找到的只是对帝王、教皇、諸侯、思想家的活动与生活变故的詳細記載，以及各式各样的国会會議和教皇會議的最詳細的清单之类。一句話，这是一部典型的唯心主义的关于帝王将相的历史，是一部不是为理解人民历史开辟途徑，而是封閉途徑的历史。

我們已經看到，恩格斯怎样在宗教改革的具体情况之下运用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識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他怎样因此有可能从事件的表面混乱中揭示出規律性。而兰克恰恰相反，他把历史发展看作是思想发展的反映和产物。这

是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基础，这种历史观不可避免地要把历史解釋成为是个人——即一定思想的体现者——的創造。这样，就为闡明历史过程的重复性和揭示历史过程規律性封閉了途徑。

我們从前面已經看到，恩格斯是怎样看待宗教改革史的：他把宗教改革史看成是階級斗争的历史，同时說明了作为群众的代表和領袖的偉大人物个人的作用。因此，他把路德和閔采尔看成是一定党派的領袖，他們的偉大正是在于他們代表了这些党派的利益和願望。而兰克完全相反，他崇拜“英雄主义”的史学观，把个人变成了历史的独立創造者。階級斗争在这里完全消灭了。

他的出发点就是这样的，虽然不說就很清楚：思想創造历史，个人——思想的体现者——是研究的主要对象，历史成为各个事件的搜集，在这些事件中不会表现出任何規律性，它們只是作为不具有重复性特点的事件而加以記載。这整个概念中都充滿了黑格尔的“人民精神”。

現在我們只举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这个例子可以表明，看来并没有如实地来解釋的历史究竟是什么样子。

兰克在談到人民由于宗教糾紛而分裂时，研究了关于这种分裂的根源的問題。兰克武断地說，現代的人——甚至是屬於天主教营壘的人——都承认，当时的天主教会應該进行宗教改革，兰克还补充說，这种改革是进行得恰如其分的。下面就是兰克用来为这一原理辯护的論据：

“我們还没有注意到新教教义所有比較近似的定义，它們只有随着時間而获得应有的意义，作为对当时宗教运动的总结，我們應該承认，深入德国人心的基督教精神逐漸在成熟，达到了不以各种偶然形式为轉移的对自‘我’的認識，溯本求源，追寻那些直接表明神和人类的永恒联系的最原始的证明(Urkunder)，在

这里基督教精神确信自己的真理，并敢于坚决摒棄那些已經不能保全自己的理論和令人苦恼的要求。”<sup>①</sup>

勿須注釋就很明白。原来这就是那种資產階級文献中大肆吹噓的所謂极力避免超出記載事实范围的客观史学。兰克并不善于继承黑格尔，同黑格尔相比，他不过是一个侏儒而已。

但是在这里我們关心的首先是研究方法的实际效果，是从一个史学家創作的观点来看这种研究方法能提供什么东西的問題。因此，讓我們撇开理論的前提轉过来看看兰克給我們描繪的农民战争的具体情景。在这个基础上我們才能够最好地評價他的理論和方法論前提的效果。

关于这个問題，总的說来，情景是很可怜的。

我們先从外形来看看。在这部約有一千三百頁的书里，关于农民战争的一章只占二十頁。这个比例本身已作了說明。关于农民战争以前的革命运动史，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里写了单独的一章，而兰克只写了三分之一頁。

現在我們再来談談农民战争史本身。首先是事实。資產階級史学引用兰克的一句著名的口号来宣揚客观記載的公設，这个公設只限于正确地轉述事实，也就是“如实直书”。我們已經指出，兰克把这个口号用来作为进行普通历史伪造的幌子。要知道，問題在于我們要記載哪些事实和迴避哪些事实。“純記載”史学的口号对那些打算尽可能放手伪造历史的人來說非常有利；在这种情况下，承认任何发展規律性无疑就是妨碍自由行动的因素。只要讀一下兰克的书中关于农民战争的一章，就可相信，作者是怎样运用了这种行动自由的。

首先，他避开了一些在他的观点看来不利的事实：例如根本

---

<sup>①</sup> 列·馮·兰克：《宗教改革时代的德国史》，德文版，第305—306頁。

不談圭茨·馮·貝利辛根的作用。然后又通过相应的安排、解釋和歪曲事实的方法来伪造事实。他完全没有說清楚下面这个问题：特魯赫澤斯是怎样战胜了起义者的优势力量的。同时，起义者力量的分散性又起着怎样的作用，因为这种分散性使特魯赫澤斯能够各个击破起义者的队伍；普通的欺詐行为起着怎样的作用，事实是特魯赫澤斯欺騙了对方，因为他装出了談判的姿态，想出了預先安排好的騙局。

不言而喻，当我们談到事件的总的情景时，情况就更糟了。为什么事件正是这样发生，而不是那样发生，哪些力量在这里发生作用，为什么济金根会失敗，他在自己的斗争中追求的是什么目的，为什么閔采尔会失敗，他給自己提出了什么目的。兰克在这些問題上都表现得完全束手无策，在他的叙事小說的臃肿龐大的形式后面隐盖着內容的极端空虛。兰克不理解这些問題，在表面上混乱的事件面前投降了。

例如让我们拿弗兰茨·馮·济金根起义的問題来看。我們記得恩格斯怎样深刻地說明了这次起义的动因，以及他怎样在分析当时起作用的社会力量的基础上指出了这次起义失敗的必然性。而兰克却企图把整个問題归結于济金根和特利尔的大主教之間的个人爭端；在他指出貴族反对諸侯斗争的一般意义的地方，他也是非常肤淺地看待問題的。結果，济金根的失敗就被看作是由于他的同盟者的軍隊受阻而发生的偶然事件；当兰克后来必須說明为什么諸侯，即济金根的敌人要支持路德的事业时，他就束手无策了。

当他要解釋閔采尔运动的性质时，他也是显得如此地无能为力。他企图把閔采尔說成是一个能吸引群众的教师 and 先知。然而他立刻又不得不承认，运动的根源在于农民群众所受到的日益加重的压迫，但他又想把事情引导到对群众不滿意于适当

让步的原因，復仇感占優勢等等進行心理研究的牛角尖上去。這在閱讀偽造的事件記載，即歪曲農民戰爭意義和性質的記載時，是很容易明白的。

蘭克到底提供了什麼呢？他只提供了一幅典型的唯心主義的時代景象，這種景象所依據的前提是：個人是歷史創造者，思想是歷史的指導力量。蘭克不承認發展規律。雖然他已宣布了一個不加任何主觀成分地描寫客觀事實的綱領，但實際上他的編寫歷史是主觀主義的。這首先表現在選擇事實的方法上，同時也表現在用偽造歷史事件客觀景象的態度對事實的解釋上。細心的觀察者很容易發現，在廣博和流暢的敘述後面隱藏着理論上的空虛和方法論上的貧乏無力。但也不可能不是這樣，因為誰要否認發展，誰也就是否認科學。蘭克的記載歷史的口號“如實直書”是違反歷史規律的，因而也是違反客觀歷史真理的概念，違反科學的史學的概念。

接着就會產生一個問題，對客觀現實景象進行這種唯心主義歪曲的根源何在？無疑是在於政治。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從這種觀點來看，蘭克的作品是一本為了資產階級容克貴族反動派的利益反對民主和革命群眾運動的典型的具有黨性的作品。作品與它的表面優點和聲明相反，具有鮮明的政治性質，而作品的全部方法論正是服從於這種反動的政治目的的。

恩格斯和蘭克的书是兩本完全對立的历史著作。首先他們是從兩個直接對立的政治觀點出發的，是保衛兩個直接對立的黨性立場的。兩本著作的這種政治條件性表現在他們的方法論上和書中所遵循的理論路線上。第一本書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與第二本書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是針鋒相對的。把史學看作以客觀發展規律為基礎上的研究學科的科學態度，是與否認這些規律的“記載歷史”的概念針鋒相對的。結果，恩格斯闡明了

所研究的历史过程的本质，并能由此得出对社会进步发展有利的結論。兰克不可能，而且也不願闡明历史过程的本质，他只是伪造历史过程的景象，偷运为反动的普魯士君主制度，为容克貴族和資產階級联盟服务的虛伪的結論。

兰克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史学的立場是反科学的立場。这种立場不是像編年史編纂者所采取的那种科学的史学以前的立場。在科学的流派已經产生和开始发生作用的条件下，繼續采取科学的史学以前的立場，那就不仅是对科学立場的反动，而且是反科学的。根据这种立場所写的作品，有的时候，特别是在揭示事实方面，还包含着实事求是的成分。但这一事实并不能使情况有所改变。从知識进步的观点来看，炼金者的活动也包含着一定的实事求是的成分，然而現在任何人都都会毫不犹豫地断定，那些今天还想研究炼金术的人所采取的是反科学的立場。

这个問題現在从科学的观点来看已經十分清楚，不承认客观历史規律，从而也就不承认科学的史学，这只能解釋为具有社会性质的偏袒，衰亡中的階級为保持政权而进行的斗争迫使这些階級采取这种偏袒态度。这一原理将在本书第二編的討論中举例說明。





## 第二編

# 对资产阶级史学否认 历史规律客观性的批判

---

## 第三章

### 资产阶级史学否认历史规律的 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把史学变成科学，是由于它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进行历史研究，找到了社会现象重复性的客观标准，并揭示了社会现象的发展规律。由于马克思主义在史学中采用了原则上与自然科学中相同的原理，把社会发展看作是一个自然过程（即虽然有自己的特点，但也和自然界的发展一样受规律所支配的过程），因而使人们对史学的性质和任务的理解产生了根本的转变。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党性有关的这种转变，就解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以及在实践中应用上述理论的可能性的角度说来，意味着一次彻底的革命。

列宁曾一再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意义。

“在全世界革命工人的新的丰富经验的光辉照耀下的马克

思主义理論，帮助了我們了解当前事变的全部規律性。它将帮助为鏟除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而斗争的全世界无产者更清楚地認識自己的斗争目的，更坚定地順着既定的方向前进，更可靠地取得胜利和巩固胜利。”①

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部著作中，曾經指出了在理論方面以及在实际应用理論方面所完成的这种转变。

“既然世界可能認識，既然我們关于自然界发展規律的知識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确实知識，那末由此就应得出結論：社会生活，社会发展也同样可能認識，科学方面关于社会发展規律的材料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确实材料。

“由此可見，社会历史科学，不管社会生活中的現象怎样复杂，都能成为例如生物学一样的准确科学，能利用社会发展規律来供实际的应用。

“由此可見，无产阶级党在它的实际活动中，决不应以什么偶然动机为准则，而应以社会发展規律，以及由这些規律中所得出的实际結論为准则。

“由此可見，社会主义已由关于人类美滿未来的空想变成了科学。

“由此可見，科学和实际活动間的联系，理論和实践間的联系，它們的一致，应成为无产阶级党的南針。”②

斯大林在这里簡明扼要地說出了馬克思主义对社会历史科学，即史学的理解的眞諦。

着重指出理論与实践的联系和理論对实践的意义，为我們指出了一个中心点，不掌握它就不能了解整个問題。

①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5頁。

②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13頁。

馬克思主義是革命的無產階級的理論，它在國際範圍內反映着無產階級的成就和要求。馬克思主義過去和現在在社會科學方面所研究的一些理論問題，與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實踐有着最密切的聯繫，說得更确切些，是實踐提出這些問題，又在實踐的基礎上得到解決。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着實際活動，它是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的強有力的思想武器。這不僅包括那些始終與實踐即政治的需要有直接聯繫的問題，如階級鬥爭的理論，革命和國家的理論等等，而且也包括其中一些最一般的科學抽象概念，如認識論或具體科學的方法論等等。由於問題本身的性質，這些抽象概念與實踐的聯繫都是間接的。歷史唯物主義當然也完全可以包括在內，不管我們把它看作是社會發展的理論也好，或者是社會歷史研究的方法也好。研究社會發展的科學理論以及以此為依據的科學的史學，過去是，現在還是革命無產階級的具有極其重要實際意義和政治意義的事情。由於資本主義自發的發展而正在成熟的無產階級在自己面前提出了掌握自己命運的任務，由於獲得歷史經驗而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階級鬥爭越來越成熟，因此，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客觀條件和主觀條件的問題，也必然獲得越來越重大的意義。

必須使無產階級認識自己的目的，以及認識達到這個目的的途徑和手段。這一點只有通過用科學的態度認識社會發展規律才能做到；由於這種認識能夠指明資本主義發展的趨勢，所以就會以科學的社會發展的預見來武裝無產階級及其革命的政黨，就會使它們能夠採取以認識事物本質為依據的正確政策。<sup>①</sup>

由此可見，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表明，人們需要一種關於社

---

① 參閱尼·謝·赫魯曉夫：《關於1959—1965年蘇聯發展國民經濟的控制數字》的報告，見《蘇聯共產黨第21次代表大會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9頁。

会发展的科学,并在暴露这种发展的机构的同时,为这种科学的誕生創造了条件。“到一定时期为止,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关系方面的变更,是不依人們意志为轉移而自发进行的。但这只是到一定时候为止。只是到已經产生和正在发展的生产力还没有充分成熟的时候为止。而当新生产力已經成熟时,現存的生产关系及其体现者的統治阶級就变成‘不可克服的’,即只有經過新阶級自觉活动,只有經過新阶級强力行动,只有經過革命才可扫除的障碍。这里特別明显地表现出應該用强力把旧生产关系消灭掉的那些新社会思想,新政治制度和新政权底偉大作用。在新生产力与旧生产关系互相冲突的基础上,在社会底新經濟需要的基础上产生出新的社会观念,新的观念組織和动員群众,群众团結成为新的政治軍队,建立起新的革命政权,并运用这个政权去用强力消灭生产关系方面的旧秩序而奠定新秩序。于是,自发的发展过程就让位于人們自觉的活动,和平的发展就让位于强力的变革,进化就让位于革命。”<sup>①</sup>

馬克思主义是从实践的需要当中,是从无产阶级阶級斗争的需要当中产生的。在这些需要的基础上,产生了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說及社会現象的研究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这个用来自觉改造社会現实的强大武器。由此可見,社会发展規律,也就是所謂历史規律的发现和系統說明,首先是由实际需要,也就是阶級斗争的需要所引起的。

只有在这种系統說明社会发展規律的科学产生以后,无产阶级政党在它的实际活动中才能有所遵循,正如斯大林所說的那样:“决不应以什么偶然动机为准则,而应以社会发展規律,以及由这些規律中所得出的实际結論为准则。”“……只有当这个

<sup>①</sup>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69—170頁。

时候，无产阶级的斗争才成为自觉的和取得胜利，社会主义才由关于人类美好未来的空想变成科学。”

但是，决定无产阶级对揭示和系统说明历史规律（历史规律是社会发展的基础）采取肯定态度的那个因素，同时也决定了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们对这件事采取反对态度。阶级斗争的实践必然使资产阶级对历史规律的概念采取坚决敌视的立场，因为这些规律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并把无阶级的力量在阶级斗争中动员了起来。因此，资产阶级甚至对社会发展科学的存在本身也采取了极端敌视的立场。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后，在历史上形成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反动性，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正在进行的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阶级斗争使反对无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反马克思主义、反彻底的科学观点的反动思想。资产阶级在社会科学中采取反科学的反动立场并不是偶然的。这不是思想继续发展和斗争的“内在规律”的结果，而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以及上层建筑在这个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的结果。

资产阶级坚决地反对历史的客观规律，因为这些规律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发生不利于资产阶级的作用。既然任何科学都与发现和研究现实生活某一领域中的规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资产阶级就反对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因而也反对科学的史学。

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歪曲真理的资产阶级理论的政治倾向；这种倾向有时表现为某种不自觉的行动，有时则表现为完全自觉的和有目的的行动。历史的发展是这样进行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作为他们政治上反动的表现越来越有意识地形成自己的理论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九世纪末，个别论的基础是兰克的这个口号：史学不应越出“客观主义”即伪科学的记载

的范围；而在十月革命以后，个别論則日益趋向于好战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并創导资产阶级的党性。

柯罗齐的“现代主义”<sup>①</sup>的意义就是这样，这一哲学流派在美国得到杜威的“工具主义”的充实而成为资产阶级史学中的好战的流派。这一主观主义流派不仅坚决拒绝（这是不言而喻的）关于历史客观规律性的一切思想，而且还直言不讳地供称，即使在前一时期，它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史学理论观点的政治用意，只是对此往往力加掩饰而已。

为了举例说明，我们将在下面论述几派的意见，同时应该声明，这种例子我们不仅还可以举出很多，而且也能够在客观唯心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中找到。

1949年12月，美国史学会会长康依尔斯·李特作了标题醒目的演讲“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李特是一个好战的主观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他的演讲也就是对史学中的相对主义的辩护，演词中援引了主观主义的独特概念，并否认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存在。但是这些，我们现在不拟多谈。使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位美国史学会会长怎样攻击一度曾被大肆吹捧的客观主义，他怎样公然运用政治论点毫不隐讳地宣布资产阶级的党性。

李特硬说，现在世界正处于从自由社会到计划社会的过渡时期，因此问题在于是独裁取得胜利还是民主管理取得胜利。按照李特的意见，我们还为自己保留的自由主义时期的特点，就是对社会所遵循的目的和价值的中立态度。

李特硬说，这是很不好的；必须摒弃这种中立主义态度，采取党性的立场。

“如果我们想在生活中站得住的话，我们应当公开地采取战

---

① 这个名词是从“现代”（*praesens*）这个字产生出来的，它所谈的是把历史理解为现代创造的一种理论。

斗的立場。对一种坏学說的解毒剂是好的学說，而不是精神的中立。我們應該提出自己的目的，确定自己的理想，規定自己的标准，并动員我們社会的一切力量来支持它們……原子彈要求迅速的決定。对社会进化采取自由主义的中立立場、風平浪靜的行为主义立場已經不行了。

“总体战争，不管热战也好，冷战也好，号召所有的人都站到队伍中去，要求每一个人都参加。史学家的这种責任不会比物理学家更輕些。

“……这听起来好像是保卫一种形式的社会监督，反对另一种形式。說实話，实际上也的确是这样的。但在我們这个分裂的世界里，我看不出有其他可供选择的道路。大概在任何一个計划統治的世界里，我們不可能成为行动完全自由的人，甚至我們說話写字也是这样。重要的是，我們要接受和承认那种对保卫我們生活方式具有重要意义的监督……这就是說，要我們承认那些无需討論的明确的基本价值。我們應該尽可能更正确地确定这些价值，并从历史的角度或其他角度保卫它們不受任何攻击。”<sup>①</sup>

十分明显，李特所提倡的是什么“生活方式”和哪些“原則”，他所同意的是怎样的监督，以及他所說的史学家的“社会責任”是什么，同样也很明显，他的相对主义和否认客观規律含有什么政治內容。李特是美国“原子”壟断資本家官方的思想家之一，他所提出的这些原理，清楚地說明了現代資產階級史学的政治面貌。

貝克尔暴露了这些观点的政治根源。他步齐麦耳和柯罗齐的后尘，把历史看作是构造。他与那些資產階級的方法論家，如

<sup>①</sup> 李特：《史学家的社会責任》，見《美国历史評論》，1950年第55卷，第2期，第283—284頁。



德国的萊辛、美国的杜威、英国的考令伍德等人，属于同一等类。他在二十年代談到这个問題的时候，毫不隱諱地說明了問題的內幕。

“和我們今天比較起来，大概还没有这样一个时期，历史构造对实际政治具有更大的意义。只要想一想关于和約問題的初步談判，关于东欧或东方各个地区新的国家形式就够了。历史构造也是国内政策，特别是文化政策方面的重要論据。”<sup>①</sup>

不需要注釋就可以明白，这种以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精神建立起来的历史“构造”，是为怎样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而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規律又是为怎样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不过，另一个美国史学家德斯特劳对美国相对主义者，特别是对李特的观点已經作了这样的注釋，清楚地表明了他們的观点的政治面貌。

德斯特劳在強調指出历史相对主义对于在思想上論证欧洲法西斯主义作用的时候，关于美国相对主义者，他这样写道：

“貝克尔、比尔特和李特的追随者們，同以前的柯罗齐、梅涅克和赫伊斯的追随者們一样，不能預見和理解：由于他們把自己爱好的学說作为人們公认的关于历史研究的基础，由于采用控制的原則，为了观点的統一，他們便把历史变成了宣傳工具，并且預先判定了历史完全屈从于每一个要想控制国会的統治集团……”<sup>②</sup>

不管是由于自由主义的錯觉也好，或是由于他的錯誤也好，德斯特劳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一判断之所以比較有价值，因为它是出自一个資产階級史学家之口。

① 貝克尔：《历史認識的变迁》，見《新展望杂志》，1927年德文版，第38卷。

② 德斯特劳：《关于現代历史理論的几点意見》，見《美国历史評論》，1950年第55卷，第3期，第525頁。

在这里要重說一遍：作者只想举几个例子來說明資產階級史学家否认历史客观規律的政治傾向这个主题，而且就其性质來說，这种說明帶有局限性和片面性。

上一世紀末以来的时期标志着資產階級人文学者反对把史学变为科学的殊死掙扎。虽然关于史学是不是科学，怎样把史学变成科学，史学与社会学的关系等等問題，曾进行了无休止的討論和爭辯，但实际上資產階級史学家的一切努力都是用来反对唯物主义，用来捍卫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而首先这些努力是用来否认历史客观規律，捍卫那种把史学的职能看作只是單純叙事的、艺术的等等，而不是科学的这一定义。資產階級理論家們用各种不同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他們自己創造了一些精心雕琢別有用心的学說，異曲同工地彈着反科学的反动的調子。

这些学說多得不可胜数，因此，一一来分析它們是沒有意义的。<sup>①</sup>

我們將只談一些其中最具有影响的，而且是对波兰的史学发生某种影响的学說，特別是现在还感觉到它們的阻碍作用的那些学說。同时，我們力求做到：通过对这些学說的分析批判，使我們能够闡明馬克思主义对所涉及的一些問題的正确观点，从

---

① 資產階級历史方法論家安利·培尔說明这方面的情况如下：“有人认为，历史是研究偶然事件(迈耶)、个别現象(李凯尔特)和各个因素的(柯罗齐，亚德里安·賴維尔)，是研究出乎規律(賴維尔)、異常事件(李凯尔特)，或者认为，历史是研究一件一件地發生的事实，即沒有重复性的事实(賽諾波尔)。历史不同于系統的科学(迈耶)，理論和概念的科学(柯罗齐)，抽象的科学(賴維尔)，規律論的科学(文德尔班)，自然科学(李凯尔特)，即与抽象地規定必要的联系，以及規定普遍的、經常的联系的科学不同，历史把单独發生的事件看作个别事件，把新的东西看作在經驗性的现实中發生的东西。历史只是与近因有关。它的任务是：尽其所能揭示具体的因果性、因果依存性，而不是揭示規律和概念。”(安·培尔——史学上的綜合法。巴黎1911年法文版，第24頁)

而能够加强我們关于史学的中心問題的論据。在批判地分析否认历史規律的資產階級学說之前，我們先把这些学說分为两大类：

（甲）个别論的学說，就是否认历史規律，把史学的任务局限于記載个别事件的学說。

（乙）形式上承认历史規律的存在，但是以唯心主义观点把历史发展規律弄得神秘莫测从而否认这些規律的学說。

## 第四章

### 对个别論的批判

#### 第一节 个别論的方法論否认历史規律

威廉·狄尔泰的观点是个別論概念的基础

自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以来，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在資產階級科学中占統治地位的科学分类法（即把科学分为規律論和个别論），与十九世紀末成为資產階級人文学者注意中心的科学分类問題，有着最密切的联系。这里使我們感到兴趣的是这个問題的几个特殊方面，如这种科学分类法怎样影响了对史学性质的理解，特别是它怎样反映在資產階級史学对历史規律的理解和解釋上面。探討人文学的全部理論問題远远超出了本书范围，这需要作专门的研究。但为了使我們直接感到兴趣的問題获得进一步的結論有所依据，我們現在不得不对这整个問題作一說明，哪怕是最簡短的說明。

从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把科学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普通的分类法問題是完全明白易曉的。对科学的这种划分是从辯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原理出发的；这种划分的基础是研究对象不同：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及其发展規律是第一类科学的对象，客观存在的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規律則是第二类科学的对象。

这种科学分类是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的；因此它能保持研

究方法的一致性(其基础是不論自然科学或是社会科学,都在同样的程度上承认存在的客观性和研究对象的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并能考虑到社会现实的特点。由于充分考虑到社会现实的这个特点,唯物主义对社会科学的理解特别强调社会发展的自然—必然性,并使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实践、对政治斗争的一切后果明朗化。

正是在这一点上,科学分类问题及确定它们的性质问题,与社会发展规律、历史规律的问题,以及阶级—政治制约性的整个问题和这方面理论观点的阶级—政治意义,都交织在一起了。使资产阶级科学强烈反对历史客观规律的那些原因,同样使它不得不在科学分类问题上,采取把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对立起来,并把历史解释为不服从规律的现象的那种立场。十九世纪末在资产阶级人文学者中出现臭名远扬的“反对实证主义派”的根源就在于此。

在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其实是上一世纪最后三十年这个时期,它的特征是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大大高涨。同时,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威望和意义也随之而增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组织和动员作用及其对阶级斗争的实际意义也越来越明显。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理论,不仅在意識形态领域内,而且直接在政治领域内,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望而生畏的理论。

按照事物的本性和斗争的逻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越来越清楚地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反动。这在社会科学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资产阶级人文学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由于为面临死亡威胁的资本主义基础服务并加以保护,越来越明目张胆地、越来越坚决地转到极端反动和反科学的立场。把新康德主义与黑格尔主义折衷地统一起

来的以德国唯心主义为代表的人文学理論——其代表人物是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以及他們的追隨者和繼承者，——就是这种反动势力的反映。帝国主义初期的人文学就是这样的。

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和他們的繼承者都以反对实证主义为口号。资产阶级哲学史和社会思想史也常常这样来解释他們的理論。但这种解释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它不是采用思想发展关系的某种“内在”标准，而是采用真正客观标准——社会职能的标准。

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理論，实际上是反马克思主义、反革命无产阶级的意識形态的反动表现，而它們反对实证主义則是次要的从屬的。它們反对实证主义（虽然它們本身不是什么別的东西，而是唯心主义的变种），因为在新的条件下，实证主义对于反马克思主义說来，已經是一个无能为力的反动理論了，因此已成為危險的东西。被工人运动的发展及其思想体系影响的增長吓坏了的资产阶级，坚决地反对承认历史規律，千方百计地否认历史規律的客观性；可是在这时候，却跑出来个保克耳或泰恩在那里一再強調要承认历史規律的存在，然而作为唯心主义者，他們是以神秘化的形式来表现这些規律的。他們为了“科学地”论证对历史規律的否认，资产阶级在科学分类当中竭力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对立起来，而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方面，同样地力图把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对立起来，可是在这时候却出来个穆勒，宣布了有必要把自然科学的方法推广到社会科学中去。在前一个时候曾經作为资产阶级思想武器的东西，在新的条件下已經变成反对它自己的东西了。形势的发展迫使资产阶级放棄了动摇的不彻底的立場，轉向坚决的思想反动的立場。专门研究社会科学方法論的柏林哲学教授威廉·狄

尔泰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内这个唯心主义反科学运动的旗手。

狄尔泰宣称，人文学认为规律性不是事变的进行，而是事变的结构，他实际上是否认历史规律。狄尔泰关于人文学方法论的见解，是彻底否认历史规律的基础。这一情况使我们值得对他的观点加以注意，特别是因为帝国主义早期资产阶级人文学的所有流派都或多或少地因袭他的观点，如李凯尔特“文化科学”理论，马克思·韦伯的“理想的典型”理论，实用主义和柏格森哲学的非理性论和“生活哲学”，胡塞耳的现象学，以施普朗格和特雷耳奇的理论为代表的“精神科学”等等。在波兰，弗洛利安·兹那涅茨基的价值论直接脱胎于李凯尔特，而间接脱胎于狄尔泰。狄尔泰的观点是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一种特殊混合物（帝国主义时代各个模仿的哲学流派都具有这样的特征），他的观点是人文学中一切唯心主义的反动思想的出发点<sup>①</sup>。

在关于方法论的论断中，狄尔泰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使人文学脱离自然科学，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对立起来。实证主义不同意那些不以自然科学方法为基础的思想体系有权被称为科学，而狄尔泰则因为想驳倒这一论题，力图把人文学搞成一种具有独特对象和独特方法的科学。他把科学分为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en)和精神科学(Geistwissenschaften)。<sup>②</sup>

狄尔泰完全有意识地时而采取客观唯心主义立场，时而又

- 
- ① 只要是浏览过狄尔泰的著作的人，都可看出塔塔尔凯维奇在他的《哲学史》第3卷中(1950年华沙版，第187页)对狄尔泰所作的完全错误的评价。按照他的意见，狄尔泰创造了一种“既不是唯心主义的，又不是自然主义的”新的概念。这种评价是所谓教授客观主义的一个有趣的例子。
- ② 在狄尔泰以前固然也有这种科学分类法的尝试(例如安培曾把科学分为宇宙学和新词学)，但狄尔泰的体系所具有的一些特点，却成为使资产阶级人文学的方法论自十九世纪末以来附和他的理论的原因。

采取主观唯心主义立場。当在他看来个人心理世界是人文学的特殊对象，心理学是一切部門人文科学应以之为基础的記載学科的时侯，狄尔泰就采取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場；但当他从人文学著作中客体化了的黑格尔的“客观精神”来解釋他自己的“精神”（Geist）的时候，他又采取显然是向黑格尔体系的反动方面靠攏的客观唯心主义立場<sup>①</sup>。在下面附注中所引的一段話，使人毫不怀疑狄尔泰的概念带有客观唯心主义的性质。把精神客体化的人文学的全部理論雄辯地证明这一点。另一方面，狄尔泰又是个主观唯心主义者，他直截了当地宣称：“人、历史和社会的研究总和，是我的著作的出发点。我不是从对象，从人类社会历史的现实，从認識这一对象的态度出发的。这是概念的抽象化，而上述的现实則是理想的概念（Idealbegriff），它标志着永远不能完全达到的認識的目的。精神工作（geistliche Arbeit）将是作为一切理論的根据的事实（das Tatsächliche），精神工作的产生將說明認識人或社会、或这两个因素的相互关系的目的。

---

① 这不仅清楚地說明了塔塔尔凱維奇对狄尔泰的观点的評價（按照他的評價，仿佛狄尔泰的观点既不是唯心主义的，又不是自然主义的）而且也說明了他的这种論断：“精神哲学”是施普朗格和特雷耳奇在二十世紀的最新的創作。（塔塔尔凱維奇著：《哲学史》，第3卷，第192—196頁）其实，施普朗格和特雷耳奇只是片面地夸大了在狄尔泰的观点中已經“用确切詞句”所表达了的东西。狄尔泰写道：“現在我們有权用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这个名詞。現在它的意义很明显。自从十八世紀以来由于需要給这类科学定一个总的名称，曾有人称之为‘道德科学’（Sciences morales），或‘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最后則称之为‘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en）。这种名称的改变表明，其中沒有一个名称是适合的。在这里應該說明，作者是从什么意义上来使用这个名詞的。我使用这个名詞的意义是与孟德斯鳩的所謂法意，黑格尔的所謂客观精神、或謝林的所謂羅馬法精神的意義相同的。”（狄尔泰：《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結構》，見《狄尔泰全集》，第7卷，1927年萊比錫德文版，第86頁）



“每一种工作决定着認識的主体及其历史眼界与某一組事实的关系，而这些事实的范围又是由一定的視野所决定的。只有从某一种观点出发，每一种精神工作才有对象。因而每一种精神工作就是某种一定的相对的观点，和認識它的对象的方式。”<sup>①</sup>

波兰的狄尔泰的信徒齐格蒙德·列姆比茨基在論狄尔泰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狄尔泰的出发点是一个最高的哲学論题——‘現象的命題’（Der Satz der Phänomenalität），这个論题断言，对我所存在的一切服从于一个最普通的条件，即这一切都是我意識中的事实。事物、对象只是对意識說来才存在，并且只是在意識中才存在。对象和主体的对立与分离，只是在意識的行動中才发生……狄尔泰认为，我們相信外部世界的存在，不应根据我們的思維的联系，这种信念产生于我們生活的联系（表现在本能、感觉和意志中，与思維过程相同的过程表明这种联系）……对外部世界存在的信念是在体验的过程中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同时形成了自我意識。就在这一个意識行动中，‘我’被划分开来，意义的形象也作为某种外部东西被标志出来，因为对我们說来，‘自我’（Selbst）只是在与外部世界不同的限度內才存在，而‘外部世界’这个名称只是在与‘自我’区分开来的程度上才有意义。按照狄尔泰的意見，完成这种区分工作的体验并不是一种概念，而首先是意志的表现。”（列姆比茨基著：《威廉·狄尔泰》，見《哲学評論》，第17年度，1914年，第1期，第104—105頁）。

毫無疑問，我們在这里所看到的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变种。記載心理学被当作整个人文学的基础学科，就可以证明这

<sup>①</sup> 狄尔泰：《精神科学导論》，《狄尔泰全集》，萊比錫1923年德文版，第412—413頁。

一点：

“心理学的材料将是通过分析社会历史真实情况而获得的最简单的材料 (Befund)，正因为如此，所以心理学是所有具体的精神科学中首要的、最基本的科学，而与此相适应，心理学的真理就形成了进一步加工的基础……从心理学在其他精神科学中所研究的原理，可以为它自己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一种记载科学，心理学应当区别于解释的科学 (erklärende Wissenschaften)。”

前面已经说过，狄尔泰的科学分类法的意义在于把人文学与自然科学对立起来。狄尔泰把它们对立起来的目的是非常明显的，虽然由此作出结论的不是狄尔泰本人，而是其他一些人，特别是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狄尔泰在对人文学所作的唯心主义解释当中所起的作用在于：无论在对象方面，或是在方法方面，他都为精神科学的独立打下了理论基础。资产阶级人文学方法论认为，狄尔泰为此应当受到赞扬，而从科学观点来看，这是他的反动性的明显标志。

在《精神科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 中，狄尔泰把所谓精神科学解释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它的对象是社会历史现实<sup>①</sup>。乍看起来，这好像完全正确。但只须稍微深入一些看看这个定义的意义，就可以发现隐藏在这个迷离的名词后面的极端接近于神秘主义的唯心主义。因为问题就在于对“社会—历史现实”作何理解。从唯物主义观点来看，这是社会关系（不论生产关系，或是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成长的意识形态关系都一样）在其历史发展中的总和。但狄尔泰不是这样来看社会现实的。他所理解的“现实”是以某种方式客观

---

① 狄尔泰：《精神科学导论》，第4页。

地存在的作用、意义和价值的世界，类似柏拉图的思想范例<sup>①</sup>。

这些作用、意义和价值，本身又是人类心理的问题，是“生活”、“精神”的客体化。<sup>②</sup>在这里又形成了客观唯心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的一种独特的混合物，在其中是“瞎子给跛子带路”——一团糟。

这样一来，从人文学的这种明确而特殊的对象中(狄尔泰把它与历史的东西等同起来)，就产生出“理解”的这种独特方法。理解就是在个人的心中对超个人精神的创造和客体化的体验。狄尔泰还从方法方面把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对立起来：自然科学的方法是观察，而精神科学的方法则是上面所说的那种意义的“理解”。

不难看出，在这里我们碰到了狄尔泰的唯心主义概念的非

①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自然界只是在它起作用 and 能影响历史的范围内，才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外界的东西固然也属于历史的领域本身，但构成音乐作品的声调，用来作画的画布，在其宣读判决书的法庭，在其中服刑的监狱，它们只从自然界中提取自己的材料，而精神科学领域中的每一动作，虽然也运用外界的事实，但仅仅与这些事实由于精神活动而获得的观感和意义打交道；这种动作服务于能够领悟这种意义和观感(Sinn)的理解。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区别，不仅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的区别，不仅是态度和方法的不同，而且理解的行为的主要根据是组成它的对象的东西，并且是在原则上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对象的某种外界事物。在其中(即在作为精神科学的对象的那些外部事实中——沙夫)，精神被客体化了，目的明确了，价值被实现了，正是被放到那些事实中去(das in sie hineingebildet ist)的这个精神因素实现了理解。”(狄尔泰：《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结构》，第118页)

② “这里揭示了‘精神科学的概念’的内容。这些科学的作用范围与理解如此广阔，而理解又以生活客体化为其固定的对象。这是与理解所涉及的现象分布的范围有关的，而精神科学的概念，要通过生活在外部世界中的客体化才能明确起来。精神只能理解它自己所创造的东西。

原先人们对此总是谈到规章、法律、宪法的精神。现在可以说，精神在其中客体化了的一切，都属于精神科学的领域。”(狄尔泰：《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结构》，第148页)

常重要的一点。瑪克斯·韦伯所提倡的所謂理解社会学与这一点相接近，直观主义的理論也与它相似。实际上，这里的问题就是他把社会生活完全归结为精神现象，也就是他在社会科学中的极端的唯心主义立场。如果社会因素与精神因素相符合，那末，社会事件就不可能被作为客观现实来观察，而只能作为被理解为精神产物的理性直观的体驗来观察。显然，这样的立场排斥了建立客观的社会科学的可能性。

按照狄尔泰的意见，凡精神在其中客体化的一切，都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这一概念显然是黑格尔哲学的继续，其不同点只是，以同样的形而上学的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生活客体化”的概念，来代替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的“客观精神”。实际上，狄尔泰与黑格尔不同点就在于：黑格尔认为哲学、艺术和宗教都是绝对精神的表现，而狄尔泰则认为它们是客观精神的创造，但通过创造性的个人而表现出来。这样一来，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严密的体系就被打开了一个有利于主观唯心主义，有利用从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利益来看是必要的“伟人”論的缺口。但狄尔泰的这种“功績”并没有使他摆脱客观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而只是表明，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折衷主义者。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波兰传播狄尔泰的观点的齐格蒙德·列姆比茨基对他的评价，乃是对非常肤浅地理解哲学概念和哲学派别的一种譏諷：

“这样来说明狄尔泰与黑格尔的关系是最好的判断，至于其他想表明狄尔泰哲学的意义何在，以及他在哲学史上何以会永远傳名的其他任何企图，通过实证的分析，摆脱一切形而上学的前提，为人文学創立新的基础，都比不上这样的說明。”<sup>①</sup>

这里所談的是唯心主义者、非理性主义者、形而上学者的威

<sup>①</sup> 列姆比茨基：《威廉·狄尔泰》，第114頁。

廉·狄尔泰，他为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人文学的极端蒙昧主义流派打下了基础。如果对真理的这样的提法不那么令人头痛的话，那么可以说，这种评价是可笑的。

上面就是我们关于狄尔泰及其把科学分为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所要說的一切。

这种划分不仅限于把人文学与其他科学分开来（这是有其根据的），而且还把人文学与其他科学对立起来。在这里这种对立也涉及对因果关系及科学规律的作用的理解。狄尔泰为人文学的非科学的、反科学的概念打下了基础。完成这个概念的创立的则是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他们虽然表面上属于哲学中的另一个新康德主义的流派，但他们关于人文学理论的基本观点却是与狄尔泰一致的；至于李凯尔特，则完全公开地以狄尔泰为依归。文德尔班把科学分为规律科学和个别科学（方法上的差别），从而继续了狄尔泰把人文学与自然科学对立起来的做法；而李凯尔特则把科学分为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对象和方法上的差别）。对这两种理论的批判是与我们要研究的历史规律的问题直接有关的。

## 第二节 論所謂个别科学

（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概念的批判）

文德尔班是史学的特殊性理论的真正创始人；按照他的思想，特殊性的依据是，历史作为一门科学并不知道有规律，历史只是力求认识个别事物。在他有名的1894年任职大学校长时发表的题为《历史与自然科学》（«Geschichte und Naturwissenschaften»）的演讲中，他把科学划分为规律科学和个别科学；这种分类直至现在还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保留在资产阶级科学中。

他的主导思想是把个别的東西与一般的東西对立起来；并以此为依据，把研究个别現象的科学（个别科学——这个名詞源于 *idios*“独特的”和 *grapho*“写，記載”）与研究一般現象及其所固有的規律的科学（規律科学——这个名詞源于 *nomos*“規律”和 *thetos*“提供的”）对立起来。我們的批判分析就从这个中心問題开始。

在探索划分史学的原則当中，文德尔班得出了这样的結論：即这个原則与各个个别科学的对象无关，而是与方法有关。按照他的意見，找寻个别現象和一般現象，这就是科学划分的方法論原則。他說：

“因此，我們在这里有一种純粹方法論的有关經驗科学的划分，这种划分是以一定的邏輯概念为根据的。划分的原則是根据这些科学的認識目的的表面性质。有一些科学探索一般規律，另一些科学則探索个别的历史事实；如果以形式邏輯的語言来表达，有一些科学的目的是一般的明确表述，而另一些科学的目的則是个别确断的原理。因此，这种区别是与那种最重要的，有原則性意义的关系，即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分不开的，苏格拉底曾认为这种关系对一切科学思維來說都是根本的东西。从这里也就产生了古代形而上学中的长期爭論：柏拉图在不变的类屬概念中找寻实在的东西，而亚里士多德在发展中的有目的的各个存在中找寻同样的东西。現代自然科学則教导我們，通过对伴随发生的事物（*des an ihm stattfinden—den Geschehens*）的經常必然性来判定存在的東西：因为現代自然科学提出了自然規律来代替柏拉图的思想。

因此可以說：在致力于認識实在的事物时，經驗科学或者探寻表现为自然界規律的一般因素，或者探寻表现为一定历史形式的个别因素。在第一种情况下，經驗科学是与实在事件的不變形式打交道；在第二种情况下，是与这种事件的暂时一定的內

容打交道。有一些科学是关于规律的科学(Gesetzeswissenschaften)而另一些科学则是关于事件的科学(Ereigniswissenschaften)。前一类科学解说永远存在的事物，而后一种科学则解说仅仅发生一次的事物。如果允许创造新术语的话，科学思维在第一种情况下是规律的，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则是个别的。按照一般公认的术语来看，可以就同样的意义来解说自然科学学科与历史学科之间的矛盾，这是指，就方法论的意义说，心理学可列入自然科学。”<sup>①</sup>

这样说来，自然科学学科与历史学科之间的矛盾，原因在于，前者应该是关于规律的科学，而后者应该是关于事件的科学；前一种科学研究一般的、重复的因素，而后一种科学则研究个别的、不重复的因素。把个别的因素与不重复的因素等同起来，这一点在李凯尔特概念中起着主要作用。由于我们在下面要批判把科学分为规律科学和个别科学的这种划分，所以我们不能不认真地注意这一点。

按照文德尔班的意见，科学之间的区别，可归结于在这些科学中所采用的方法：在一种情况下是一般化，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是个别化。对象在这里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同一研究对象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解释，看你所采用的方法如何。在任何情况下，从文德尔班概念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规律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历史规律这一概念本身就是有矛盾的形容法(contradictio in adiecto)。很久以后，李凯尔特的理论又极力支持这一结论的正确性。在文德尔班概念中，这一结论又被看作为前提。凡是要加以证明的事物，都完全可以当作前提来接受；因此，无怪乎从这一原理中得出的结论，完全符合个别论

<sup>①</sup> 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第144—145页。（着重点是我加的。——亚·沙夫）

科学的創始人的意图。下面我們可以看到，这还远不是唯心主义的人文學理論家們在反对历史規律的斗争中所使用的唯一的邏輯上的欺騙伎倆。

文德尔班的继承人亨利·李凯尔特(海德耳堡大学教研組)因襲和发展了他所提倡的思想(首先表現在《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Die Grenzen der naturwissenschaftlichen Begriffsbildung»)这部著作里，他的另一部著作《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是对这部著作的簡要通俗的說明)。李凯尔特把狄尔泰的概念和文德尔班的概念結合起来，企图既从对象方面、又从方法方面来确定人文學的独立地位。因此，他的文化科學理論成了唯心主义人文學的主要的、最有代表性的理論。

在按对象划分科学方面，在价值哲學的問題上，李凯尔特都販運了狄尔泰的基本思想；但同时他却摒棄了作为划分原則的自然与精神(Natur-Geist)的对照提法。如果把精神(Geist)看成是个人的心理，那末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科学的方法也就屬於心理範疇，因为心理是与现实的实体方面处在不可分割的統一之中的。后来，当人們已經普遍承认把精神理解为客观精神的时候，李凯尔特在其《历史哲學問題》(«Die Probleme der Geschichtsphilosophy»)一书中又补充說，即使这样来理解精神(看作是客观意义和見解的世界)，自然与精神的对立也不能成为划分类别的适当标准。因此，他用了另一种对照提法，即自然与文化的对立，把科学分为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就是以这种对立为依据的。同时，他用极其唯心主义的态度来理解文化，把它认为是和所有反映任何价值的东西同一类型<sup>①</sup>。

“可見，自然界是从本身产生出来的东西的总和，是由于自己本身的‘增长’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東西的总和。与自然界

<sup>①</sup>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第19—20頁



对立的文化，或者是作为通过自己的活动来实现目的的人所直接創造的东西，这些目的以一定的方式获得价值(nach gewerteten Zwecken)；或者就其中存在的价值而言，最低限度是人自觉地細心培植出来(gepflegt)的东西，如果这种东西已經存在的话……可見文化的对象是与价值联系着的，因此，我們將把它們称为福利，以便同时把它作为与价值联系着的现实，来区别于价值本身；价值不是现实，我們也可以从价值中得到抽象概念。自然界的過程不可能被想像为价值，这些过程与价值沒有联系；因此，如果我們把一切价值从文化的对象中抽出来，那么文化的对象就变成了普通的自然界。”<sup>①</sup>

但是这种对于对象的划分只是对于方法的划分本身的开始。如果說以前李凯尔特追随了狄尔泰，那么在这里他是在追随文德尔班。他說：

“对我們來說，仅仅这样(按对象划分——亚·沙夫)，是不够的。物质的划分原則还必須以形式的划分原則来加以补充……自然界作为事物存在的相同的邏輯概念，又可能是相对立的邏輯概念，其对立的程度决定于一般的規律。据我看来，历史这个名詞在最广泛的表面意义上的概念，即在形式上与一般規律的概念相对立的，所謂个别的单独的一次事件的概念就是这种概念；因此，我們就不得不談到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方法之間的区别。”按对象划分的原則是与按方法划分的原則不相符合的；因此，按照李凯尔特的意見，存在着純自然科学和純历史科学，而除此以外，也还存在着介乎两者之間的科学領域。

历史科学的特点，其根源究竟何在呢？在于历史的对象是研究“有意义的”现实的文化；因此，为了弄清楚这种现实，我們

---

①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第19—20頁。

應該对价值采用个体化的方法<sup>①</sup>。但是也在于，而且首先在于：历史的目的是要提供对现实的个体化概念。为了代替說明，我們在这里举出一个完全从唯心主义“科学”的精神出发的关于历史“作用”的論断。“有某种科学，其目的不在于制作規律，也根本不在于創造一般概念；这就是按照最普遍意义来理解的历史科学……一切科学的概念都是关于任务的概念；只有当我们从这些概念所遵循的目的出发，来看它們使用的方法的邏輯結構时，才能得到对这些概念的邏輯理解……历史不适于使用自然科学所采用的方法来进行概括。这对邏輯來說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点。”<sup>②</sup>

李凱尔特引用了文德尔班的話以及他将科学分为規律科学和个别科学的划分；同时在接受这种划分时提出了一个附带条件，即不仅应把規律，而应把一般概念从历史科学中排除出去。他得出結論說：“当我们从一般的观点来观察现实的时候，它就成了自然界，而当我们从特殊的，个别的观点来看现实的时候，它就成了历史；根据这一点，我把历史的个体化的行为与自然科学的一般化的行为对立起来。”<sup>③</sup>

从这种立場出发，他坚决否认历史規律存在的可能性。他說：

“无須证明，經驗史学从来沒有提出自己的最終目的是发现这种意义的規律（就是像在自然科学中那种意义的規律——亚·沙夫）。因而像这样来理解自己任务的史学家也就不再是一个史学家，就不再想对自己的对象找出历史的概念。可見，由于經驗史学和关于規律的科学是两个互相排斥的概念，我們可以說，历

① 李凱尔特：《历史哲学問題》，1924年德文版，第74頁。

② 李凱尔特：《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第58—59頁。

③ 同上，第60頁。

史規律概念是有矛盾的形容法 (contradictio in adjecto) ……”

簡單說來不把問題糾纏于細節，史學個別論就是這樣的，這一理論在整個最近的資產科學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

按照這種理論，史學的對象是精神現象。正因為是精神現象，所以會有同類現象發生而不會有重複現象。由此就得出一個方法論的結論：史學的方法是个体化的方法，史學家觀察的是個別現象，因而（按照這種理論）也就是沒有重複性的，一次的現象；所以史學與自然科學相反，它不研究規律，因而必須將規律、甚至一般概念從歷史科學中排除出去。問題的這一方面正是我們直接關心的，我們將在下面的探討中予以批判。

為了有可能否認歷史規律的存在，文德爾班和追隨他的李凱爾特提出了這樣一個論題：史學按其本質來說，仿佛應該研究現實中由單個事件組成的那一方面，當然這就排除了研究大多數事件所固有的共同因素的可能性。史學家如果一定要研究一般規律，就不再是一個史學家了。因此，按照李凱爾特的意見，歷史科學的任務就是在進行細微末節和個別的研究中探索真實的東西，因此這種科學甚至從來也不能設想把它的材料歸納於一般概念的體系。

關於這一原理應該研究下面三個問題：

(甲)能否把史學作為一門個別科學，也就是研究個別現象而沒有一般概念的科學？

(乙)個別的單獨的現象是否就等於一次的、不重複的？

(丙)能否存在純記載的、不研究規律的科學？

只有在唯物主義辯證法的基礎上，才能徹底解決一般與個別的關係的問題。也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徹底駁倒這種把科學分為規律科學和個別科學的錯誤的劃分。

列寧在《談談辯證法問題》的片斷筆記里，探討講授和研究

辯证法的方法問題时写道：

“从最简单的，最普通的，最常见的等等东西开始，从任何一个命题开始，如树叶是綠的，伊万是人，哈巴狗是狗等等。在这里（正如黑格尔天才地指出过的）就已经有辯证法：个别就是一般……这就是說，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論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列入一般之中等等，任何个别經過千万次的轉化而与另一类的个别（事物、現象、过程）相联系。諸如此类等等。在这里已经有自然界的必然性、客观联系等等的因素、萌芽、概念了。这里已经有偶然和必然、現象和本质，因为当我们說伊万是人，哈巴狗是狗，这是树叶等等时，我们就把許多特征作为偶然的東西抛掉，把本质和現象分开，并把二者对立起来。”①

形而上学的思維方法与辯证法相反，它的根据之一是，这种方法使研究对象与現象隔离，人为地割断研究对象与現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性；因此，形而上学看不见对立面之间的联系，而把表現这些对立面的概念只是解釋为相互排斥的两极。当然这也适用于一般和个别的两个对立的观念。辯证法与此完全相反，它承认我們所研究的现实中的对象和現象之間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性，所以不論在客观对象和現象中，或在反映它們的概念中，都可以看到对立面之間的轉化和对立的統一。当然这也适用于一般和个别的两个对立的观念。

按照形而上学，一般和个别是相互排斥的；一般既不是个

---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63頁。

別，也就不能与个别有所联系。因此，形而上学把这两个概念解釋成僵死的邏輯的創造物。这是抽象化的結果，是徒劳无益的、是把人类認識——包括对許多事物和現象所共有的因素的認識，以及把事物和現象划分开的那种認識——的一个方面絕對化的抽象化的結果。当把一般概念作为实际存在的时候（柏拉图主义），这种抽象就导致客观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当把概念当作理智的主观創造物的时候（新唯名主义），这种抽象就导致主观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

辯证唯物主义者則与此完全相反。它也运用抽象法，但是是科学的抽象法。他把概念看作是现实在其整个进程中的反映。因此，他没有把概念变成僵死的、靜止的、純形式的創造物。辯证唯物主义者看到并考虑到概念之間的轉化，以及它們的辯证的統一，而这种統一是在客观地在现实中出現的总的联系和相互依賴的反映。按事物的本质來說，一般和个别不是相互排斥的，在其間沒有轉化的对立面。相反地，在客体的个别事物和現象中，表现出客观的相同之点。在这些客体中客观地含有在各該类所有个别事例中重复出現的一般因素；在这个意义上，事物和現象的类具有客观的性质，虽然类不是事物。在个别之中总是包含着与其他事例相同的因素，包含着比較一般的因素；因而，对个别的認識就会导致对特殊和一般的認識。列宁說，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他用包含“伊万是人”这种概念的最简单的例子來說明这一点。这所以有可能，是因为在每一个个别的事物和現象之中都包含着与其他情况相同的因素。个别的概念与一般的概念是不可分离的，是不能人为地把它隔斷的；相反地，它們是互相有联系的。这种联系是双方的。

列宁說：“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通过个别而存在。”他引证了亚里士多德的話：在看得見的房屋（即所謂个别的）之外，

不存在“一般的”房屋。只有柏拉图派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才承认一般的实际存在(就个别存在来说)。对唯物主义辩证法来说,一般只作为各个个别的事物和现象的同一的因素而存在(或作为个别的事物和现象的共同属性,相互关系,或作为各种关系的综合等等)。由此可见,一般的概念和个别的概念也是相互交叉的,其间并不存在鸿沟,相反地,显然存在着转化,存在着明确的联系。只有在辩证地解决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与形而上学进行斗争;因为形而上学把这些概念绝对化,或者专门把概念看作实际存在的神秘观念,或者一味否认概念的内容的客观性。因此,如果正确地辩证地理解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就没有根据可以从这两个概念的对立面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存在着某些在原则上对立的科学,即个别科学和规律科学。同时形而上学把个别概念与一般概念对立起来,却可以为这一目的服务,并且正在为它服务。拥护史学具有个别论性质的理论者,也站在这种形而上学的立场;他们宣称,史学是研究个别的对象,而个别的就等于一次的,其中任何一个因素也不具有重复性。从这种关于个别与一般的关系的错误观念中,会产生出两个很明显的恶果;第一,认为历史只研究个别对象;第二,所谓个别也就等于说其中任何一个因素也不具有重复性。

为了避免误会和答复常常会提出的争论之点,在这里必须说明,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根据什么断定,在个别论的理论家看来,所谓个别也就等于说其中任何一个因素也不具有重复性。

文德尔班,特别是李凯尔特曾一再指出,史学家在其研究中不应从事于重复的事物,历史的事物是不会有重复再现的。应否把这一原理解释为是鉴别科学的基本原理,是表明这种或那种科学应当研究什么的原理呢?我们能否因此就把这一原理解释为是本体主义的原理,是说明历史过程规律性的存在或不存

在的原理呢？

試圖把個別論的观点仅仅解釋为是鑒別科学的基本观点，那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种意图沒有考虑到这一流派的世界观的基础。作这种嘗試的人們以为：个别論的理論家們限制了史学的視野，把发现和系統說明历史发展規律的任务从史学中排除出去。这一原理实际上是錯誤的，但要知道，它是屬於客观历史过程的主观反映学派的一种。这一原理与下述情况并无抵触，即在这个客观过程中会有重复的事件和发展的規律性，而其他科学如社会学应当研究这些規律。

錯誤正在于这样来理解个别論。問題在于：从新康德主义——个别論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兴起的——的观点来看，除了主观的一面以外，便一无所有。無論如何，认为除了主观反映（即史学）以外，还有所反映的某种客观过程的論断，是与个别論格格不入的。按照个别論的理論家們的意見，正如表达了这一学派的全体意見的齐麦耳所肯定地指出的那样，历史是史学家的創造。由此可見，如果个别論者宣称，史学家应当研究个别事物，把它看作不会重复的，他应当把重复的从其研究中排除出去，那末我們在这里談的就不仅是鑒別科学的基本原理，而且还有一条本体主义原理，这个原理认为个别也就是說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不会重复的。从正常的思維观点来看，这是反常的現象。但是唯心主义哲学家反复地、有意識地、有目的地違反正常思維，已經是司空見慣了。这似乎与个别論学者們的其他意見，特別是在社会学問題上的意見相矛盾，但唯心主义哲学家們自相矛盾，以掩盖他們的真正意图，也是司空見慣了。當我們分析个别論理論家們关于社会学規律的观点的时候，在进一步的說明中，我們还将回到這個問題上来。

文德尔班，特別是李凯尔特一再坚持，史学是研究个别的。

对那些想贯彻把科学划分为规律科学和个别科学这一观念的人来说，对那些想指出历史规律概念是有矛盾的形容法（*contradictio in adjecto*）的人来说，这是唯一可能的观点。但这种观点会引起很多的麻烦，因为彻底地贯彻这种观点，意味着必须放弃一般的概念。因为，不可能既局限于个别的，同时又运用某种与个别相对立的一般的观念。实际上，李凯尔特也认为，史学从来也不可能做到把它的材料纳入一般概念的体系。但是，我们既然作出了这种结论，那么人们立刻就会提出下面一个问题：没有一般的概念，怎样能创立科学呢？对这个问题，李凯尔特和他的追随者都不能提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历史事件的记载，即使是按照自己构思的最详细、最个别的记载，也必然要运用一般的概念；要知道这种记载是以语言来表达的，而语言就已是概括。如果记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事件的作家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像照相那样准确地使事件传之后世，他就免不了要使用这些概念，如“国家”，“政权”，“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等等；没有这些概念，他的记载就毫无价值，而且也是不可能的。可是这样一来这个史学家已越出了个别的范围。李凯尔特所假设的那种没有一般概念的科学，谁也不能创造出来。后来李凯尔特本人终于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在自己最近的一部著作中，实际上删去了没有一般概念的史学这个假设，从而与他的观念的基本前提——作为个别科学的历史，只研究个别的——产生了矛盾。他说：

“如果我们接着问，一般的概念在历史中起着什么实际作用，那么就立刻会碰到一个事实：历史提法和历史概念的一切因素都是一般性的。这些都应该是—般的，至少因为它们总是用人人明白的语言明确表达出来的，而语言之所以明白易懂，又仅仅因为它具有一般性的意义，也就是具有对许多事物来说是一般的東西。由此可见，历史总是运用现实的一般概念（作为自己



单个概念的最后因素),并且仅仅由于这些一般因素的特定的組合,历史才获得它自己的个体化的概念。”在这里李凱尔特的鋒芒針對着自己的观念,他这番話无異于承认自己的失敗。

如果我們注意到在一定地点和时间、在一定的組合、联系和力量中出現的各种特征的一定的綜合,那么在文德尔班和李凱尔特的观念中,起显著作用的不仅是把个别的作为史学家关心的真实对象来引用,而且是把个别的与一次的,不会重复的事物等同起来。从这一意义上說,不仅列宁冶金联合工厂的大高炉的投入生产,而且連某株橡树上采下的这片树叶,連这条狗,連这个人,都将是不会重复的和一次的现象。每一个具体事物或具体事件中,既包含着在其他同类个别事物和个别事件中重复的因素(例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过剩的一切危机的基础),也包含着这一事例所特有的,因而也就是个体化的、不重复的因素(例如1847年或1929年的危机的历史条件、影响范围和規模)。

因此,决不能把因素的具体綜合的不重复性,与每一个单独的因素的不重复性,或該因素的某种結合的不重复性混淆和等同起来。也决不能在事物和现象重复的与不重复的两个方面之間筑起某种人为的壁壘。这种企图是形而上学的。文德尔班和李凱尔特正是犯了这种錯誤;在他們要求历史学家研究事件的不重复的一面的同时,实际上构成了某种历史个别性的概念,这种概念也就等于說事件的所有因素都是絕對不会重复的。因此,个别的实际上与十足(*tout court*)不重复的是同一的。

个别論的观念的重要涵义正是在于它把个别的与不重复的等同起来。如果个别的、单独的就是其中任何一个因素也不会重复的某种东西,那么,它就不可能为在重复的现象中起作用的規律打下基础;因而,如果历史科学是研究个别的,它就不可能

研究規律。这里的意图是十分明显地表現出来了，但达到目的的途径也是通过十分明显地表現出来的邏輯上的錯誤，因为把个别的与不重复的等同起来是沒有理由的，是由于文德尔班、李凱尔特及其伙伴的有神論的傾向，而不是由于事物的客观秩序。

李凱尔特在上面已經承认了完全不可能建立沒有一般概念的历史科学，实际上他也就承认了在单个的与不重复的等同起来的問題上的錯誤。因为，正如他所說的，如果“个体化的概念”只能作为“一般因素的一定的綜合”才有可能，那么，单个的就無論如何也一点不能离开一般的，因而，在单个的之中就包含着重复的因素。馬克思主义为了揭示个别的概念，先从解釋什么是事物和現象的具体性开始。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学批判序言》中这样說：

“具体之所以为具体，因为它是許多規定的总结，因而是复杂的統一。因此，在思維中它表现为总结的过程，表现为結果而不是表现为出发点，虽然它是现实的出发点，因而也是直觉和表象的出发点。”<sup>①</sup>

列宁在《哲学筆記》中写道：

“一般的含义是矛盾的，它是僵死的，它是不純粹的，不完全的等等，而且它也只是認識具体事物的一个阶段，因为我們永远不会完全認識具体事物。一般概念、規律等等的无限总和才提供完全的具体事物。”<sup>②</sup>

实际上，在客观世界里存在着具体的事物和事件。每一个事物和每一个現象，作为整个现实的一部分而与它相联系，所以具有数不尽的众多方面。我們总是在認識客观现实，即所謂具体的事物和事件，它們是我們認識的出发点，但在我們的思維中却

① 馬克思：《政治經濟学批判》，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63 頁。

② 列宁：《哲学筆記》，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284—285 頁。

表现为結果。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認識过程，即認識的思維运动过程是复杂的，是因为沒有一般概念我們便不能思維，只是由于一般概念的結合，我們才能理解具体的东西，才能越来越深刻、越完全地掌握和認識具体的东西。因此，我們在这里又一次看到了个别与一般的联系，这种联系显示了把单个的与不重复的等同起来的錯誤。个别是具体的，虽然在个别之中也明显地表现出重复的因素。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是个别的和具体的，因为它处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之中。但每个历史事件总是有其固有的一般的因素，因而也具有重复的因素。这些因素的組合虽是一次的和不会重复的，但这种組合必然是重复的因素的組合。因此，每一个具体历史事件，虽然是不会重复的、一次的，但同时却包含着重复的因素。我們可以举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例来加以說明。米古拉契克这个历史人物是一个个别的和具体的現象，因为他具有个人的特征，如他的外表，他是一个政治家，曾参加波兰“人民”运动，在波兰的土地上和在一一定的时期为美帝国主义服务过等等。米古拉契克就是米古拉契克，不是馬尼烏或費倫茨·納吉；就这个意义來說，他是一个不重复的、一次的現象。因此，在談到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在人民波兰的活动时，我們叙述的正是米古拉契克，而不是叙述他的羅馬尼亚的、匈牙利的或其他的盟兄盟弟。但仅仅局限于肯定这种一次性、不重复性，那就大錯而特錯了。因为除了个性和具体性以外，在米古拉契克的活动中还表现了某些一般的、重复的因素。正因为如此，米古拉契克不仅不同于馬尼烏或費倫茨·納吉，而且也具有与他們相同的特征；正因为如此，我們能够把他的活动归納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階級斗争的某些規律的基础上。也正因为如此，我們能够根据已經为我們所揭示的規律性，估計敌人的行为，預見敌人的活动，并与他們进行斗争。

在上面的討論中，我們对个别与一般的关系的分析具有片面的性质，只是局限于批判个别論所必需的范围之内。这个问题在本书第三編第六章中将要作更广泛的討論。

由此可见，与拥护个别論的人們的說法相反，沒有一般的概念，我們是不能建立历史科学的。与他們的說法相反，在自然科学与史学之間並沒有任何鴻沟，尤其是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把科学划分为規律科学和个别科学。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它也运用一般的概念。

如果把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比較一下，同时又从它的研究方法的观点順便与自然科学比較一下，那么，历史科学是具有一定的特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科学不研究現象的重复方面，不研究发展規律。史学总是研究具体現象，但不仅仅限于記載具体現象，我們就这样来答复上面所提出的第三个問題。把“純記載”的公設应用于史学是与史学的科学性相矛盾的，“純記載”的历史科学是不可能的。

說馬克思主义了解和承认科学記載的意义，看来是多余的。不言而喻，一切科学都必須登录和記載事实，把它們作为依据和在它們的基础上进行概括。因此，每一件科学工作都包含着——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記載。我們已指出过，有的时候，甚至整个科学工作完全就从事記載（如考古学和語言学等）。但承认記載在科学上的重要性是一回事，把科学与記載等同起来则又是一回事。后一种情况就是把科学工作的一个方面錯誤地割裂开来，并把它絕對化，这正是个别論所干的事，因为它力求达到这样一个明确的目的：即否认历史規律的存在，否认史学的科学性。在史学中，記載事件的确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这是与这一学科的具体历史性密切相关的。但是，記載在自然科学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此其一；能够把史学仅仅归結为記載的論断是錯

誤的，是与真理不符的，此其二。个别論的学者們制定这一錯誤的命題，是由于他們的理論具有一定的階級制約性和一定的党性。

我們将在下面提出几点补充意見，以結束对个别論的批判。

按照李凱尔特的意見，自然科学定出的規律是永恒的，是随时随地永远有效的；而史学則研究实在的现实情况，研究“在一定地点和一定時間內完成的，具有具体性和个别性的”东西。这样，李凱尔特就提出了一个問題，研究規律的科学應該研究“永恒的”，有“普遍約束力”的規律，从而便利了自己的任务，因为他可以毫不費力地证明，社会科学不能承认这种規律的存在。<sup>①</sup>

这里的錯誤在于把“絕對規律”、“永恒規律”的意义納入“規律”这个概念。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曾經对这种“永恒的”規律作了最有力的批判。正是馬克思主义指出：社会发展規律具有具体性，它們受到一定的空間時間范围的約束，并且随着社会发展条件的改变而改变，或停止其作用。

但是可以断言，社会历史現象的具体性与承认社会发展的規律性絲毫不矛盾；恰恰相反，我們只有依靠承认历史規律，才能正确理解这种具体性。确定两者的区别在于，一个是比较长时期起作用的自然規律，一个是比较短时期起作用的社会发展規律，这是正确的。但把这一区别絕對化，并在此基础上否定历史規律，則在理論上是錯誤的，而且这种錯誤具有階級的背

---

① 亞·賴維爾也提出了相同的論据，他說：“历史規律是沒有的。在‘这是一般的联系’这句话中所指的联系，是在各个時間、也可能在各个不同的空間多次重复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与真正的規律不同，并不是普遍适用的。这只是結果，取得結果要依靠一定的条件，这种結果的确能够在一定的地点和一定的時間內取得，但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得到的。”（賴維爾：《历史規律的概念》，見《历史綜合評論》，1904年第9卷第25期第5頁。）

景。

在反对历史規律和宣傳历史科学的个别論的同时，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及他們的追隨者們，都反对承认社会发展規律；我們已經着重指出，这就是他們的理論投机的真正目的，他們的理論投机是有明显的实际方向的。但拥护把科学划分为規律科学和个别科学的人們，在援引李凯尔特的观点的时候，也从李凯尔特的分类观点出发，談到“中間”領域，“混合”領域。史学是个別科学，而社会学則应当是規律科学。可是狄尔泰早就談到結構的規律，他仅仅反对社会科学中的继承性規律。誰承认把科学划分为政治的和个别論的，誰就从而否认了社会发展的一切規律，这种論断有根据么？那些借口史学方法的特点宣傳史学的个别論，同时又宣布承认在社会学这种社会科学的領域中存在着規律的人們，可能是对的么？

我們认为，譴責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及其追隨者們否认社会发展的一切規律，是完全正确的。

每一社会現象(其实自然現象也是一样)同时也是历史的現象，因为它是处在发展中的。沒有一种社会現象不是动态的、发展的，因而也不是历史的。这就是說，如果不能把历史現象看作是有規律的現象，那么也就不可以把社会現象看作是有規律的和社会的現象。有人认为可以有属于社会結構、而不是属于社会发展的某些社会規律，这种論点所依据的是一个錯誤的前提，那就是可以靜止地、而不是从发展中来研究社会結構。这个明白易懂的社会結構是什么呢？它是在時間上把社会割裂开来的結果，是关于在某个阶段上一一定的社会关系的靜止分析。研究这种割裂只能有次要的意义，是那种忽視社会現象中最主要的东西——变化——的抽象的产物。研究这种割裂的結果，提供了一种記載，它能有助于在研究和了解事物的动态及其規律的条

件下，了解所研究的事物的作用。如果所謂社会生态学在研究例如犯罪行为分布情况的基础上定出了某些“規律”，那么，这里所指的或者是不正确地使用了“規律”这个名詞的普通記載，或者确实是提供了关于規律的記載；但是这些規律还没有结构的性质，而是以关于社会发展的分析为依据的。由此可见，研究支配社会的各种类型的規律是可能的；研究許多重要特征同时存在的規律，即所謂結構規律，同样也是可能的，但是必須始終以了解社会发展及其發展規律为依据。遵循上述階級动因的个别論的拥护者們，正是力图避免这一点。

既然个别論的拥护者們否认历史規律的存在，同时表面上又承认有某些社会規律存在；既然他們认为史学是个別科学，而社会学是規律科学，那么他們簡直是自相矛盾。这种矛盾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解决：或者我們承认社会規律的存在，因而承认社会发展規律的存在；或者我們否认社会規律作为社会发展規律的存在，从而強調科学的社会学本身存在的可能性。或者承认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否认个别論，或者坚持个别論，否认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二者必居其一。

可見，史学个别論性质的观念，意义比它的提倡者所声称的更加广泛，因为实际上，它与一切社会科学的总和都有关系。这是实际上否认任何社会发展規律存在的观念。它的階級性和社会作用是显而易見的；它是反工人运动思想体系的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这种捍卫資本主义的階級性和社会职能导致对社会客观现实及其發展規律的歪曲；同时，由于自己的階級先决条件，个别論在社会研究中也是站在反对科学的立場，它是反科学的反动学說。科学地、忠实地反映社会现实，是与資產階級的利益相矛盾的；因此，資產階級在思想上的代表人物攻击社会科学，声东击西地破坏科学。除了其他东西以外，个别論的理論

就是这种破坏科学行动的产物之一。这种理論否认社会发展規律，从而否认社会科学存在的可能性。在社会研究中拒絕科学，保卫极端唯心主义的、反科学的立場，这就是个别論理論的真正內容，这种理論是帝国主义时期反对革命工人运动及其馬克思主义意識形态的资产階級反动的表現。

否认因果性，承认目的論，也就是承认历史过程具有目的的流派的理論，这也是个别論的一个特征。这一理論直接导向信仰主义。

这个問題是李凱尔特在其“文化科学”理論中提出的。个别論理論的創始人文德尔班完全接受了李凱尔特的思想。在《論現代邏輯学与科学和历史》这篇論文中，文德尔班肯定地說，“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这个名詞能够最好地把历史科学（它被看作是与文化科学相同的）与自然科学区别开来。当我们討論价值的时候（价值是某种过程的目的）便要用到“文化”这个概念。但历史的价值并不具有个体性（这已經屬於心理学的范围），而具有超个体性。文德尔班說：“只是因为存在着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作为选择和綜合事实的基础的价值，历史即所謂文化科学，才有可能作为一門科学。”<sup>①</sup>

个别論的代表需要新康德主义价值哲学的这些客观的，超个体的价值，是为了一个十分明确的目的；因为他们获得了选择事实的标准，就可以走出“純記載”史学这个观念的死胡同，同时又可以在其中看出他們所明白表示的社会政治方向。要知道，这里所談是作为德国民族的“文明使命”的那种价值；按照文德尔班的意見，这种价值可为剝削、压迫和虐待殖民地人民作辯护。具有目的論性质的历史正是把实现这种价值作为自己的目的。

<sup>①</sup> 文德尔班：《論現代邏輯学与科学和历史》，見《历史綜合評論》，1904年第9卷，第26期，第137頁。



于是从这里得出了一個方法論的最后結論：“在这里不可能分析从我們为了經常解决历史观念客观性这个問題所闡述的思想中得出的一切結果，但是十分明显，只是因为我們运用了應該被看作是历史的目的的价值观念，历史才可能作这种分析。如果說自然科学只允許作因果关系的研究，那么史学只是因为它本着目的論观点才有可能作这个研究。”<sup>①</sup>

个别論的一个不大有名的追随者恩斯特·梅斯特从他所站的立場上暴露了他在得出結果时的彻底性：

“作为一种十分优良并具有同等价值的認識形式的目的論叙事法，与自然科学的因果律可以相提并論……虽然这两种認識形式——因果律的認識与目的論的認識——不屬同类，但如果問題是为了在一定情况下使它們在存在的領域中各得其所，那么它們是具有同等价值的。在这两种認識形式具有价值（in dem sie gelten）的那个现实的領域內，它們联結成为一个可以認識的不同类的連續性（der Mannigfaltigkeit）；而这种連續性本身則是杂乱无章的。”<sup>②</sup>

由此可見，从否认历史規律就会直接走向明显的目的論的道路，这是資產階級科学沒落的必經之路。

文德尔班的个别論观念，对資產階級史学來說是“經典的”观念，它在資產階級方法論者中間找到了許多追随者和拥护者。这种观念直到今天还在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現。很明显，我們不可能（而且这也沒有必要）研究个别論的一切变种。因此，在这里我們只分析一下塞普波斯和賽波諾尔在他們写的《数列論》

---

① 文德尔班：《論現代邏輯学与科学和历史》，第 138 頁。（着重点是我加的。——亚当·沙夫）

② 梅斯特著：《論历史規律的可能性》，萊比錫 1928 年德文版，第 56—57 頁。

中說明个别論的一种具有明确特征的企图；按照他們的理論，历史科学与研究具重复性的事实的自然科学相对立，它研究承續性的事实。在进一步的叙述中，我們將探討个别論的这些代表們的观点，他們或者站在比較独立的立場，或者他們的理論与波兰历史科学的发展有着更密切的联系。

### 第三节 被理解为偶然性的彙集的历史

#### （迈耶的概念的批判）

爱德华·迈耶在其《古代史》一书导言里及在其方法論著作《史学理論与方法》中闡述了个别論理論的一个变种。

“历史的对象永远是研究个别事件和相应的概念，也就是研究我們能够最好地确定为‘个别的’事件和相应的概念。”<sup>①</sup>

“〔历史〕是从现实中的个别事实开始，并以同样的事实結束的。现实世界中的每一个个别事件，以及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是由于无数因素在同一時間內相互作用而发生的；这种時間上的連續和一連串原因的交錯，我們称之为偶然事件；因而，偶然事件是支配在經驗中表現出来的一切的因素……在人类生活的一切理想事件中……与偶然事件联合在一起的还有——作为另一种同样存在的因素——自由的、有目的的意志”。<sup>②</sup>

迈耶与文德尔班、李凱尔特，与个别論相呼应，他坚决反对历史規律的概念，但是他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論据，使我們不得不專門来批判他的观点，更重要的因为是他的理論間接地，特别是通过他的学生华列克—契尔涅茨基教授影响了波兰的史学。这就是說，迈耶利用历史是偶然性的累积，因而历史規律的概念

<sup>①</sup> 迈耶：《史学理論与方法論》，第29頁。

<sup>②</sup> 迈耶：《古代史》，第1卷，第1册，什图特加特1907年德文版，第182頁。

是有內在矛盾的概念這一原理，竭力為自己對個別論的支持找出根據。

“由此可見，如果歷史想弄清楚歷史形成的事實，如果追隨蘭克，想說‘如實直書’，如果任何存在同時都只可以描述和理解為形成，那麼，歷史就遠遠不能把存在和形成看成是某種規律性；而且這種想法是與歷史的真正本質相矛盾的……在歷史所提供的世界裡，占統治地位的不是這個（即普遍的規律性——沙夫），而是偶然事件和自由意志的因果性。”<sup>①</sup>

最後，他硬說：

“實際上，在多年的歷史研究中，我自己沒有發現過任何歷史規律，也沒有任何別的人找到過這種規律。”<sup>②</sup>

邁耶對歷史規律的極端否認，是與承認自由意志和偶然事件在人類生活中起着“巨大作用”結合在一起的。

邁耶絲毫也不反對，偶然事件是有其原因的。偶然事件應該有其原因，既然邁耶也這樣肯定，那麼從因果關係的觀點來看任何事件都是在思維上有其必然性的。任何事件都是必然的，因為事件已然發生；如果不從形成的觀點來看它，那麼我們就應該承認把可能變為現實的自由意志的作用。由此可見，按照邁耶的意見，在必然與偶然之間，並沒有原則上的矛盾。

但這種表面上客觀的論題僅僅是煙幕，在它後面隱藏着一切事件都是偶然的這一論點。<sup>③</sup> 正因為這是整個概念的實質所

---

① 邁耶：《古代史》，第1卷，第1冊，什圖特加特1907年德文版，第183—184頁。

② 邁耶：《史學理論與方法論》，第26頁。

③ 應該指出，邁耶絕對不是發表這種意見的第一個作者。在他的前輩中間，應該提到古斯塔夫·呂梅林；同邁耶一樣，呂梅林在《論歷史規律》（演講與論文集，弗賴堡1881年德文版）一書中發表過否認歷史規律存在的意見。

在，我們將比較詳盡地來論述邁耶所理解的偶然事件及其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

按照邁耶的意見，偶然事件永遠與一系列因果關係有關，因為事件本身並不是偶然的，而是與一系列因果關係有關的，它是與一系列因果關係相互交錯着的。

“現在我們從偶然事件開始……如果我們從它自己的因果鏈條的相互聯繫的觀點出發，把它看作是這個鏈條的最後一環，〔思維世界的任何過程和任何對象〕就都是必然的；而當我們從另一系列因果關係——它在時間上和空間上與這一系列因果關係相毗鄰，因而影響這一系列因果關係——的觀點來看它的時候，它又好像是最終的。因為這種影響不可能從這一系列因果關係本身所提供的條件中得出，它是通過一定的外界作用而引起的，即第一類因果關係中所謂原因和結果的合乎規律的過程，由於與其他類因果關係交錯而中斷。因此從我們所分析的這一系列因果關係的觀點來看，這種中斷是偶然的。從這條路綫的本性來看，可以得出結論說，當它延長到終點時，它應該經過一定的點；但是從這條路綫的本性決不能得出結論說，它是在這一點上與另一條路綫相交錯的，雖然對這另一條路綫來說，經過這一點也同樣是必然的。儘管確定某一事件是偶然事件，但我們決不斷言，這一事件本身不是在因果關係上受到制約的，不是必然的；我們只斷言，這一事件進入（Eingreifen）另一系列因果關係，不可能是受到該系列因果關係的制約的。

“但是在現實世界所有的事件中，有無數這樣的因果序列交錯着，因而現實世界的一切事件，一切現象，一切事實都同樣地既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sup>①</sup>

不錯，邁耶接着宣稱，當我們把世界作為一個整體來看的時

---

<sup>①</sup> 邁耶：《史學理論與方法論》，第 17—18 頁。

候，各种不同的因果序列的交錯也是必然的。

但他只是把这种情况看成是我們思維的最一般的公設，可是在实际世界中偶然事件占着完全的統治地位。<sup>①</sup>

“誰不承认这些事实对历史生活的原則性意义，不想把偶然事件和自由意志从历史中排除出去，或者想在这些事实中只看到非本质的因素，誰就不仅消灭了历史的全部丰富生活，消灭了形成历史效益的基本对象的一切，而且完全消灭了历史的实质，用一些沒有任何具体内容的公式（像典型主义或个人主义、自然經濟或貨幣經濟、生存竞争或階級斗争这样一些公式）来代替历史。同时，对历史來說，最重要的是个别的独一无二的內容；历史与自然科学不同，它与一般的水和空气以及支配它們的規律无关；与它有关的只是具体的、‘个别的’一杯水，或具体的一把火及其单独的、个别的表現。”<sup>②</sup>

显然，从这整个結論可推断出：历史現象是偶然的，它們不受任何規律的支配，因此，所謂历史发展是必然的，不是指这个字的真正意义，而是指它的近似意义而言。<sup>③</sup>的确，如果偶然和自由意志在历史发展中起着決定性的作用，就不可能有其他推論。

从已經談到的个别論的社会职能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理論的社会意义何在，它所反对的是什么。但迈耶的理論之所以需要进行批判的分析，是因为考虑到其中涉及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問題，特别是因为在其中真假参杂，混淆难辨，以致加重了分析和适当评价这一理論的困难。

偶然这个概念是批判的中心問題。为了弄清楚这个概念，需要分析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

---

① 迈耶：《史学理論与方法論》，第 19 頁。

② 同上，第 22 頁。

③ 同上，第 27 頁。

偶然往往与必然性对立，既有偶然也就有必然。但对这种对立还必须进一步予以明确。

偶然事件是由原因决定的事件，偶然现象总是某些原因的结果。从这一观点来看，偶然性与必然性没有区别。正是这一事实引起了各种不同的对因果关系的机械论解释。法国的唯物主义者曾把因果关系与必然性等同起来，而这种等同必然导致承认偶然性的普遍统治地位。对因果关系的机械论解释还公开否认偶然的客观性，而承认偶然是反映我们主观上对某种事件的原因无知的主观范畴（顺便提一下，普列汉诺夫的意见就是这样）。

从这种观点来看，每一个具体的偶然事件或者是不可预见的事件（但如果我们充分了解有关的因果联系，它是能够预见的），或者是与我们意想相违背的事件，因而也就是具有纯主观属性的事件。在这里偶然这个范畴是根据相对主义（偶然事件被认为属于可以认识的主体）和主观主义来分析的，它的客观性则被坚决地摒棄了。

根据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否认我们在日常生活以及在科学中时常碰到的偶然事件的客观性，是错误的，这是企图通过援引一些偶然事件来推翻决定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毫不怀疑偶然是具有客观性的，虽然他们都是彻底的决定论者。他们在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问题上所发表的意見，就是最好的证明。<sup>①</sup>

在写给約瑟夫·布洛赫的信里，恩格斯把偶然事件确定为是这样一些事件：它们的内部联系如此疏远，或如此难以证明，

---

① 在许多著作中我们只指出以下一些：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 1871 年 4 月 17 日致留·庫格曼的信；恩格斯 1894 年 1 月 25 日致施塔尔肯堡的信。

使我們可以認為它並不存在和不去注意它。這一定義強調決定論是分析的出發點，同時又突出偶然事件的客觀性，認為這種事件與其他事件的聯繫是如此疏遠，因而可以不去注意它。庫爾諾也發表過類似的意見，他曾宣稱，偶然事件是處在兩個獨立的因果序列的交叉綫上的事件。斯莫魯霍夫斯基也採取相同的立場，他認為所謂偶然事件就是特種的因果聯繫。

為了理解偶然性這個問題，恩格斯給施塔爾肯堡的信里關於偶然性與必然性的關係問題的一段，具有重要的意義。

“人們自己創造着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至今創造這個歷史，甚至在某個一定有限社會範圍內，也沒有遵循着一個共同的意志，沒有按照一個共同的計劃來動作過。他們的意向是錯綜交叉着的，因此在所有這樣的社會里，都是那以偶然性為其補充和表現形式的必然性占着統治地位。這裡透過偶然性來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歸根到底仍是經濟的必然性。這裡我們就要談到所謂偉大人物問題。恰巧某個偉大人物在一定時間出現於某一國家，這一情況完全是種偶然的。但是，如果我們把這個人除掉，那時就會需要另外一個人來替代他，並且這個替代者是會出現的——也許是較好些或較差些，但經過一些時間總是會出現的……”

“歷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性和貌似偶然的偶然性，都是如此。我們所研究的部門離開經濟部門越遠，它越是接近於純粹抽象思想部門，我們在它的发展進程中，就看到越多的偶然性，它的曲綫就越加是曲折的。如果您畫出曲綫的中軸綫，您就會發覺到，研究的時期越長，研究的範圍越廣，它的軸綫就越接近經濟发展的軸綫，它就越是跟後者平行而進。”<sup>①</sup>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05—506頁。

上面这一段涉及必然性与偶然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我们以后还要讨论。恩格斯在其名著《自然辩证法》中关于“偶然性与必然性”那一段里，曾从另一方面阐明了这个问题。从上面这一段引文中，可以间接地得出关于偶然性的特征的极其重要的结论，现在我们尽可能来说明这种结论。

偶然事件这个概念在释义上有两种微细的差别，必须加以区别。

在第一种意义上，我们理解的偶然事件是由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的因果序列的交错而发生的事件。就这一意义看来，举例来说，火车失事就是偶然事件，它的发生是由于岩石坍塌在列车上，又如由于暴风雨而妨碍了散步等等，都是偶然事件。这样理解的偶然事件是由错综交叉的许多因果序列的影响有因而引起的，而不能说是仅仅由于其中的任何一个单独的因果序列。这一事件是一系列因果序列错综交叉的结果，而从其中的每一个因果序列来看，这一事件是偶然的。

在另一种意义上，我们把偶然事件理解为所属体系的肇因序列本身（主要因果序列）。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各种不同的因果序列的交错而发生的事件，将被看作是次要序列的结果。在这样理解偶然事件的时候，我们说，岩石坍塌和失事是偶然事件，在某一天和某一时间发生的暴风雨妨碍了散步是偶然的，等等。

这样的理解更接近口语的直觉，恩格斯关于事物和事件的内部联系如此疏远，可以认为它并不存在的定义，就是以此为根据的。在我们的分析中也将以这种意义为基础。

把偶然事件理解为在一定点上两个或几个独立而交错的结果序列之一，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不存在“本身”是偶然的，即绝对偶然的事件；偶然事件总是对某一个因果序列，某一



种必然性，某一个规律而言，因而它是相对的。<sup>①</sup>对理解偶然性实质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书刊中受到足够重视的因素。

例如，引起华特·泰勒的起义的14世纪英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首先是由国内经济发展所引起的必然性。1348年的流行病（“黑死病”）对这一必然性说来是一个偶然事件，它影响到革命过程的加速发展。

同时也十分明显，在有关的因果关系链条的范围内，从大陆上染来的这一流行病的传播则有其必然性。

上面所援引的恩格斯致施塔尔肯堡的信中的一段正表明了这一思想。恩格斯说，创造历史的人们的行动是错综交叉着的。其结果，除了主要的经济因果关系序列以外（从它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来看，主要经济因果关系序列是关系体系），还有与主要序列，也就是与经济必然性交错着的大量次要的因果关系序列，这些次要序列还与行动中的人们的个性和意愿，与自然界的种种现象等等联系着。当然，这些次要因果关系序列的各个环节，也都是由别的原因决定的，但对主要因果关系序列，对经济必然性说来，它们是偶然的。

---

① 为了避免误解起见，必须附带声明，概念的相对化与相对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相对主义是一个哲学流派，是主观主义的一个变种，它把认识列为可认识的主体，并使它依赖于这个主体，否认认识的客观性。把概念相对化决不意味着把概念依赖于认识的主体，而是意味着把概念放在事物或现象的一定联系中，因为只有在这种联系中，概念才获得意义。例如，说运动这个概念是相对的，并不是说它依赖于它那认识的主体，而是说，运动始终意味着是对任何一种别的事物而言的运动，因而运动中的物体一定是对另一个物体而言（关系体系）。同样，事件是偶然的，也只是对另一个必然的事件而言，因而它本身并不是偶然的。这样的概念相对化，以概念的客观性为条件。由此可见，它与否认认识的客观性的哲学相对主义是对立的。

恩格斯也总是把偶然看作是对必然而言，对经济必然性而言。

从我们分析的这一段引文中，也可以得出一个涉及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法问题的重要结论。这个问题与批判迈耶的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现在来分析必然性与偶然的问题。

当我们研究社会现象的时候，就会涉及人们的活动，因而会涉及成千上万单个的因果关系序列。经济必然性一定在这种不可胜数的人的行动中起作用，因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种活动具有个人的痕迹，对出现在社会发展中的经济必然性来说，它或多或少地是偶然的。但是，尽管这些行动是偶然的，它们却是在必然性的基础上进行并实现这种必然性。举一个具体事例来说，用加紧剥削“自己”的人民、掠夺其他国家人民和战争的办法力图获得最大利润，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这个规律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是由千万个资本家实现的。其中每一个资本家都有他的个性，如个人目的、理想、意愿和心理特征等等。其中有法西斯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具有创造能力和最普通的懒汉，吝啬鬼和挥霍无度故事闹掉的人，以及爱财如命贪得无厌的人，等等。其中每一个人的个性都表现在他的活动上面，从表现在现代资本主义基本规律中的经济必然性的观点来看，每一个人的个性都引起了这样或那样的偶然性。然而所有这些偶然的行动都是在一个共同基础即帝国主义经济基础上进行的，而资本主义竞争使得最固执的个人也不不得不在自己的行动中服从它的规律，并作出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来看是必要的行动。由此可见，个人的偶然活动不仅与这种必然性对立，而且也是它的实现。在我们援引过的这封信里，恩格斯正是说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在现代社会的个人行动的交错中，必然性占统

治地位，而偶然性是它的補充和外部表現形式。在《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這部著作里，恩格斯更發展了這一思想，他在這本書里分析在社會發展中的偶然對必然性的關係問題時，強調指出了社會發展史與自然界發展史之間的區別，以及建築在人類活動自覺性基礎上的區別。

我們在談到必然性與偶然性的辯證關係時，應該說明，從一定的領域的觀點來分析的每一個具體事件，都是必然性與偶然性的統一。必然性表現在一些基本原因的行動中，這些基本原因處在對這一現象的領域來說是基本的因果鏈條的綫上。偶然性表現在每一具體事件中，一些次要的因果序列也在起作用，它們對基本序列來說是偶然的。與此有着最密切的聯繫的是這一事實：在每一個別事件中，我們既要研究一般的重複的因素，也要研究單個的不重複的因素。在事件中的一般與個別之間，以及在其中的個別與偶然之間，存在着密切的聯繫。我們將在本書第三編中更廣泛地分析這些問題。

對於史學方法論來說，對於了解歷史中的必然性與偶然的實質來說，討論偶然性與必然性的辯證關係問題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由於社會關係的性質特別複雜，分析歷史中必然性與偶然性的關係問題顯得特別困難。在我們的討論中，不得不通過抽象法從形成一個整體的某些事實中抽出一小部分現實來做“實驗標本”。

各個社會歷史事件中的這種同樣的完整性，從它們的內部聯繫來看是極其多方面的和複雜的，因為做這樣的“實驗標本”是非常困難的事。

然而馬克思主義給了我們一把鑰匙，一個方法，有了它就可以進行這種困難的工作，並給了我們可以依據的基礎，使我們可

以突出那些决定整个人类社会运动的因果关系序列。

使史学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划时代意义的功績，就在于它指出了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从这一角度来看，历史上的偶然——現在已經可以列为某种历史必然性——这个概念，也获得了真正的意义。

由此可見，必然性和偶然性这个一般的哲学概念，完全适用于史学的方法論，而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更加复杂的性质是与它們所适用的那个領域的复杂性相联系的。

在簡略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必然性与偶然性問題的观点以后，我們現在重新回过来批判迈耶的观点；他把历史理解为偶然事件的汇集，并以此作为他否认历史規律的证据。

迈耶在理論上的基本錯誤在于，他不了解必然性与偶然性，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深入細致研究和闡明了的問題的那一主要方面。同时應該看到，迈耶对偶然性問題的了解，要比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們深刻得多，因为他究竟注意到这一个事实，即只有分析了各种不同的因果序列之間的关系以后，才能了解偶然性这个范疇，并且只有在这种分析之下，这个范疇才能作为与必然性不同的另一个范疇而获得意义。尽管如此，迈耶还是不懂得历史事件中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辯证关系，因为他沒有足以凭借的根据可以把社会过程的必然性孤立起来，而缺乏这种根据就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即实际上对他來說，如果从必然性范疇的主观“思維公設”来加以抽象化的話，一切就都同样是偶然的。

在前面援引的迈耶著作中那段长文里，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原理：现实世界中的一切事件都既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但从我們在上面所力图表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論来看，問題是很清楚的：即每一个事件中既含有一般的、必然的因素，又含有个别的、

偶然的因素。对每一个了解辩证法及其关于事物和现象的普遍联系与相互依赖的原理的人来说，这是十分明白的。对历史科学来说，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这个结论就是：关于现实的具体观念揭示了事件的双重性，一方面指出事件中本质的必然的因素即发展规律，同时又指出事件中偶然的因素即历史事件的个别性和不重复性。但是从上面所说的原理中，迈耶得出了什么结论呢？

迈耶违反了一切逻辑，违反了自己所宣布的关于事件的双重性，他得出的结论是：任何事件都是偶然的，因为它是各种不同的、实际上是独立的因果序列交错的结果。因此，他只承认事物栓定程序的一个方面，为的是有可能达到他所希望的目的——否认发展规律。这种处理过程的漏洞一望而知，不须多予讨论。至于从迈耶的结论所产生的后果，即否认历史规律和承认研究个别现象为史学的唯一对象，那么我们在这里所作的批判，与前面所作的对个别论基本论题的分析批判，并无不同之处。援引必然性与偶然性的问题来论证个别论的企图，不过是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关于历史事件只有个别性和不重复性的理论的许多变种之一，它与其他一切变种一样，都是错误的。

#### 第四节 在史学实践中否认历史规律

##### 1

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通过几个作者的例子分析了宣传个别论的方法论者的著作。可是，我们没有涉及他们的方法论原则怎样影响了史学实践问题。但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原因有二：第一，因为许多史学家敌视方法论的问题；他们想把自己在历史科学领域中的具体工作与一切理论问题割离开来。这种立场是

不正确的。但只有当我们能够根据事实指出，个别論的原则决不限于在“純理論”的領域內流行，而且对史学的实践起了不良影响，这样我們才能战胜这种立場，同时又击中个别論的要害。第二，因为在史学实践中，誰也沒有实现过，因而也不可能实现“純粹的”个别論的原则。因此，必須举例表明，哪怕是举一个例子，来表明这些原则在史学实践中有了哪些修改，实际上它們实现的程度究竟有多少。

这项任务不是容易的；为了正确地完成这项任务，必須同时既是一个哲学家，又是一个史学家；遺憾得很，本书作者却不是的。作者的分析可能不够完备，这也許只能归咎于一个事实，即在現有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中，缺乏任何可以作为典范的作品。但这一点至多只能证明任务之困难，而决不能貶低这个任务的意义和完成它的必要性。因此，我們试图通过迈耶及其弟子华列克—契尔涅茨基的一些著作来进行这种分析。我們在这一分析中提出的任务如下：我們想指出，上面提到的一些史学家在他們著作中怎样和在如何程度上实现他們所采取的方法論原则；从忠于历史面貌的观点来看，这使他們得出了什么結果。

但是，在进行分析以前，我們要稍微談一下比較一般的問題，即个别論的方法論指示的现实性問題。我們在上面的討論只涉及一些“經典作家”如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和迈耶等人。他們的活動時間距今虽不过几十年，这是一个不算太长的时期，但已足以使这种或那种理論成为明日黃花，失去了它的迫切的科学意义。因此，可能产生一个问题：鉴于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个别論在历史科学中是否仍然是迫切的現象，或者它已失去了自己的意义？如果絕對肯定說，个别說有其迫切的意义，那就必須討論，哪怕是簡短地討論，两个問題：說明为什么我們的分析只限于一些“經典作家”；指出一些事实来证明；在現代資

产阶级史学及其方法论中，依然存在着个别论。

为了说明第一个问题，应该着重指出现代个别论的模仿者们并没有在其“经典的”论据清单上添上任何新的东西，“经典作家”们表现他们的思想，比他们的现代信徒们踏实得多，明确得多。因此，根据那些最明确地、最成熟地表达个别论的论据的著作来对它进行批判，这是对的；当然，同时也要指出现代个别论的继承者，强调指出他们的可能具有的特点。这就使我们转到上面所说的另一个问题，即以事实来证明，在现代资产阶级著作中，个别论依然存在。

在史学的实践中，个别论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记载的”历史和“罗列事实的”历史的形式。这种“实践的”个别论从某些理论前提出发，或者是以“客观主义”的口号出现的旧个别论，或者是它的新版，这是十月革命以后在极端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旗帜下出现的。

实际上，从一开始个别论就以主观主义为基础。的确，史学家已经按照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意见，运用他们自己这样或那样订立的“价值”标准来选择历史事实。顺便提一下，这种概念在玛克斯·韦伯的“理想的典型”理论中已经出现，它把规律的唯心主义神秘化与个别论结合起来。它的主观主义方向也明显地出现在齐麦耳的学说里，齐麦耳坦率地宣称，历史是史学家的创造物。历史是“纯记载”这一公设，与这种记载的主观主义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

另一方面，新黑格尔主义也导向同样的结果，它的著名代表贝尼迪托·柯罗齐明确地把个别论作为公设。新黑格尔主义接受新康德主义的个别论的概念，而巴敦学派的新康德主义代表们，特别是文德尔班则宣称必须恢复黑格尔主义，在“困难的时刻”要借助于它。由此可见，柯罗齐把黑格尔的概念，即认为历

史是精神的发展的概念，与一种独出心裁的个别論结合起来，这种个别論的产生，是由于把史学理解为一种艺术，以及由于所謂現代主义，它把历史資料解釋为仅仅是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对它进行加工的基质。在下一节分析新黑格尔主义时，我們还要重新討論柯罗齐的观点。这里我們只是指出，他的概念非常适合于乐于采用它的法西斯主义，由于同一理由，它受到美国正在发展的法西斯主义化的思想家們的热烈欢迎。現代个别論的方法論基础是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此外，在美国个别論还得到实用主义，特别是約翰·杜威的工具主义的支持。杜威在反对承认历史中的客观規律性的斗争中，利用了主观主义。<sup>①</sup>在这个基础上兴起的一系列的历史学派，其代表人物是李特、比尔德、貝克尔及其他等人；在方法論学者中我們可以提到德国的狄奧多·萊辛<sup>②</sup>，英国的考令伍德<sup>③</sup>、阿曼<sup>④</sup>和兰尼埃<sup>⑤</sup>，法国的阿龙<sup>⑥</sup>、哈尔芬<sup>⑦</sup>。

在現代著作中我們只举出了一些最著名个别論的代表。的确，他們所談的都是些使人乏味的事物，都是在重复一些旧的口号和旧的論点。例如，兰尼埃教訓人們說：史学家只关心个别事件<sup>⑧</sup>，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的区别恰恰在这一点上；关心事件的一般方面的史学家就不再是史学家了，等等。<sup>⑨</sup>

---

① 約翰·杜威：《邏輯学，探討的理論》，紐約1938年英文版。

② 狄·萊辛：《历史是一种无意識的思想流派》，慕尼黑1919年德文版。

③ R. 考令伍德：《历史概念》，牛津1951年英文版。

④ 查·阿曼：《論历史的編写》，倫敦1950年英文版。

⑤ G. 兰尼埃：《历史，历史的目的和方法》，倫敦1950年英文版。

⑥ 萊·阿龙：《历学哲学緒論》，巴黎1938年法文版。

⑦ L. 哈尔芬：《历史緒論》，巴黎1948年法文版。

⑧ G. 兰尼埃：《历史，历史的目的和方法》，第223頁。

⑨ 同上，第222頁。



一句話，這些都是老生常談的舊的“真理”。在現代個別論的代表們那里，情況也是如此。但是他們中間某些人却承認歷史事實的客觀性，記載歷史事實應該使我們避免解釋的主觀主義；例如查理·阿曼的論點就是這樣的。而另一些人則因作出極端的主觀主義的結論，否認歷史事實的客觀性，就把它看作是史學家的構造（例如，狄奧多·萊辛和考令伍德）。不管怎樣，現代個別論的代表們的“純記載”的概念，其目的是反對承認客觀歷史規律的存在，及歷史中預見的可能性，這都是他們異口同聲加以否認的。

在這一輩主觀主義者當中還可以看到這樣一個流派，如果我們要想舉例證明為什麼個別論對於現代資產階級著作說來具有迫切意義的話，那麼我們就應當注意到這一流派，考慮它的立場。在考慮到這一流派的觀點在波蘭特別泛濫，所以我們必然會對之特別留心。這裡所指的是新實證主義。

新實證主義過去很少研究與人文主義有關的問題。最近它也寧願集中注意於語義學和自然科學的方法論問題。但某些新實證主義的著作，特別是涉及歷史方法論的著作，<sup>①</sup> 却試圖把唯心主義的語義學也推廣到歷史研究之中來。這些著作形式上承認歷史規律，但把這些規律限制在語義分析的領域內。不過這不是新實證主義的唯一趨向。除了對歷史規律從語義學的角度加以神化以外，他們還以個別論的精神明顯地否認歷史規律。順便提一下，包勃爾在其《開通的社会及其敌人》一書中說明的立場，就有這種特點。

我們要多談一下包勃爾的著作，這本書對個別論的舊概念並沒有提供任何新的因素。但是它之所以值得注意，因為，第

<sup>①</sup> C. G. 漢普爾《歷史中一般規律的作用》，見《哲學雜誌》第39卷，1942年第2期。

一，这部著作出自最著名的新实证主义方法论者之一的手笔；第二，它表明了个别论的旧概念的特殊生命力并暴露了它们彻底的反动方向。

包勃尔这本书是从规定自己的理论观点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开始的。在提到这部书的原意时，包勃尔宣称，它的主要目的是保卫民主反对“极权主义”，当然他保卫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接着就可以看到，包勃尔把极权主义同在计划基础上建成的社会等同起来，实际上对他来说，他所反对的敌人是共产主义。包勃尔在反对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时，否认历史预见的可能性。包勃尔根据这些政治前提，为了力求达到既定目的，就把预见社会发展的可能性问题（或者不如说是不可能性问题），作为社会科学主要的方法论问题提出；他这本著作就是用来探讨这个问题的。

因而包勃尔写道：

“这是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这个问题比为了加强某种历史预言而提出一些个别论据的一切讨论，无疑地更有原则性的意义。<sup>①</sup>对这个问题的仔细研究使我深信，这些对遥远未来的预言完全处在科学方法的活动范围以外。未来决定于我们自己，而我们并不决定于任何历史的必然性。”<sup>②</sup>

承认预见未来事件的可能性的那一流派，把改善这种预见作为科学的任务，并宣称，它正在发现为创造这种预见可能性的一些规律。包勃尔称这一流派为“历史主义”。他宣布要与这样理解的历史主义进行斗争。从上面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他是

---

① 包勃尔从来不用“预测”“预见”这些字眼，而总是提到“预言”（prophecy），因为他想强调它的非科学性。

② 包勃尔：《开通的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第3页。（着重点是我加的。——沙夫）

从与科学不相容的非决定論和唯意志論的观点来进行这一斗争的。

包勃尔书中的基本思想圍繞着那个关于“开通的”社会和“閉塞的”社会的概念。这个概念与包勃尔式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非决定論和唯意志論密切地联系着。这就是說，根据个性原則建立的社会是“开通的”社会（換一句話說，就是根据非决定論和唯意志論的原則）；而“閉塞的”社会則是集体主义的社会（說得更确切些，这是排斥唯意志論的社会）。在这里我們撇开这种毫无意义的划分不談，这种划分是以包勃尔式的某种“开通的”社会的存在为条件的；在这里使我們感到兴趣的只是他的思想的发展过程。

包勃尔在与历史主义进行斗争，实际上就是与承认历史規律存在的概念进行斗争时，把战綫拉得很长：他既攻击柏拉图，又攻击黑格尔，也攻击馬克思。但实际上，他是攻击馬克思和馬克思主义；他断定馬克思主义是历史主义的最高峰。对包勃尔來說，馬克思主义的社会决定論是第一号敌人。从他的无数議論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种态度的原因不是純粹理論上的；使包勃尔感兴趣的是問題的实践方面，是以承认决定論为基础的活动，即包勃尔称之为所謂“烏托邦工程”的（utopian engineering）。在他看来，以預見为基础的活动，因而也是有意識的有目的的活动都是空想的活动。我們不打算让讀者过于注意包勃尔关于批判馬克思主义的結論。归根到底，他的結論是不值得分析的，这是一种极度的不学无术的表现，甚至从资产階級科学比較踏实的范例来看，也看不入眼。因此，我們現在就来分析包勃尔在历史問題方面的信条；这一信条包括在第二卷第二十五章中，这一章的耐人寻味的标题是“历史有意义么？”我們將看出，在这个标题后面，隐藏着旧的，對我們很熟悉的

个别論。

包勃尔說，科学从一定观点出发来选择事实，而这些事实可以服务于各种不同的目的。概括的科学（物理学，生物学，社会学等等）从事于探寻和系統說明規律，它們只是作为例外才研究个别事实。历史科学則与此相反，它研究个别事实，而不研究規律。“所以，以特殊事件及其說明为对象的那些科学，与概括的科学相对立，可以称为历史科学。

“对于历史的这种观点說明，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史学家和历史方法論学家着重指出，使他們感兴趣的只是个别事件，而不是所謂一般的历史規律，因为从我們的观点看来，不可能存在任何历史規律（着重点是我加的——沙夫）。概括完全属于另一种兴趣，必須把这种兴趣与对待特殊事件及說明其因果时所表現的兴趣（而这是历史的事情）明确地区分开来。誰对規律感到兴趣，誰就会轉向概括的科学，例如社会学。”①

在上面所援引的論据中，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它不过是重复了主張把科学分为規律科学和个别科学的人們的旧論点。但包勃尔不仅是重复文德尔班和李凱尔特的旧論点。正如“科学的”哲学的代表人物慣于做的那样，他也重复着主观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齐麦耳的旧論点。由于反对承认历史規律的存在，他也一貫地反对承认历史的客观真实性的存在：客观的历史是沒有的，只有帶有一定观点的历史。在包勃尔看来，兰克的关于史学任务的口号，在新的条件下是不能接受的，因为甚至客观历史真理存在的外貌也是不能接受的。

“总而言之，我們有权說，不可能有像‘如同真实发生的那样的’历史，只能有历史的解釋，而且沒有一种解釋是最后的解釋，

---

① 包勃尔：《开通的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第264頁。

因此，每一代人都有权作出自己的解释。他们不仅有权利，而且也有义务来作出自己的解释，因为存在着这种必须满足的迫切需要。我们希望知道，我们现在所关心的事情应与过去有什么联系，并且希望看到一条道路，使我们沿着这条道路能解决我们感觉到的和选择的主要任务。这种需要，如果我们不合理地，充分地予以满足的话，就会产生历史的解释。在这种需要的压力之下，历史主义者不是提出合理的问题：“我们应该把什么东西作为我们最迫切的任务？它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应该选择哪条道路来解决它？”而是提出不合理的，只是在形式上与事实有关的问题：“我们正在走什么道路？实际上历史为我们规定了什么作用？”<sup>①</sup>

上述这一表述方式尽管措辞不明确，而且有很多含意，但其倾向是很明显的，即关于客观历史真理问题的唯意志论和极端主观主义。这就证实了，包勃尔从拒绝他称之为“历史主义”的东西而得出的结论，实际上意味着拒绝承认历史认识的客观性。

“历史主义者不承认我们搜集历史事实和整理历史事实，而相信‘历史本身’或‘人类历史’，他通过历史内部所固有的规律来决定我们自己、我们的问题、我们的未来，甚至决定我们的观点。

“历史主义希望发现……历史的意义……历史究竟有意义么？这里我不想提出‘意义’这个词的涵义问题；我假定，当人们说到‘历史的意义’，‘生活的意义’的时候，一般都十分明确地想像得到，他们所指的是什么。由于我指的是人们所想像得到的那种意义，我就回答说：历史没有意义。”<sup>②</sup>

① 包勃尔：《开通的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第255页。

② 同上，第256页。

当包勃尔說到“历史的意义”的时候，我們首先应把它理解为历史的規律性。因此，他接着說，实际上历史既沒有意义，也沒有目的，但我們可以指出它的意义和目的，因为从唯意志論和主观主义的观点看来，是个人創造历史；这里所謂創造，不是指活动这个客观規律性的因素，而是指，个人的意識能够随便解釋事实。

“这里我們又碰到自然界和慣例的問題。自然界和慣例都不能告訴我們應該作些什么。任何事实，無論自然界的事实或者历史事实，都不能替我們作決定，都不能決定我們所提出的目的。只有我們自己才能給自然界和历史以目的与意义……”<sup>①</sup>

由此可見，新实证主义否认历史規律，否认把历史作为科学，不过是把个别論的旧概念与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論結合起来而已。这就是所謂“新的”，标榜为“科学的”哲学，它是腐朽的資產階級的产物。

对現代資產階級历史方法論的簡略評論已足以证明，个别論之中的确隐藏着对史学的有害的威胁。因此，完全有必要来分析个别論对史学家的活动所产生的实际后果。

現在我們要來說明，史学家如果在研究工作中遵循个别論的要求，就会产生怎样的实际結果，以及为什么这种結果是有害的。为了这一目的，我們將根据我們所采用的方法，来比較和分析两个作者对同一論題所作的說明的結果。一方面是以个别論的原理为指南的作者，另一方面是以馬克思主义方法論为依据的作者。为了这一目的，我們以迈耶<sup>②</sup>对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历史所作的說明为个别論的代表，以 A. B. 拉諾維奇为馬克思主义

① 包勃尔：《开通的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第265頁。

② 迈耶：《亚历山大大帝与君主专制》，《短篇論文集》，哈勒1911年德文版，第283—333頁。

方法論的代表。<sup>①</sup>我們也順便提一下塔德烏斯·華列克—契爾涅茨基對這個問題的看法。<sup>②</sup>

在進行選擇的時候，我們是以下面的情況為根據的，在鼓吹個別論學者們中間，邁耶看來好像是最著名的歷史實踐家之一，而在馬克思主義的大史學家當中，A. B. 拉諾維奇和邁耶一樣，也是研究亞歷山大大帝的歷史的。此外，亞歷山大大帝的歷史在歷史上是重要的，在理論上是有趣的、困難的。這是古希臘史中的一個轉折時期，它標誌着在其發展中的一個新的、重要的階段——希臘化時代。不了解希臘化的意義，就不可能了解馬其頓王亞歷山大的歷史。而且，正如“大帝”這個稱號所證明的，亞歷山大大帝在歷史確實是一個偉大的人物。研究他的活動，首先要實際上解決傑出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這個困難問題。因此，要從歷史方面來研究他的民族及其活動，就必須掌握正確的方法論。

在着手分析以前，我們先要對分析作幾點說明。

我們要研究，個別論史學家根據他所接受的原則，是怎樣對待研究資料和得出怎樣的結果的。關於這一點，我們應該說明我們對“個別論史學家”這個名稱是怎樣理解的。從事於記載個別事件的編年史學家是“純粹的”個別論學者，雖然他們並不遵循方法論的原則。現代史學家在其編纂歷史的實踐中，不可能成為“純粹的個別論學者”，縱使在理論上他宣傳極端個別論的觀點。我們已經說過，如不運用一般的概念，就不能編寫歷史；

---

① A. B. 拉諾維奇：《希臘化時代及其歷史作用》，1950年俄文版，第10—78頁。

② 塔·華列克—契爾涅茨基：《古代世界經濟史》，第2卷，華沙1948年波蘭文版，第118—147頁；同一作者的：《大通史》中《希臘史》一篇，第2卷，華沙1934年波蘭文版，第541—583頁。

現在沒有一個歷史學家能從事於純粹的編年史而撇開事件之間的因果聯系不談。實踐史學家固然能聲明他們承認極端的個別論的原則，或者能假定這個原則，但卻不能以純粹的方式來實現它。那麼，個別論是不是一種對實踐史學家並不起任何重大影響的普通方法論的空論呢？事情是不是這樣：所有的人都在聲明，或者無論如何我們有些史學家正在設想，方法論是一回事，史學家的手法又是一回事？從這裡可否得出一個資產階級史學家們所堅持要強加於人的結論：理論對史學家們來說是一件不重要的東西，因為當我們從理論轉到實踐的時候，所有史學家畢竟都是史學家，他們彼此之間不同的僅僅在於才能方面。我提到這些錯誤的理論，是因為它們是資產階級思想家攻擊史學家的一種極其危險的表現。它們有時是有意識的，但最常見的是無意識的對馬克思主義的反動，是通過表面上否認理論對史學家工作的作用來保衛資產階級理論的嘗試。我想以個別論為例來說明這種觀點的錯誤，正是因為這種觀點在表面上看來可能是正確的。這種表面性之形成是因為，不管他們的理論信條如何，實際上並沒有“純粹的”個別論史學家。

首先必須十分堅決地着重指出，在起源方面，個別論是與史學的實踐結合在一起的。如果以為巴敦學派的哲學家僅僅遵照對歷史任務的党性態度建立了個別論，那是太天真了。在文德爾班和李凱爾特這些人沒有登上方法論舞台以前，就有一大批史學家已經在實踐中採用個別論的原理，並已經不斷地在理論中表現出來。文德爾班和李凱爾特只不過在理論上總結了蘭克、德羅遜、呂梅林等史學家的實踐。當然，這種總結有其階級背景，有其黨性的方向。當然，在總結的時候，可能把反映資產階級否認史學是科學的觀點達到極端的程度，這種否認態度在一定歷史時期十分肯定地會成為對馬克思主義的反動。在哲學



思想与其所由产生的实践之間，固然存在着差別，但这不等于說，个别論与史学的实践沒有联系，前者是与后者脫节的。

但是，个别論与史学实践的联系，不仅在起源方面，而且因为它确实給这种实践以某种方法論，从而影响了它的进一步发展。如果以为，那几十部直到現在还在宣揚个别論概念的方法論著作，沒有留下什么痕迹，沒有影响实践，那也是太天真了。

要知道，在实践家之中有些人在向方法論家学习，他們自己也更加是史学实践家，他們也使用公认的专门著作。为了摆脱龐大的科学宣傳机器的影响(这种宣傳使史学家牢牢記住“史学家只应研究个别事件”那条所謂的真理，并贊揚按照这种观点写成的著作)，必須具有更多的独立思考能力以及更多的社会政治上的独立性。如果責难資产階級把大量物力和人力用在这种宣傳上面是毫无意义的，那未免太天真了；如果不承认这些广泛流行的有害的历史方法論著作有其实际結果的事实，那也未免太盲目了。在資产階級世界的历史著作中，这样的例子很多，我們以后还要討論在波兰的著作中出現的这种例子。被带进史学实践中的“純粹的”个别論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这是无容置疑的事实。但在資产階級的史学实践中，毕竟保存了个别論概念的本质，即：否认历史过程的客观規律，否认史学真实地反映历史过程客观規律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也是事实。正是这种个别論的本质隱藏在“純記載”的公設后面。順便提一下，迈耶在其关于馬其頓亚历山大大帝的那部书中，就是这种史学实践的代表人物。

迈耶是从我們已經分析过的十分明确的方法論前提出发的。历史事件具有偶然性，历史过程不是有規律的，而只是一大堆偶然巧合。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說（虽然迈耶沒有用确切的詞句 [expressis verbis] 来作这种結論），历史是个人的历史，特别是偉人的历史，是他們的活動史。这种概念是与承认自由意志

作为历史“推动力”而存在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

爱·迈耶的观点的最一般的方法論前提就是这样的。現在我們再来看看他是怎样在史学实践中应用它們的。

迈耶这部书分为三个几乎相等的部分：第一篇簡要叙述亚历山大从登位到逝世的历史；第二篇說明亚历山大在阿孟圣地被奉为神明；第三篇叙述他的老朋友巴美尼奥及他的儿子菲洛特、克里特和史官卡里斯京等人因企图反抗他的专制图謀而丧命。第一篇和第三篇是純記載資料，不过要提一提，在第三篇里，著者旁征博引，以批評的眼光来分析关于所記載的事件（即这个君主的旧友之死）的原因的不同傳說。就其性质而言，第二篇与其余两篇稍稍不同，因为，在这一篇里著者虽然一开始就叙述亚历山大旅行到圣地阿孟被奉为神明这一个对史学家有兴趣的故事，但接着以冗长的篇幅討論君主专制制度可能在其中发生及建立的一般条件。

現在我們来看看作者在书中写了些什么，他是怎样对待史料的，同时也看看哪些东西是他應該写而沒有写的。

关于迈耶在其书中写了些什么，我們已經在上面說过。現在我們要回答他怎样对待史料的問題。應該說，他是完全按照个别論的要求来看待这些史料的。在全书中，甚至沒有承认任何历史規律的痕迹。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样，这本书的著者根本沒有看到要求提出关于历史規律性問題的那些問題。一切都是簡單地完成的；既然每一个事件都是某种偶然的東西，那就只需要加以安排和登記。迈耶正是这样做的，为登記而記載。某人打了胜仗，某人不同的某种意見，某人杀人，某种制度产生，然后又瓦解了。但是，即使彻底地遵循个别論的要求，要想限于这些問題，也非常困难；因为归根到底很难回答“为什么”这个問題，所以迈耶就采取一种行之有效的唯心主义的手法，即諉之于

創造历史的个别人物的自由意志和性格。从极端个别論的規范的观点来看，这还是不彻底的，因为作者在这里越出了“純記載”个别事件的范围，并采用了一定的、当然是唯心主义的一般理論。但这种不彻底性的基础是个別論的概念本身，因为甚至在這一理論中，也是以目的論来补“純記載”个别事件这个公設之不足的，而目的論之产生又是根据历史是实现“价值”的那种观点。迈耶以英雄人物的概念来补充个别論，因此他的理論就是記載那些被理解为个人的随心所欲創造的事件。因此，所有這些問題都在这个意义上輕而易举地得到解决：其实并没有历史問題，但不待說，这样理解是錯誤的，是歪曲历史面貌的。

希腊化时代的中心問題（在分析拉諾維奇的著作的时候，我們將看到這個問題）是說明公元前四世紀希臘的政权集中和擴張趨勢的根源。在亚历山大以前，这种趨勢就已开始出現；它反映在当时的意識形态上，特别是反映在哲学和政論上面，亚历山大的君主专制制度正是这种趨勢的反映，因而它是希腊化时代的本质。如不弄明白這一問題，就既不能解釋希腊化时代的誕生（在資產階級著作中錯誤地把它看作只是文化方面的現象），也不能解釋它的最終解体。這個問題應該作为一部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科学的历史的引言。但是資產階級史学，甚至在那些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如塔恩<sup>①</sup>或罗斯托夫采夫<sup>②</sup>的著作中，也不能解决這個問題。

但迈耶是以可笑的輕率的方式来解决這個問題的，因为他誘之于年輕的亚历山大的个性。

这倒是簡單明了。这样做的結果，著者就可以不必費心了，

---

① 塔恩：《希腊化文明》，倫敦 1927 年英文版。

② M. 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的社会和經濟史》，第 1—3 卷，牛津 1941 年英文版。

因为問題本身沒有了。一切叙說都根据这种幼稚的解釋方式：如亚历山大希望这样，这是由于他的个性，等等。不用說，通过这种方式，一切都变成了与历史英雄的个性或命运联系着的偶然事件。亚历山大的帝国的产生是偶然事件，他的“思維世界”恰恰是这样，而不是别的，也是偶然事件。希腊化时代的最終解体同样是偶然事件，年輕的亚历山大之死使他不能巩固自己的事业，也是偶然事件。

下面举几个例子。

作者想要解釋，为什么伊苏斯大会战以后亚历山大沒有接受大流士提出的媾和条件，如像巴美尼奥劝他的那样。

“但亚历山大与其父判若两人。而且他更觉得自己是个希腊人，认为父系方面是赫拉克力士，母系方面是阿喀琉斯后裔的年輕英雄，应献身于希腊人反抗野蛮人的斗争。”<sup>①</sup>

按照迈耶的意見，亚历山大在进军印度以后仍然力图扩张他的帝国，其原因同样是由于：“三十岁的馬其頓王不可能……想到他的事业在当时业已完成……”<sup>②</sup>

这种解釋可謂非常幼稚（对一个学者來說，完全不会这样形容），但要知道，这是应用个别論的必然結果。不这样嘲笑真实的历史問題，就絕對不能躲避个别論的死敌——客观規律性——的問題。

但如果我們把迈耶在其书中所說的，与其根据科学要求應該說而沒有說的作一比較，他所采用的个别論方法的錯誤和实际坏处就暴露无遗了。为了从这方面来了解這個問題，讓我們把迈耶的著作与根据馬克思主义方法論原則来写的拉諾維奇的著作比較一下。在其关于希腊化时代的深入研究中，拉諾維奇

① 迈耶：《亚历山大大帝与君主专制》，第 297 頁。

② 同上，第 299 頁。

不仅根据馬克思主义來說明亚历山大大帝的历史，而且也批判了在这样或那样程度上充滿个别論精神的資產階級历史著作。甚至在最好的資產階級著作中，个别論也与由于不了解社会經濟形态学說及相应問題而产生的主观主义与現代主义同时出現。这种著作的一般特征完全适用于迈耶的著作。

“否认社会經濟形态，是資產階級个别論的主要毛病。当問題在于作出广泛的历史总结的时候，以經驗主义的观点来仔細地研究各个細节，就沒有絲毫帮助。在这里細节遮盖了看来似乎平淡无奇的，被剝夺了历史特征的整体；历史变成与任何历史規律无关的个别事件的总和，这等于把各种不同构造的复杂机器簡化为一些車輪、杠杆等等的总和。

“資產階級学者的經驗主义絕對不止于证明它不能了解整个历史过程；在它后面还隐藏着資產階級的階級方針，即承认資本主义社会的社会范疇的永恒性和不变性，从而承认这个社会本身的永垂不朽。”<sup>①</sup>

拉諾維奇在这里揭露了迈耶的著作里清楚地表現出的現代主义的階級根源，而在华列克—契尔涅茨基的著作里則达到了荒謬的地步，現代主义的基础是資本主义及其范疇永垂不朽的趋向。拉諾維奇还揭露了資產階級史学的基本錯誤就在于拋棄了社会經濟形态是历史分析的基础这一理論。

在根据这种批判作出結論的时候，拉諾維奇把希腊化时代看作为古代奴隶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虽然保存着古典时代的某些特征，但同时却有它自己的特点。該书作者說：“如果不考虑到希腊化时代并不是偶然事件的某种錯綜結合，而是具有奴隶制度特种規律的古希腊在整个前一时期历史发展中

---

① 拉諾維奇：《希腊化时代及其历史作用》，第 15 頁。

的必然結果，那就決不能了解它。”<sup>①</sup>

根據這一原則該書作者談到希臘化時代的起源這一重要問題，並根據這一背景，揭露了馬其頓王亞歷山大遠征及其世界帝國產生的更深刻的理由。

我們記得邁耶是怎樣解決這個問題的。他諉之於這位英雄的個性。華列克—契爾涅茨基也是這樣來處理這個問題的。他在其《希臘史》一書中，把一切都歸之於父子之間的個性差別，<sup>②</sup>歸之於腓力與亞歷山大之間的差別（這種差別應該是馬赫主義者的心理與唯心主義者的心理之間的差別），<sup>③</sup>歸之於亞歷山大的個性，認為亞歷山大“在整个人類政治史上是一個絕對的，毫不妥協的理想主義者”。<sup>④</sup>這種模糊不清的心理解釋清楚地證明，史學家如果站在個別論和唯英雄論的立場，就不可能看到和提出，更談不到解決他所研究的那個時代的中心歷史問題。從這方面來看，馬克思主義的史學方法的優越性更加明顯了。

當然，詳細地評論和分析拉諾維奇的概念的實質，不在我們的任務範圍之內。但我們要簡短地分析一下，以便指出，提出和解決希臘化時代的起源問題，對於說明那個時代的面貌及了解其相關問題具有哪些重要的結果。

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原則，特別是以社會經濟形態的理論作為分析的基礎，拉諾維奇指出，應該在奴隸制度的根本矛盾中去找尋希臘化時代的興起和衰落的原因。在分散為一系列的城邦（城市國家）的希臘社會里，可以看到不平衡的經濟發展。在雅典、科林斯和美加拉這些發達的城市國家中，在公元前

---

① 拉諾維奇：《希臘化時代及其歷史作用》，第 16 頁。

② 華列克—契爾涅茨基：《希臘史》，第 544 頁。

③ 同上，第 545 頁。

④ 同上。

五世紀時期，奴隸制度達到了最高峰，其後就進了衰落時期。社會形態的基礎——以奴隸勞動為基礎的生產關係，是衰落的原因。正是這種生產關係已開始阻礙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同時使自由人輕視體力勞動。在希臘世界一些比較發達的國家里，開始了貿易危機，其產生原因，一方面是商品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是由於當地生產的發展而使得銷售市場縮小。於是生產力發展的需要與生產關係之間發生了特殊的衝突。在當時條件下，沒有一種社會力量能夠通過革命來解決這一矛盾，因為由於種種原因，奴隸還不是這樣的社會力量，而奴隸主階級則關心於捍衛統治的制度。因此，就產生了這樣的願望，力求通過從領土上擴展經濟基礎來找擺脫危機的出路，並克服城市國家的傳統的領土局限性，在新的條件下，這種局限性已成為進一步發展的阻礙。客觀規律的作用反映在一些哲學家 and 政論家的著作中，如詭辯家高爾基亞，亞里士多德的部分著作，伊索格拉底，最明顯的是斯多葛派哲學家芝諾，他們已開始宣傳統一希臘以至全世界的思想。這種客觀趨勢及其反映——意識形態乃是希臘化的基礎；按照拉諾維奇的意見，希臘化首先是一種經濟現象。希臘的奴隸制社會在這個階段的發展，首先要求擴大市場，擺脫當時已成為枷鎖的城市國家組織。同時，階級鬥爭迫使奴隸主（公元前338年的科林斯會議證明這一點）在君主制度中去尋抵抗勞動人民起義的威脅的支柱。生產關係的發展就這樣向當時的希臘提出征服東方，擴展市場，形成中央集權的君主國的客觀任務。亞歷山大大帝是這一任務的英明的實現者；這個任務之所以具有客觀性，因為它是由客觀的社會發展提出來的。這並不貶低亞歷山大的意義和作用，但同時卻證明，正如拿破侖的情況一樣，一定的社會任務必有其人來完成；如果沒有亞歷山大，那麼就會有另一個被放到這個地位上的人來完成它，當然會完成

得較好或者較差些。

拉諾維奇的概念的实质簡單說來就是這樣。不难看出，這一概念可解決一系列的問题。而根据个别論和把历史看作偶然事件的汇集的概念，这些問题是不能解决的，深奧莫測的，甚至簡直是神秘化的。

我們来看看，拉諾維奇是怎样解决希腊化时代的誕生及其衰落的問題的。

“希腊化时代意味着古代奴隶制社会在較高程度上发展的重复。但是，由于希腊(和东方的)奴隶制社会的危机而产生的希腊化时代，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任何一个社会矛盾。它只能引起某种高漲，主要是在东方地区，但高漲的結果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持續的，穩固的。为了以比較进步的社会經济形态来代替奴隶制社会，希腊化时代并没有創造足够的条件，所以它也同样地导致了危机，这个危机后来由于被羅馬征服和这个过程在更高程度上的重复而得到解决。羅馬的征服是在(公元前——譯者加)三世紀末已經出現而在二世紀成为威胁的希腊化时代經济危机的必然結果。”

拉諾維奇还根据馬克思主义的方法論原則解决了亚历山大大帝本人的个人問题，他坚决地与英雄主义史学的唯心主义概念进行了斗争。

“亚历山大征服其他国家的条件本身是前一时期所創造的。复仇思想是一种表现了危机所引起的統一企图的政治形式。与波斯的战争是公元前337年在科林斯會議上决定的，早在公元前336年巴美尼奧和阿塔耳就已渡海到亚洲去了。如果要猜測，要是腓力不在公元前336年被害，由他自己来領導战役，或者如果不是亚历山大，而是拍狄卡斯或安提帕特来率領軍隊，那么結局将怎样，这是沒有意义的。重要的是，东征的任务是亚历山大提



到日程上来并由他解决的。换上另一个人，也许，腓力除外，这个任务就不会完成得这样快和这样顺利，而且具体结果也不会是这样。但亚历山大之所以能够表现他的能力，只是因为物质生活条件向他提出了这个巨大任务。”<sup>①</sup>

说明希腊化时代的产生和没落是合乎规律的现象，根据这种背景把亚历山大的活动看作是客观规律性的反映，这就不仅打击了唯心主义的英雄主义史学和个别论，而且在史学面前开辟了只有对历史过程的科学观点才能达到的新的广阔远景。我们的确应当记住，在历史科学中绝不能局限于个别现象的狭隘范围，如亚历山大的历史，而必须看得广泛一点，注意到历史过程，把所研究的问题看作只是其中的一个片断。其次，应当说，拉诺维奇的立场把亚历山大的历史看作是历史过程的一个环节，为科学地解释历史过程提供了一把钥匙，而个别论的立场则排除了了解历史过程的可能性，把它变成了乱七八糟的一堆孤立的和偶然的事件。

问题的实质也就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个别论的优越性不仅在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注意到个别论者根本不去研究的综合问题，而且考虑到在个别论乱七八糟堆砌的零碎事件中根本消失了的那些事实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优越性还在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能够提供历史过程的真面貌，而个别论学者则由于他所本的方法论立场的局限性，而不能了解他所掌握的事实，有意或无意地歪曲这些事实，或者不正确地搜集事实，捏造出历史过程的假面貌。

这是对一种学说提出的最严厉的谴责，它把史学家心目中对这种学说的看法指责得一文不值。鉴于这一谴责的重要性，

---

<sup>①</sup> 拉诺维奇：《希腊化时代及其历史作用》，第23页。

我們要再举一个例子来加以证明。

亚历山大在伊苏斯战胜了大流士以后，沒有深入波斯加以追击，而是进攻叙利亚和占領了沿海城市，接着又进攻埃及，这是历史事实；順便提一下，这一事实是所有的史学家都承认的。除泰尔以外，亚历山大沒有碰到反抗，相反地，不仅希腊的一些城市，而且波斯的統治階級实际上也已站到馬其頓王方面，这也是历史事实。这些事实有什么意义呢？各种不同的史学家根据各自的方法論立場，是怎样解釋这些事实的呢？

迈耶在其书中以十行的篇幅来叙述亚历山大解放希腊城市的问题，把这一点解釋成希腊人反对波斯人的人民战争的領袖的使命。但是，并于小亚細亚的大多数城市和总督实际上自願地轉到亚历山大方面，以及亚历山大給予希腊城市的那种特殊自由的实质，迈耶却完全沒有提到（应当指出，这本书約有十六頁左右叙述亚历山大到阿孟圣地去旅行）。因此，在华列克—契尔涅茨基的《希腊史》中，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也受到同样的輕視，順便提一下，华列克—契尔涅茨基在《希腊史》中虽然提到这个问题，但沒有給予任何重視。

然而这里所談的不是什么簡單的问题，而是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就可說明希腊化时代的实质，从而說明亚历山大的历史和作用。

按照个别論的英雄主义的概念，亚历山大是一个文化傳播者，是他帶到东方去的“希腊精神”的表达者。从这一概念来看，就完全不可解，为什么近东各国人民会轉到亚历山大方面，为什么希腊化时代虽然受到人民群众的反击（例如在犹太）却在这些国家的有产階級中取得那么迅速和那么重大的成就，为什么对亚历山大的反抗随着他的軍隊深入东方而增长。在我們面前，历史又好像是一堆猜不透的偶然事件，好像是沒有任何規律性

和仅仅以个人任性为轉移的事件的結果。但这种非理性主义并不是由历史过程本身决定的，而是由它的某些解釋者的願望决定的。

拉諾維奇則給了所有这些事实以合理的解釋，他非常注意沿海城市与在亚历山大以前所形成的小亚細亚有产階級之間的关系問題。按照他的概念，希腊化时代是在奴隶制社会中生产关系危机的背景上产生的經濟現象。但这种危机不仅出现在希腊，而且也出现在經濟上比較发达的近东国家。在希腊有过那种經濟上的必然性，在近东也有。因此，使得阿凱米尼特王朝的統治崩潰的同一危机，决定了波斯本土的有产階級对亚历山大拥护态度；而在經濟落后的处于东方較远的地区，則是另一种情况。

“亚历山大征服东方，不仅有利于希腊和馬其頓，而且也有利于东方最发达的地区中的統治階級。在这些地区，奴隶制固然沒有像在希腊所起的那种作用；公社的保存固然使得社会停滞不前，发展緩慢，矛盾疲塌地逐漸增长。但在这里的一些奴隶制經濟很发达的貿易中心也已經感到需要扩大經濟基础。看来，华維隆·居魯士的出征一帆風順几乎沒有遭到什么反抗，必須用这种情况来解釋。虽然亚历山大的帝国也是以征服力量人为地联系起来的各国人民的不团結的‘偶然的堆积体’，正如阿凱米尼特国家一样，但亚历山大征服波斯，毕竟意味着波斯轉入較高的发展阶段。因此，一些东方的商业城市，首先是居民的富裕阶层很快就希腊化了，成了征服者的支柱。”<sup>①</sup>

拉諾維奇对亚历山大給予小亚細亚希腊城市的那种特殊自由的問題，分析得很詳尽。我們不可能深入研究这个与亚历山

---

① 拉諾維奇：《希腊化时代及其历史作用》，第 24 頁。

大所建立的新国家的政治制度有着最密切联系的有趣問題。这里我們只援引拉諾維奇从分析中所得出的結論：

“这种‘自由’不是自給自足的，具有局限性的古典城邦的自由，而是在与东方专制国家对比的意义上的自由，是在作为一个自治单位加入当时人們还不大知道的新型国家体系的意义上的自由。当亚历山大說到解放城市的时候，他指的只是这种自由。”<sup>①</sup>

我們援引了个别論史学家們所不了解的重要历史事实的一般特征。他們的不了解，并不是由于偶然不善于說明事实。这些历史家規避这些事实，正是由于他們的理論立場的局限性；他們看不到也不了解这些事实，他們以不正确的观点去搜集事实，从而歪曲了历史面貌。因此，这个例子說明，錯誤的理論立場，即个别論的立場，在史学家的实际研究工作中，怎样酿成了根本的錯誤，怎样造成了对历史真理的歪曲。

我們还要举一个稍有不同的例子。

大家知道，亚历山大处死了他的旧友巴美尼奥、菲洛特、克里特和卡里斯京。迈耶几乎以全书的三分之一來論述这个問題；华列克—契尔涅茨基对这个問題談得更詳細。当然，对这个問題拉諾維奇也沒有避而不談。但个别論史学家与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这个問題的理解是多么不同！迈耶引证了一些古代文献，这些文献的作者借喝醉酒的克里特的口來責备亚历山大改变馬其頓的風俗习惯，而把国王不喜欢卡里斯京，解釋为后者不願意依从东方礼节，在国王面前下跪。迈耶所做的只此而已。他甚至沒有把这些事实与馬其頓军队在进军印度以后，亚历山大想把老兵宿将召回祖国时发生嘩变联系起来。拉諾維奇也談

---

<sup>①</sup> 拉諾維奇：《希腊化时代及其历史作用》，第 53 頁。

到了这些事实，但他是以社会斗争的规律来解释的。他认为这些事实的发生，是由于馬其頓的經濟落后，使得有产階級不喜欢亚历山大的政策。这种政策不符合馬其頓人的利益，他們认为是对他們的权利和特权的威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阴谋，甚至牵涉到亚历山大的几个亲密战友，由此发生了馬其頓军队的嘩变。在个别論看来称之为偶然性的事实，現在得到了应有的地位和进一步的解释，它們被看作是发展规律性鏈条上的一个环节，因为它們是根据古代社会的階級斗争背景来分析的。

最后，我們再举一个歪曲历史事实的例子。我們在上面已經提到，迈耶长篇大論地談及亚历山大到圣地阿孟的旅行和把这位国王神化。拉諾維奇也談到这个問題及资产階級著作对它的說明。他同意这样的观点：亚历山大的神化能在迷信帝国統治者的基础上巩固帝国的統一。但迈耶則进一步认为，对这个問題的分析会显示出一切君主专制政体的根源和基础，公元前四世紀的历史会向我們解释十七世紀的事件，它会用所謂永远起作用的迷信的因素来解释它(君主专制政体)。我們无意与这种显然錯誤的庸俗論点爭辯，但要預先警告，个别論否认发展规律，孤立地看待事件，把它們看作是偶然的，因此有利用反历史主义。从个别論产生的反历史主义，是在迈耶和华列克—契尔涅茨基的著作中經常碰到的現代主义庸俗化方法的基础。

对于华列克—契尔涅茨基的著作，我們再稍微說几句。他是迈耶的学生，并忠实地追随迈耶。关于《希腊史》这部著作，我們可以說，这是个个别論的一部經典著作，在这方面是青胜于藍的。甚至迈耶对于这种編年史也相形見绌。关于他的著作，在根据迈耶的书作了分析以后，我們不能再有什么新的补充。但应当提一提《經濟史》这部书。其原因有二。第一，因为在这个例子中特別明显地表现出个别論的反科学性。这里我們談的是

經濟史；正因为如此，所以撇开一切規律性，撇开社会經濟形态和階級斗争不談，对这部书的价值起了特別坏的影响。个别論的缺陷在这里得到了集中的、明显的表現，这是連看問題不深的人也能了解的。第二，这部书值得注意，还因为其中特別清楚地表現了个别論的反历史主义，即上面所提到的現代化。現代化是在資產階級史学，特別是在古代史中經常可以遇到的弊端，而我們在华列克—契尔涅茨基的著作中看到，这种弊端已达到了荒謬的程度。在他那里沒有对社会形态、生产关系和階級斗争进行具体分析的絲毫痕迹，可是經常听到他談論資本主义、国家主义、国家資本主义和銀行壟断組織等等。我們可以讀到：在亚历山大死后的各个統帅的統治时期，在法老的国家里已发展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合理的、最彻底的和最得当的国家資本主义体系”；<sup>①</sup>“銀行組織是雷比达的最完备的国家資本主义”<sup>②</sup>等等。他的諸如此类的“发现”是书中的“指导思想”；不仅从它的概念来看，即使从报道的資料的忠实性来看，它們都是很可怜的。这是个个别論在科学上无能为力的一個令人注目的例子。

总之，我們可以說，在史学實踐中采用的个别論，不断地把史学推上不正确的道路。个别論的錯誤理論概念，通过否认客观历史規律，走向对英雄作風的曲解，走向对事件的反历史的理解，把事件看作是孤立的和偶然的。結果，个别論史学，正由于把自己的任务限于对个别事件的“純記載”，所以不能科学地選擇事实，而对它所記錄的那些事实又不能予以解釋，因此曲解了这些事实的真正涵义。

上面已經說过，我們对个别論的尖銳批判，絲毫不意味着否认历史記載的作用，也不意味着否认个别事件的作用和意义。

<sup>①</sup> 华列克—契尔涅茨基：《古代世界經濟史》，第2卷，第136頁。

<sup>②</sup> 同上，第141頁。

沒有无記載的历史，而历史所記載的总是具体事件，也就是置于一定時間和空間的个别事件。这說明，为什么尽管有許多保留，我們还是能够而且必須利用資產階級史学家著作的資料，虽然对这些資料始終必須进行分析，而且往往要給以完全不同的解釋。可見我們批判的对象只是把史学的任务归結为“純記載”的企图；我們在上面已經說过，这一点最后就表現在記載本身的繁瑣性上。因为只有以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論为依据，以对客观历史規律的認識为依据，科学的历史記載才有可能。

## 2

現在我們要研究下面的問題：个别論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波兰史学，在我們史学发展的道路上，它是否一种障碍？这正是使我們不得不批判錯誤的历史方法論的那个实际問題。

波兰的史学目前正在經歷一个轉变时期。波兰十年的人民政权，在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态方面的新生活中資產階級的发展，所有这些在史学領域中也不能不留下痕迹。相反地，可以大胆地說，波兰的文化革命也充分地反映在最近十年中我們历史科学所发生的变化上面。現在絕大多数波兰史学家都拥护馬克思主义的方法論，并富有成效地力图把它应用于实践。1951年12月至1952年1月波兰史学家在奥特沃茨克举行的第一次方法論會議足以证明，我們的史学家在方法論上的轉变。波兰历史科学有自己的隶属于波兰科学院的研究所，有許多大学的教研組和一家出版社，它已坚决地走上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来改造自己的基础的道路。但在指出肯定的成績的同时，当然不能不看到波兰史学在自己的道路上碰到的，也不能不碰到的那些困难。資產階級意識形态进攻我們科学由来已久，因此不可能在这个比較短的时期內彻底摆脱它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表

現在个別的史学家身上，甚至是違反他們的主观意願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在科學中已根深蒂固，為了徹底地根除它，必須作出巨大的努力，首先要不倦地努力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透徹地了解各种不同的流派的精神和意義。因為，對異己的敵對意識形態的影響只能在與它作有意識的鬥爭過程中得到克服，而這種鬥爭要求我們了解敵對思想的特點和危害性。因此，中立主義，即理論上的旁觀主義，是客觀上有助於敵人的有害現象。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曾經在我們科學中進行了長期的統治，現在仍然大大地影響着我們的科學；在這種情況下，任何輕視理論的態度就會削弱我們在鬥爭中的力量，實際上會延長這種影響的期限。

實在說來，關於個別論的問題就是這樣。史學家中間有些人往往低估了與個別論進行鬥爭的理論問題，認為文德爾班和李凱爾特從來沒有嚴重地影響我們的史學。這種立場不僅是錯誤的，而且作為低估理論和思想鬥爭一種表現，也是危險的。個別論對我們的史學，的確起了重大的影響，不過這種影響是通過德國的一些大學的研究班產生的，因為我們許多史學家曾經參加過這些研究班；二十世紀波蘭史學的一些主要流派都會受到個別論的傳染，個別論在我們某些史學家的著作里打下了烙印，對波蘭史學的發展是一種實在的危險和阻礙。在這裡問題不僅有關將來，而且有關現在。因此，這個問題就顯得更加重要和尖銳。

每一種意識形態的影響與它起作用的時間長短也是分不開的。因此，幾乎十九世紀下半葉，我們所有的史學著作，都是在否認客觀歷史規律的口號下述作的，因而不管怎樣都受到了個別論的傳染。在後面分析史學中的波蘭實證主義的時候，我們還要回到這個問題的這一方面來。但在這裡我們只限於分析二



十世紀波兰社会学和史学中站在个别論立場上的某些突出的流派，它們直到今天还影响着我們的科学。我們也要指出个别論在人民波兰时期的史学中出現的危險性。

\* \* \*

我們从討論社会学和哲学方法論对于史学的影响这个論題开始。这不是因为它是最重要的問題；相反地，它对于我們的作用并不太大。但决不能低估社会学和哲学著作对于史学的影响，对它完全置之不理；要知道李凯尔特和齐麦耳这些人并不是史学家，然而他們对資產階級史学的发展却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涉及人文学方法論問題的社会学和哲学著作，在我国并不太多。只能找到几本在原則上或多或少同情德国人文学方法論观点的著作<sup>①</sup>。有几本著作，从語义学的观点叙述了人文学方法論的問題<sup>②</sup>。康斯坦丁·米哈尔斯基从信仰主义的立場研究了“历史哲学”<sup>③</sup>。

但这部著作对史学沒有产生特别的影响。因此，我們現在只分析弗洛利安·茲那涅茨基的观点。茲那涅茨基固然只是重复和折衷主义地融合西欧唯心主义方法論的观点，但尽管如此，由于他在整个資產階級社会学中所起的作用，因而占有特殊地位。史学和社会学密切地相互联系着，首先因为，它們有共同的研究对象，即社会生活的发展。当然，这并不排斥每一个学科各自的特殊性和特征；同时又要考虑到它們之間的联系問題。因

---

① 这一类著作我們举出下面几本：齐·列姆比茨基：《威廉·狄尔泰》；B. 苏赫道尔斯基：《德国人文学方法論的研究状况》；M. 瓦尔菲希：《現代方法論中对人文学的捍卫》。

② 例如可以指出下列著作：S. 奥索夫斯基：《社会学中的历史規律》；D. 斯台英巴：《人文学中的非决定論問題》；J. 冬布斯卡：《科学規律論》；T. 科塔尔宾斯基：《認識論的因素，形式邏輯和科学方法論》。

③ K. 米哈尔斯基：《現代历史哲学問題》。

此，无怪乎社会学占据了从前的历史哲学的地位，成为史学锻炼方法論的場所。不管怎样，社会学家总是认为这是它的任务之一，而史学家也往往求助于它。这完全不应理解为：史学家直接地、有意識地、公开地宣称追随这个或那个的社会学家。有时是这样，但有时不是这样；現在的社会学派制造了滋潤社会科学其中包括史学的“气氛”，这些社会科学也采用了某些得到公认的社会发展的概念。理解資產階級社会学对史学的影响，对于认清这一事实是必要的。史学自己的方法論概念愈薄弱，現在的社会学派的趋向与現有的史学的趋向愈接近，这种影响就愈大愈明显。

在我們史学家中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了解这个問題的。因此，发生了低估資產階級社会学影响波兰史学，特别是二十世紀的波兰史学的思想上的危害性，以致必然会导致放松警惕和削弱現阶段思想战綫的斗争。这里首先是茲那涅茨基在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間的时期对波兰史学的影响。往往有人肯定地說，沒有任何史学家引证和直接采用茲那涅茨基的話，等等。但他們忘記了某些“小問題”，例如，茲那涅茨基以理論总结的形式表达了这个时期的資產階級史学实际上所做的事；汉德尔斯曼的方法論概念具有同样的唯心主义的根源。茲那涅茨基作为当时最有影响的資產階級社会学家（不管史学家一实践家认清这一点与否），也是一个毫无疑問地影响了历史发展的历史方法論学家。他在一系列著作中研究了我們感到兴趣的問題，但我們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学入門》这部书上，因为，他的观点在其中得到了特別明显的表現。

在分析茲那涅茨基的体系中的因果性和历史規律問題之前，在原則上應該先分析这个体系的基础。但近年来這個問題在我們的許多書籍中已經过多次討論，并在原則上认为已經弄

清楚，这一事实使我们无须再来作这种分析<sup>①</sup>。兹那涅茨基的社会学体系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的混合物。它脱胎于各种不同的唯心主义的来源，是狄尔泰、李凯尔特、瑪克斯·韦伯的观点和席勒的“人文学”的折衷主义的結合。在分析特殊問題，特别是方法論問題的时候，兹那涅茨基总是把它們与整个唯心主义的体系联系起来。

在分析兹那涅茨基的社会規律問題时，应该把它与人文学共同因素的理論密切結合起来，这一理論把现实归結为主观的体驗，从而使研究对象失去了客观性；还应该把它与价值論和因素論密切結合起来，这两种理論指出，应该从实现独立了解的目的——价值的立場来对待兹那涅茨基关于社会变动的理解。

兹那涅茨基以資产階級著作中把科学分为規律科学和个别科学的傳統的划分为出发点，同时指出——不过是在注釋中——，他的分类法与李凯尔特的分类法的血統关系，但附有某些保留。

“……应该把试图合理地認識一次的，不重复的形成过程性质的科学，如地质学或政治史，和探索重复无限次的过程規律的科学，如物理学或理論經濟学分別开来。

“第一类科学从已知的結果出发，探索这些結果起源的因素；第二类科学則从已知的因素出发，探索这种因素起作用的經常的結果。第一类科学可称为历史科学或起源科学，第二类科学可称为規律科学。”<sup>②</sup>

① J. 哈拉辛斯基：《社会研究的方法論問題》，見《哲学思想》，1951年第1—2期；J. 霍赫菲尔德：《历史唯物主义和資产階級社会学的几个对立面》，見同上杂志；亚·沙夫：《个别与社会研究的論证法》，見《哲学思想》，1952年第3（5）期。

② 兹那涅茨基：《社会学入門》，波兹南1922年波兰文版，第306—307頁。

不錯，茲那涅茨基接着又強調說，這種劃分不是絕對的，也就是說，在一些科學中可能同時出現這兩個因素，但應該把那個占優勢的因素作為分類的基础。下面我們會看到，這一保留沒有絲毫意義。關於他的分類法本身及其前提和假設，就茲那涅茨基與他的精神感召者德國唯心主義者相比起來，並沒有作出什麼新的東西。因此，這個問題我們可以不去討論，請讀者仍舊回顧一下上面的論述。

茲那涅茨基把歷史發展的問題，與社會學規律的問題區分開來。他把歷史發展規律與康德體系的思辯結構等同起來，他輕率地對待歷史發展規律的問題。在這裡不值得詳細討論這個問題和揭露茲那涅茨基的論據毫無根據。我們只分析茲那涅茨基的論斷的中心點，即作為對古典個別論的特別補充的“創造”的概念。

為了攻擊歷史規律的概念，首先必須攻擊承認歷史中因果性的存在。因此，當茲那涅茨基首先分析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完全是按步就班胸有成竹的。

他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極其簡單，認為歷史事件的聯系不可能建立在因果性原則的基础上，因為歷史事件是自由創造的結果。因此，即使社會學作出了社會現象的一些規律，它反正還是不能用這些規律來解釋社會的進化。從這裡明顯地可以得出一個與茲那涅茨基前面的論斷相反的結論，即他認為甚至在社會學中只能夠弄出一套結構的規律，即靜止的規律，而完全不可能作出一套發展的規律。對他來說，這一結論的前提是唯意志論及在其基礎上產生的關於“創造”是不受因果制約的那條原理。當然，所有這一切茲那涅茨基沒有說得這樣明白；他在接受實用主義的人文學共同因素論和因素理論的同時，把這種含糊其詞的說法也接受過來作為自己的原則。

但我們要根据茲那涅茨基自己的說法来表明他的思維过程正是这样的。

他是从一般地宣布反对历史中的因果性开始的：

“虽然社会学有权探索社会現象的規律，但决不能希望这些規律能使它解釋社会进化；政治的任务与历史起源的任务不能相互結合起来。这种不可能性，較之上面指出的历史过程的具体性、不重复性、实际范疇性与科学規律所要求的抽象性、重复性、假設性之間的矛盾，具有更加深远的根源。在規律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之間还有进一步的區別，这就是：借助規律来作解釋时是以因果性原則为依据的，而在起源的解釋时，则排斥这一原則。”<sup>①</sup>

为什么？茲那涅茨基解釋說：

“在这里我們不可能詳細地研究因果性的問題，我們只选择其中原則性的部分；从分析这一部分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結論：因果性原則是很明确的，从历史作为客观上新的現象的表現这一尺度来看，它不适用于历史。”<sup>②</sup>

这么一来，按照茲那涅茨基的意見，新的东西是不受因果制約的，而是以毫无任何制約性的某种方式来解釋的創造行为的結果。这种理論所根据的是：事实与本质的區別，即根据不能區別的区别。但使我們感兴趣的不是在茲那涅茨基的著作中很难找到的明确易解之处，而是他的結論：

“显然，对新的現象的这种解釋，由于从創造的原則出发，所以是因果性的解釋的反題；这种解釋的最重要意图恰恰是要以現在追溯到过去，以及根据現在預見未来。創造的原則作为一种真正有启发性的原則，在被用来解釋事件时，不是因果原則的

① 茲那涅茨基：《社会学入門》，波茲南 1922 年波兰文版，第 333 頁。

② 同上，第 335 頁。

一部分，而是完全不同于后者和不依赖后者的原则，是对因果原则的补充。创造的原则不能解释那些在因果关系上依赖其他实际因素来实现的事实；质言之，它的任务是解释与其实现的条件无关的现象的经验本质。可见，这两个原则是把因果关系分析为既是事实的基础，又是本质的基础，这种没有区别的形而上学的概念的结果……一面假定有因果关系的影响，同时又把创造作为历史现象的因素之一，这样就不能同样合理地应用这两个原则。因为顾名思义（*ex definitione*），既说‘创造’就使我们怀疑因果关系的活动或者说它的活动业已停止，而提到‘因果性’就不得不把新的东西解释为过去有过的东西的必然结果，所以它与创造是势不两立的。”①

决不能说，兹那涅茨基的这些表述不明确和模棱两可。在这里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表明排斥因果性及规律的作用的“创造”，在历史中起着作用。尽管头绪纷乱和离开正题，兹那涅茨基从他关于历史中的“创造”这一论题的讨论中，还是得出了这样的最终结论——这一结论当然是符合我们已分析过的现代资产阶级历史方法论的主观主义倾向和相对主义倾向的。

“历史主要是（*par excellence*）起源的科学，这是事实，因为它力求尽可能准确地重创一个阶段的历史过程。规律的方法在历史中只起辅助的、次要的作用，因为，如果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具体的、完整的个别事件的演进不属于规律的范围，而应当被分成一些基本事实。那么，历史这门关于完整的个别事件的科学，就不能发现自己的规律。在这种情况下，史学应该从其它科学中吸取它所愿意采用的规律。但在任何情况下，它的主要任务总是应用创造的原则（个人的或共同的创造）来揭露新的

---

① 兹那涅茨基：《社会学入门》，波兹南 1922 年波兰文版，第 339 页。

現象；只有当創造遇到它确实不能越过的实际界限的时候，因果性的观点才能自由运用。”<sup>①</sup>

当談到个别問題的时候，茲那涅茨基的立場并不坚定，并不彻底。但他的傾向是明显的，即力图否认历史規律。他对历史規律的否认，基于他的整个唯心主义的社会学体系。因为与波兰的資產階級史学思潮紧密地結合在一起，所以茲那涅茨基的社会学以及从其中得出的方法論結論，无疑地加强了波兰史学中的唯心主义的趋向，特别是个别論的趋向。

\* \* \*

正如我們所說过的，应该在波兰史学本身的发展中，在它的主要流派，特别是本世紀的主要流派中，去找寻个别論对波兰史学的思想影响的真正根源。我們已經知道，个别論作为否认社会发展客观規律的反映，是保护有产階級利益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态的党性的反映。个别論是資產階級方法論的一般傾向，作为它的基础的那些同样的社会因素，階級因素，在波兰也充分起着作用。緊張的革命形势及后来的 1905 年革命，造成了对資產階級前景的威胁。意識形态已开始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作为階級斗争的武器，其意义在当时已充分暴露出来。思想意識的斗争普遍地尖銳化起来，特别是在波兰的史学領域內；思想意識斗争的尖銳化是与階級斗争的尖銳化密切地联系着的。对于作为十九世紀波兰实证主义的特征的“科学的客观主义”奉承献媚告一段落。1905 年以后，連斯摩梭斯基、科尔逊和其他一些人都改变了他們的观点。資產階級或者轉到公开反动的立場，或者一言不发地力求躲避他們所討厭的或感到困难的一些問題。二十世紀我們的史学家对方法論問題的兴趣突然下降，其秘密

---

① 茲那涅茨基：《社会学入門》，波茲南 1922 年波兰文版，第 342 頁。

就在于此。1906年，斯坦尼斯拉夫·扎克热夫斯基曾对此表示过不满。如果有些史学家接触到方法论问题，那么，他们都是明显地从个别论的精神入手的，例如，E. K. 科汉诺夫斯基在其《现代史学流派和科学的史学概览》一书中就是这样做的。

波兰史学对方法论问题的沉默，决不是证明它对这个问题采取中立和漠不关心的态度。在史学实践中表现了非常明确的方法论观点。在史学实践中也表现了个别论的倾向，史学实践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才得以存在。应当承认，这是一种最巧妙的方法，因为它合乎大众的需要。从思想斗争的观点来看，这种方法也带有最大的危害性。

个别论对我们历史著作的影响与唯心主义和英雄主义论不可分割地联系着。如果历史是观念的创造，如果历史的创造者个人——这些观念的表达者，而且如果他们是在“自由意志”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那么，史学就只有一件事可作，即登录事实，记载事实。个别论在这种唯心主义的历史概念中找到了刺激因素。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发现个别论的影响，例如在阿施凯纳兹的《约瑟夫·波略托夫斯基公爵》、汉德尔斯曼的《亚当·查尔托里斯基》和康诺普钦斯基的《巴尔联盟》等书中。显然，我们的分析只应限于某些著作，因为它们太多了。注意到各个流派的影响和生命力，考虑到其中哪些流派还活在从事科学工作的名派后继者们的观点中间，并考虑到这些或那些科学著作的流行程度，我们决定来分析汉德尔斯曼和康诺普钦斯基的观点，这尤其是因为他们两个人不仅是史学家，而且是在方法论方面留下了相当大的遗产的方法论学家。

在我们看来，如果先从批判作者自己所说明的方法论观点开始，然后再把他在方法论方面思索的结果，与史学中的实践活动一比较，这样来作分析将是正确的。在那些成熟的作者，如



汉德尔斯曼和康諾普欽斯基的方法論著作中，我們可以得到对提出的这个問題的直接回答。因此，我們在分析汉德尔斯曼有关我們感到兴趣的問題的观点时，先从他的《史学家》一书开始。这是在两次大战之間对波兰史学方法論无疑发生过最大影响的一部著作。《史学家》是一部折衷主义的著作，它受到了各种唯心主义方法論流派，首先是德国李凱尔特的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en）派及其价值論的全部形而上学的影响。这极其明显地反映在汉德尔斯曼关于历史規律的观点中。他在該书各个部分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了历史規律的問題，这是与作者的折衷主义有关的。然而他的論点的矛头总是指向反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規律理論的。

汉德尔斯曼一方面不想明确地否认史学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又力图否认历史規律。結果，他只能徘徊于目的論和表面上承认决定論之間，引起讀者思想上的极度混乱。

在討論历史现实的重要特征时，汉德尔斯曼涉及到史学中的規律和規律性問題。书中的这一部分是客观唯心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的特殊混合物，是狄尔泰和李凱尔特的思想的結合。按照汉德尔斯曼的意見，历史现实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因此，这种现实是个人的世界；它具有个人的，或超个人的性质，但始終是心理的性质。他固然附带說明了，关于心理世界的自律这一論題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現在就不依赖于物理現象的，然而他还是把他的理論与“自由意志”即与自由选择目的联系在一起，不过說得十分不明显罢了。就在这里，我們碰到了規律性的問題。

“这种提出目的和实现目的的能力和經常要求，是个人世界的特征，要使得一些目的服从于另一些目的的經常运动在这个世界中占統治地位，这样就会得出现在历史现实表面的乱七八

糟的現象，每一次都得對具體事項進行整理。”<sup>①</sup>

因此，按照這一唯心主義的概念，歷史現實的程序不是客觀的，而是選擇目的的結果。因而，不是主觀目的的選擇取決於客觀規律性，而是相反，客觀規律性取決於目的的選擇。

漢德爾斯曼的這一唯心主義概念的基礎是因襲於李凱爾特的價值論。他說：“事物和事件的世界作為價值的世界進入目的範圍。”<sup>②</sup>但他不是主觀地把價值理解為一種評價，而是客觀地把它理解為事物和現象的屬性。事物和現象是通過它們與人的關係而獲得價值的性質。這些價值是在主觀之外實際存在的。它們既然與人有關，價值體系就變成目的體系了。

現在我們要引用一段較長的引文，為此要預先請讀者們原諒，因為這裡涉及一個很不清楚的問題，我們不敢冒昧來作解釋。

“在事物和事件與人發生關係的時候，價值體系就變為目的體系了。沒有改變的或改變過的價值成了個人的目的，也就是說實際的或可能的價值運動，變成在人類活動的某個一般領域內所實現的實際運動。價值作為人們的目的，有意識的選擇或下意識地作出的決斷，作為因素而形成行動的世界；從作用和反作用、加強、削弱、歪曲、轉變、中立等等當中，產生着某種有條不紊的情況；從這個意義來說，這些行動是彼此協調的。儘管每一環節有其變動性、片斷性和特殊性，但從其深處來看，這個歷史現實世界是一種超主觀地存在的秩序；在這個秩序裡面，超主觀的價值的作用（從事物和事件的本质中產生的某種決定性和必然性）與實現自己的目的（人的自由意志）的人類意志的作用取得了一致。作為一切力量作用的合力——這些力量今天存在，昨

<sup>①</sup> 漢德爾斯曼：《史學家》，華沙 1928 年波蘭文版，第 266 頁。

<sup>②</sup> 同上。

天却没有存在，明天它们的对比关系又与今天不一样——，即历史现实的每一个剖面(平面)，都是一次的和不重复的，是个别的整体，是一种特殊的个体。”

上面这一段引文是唯心主义的含糊不清的典型。但在这种含糊不清的形式后面，却隐藏着相当明显的内容，那就是：作为目的而出現的价值造成一种有条不紊的情况。历史现实的世界——我们从汉德尔斯曼那里領教过了这种世界——是一个心理世界，是“超主观地存在的秩序”。简单說来：秩序、規律性，乃是主观地选择目的的产物，是心理的創造物。在这整个混合的概念后面，隐藏着寻常的唯心主义，其一半是客观的(作为目的的超主观的实在价值)，另一半則是主观的(实质上由主体自由地选择这些作为目的的价值)。結果就是否认規律的客观性。

接着，汉德尔斯曼好像感到自己的立場軟弱无力，就在分析和認識的基础上向我們提出了同一个观点的另一种說法。

汉德尔斯曼說，研究的对象永远是单个的現象。但是，在力求認識这些現象时(作者把認識与解釋等同起来)，我們应当找出这些个别的現象的某种一般規律，应该把这些現象当作这个規律的表現来看待。但这是什么規律呢？我們怎样来系統說明这个規律呢？我們要再看一看原文：

“任何观察和研究都是个别的。但在试图認識和解釋个别現象时，我們力求把它们作为某种一般規律的表現来認識。我們在具体的、变化的个别現象的世界中，探索那些标志实在現象的固定因素。这些固定的理想因素，是在观察个别現象的一切主体的观察中出現的普遍的基质。这种一般的、无所不在的、在一切个别現象中都有的因素，形成这些現象的理想本质，而不是总结，它們是这些現象的‘經常的证明’，是这些現象的經常重复的論据。如果再进一步，我們就发现在这些經常的理想因素与

其有关的现实中变幻不定的个别现象，以及根据这些现象所作的个别的观察之间，存在着一些有机的联系。这些经常的联系，在科学中叫做规律。”①

我们试评述一下这一段引文的思想。按照这种思想，有某种“理想本质”出现于个别现象中。当然，我们不难看出其中有亚里士多德的“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universalie in re*）的论点，看出理想存在的某种变种。此外，我们还知道，这个一般的因素是真实现象的标志；而规律是在某种经常的东西——“理想本质”和与其有关的变化无穷的个别现象之间的联系。在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出其中有柏拉图的“思维典型”及其反映——个别现象。但我们现在暂不追溯这一理论与这种或那种唯心主义变种的历史关系。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只是：这个理论旨在证明，规律没有客观性，因为这里所谈的不是在客观现实中发生的联系，而是在某种理想本质与个别观察之间的联系。这样，规律就从客观现实转入了既可客观地也可主观地解释的精神领域。不管怎样，这都是意味着抹煞规律的客观性，因而也就是否认历史规律的客观性。

上面所谈的都是个别论所走的老路，但是它的原理还没有直接地说出来。在进一步讨论的过程中，汉德尔斯曼却画蛇添足，从而暴露了他以前关于规律这个论题所作的唯心主义的思辨，是为为什么目的服务的。在分析历史的起源这个概念的时候，他写道：

“科学的任务，因而也就是历史的任务，不是要设法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现实中作为它的认识对象的那个范围里，会发生这个或那个事件？而只是要回答这样的问题：这个现实的

---

① 汉德尔斯曼：《史学家》，华沙 1928 年波兰文版，第 278 页。

对象是怎样发生的，它与其本身有什么关系？因此，科学的任务将是記載現象和現象之間的一定的关系，以及解釋这些現象。”<sup>①</sup>

固然后来汉德尔斯曼提到了历史中的因果律，把它列入价值的范围，但这并没有特别的意义。他的綱領性的立場包含在上面那段引文中。这是个別論的綱領，暗示着否认历史規律的存在。如果汉德尔斯曼与个别論的經典代表們有所不同的話，那只是他的論据更不明确和缺乏一貫性。但不能說这是他的优点。

然而，在分析《史学家》这本书的时候，我們應該准备解答下面这个論据：汉德尔斯曼是一个杰出的史学家。他作为一个方法論学者来进行写作，这并不重要；可能他的这些观点毫无价值可言；但当他作为一个史学家进行写作的时候，他的理論观点既沒有意义，又沒有影响，不客气地說——因为他只是一位史学家。

因此，我們要来看一看汉德尔斯曼的史学实践，看一看他的錯誤的方法論观点对研究工作发生了什么影响。

同时，要附带說明，我們完全不想对作为史学家的汉德尔斯曼作一个总的評价。这是史学家們自己的任务，哲学不可能，也不想解决这个任务。特别是对本书作者來說，这个任务不仅超出了本人的能力范围，而且也超出了本书的目的和任务的范围。

我們感到兴趣的只是一个很小的問題，就是，我們想从汉德尔斯曼的历史著作中举例來說明他自己在我們感到兴趣的問題上的方法論原理；我們想指出，他的个别論理論是与实践彼此密切联系的，并证明，个别論威胁着我們史学的实际危險；順便提

---

<sup>①</sup> 汉德尔斯曼：《史学家》，第303頁。

一下，这是由于汉德尔斯曼学派目前还有影响。

分析汉德尔斯曼在《史学家》中所阐述的方法论观点，可以表明这些观点不明确的并带有折衷主义的性质。至于历史规律的问题，我们从某些地方看到汉德尔斯曼企图在狄尔泰—李凯尔特价值论的基础上使规律神秘化，同时明显地表现出个别论的观点。在研究汉德尔斯曼的历史著作时，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指出，他的理论是与实践完全相符的；这样就暴露出汉德尔斯曼在《史学家》中表示了他自己有意識地在研究工作中实现的方法论观点。

我们拿汉德尔斯曼的两部书来作例子：《现代民族的发展》和《史学家约瑟夫·毕苏斯基》。第一本是在1923年写成的，第二本是在1934年写成的。

《现代民族的发展》是一部综合性的著作，其中明显地表现了想确定一些规律性的愿望，虽然这种规律性是被神秘化的，并与价值论联系在一起。当然，在这本书中对民族的理解，是从唯心主义的精神出发的，而首先是被理解为“共同性的总体意识”。这种意识是在不同的社会中处在不同阶段的长期历史过程的结果。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某些一般规律。因此，作者认为：“与研究现代的同时，也许在研究现代以前，就应该力求通过历史方法来作出历史的公式，确定现代民族运动的根本路线和基本概念。”<sup>①</sup>因此，他接着说：“应该以当时的过程的典型形式为根据，对整个欧洲来说，这个过程就是1789年以后，特别是在革命和复辟时期的法国历史；同时考虑到由于领土的分散性和缺乏完全的独立而产生的必然的偏差，这首先表现在当时的意大利、波兰和德国。”<sup>②</sup>在这里我们对汉德尔斯曼怎样理解

① 汉德尔斯曼：《现代民族的发展》，华沙1924年波兰文版，第7页。

② 同上。

“发展的公式”没有兴趣。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他不仅没有把探索发展的规律性与史学家的任务对立起来，而且还尽可能更紧密地把它们联系起来。他在这里甚至看到了阶级的存在，并指出了在“现代民族”的产生方面阶级斗争的意义。同时，这整个问题却在民族发展的理论中被神秘化了，被看作是一定的价值、理想的实现，因为“关于民族运动的任何根据应当与道德理想联系在一起”。<sup>①</sup> 汉德尔斯曼企图指出“民族运动的基本趋向”；按照他的意见，这些趋向是，统一各个集团的努力，争取政治自主的运动等等。这整个概念是唯心主义的和思辩的，但汉德尔斯曼在这里却几乎是以纲领式的观点来探索发展规律的。

在《史学家》里，情况完全不一样。例如，在对毕苏斯基的推崇赞颂述评中，汉德尔斯曼以个别论者的身分，把个人迷信与有意识地采用的历史直觉主义结合起来。只有直觉才会为了解过去提供可能。直觉的来源倒是次要的东西，因为“过去是本身心理的一部分，并继续生活在心理中，而且只有在心理中才能被发现。”<sup>②</sup>

这两部著作证明，汉德尔斯曼的理论观点游移不决，在实践中得到了反映，《史学家》的出现毕竟在毕苏斯基的述评以前，它的主要轮廓的完成也比《现代民族的发展》为早。但是《亚当·查尔托里斯基》<sup>③</sup> 这部汉德尔斯曼写了一生的著作，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这部著作里，他作为一个史学家，其活动的光明面和黑暗面都已暴露无遗。

---

① 汉德尔斯曼：《现代民族的发展》，华沙1924年波兰文版，第13页。

② 汉德尔斯曼：《伟大的浪漫主义者。史学家约瑟夫·毕苏斯基》，华沙1937年波兰文版，第84页。

③ 汉德尔斯曼：《亚当·查尔托里斯基》，第1—3卷，华沙1948—1950年波兰文版。

在这里我們应再一次声明，史学家可以对《亚当·查尔托里斯基》这部书作出全面的評價，而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新的观点写一部关于这个题目的新的著作。凱聶維奇教授在其《出版者后記》中向波兰青年一代史学家提出了一項任务，依据馬克思主义的方法論和汉德尔斯曼所搜集的資料，对查尔托里斯基的时代作出新的总结，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我們只想就我們感到兴趣的个别論史学的问题来分析这部著作，并且根据需要，我們不得不一作一简单的分析。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杰出的史学家的著作，它的特征是，旁征博引与高度的叙事艺术和文学修辞兼而有之。在这里我們碰到的是一部典型的历史著作，尽管它具有歪曲历史真相的根本性的方法論錯誤，但由于其中搜集的資料丰富，馬克思主义研究者还是可以和應該加以利用的。同时，这部著作最好地說明了一条原理，即錯誤的方法論，特别是个别論必然使史学家离开正确的道路，即使沒有使他的研究工作全功尽棄，也会降低其效果。此外，对于波兰史学來說，这部著作还有个別論的严重的（*meménto*=切記在心）危險意义；因为它为一些史学家錯誤意見提供了論证，这些史学家对理論問題估計不足，认为在波兰根本不存在文德尔班和李凱尔特的影响問題。恰恰是《亚当·查尔托里斯基》这部书充分证明了在我們史学中 with 个别論作斗争的迫切性。

在方法論方面，《亚当·查尔托里斯基》是怎样的，对这个問題，可以毫不含糊地回答；在这里个别論与英雄主义的概念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前面我們已經着重指出了这种联系的原则性意义。如果从个别論的原则出发，必然会写出一部英雄主义的历史，反之，誰从英雄主义的史学的概念出发，誰就不能避免个别論。在这里个别論和英雄主义的理論，哪一个刺激因素在



先，这无关重要。重要的是，这两个概念彼此不可分割地联系着，它們都是从同一个唯心主义的树干上生长起来的。

《亚当·查尔托里斯基》一书正是这样做的。出版者在序言中说：“另一方面，汉德尔斯曼始终遵循着这一种意见：即不是偉人的感受和活動，而是深刻的社会过程，构成了历史的涵义。”<sup>①</sup>如果汉德尔斯曼真正遵循这种意見，那他就違背了他自己的观点。这部书最根本的方法論的錯誤，就是作者站在資產階級方法論的党性立場上，不能越出“偉人的感受和活動”的範圍，他看不到，因此也不能了解組成时代本质的意义的“深刻的社会过程”。結果，尽管付出很大的努力，他还是只能寫出一部歪曲历史真相的著作。其原因何在呢？

当然，主要的原因在于汉德尔斯曼的科学立場的階級局限性。在我們的分析結束的时候，还要回到这个問題。作者的原則性的方法論的錯誤，是从他的階級立場中产生的。

在一次辯論过程中，有一位年青的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虽然正确地批評了那些想以各种公式来代替可靠的知識的人們，却諷刺了那些青年科学工作者，說他們的自信仅仅由于懂得社会意識决定于社会存在。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这种批評是正确而中肯的，但是当你讀《亚当·查尔托里斯基》这部书的时候，就显出这种責难的片面性。因为那条在我們青年工作者看来是显而易見的馬克思主义的根本真理，完全沒有陈腐之气。恰恰在不了解这条原則性的真理上，汉德尔斯曼被难住了，因为他看不到社会形态、社会各階級及其斗争，以及时代本质的現象。因此，他不能了解这个时代，不能描述它的真面貌。

当出版者在跋文中提到书中第三部分的时候說，按其本质

---

<sup>①</sup> 汉德尔斯曼：《亚当·查尔托里斯基》，第1卷，第9—10頁。

來說，它不同于其余部分（这一部分其实是最“政治化的”），他是正确的：

“汉德尔斯曼在书中不把各个国家的社会阶级，而把一些国家活动家如尼古拉、拿破仑三世、帕麦斯顿、加富尔、查尔托里斯基和他的战友们提到首要的地位。当然，这些人都是重视经济必然性和‘社会舆论’的，但是归根到底，他们的虚荣心、热情、外交上的灵活性或不灵活性，决定了历史的命运。结果，这种对心理化的偏爱使作者抹杀了克里米亚战争的真正意义。”<sup>①</sup>

这是正确的。

《亚当·查尔托里斯基》是一部论“英雄”及其心理和事业的書。这一切被看作是在社会及其动力之外的，是在社会阶级之外的，并且也违反了一望而知的情况，被看作是在实际国际情况及其矛盾和重要问题之外的。谁不了解社会形态的意义，谁就不能抓住所有这些问题，从而除了自己的英雄及其经历以外，什么东西也看不到。结果，他只局限于这些经历的范围以内；个别论的出现，是英雄主义的必然产物。

汉德尔斯曼这部书的第一卷具有最大的传记性。对这种历史研究的必要性是不能加以反对的。对作者在第二章标题为“母爱”的一章中所提到的那个问题也应该加以分析。为了了解个人及其行为的动机，当然也必须了解他的心理，因为它决定着心理上的特殊的不重复的情况。例如，如果我们看一看叶甫根尼·塔列列的《塔列兰》这部书，在其中也可以找到这种心理上详细的传记。但问题在于，汉德尔斯曼把这些细节当作事情的本质，把整个理论归结为这样来理解问题。他模仿尤利乌斯·斯洛瓦茨基的《戈尔什典斯基》的一书中的辛斯内伊的形象，塑造了自

<sup>①</sup> 汉德尔斯曼：《亚当·查尔托里斯基》，第3卷，第2部分，第721頁。

己书中的主人公：一个具有两种精神的人；他内心是分裂的，因而不能有所行动。同时在这里暴露了弗洛伊德杰义<sup>①</sup>的精神，即对母亲的不正常的关系瘫痪了这位主人公；当他摆脱了母亲的影响时，他已经年纪大了，已经四十七岁。下面我们援引一段原文，它可以代表这部书中的整个概念。汉德尔斯曼谈到在母亲与亚当公爵结婚关系的基础上发生矛盾时写道：

“在母子之间感情的争论中，儿子胜利了。亚当公爵终身保持对自己母亲的眷恋和热爱，但她的无可非议的威信却受到了损坏并永远消失了。

但这种道德上独立精神的建树已经太迟了……

母亲长期占优势，在儿子的精神上打了一个很深的烙印。此外，在公爵的心理中，还有另一个从上一世纪继承下来的传统包袱，使他不能行动；这个包袱成为一种障碍，由于发展过度而在正常生活下成为阻力。由于在紧要关头没有决断，公爵失掉了摆在他面前的许多机会，以致他不论做什么，归根到底一切都对他不利。这种特点大概是在可怕的第十八变态心理的基础上，即在由于多年的作用而加强的母性变态心理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完全是悲剧性的第三变态心理（友谊或心理上的俄国俘虏）的影响下，应当从而更加巩固起来。”<sup>②</sup>

记述查尔托里斯基为沙皇亚历山大服务的下一章证明，对汉德尔斯曼来说，上面这一段引文不是偶然的。在心理和变态心理的狭路上又碰到了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作者把这一章的最后一节题为“俄国的友谊与亚当公爵的心理”，是很有

---

① 弗洛伊德主义——现代资产阶级心理学中反科学的流派之一，始创人为奥地利医生兼心理学家齐格蒙德·弗洛伊德。这种学说企图以生物本能（性爱）和趋向来说明人的社会生活。——译者

② 汉德尔斯曼：《亚当·查尔托里斯基》，第1卷，第50—51页。

意思的。在叙述保罗统治时期的一次阅兵式中，查尔托里斯基冻坏了指头的一段插曲时，作者以下面的几句话结束这一章：

“这一段回忆中具有某种悲惨的象征。为沙皇服务的时代过去了，俄国友谊的强制不可挽回地消逝了，但从其中产生的，使他不能有所作为则仍将终生留在他身上。”<sup>①</sup>

可见这是心理作用和变态心理。这可以说明这部著作的全部内容。在这部书中哪里找得到阶级和社会形态的地位呢？哪里找得到阶级斗争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呢？汉德尔斯曼是始终一贯的，在他的著作中我们找不到，或者几乎找不到所有这一切。找到的只是亚当公爵的感受和变态心理。英雄和关于英雄的故事，英雄主义和个别论。

结果怎样呢？

根据汉德尔斯曼所写的关于查尔托里斯基的浩瀚篇幅，我们试求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几十年的长时期中，作为一定的集团、一定的政治概念的象征，查尔托里斯基代表谁呢？

不知道。为什么十一月起义以失败而告终？为什么注定要失败？参加起义的一些人和一些派别代表谁？代表什么？

不知道。与国内革命派比较起来，“兰伯郎”<sup>②</sup>意味着什么呢？他对这个问题作了完全错误的、令人误解的解释。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作者以一千页篇幅来叙述那个按其思想来说应当代表时代的人的活动，却根本没有看到在那个时代的社会冲突中占着首要地位的农民问题。但这不等于说，他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当他分析十一月起义和说明起义后的国内情况，侨民情况以及其它有关事件的时候，他的确也谈到这个问题。但

① 汉德尔斯曼：《亚当·查尔托里斯基》，第1卷，第119页。

② 查尔托里斯基晚年逃亡巴黎时的寓所，后来成为波兰侨居国外的反动分子活动中心。——译者

他談到这点只是为了配象，只是当作一条新聞来报导，沒有把它与一些事件，与查尔托里斯基及其行为联系起来。作者完全不知道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完全不了解波兰的民主社会的性质。应当指出，只有两次提到爱特瓦尔特·杰姆鮑夫斯基：一次称他为“狂人杰姆鮑夫斯基”，因为他成为左派的领导人，并和其他一些人一样，要求“全部政权归于己，仅仅归自己”，又一次只是順便說一句：他死去了。<sup>①</sup>

汉德尔斯曼写了一部亚当·查尔托里斯基的傳記。但这种历史著作，特别是关于一个民族如此重要的时期某一派别的領袖的傳記，不能够也不應該从英雄主义的观点来撰写。因为对于亚当·查尔托里斯基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只有根据时代背景，根据时代中的实际冲突，时代的需要，以及这样那样地反映这种需要的社会力量，才能得到了解。当然，同时也應該看到并表明这个人及其所有的特性和优缺点。而且，写亚当·查尔托里斯基的历史，等于是写一部时代的历史。

由于汉德尔斯曼站在个别論的英雄主义方法論立場上，所以正是这一点他沒有能做到。

为了更好地了解汉德尔斯曼的个别論的問題，我們来分析一下《亚当·查尔托里斯基》和叶甫根尼·塔尔列的《塔列兰》这两部书对同一历史事件的理解。我指的是維也納會議。

把这两部书作一对比是很有意义的，这特别是因为它们具有相同的意图：都是要写一部与时代历史密切联系的个人的傳記，然而它們却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实现这个意图的。从表面来看，这一点即使是在按各章分期的标准問題上也明显地表示出来：在汉德尔斯曼的书中，查尔托里斯基的个人遭遇是分期的

---

<sup>①</sup> 汉德尔斯曼：《亚当·查尔托里斯基》，第1卷，第217頁。

标准，而塔尔列则把社会形态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作为分期的标准。但他们的不同之处还不止于此。汉德尔斯曼在原则上是脱离了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从个别论的观点来记载他的主人公遭遇的。塔尔列也是写的传记，但他是以时代的阶级斗争为背景，把传记作为阶级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写的。因此，在塔尔列的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主人公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一点也没有失去记载和历史故事的生动性；而在汉德尔斯曼的书里却只有记载，而看不到历史。在这两个作者对维也纳会议的理解的例子中，非常明显地表现了这两部历史著作所采用的两种方法和两种形式的根本对立。

汉德尔斯曼只限于记载，而且是非常离奇的记载，其中除了政治上的重要事件以外，还有被看作具有同样意义的亚当公爵的私事，外交上的流言蜚语，各种琐碎小事，以及最主要的书中主人公的情绪和感受。至于什么是维也纳会议，在会议中出现了哪些社会力量，在国际范围进行的斗争是为了什么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提法却只字不提。

塔尔列对问题的提法则完全不同。开始的一章就说明了在会议上出现的各种阶级力量，然后再按年代记载了事件。作者固然也记述了许多奇闻、流言和内部传闻等。但其主要思想——描述塔列兰在形势的发展中所起的社会和政治作用——是明确地放在首要地位的。

对比分析还暴露了一个问题，即“纯记载”免不了倾向性，而且是倾向性的工具；这反映在对事实有一定的选择上面。在汉德尔斯曼的书中，查尔托里斯基被描写成一个千方百计地力谋拯救波兰的热诚爱国者。把这种记载与塔尔列的解释作一比较，就可看出，汉德尔斯曼在无数琐碎细故的海洋中淹没了极其重要的事情，而从这些重要的事情来看，查尔托里斯基的活动就完

全是另一种样子。姑以塔列兰长期而坚决地反对亚历山大的活动这个问题为例，塔列兰的目的是获得波兰的独立，法国支持波兰的独立是为了削弱俄国。塔列兰在作了长期坚决的斗争以后，放棄了他的计划，因为看来亚历山大的力量——附带提一下，由于得到查尔托里斯基的支持——显然太强了。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实，一切把形式上的客观主义认为是史学家著作获得成功的基础的人们，都应当考虑这个事实。

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在我们的分析即将结束的时候，还想再谈一谈。我指的是历史研究中的党性问题。在上面讨论中，我们不止一次地涉及这个问题，我们曾尽量指出它与个别论问题的联系。在分析汉德尔斯曼的历史著作的基础上再一次碰到了这个问题。无须证明，只有站在进步的立场上，才能科学地、正确地阐明过去的事件，只有无产阶级这个最革命的阶级的党性观点，才是彻底的、科学的观点；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无产阶级的党性，就不能科学地、客观地记载历史事件。反之，资产阶级的党性则是客观地反映现实的阻碍，它总是歪曲过去的容貌。所以归根到底汉德尔斯曼的英雄主义和个别论的倾向，还要归结于他的资产阶级的党性。在他的书中这种资产阶级党性表现在各个不同的方面：他明显地同情当时资产阶级地主的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查尔托里斯基；他否认时代的革命问题，正是为了掩盖这个问题，他利用个别论；这也表现在他的一些个别的相当典型的意见中。

下面是两个例子：

在分析十一月起义失败的原因的时候，作者指出，各党派之间的斗争和相互仇恨是起义的内部软弱无力的原因。不仅由于他完全不了解当时斗争的意义，而且由于他不喜欢这种斗争，所以实际上不得不赞成弗·札莫伊斯基的意见，以为必须组织一

个“能严厉对待扰乱分子的”强有力的反雅各宾政党。他公开反对极端的政党，赞成当时自由主义者口号：社会“团结”。因此最后他感叹地说：“在这种情况下，在实践中产生了不停的斗争……波及各个生活领域的夺取政权的斗争。”<sup>①</sup>

现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及其前辈思想家的这种所谓“团结”，实际上是一种党性的观点，从这种观点出发，除了歪曲历史真相以外，不可能导致其他结论。

从汉德尔斯曼关于这个时期的分析中，还可举出另一个例子：

“战争开始了——如果不甘灭亡，就应该争取胜利。

“在这场已经开始的为了波兰的斗争中，我们共同的处境就是这样。与其说，与俄国本身作战，倒不如说是与沙皇本人作战。大家深信，这不是，也不可能是与俄国人民作战。而在逊位的那一天，在首都举行的别斯土日夫和他的朋友安葬周年纪念的盛大示威游行，以及写在军用旗上的口号‘争取你我的自由’，就是群众信仰什么，和上层领导分子注意什么的象征。”<sup>②</sup>

反对波兰和俄国进步力量的兄弟般的团结，不仅是民族主义的表现，而且也是害怕革命斗争的表现。结果，汉德尔斯曼在其著作中根本不提另一个俄国的存在，一点也不想知道关于争取波兰独立的革命斗争，而是把为沙皇服务的查尔托里斯基描写为波兰爱国主义的唯一体现者。这种对历史真相的明显的歪曲是作者的资产阶级党性的必然结果。

唯心主义的英雄主义和个别论，以及它们的基础——资产阶级的党性，这些就是分析汉德尔斯曼的主要历史著作所暴露出来的东西。个别论在史学家研究工作中的实际结果就是这样。

① 汉德尔斯曼：《亚当·查尔托里斯基》，第1卷，第158页。

② 同上，第152页。



个别論的影响深入我們現代史学的途徑就是这样。

当然，个别論的影响不仅通过汉德尔斯曼及其学派深入我們的史学。它还通过一些别的途徑。

这里我們也来簡括地分析一下康諾普欽斯基的观点。个别論也通过他而进入我們的現代史学。

我們先从分析他在《史学家》一书中所闡述的方法論观点开始；这部书是康諾普欽斯基晚年写的手稿。

首先，从其中的意識形态上的折衷主义观点来看，康諾普欽斯基的《史学家》与汉德尔斯曼的著作来自同一根源。这是一部唯心主义的著作，明显地反映了个别論的傾向。我們正是要簡短地分析問題的这个方面。

在以“历史的科学性”为題的第九章里，康諾普欽斯基答复了一些人提出的責难。他們认为历史沒有权利被称为科学，因为历史研究的对象都是曇花一現的一些事实：

“在这些巨大的任务面前，严厉的責难和要求落在史学家的头上。塞克斯特·艾姆皮里克把历史称为[amethodos hyle]①，是无路的森林，或虽然有路而无向导者。許多思想家，其中大多数不熟悉档案，他們在历史沒有滿足他們的理論要求以前，拒絕承认有权称为科学。所以阿瑟·叔本华宣称，历史沒有科学思維的最重要的特征，因为它不是使事实系統化，而仅仅是排列事实，从沒有把这些事实建立成体系。另一些哲学家至少表示过他們的希望：历史学将会得到改进，将可研究某种比个别事件和个别人物更重要的东西。

“史学家們對他們的師傅的話是洗耳恭听的，虽然他們也看到師傅們远沒有达到哲学的理想。有在理論上这个人或那个人

---

① 即“乱七八糟的东西”——譯者

同意了所提出的改进意見。

“沙尔·謝尼奧博斯慚愧地承认，他的車間連整頓好的概念或准确的定义都沒有，因此，他試圖尽可能迅速地把它們建立起来。但和所有其他人一样，他最后还是写出一部真实的历史，只是曇花一現而不是循环的历史……”

康諾普欽斯基明确地宣称，他站在个别論的立場。最后他引用了个别論者爱德华·迈耶来作证，迈耶肯定地說，他自己从来没有发现过任何規律，在他的同行中也没有誰找到过。在后面关于历史中的因果关系、規律和偶然性等問題的几章中，康諾普欽斯基的方法論十分模糊，但他是明显地以迈耶为依据的；迈耶认为，历史是偶然性的汇集，因为每一个事件都是偶然的。

按照康諾普欽斯基的意見，个性属于偶然性的范疇，这样他就取消了因果关系的存在，抹煞了历史中的規律性。

康諾普欽斯基宣称，历史是科学，因为它有自己的对象，力图掌握现实，并且是运用准确的方法的。他作出結論說，因此，可以排除发展規律这个与历史的科学性无关的問題。

从前面已經对个别論所作的批判来看，我們可以不去理睬这整个論点，再作什么补充。但我們必須指出，康諾普欽斯基在我們的书刊上仍在完全公开地保卫个别論的观点。我們还要补充說，甚至在人民波兰时期，他还是这样做的，这就在实际上证明，對我們史学家的某些人來說，這個問題絲毫也不是过时的問題。

康諾普欽斯基的方法論原則在他的历史著作中有什么反映呢？他的《巴尔联盟》这部书回答了這個問題。在这里我們可以再一次找到他与汉德尔斯曼之間的某种相似之处，因为汉德尔斯曼的《亚当·查尔托里斯基》和康諾普欽斯基的《巴尔联盟》都

是他們毕生的著作事业。此外，这两部著作在許多方面是相似的：它們都是作者博学多聞的成果；和《亚当·查尔托里斯基》一样，《巴尔联盟》也是根据关于联盟的丰富資料写成的，史学家們可以使用这些資料来作进一步的加工；这两部书所依据的是同样的方法論原則，而且都犯了同样的錯誤。康諾普欽斯基的著作是一部典型的个别論的著作，它具有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它与汉德尔斯曼的傳記性著作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康諾普欽斯基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一个英雄的命运上面，因为他写的是一部运动史，所以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許多人的命运上面。但这并不改变这部书的个别論和英雄主义的性质（总结性的最后几章还有一些其他性质）。我們认为无必要深入探討这部书的細节及其本质。我們只須指出，康諾普欽斯基的理論观点是与他的史学实践相同的，这就再一次证明个别論的危險在我們史学中仍然存在。

上面我們分析了由于在两次大战之間的时期一些重要的历史学派对現代波兰史学的影响而产生的个别論的危險性。但这不意味着，在說明这种危險性时，我們只應該引证过去的著作。現代历史著作中也有許多受到个别論影响的例子；我們可以从其中举几个例子以便使我們的說明更加全面。

看一下丰富的純粹“罗列事实”的著作，就可以相信个别論的危險是直接而明显的。这种著作在战前很多，現在还是許多。最坏的是，資產阶级个别論所关切地支持的关于这种著作的“学术性”的神話至今沒有彻底消除。这里指的是实践中的个别論，是具备它的一切必要工具的个别論，这些工具是主观主义，歪曲历史真理等等。但这不等于說，我們否认記載性著作的必要性，尤其是历史著作中的記載地点的必要性。我們已再三強調过，沒有記載，沒有个别事实，就不可能有历史科学。但在一些“罗

列事实的”著作中正是沒有作好这一点。問題在于,这些著作的作者把“純記載”变成了用来反对史学的科学基础的綱領。这些著作是以广博的外貌出現的个别論的实际应用。这一类著作还没有在波兰消失,而在某些方面还具有綱領性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我們敢于說,不仅有个別論的危險性,而且是真正地存在着。

下面就是一些例子。

1948年卡洛尔·古尔斯基出版了《論历史中的解釋和評价》一书。在这本书中我們讀到了下面一段:

“如果历史从事于認識一般的概念,它就能形成科学規律和发现支配世界的机构或构造。但是这种东西是沒有的。創造历史規律的任何企图都是与丰富的历史事实相矛盾的。社会学和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的科学能够形成規律,这些科学反映着现实的某些方面并把它們反映在体系中或数学公式中。历史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当然,历史是科学,但不是完备的科学,其中沒有有关的一般概念。用純粹的历史方法,历史不可能从自己的材料中創造一般概念。”<sup>①</sup>

这种公开的宣揚个别論,在这个时期我們的方法論著作中并不是唯一的。1948年在弗劳茲拉夫举行的第七次波兰史学家代表大会上,罗曼·魯特曼在其《史学方法論基础》报告中,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同时依据了与不可知論相結合的新实证主义。魯特曼把历史概念解釋为結構,得出了下面的結論:

“有了这些历史的結構,我們就可以試圖接近了解历史过程,而历史过程已經过去,只留下历史源泉的痕迹。实际上这一现实是怎樣的,非我們所得而知。因此,在我們看来,关于这

---

① 古尔斯基:《历史中的解釋和評价》,卢布林1948年波兰文版,第6頁。

一历史过程的性质以及支配这个过程或在其中出现的规律这个问题 的辯論，是言之无物的辯論。既然历史现实本身非我們所得而知，那么关于支配这个现实的规律，我們就无話可說了。”<sup>①</sup>

我們前面提到的卡洛尔·古尔斯基，与其說他是一个方法論学家，不如說他是一个史学家。正是在他的典型的罗列事实的历史著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个别論的影响及其一切不良后果。他在战前写的十三年战争时期的濱海区历史<sup>②</sup>就是这种著作；他在战后写的十字軍軍团史<sup>③</sup>及波罗的海沿岸地带的历史<sup>④</sup>也具有同样的性质。最后这部著作是个別論的一个特別明显的例子；作者記載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几个世紀以来的悠久历史，但在大堆的事实、名称和数字中，却一次也沒有提到这些或那些事件是在什么社会形态中发生的。可是，这部书首先是分析經濟問題的著作。显然，在这样的态度之下，像汉薩城市的扩展，汉薩同盟与波兰的关系的問題，以及其他的政治問題，似乎都无須解釋了。

問題之更加复杂化，还因为在卡洛尔·古尔斯基左右圍繞着一些追随他的年輕学者。例如，馬里昂·比斯庫普的涉及革旦斯克历史的那部书<sup>⑤</sup>就充分保持了个别論的精神。

但个别論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托倫一批人的著作中。斯卡尔

---

① 參閱《弗劳茲拉夫第七次波兰史学家會議記錄(1948年9月)》，第2卷第1篇，华沙1948年版，第27頁。

② 古尔斯基：《十三年战争时期的濱海区》，波茲南1932年波兰文版。

③ 古尔斯基：《普魯士十字軍国》，革旦斯克1946年波兰文版。

④ 古尔斯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波兰人》，革旦斯克1947年波兰文版。

⑤ 馬·比斯庫普：《1454—1466年13年战争期間革旦斯克与卡伊密斯·雅格隆車克的关系》，托倫1952年波兰文版，第238頁。

科夫斯基的关于白波兰的著作<sup>①</sup>，維拉烏姆<sup>②</sup>和恰普林斯基<sup>③</sup>的著作也都受到个别論的有力影响。在雅·柳比奇—巴洪斯基的法国—拿波里之战的历史<sup>④</sup>中，个别論的影响达到了頂峰。

这一份目录是非常不完全的。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來說明个别論的影响在我們史学中有着另外一些温床。

这些引证的事实說明什么呢？

这些事实证明，个别論不仅过去对我們的史学是一种危險，而且現在还有它的影响。这些事实还证明，那些认为与个别論的残余作斗争在我們的条件下是捕風捉影和多余的史学家們錯了。具体的分析表明，在我們这里还没有彻底克服资产阶级方法論的影响，特别是，与个别論作斗争在我們这里仍然是我們史学战綫上的一个重要障地。

- 
- ① A. M. 斯卡尔科夫斯基：《家族史料館中的亚历山大·魏洛波斯基(1803—1877)》，波茲南1947年版，第1—3卷。
  - ② J. 維拉烏姆：《华沙公爵弗利德立克·奧古斯特(1807—1815年)》，波茲南1939年波兰文版。
  - ③ W. 查普林斯基：《1632—1648年的波兰和波罗的海》，弗劳茲拉夫1952年波兰文版。
  - ④ J. 柳比奇—巴洪斯基：《1798—1799年的法拿战争》，第1—2卷，克拉科夫1947—1948年波兰文版。

## 第五章

### 对历史规律的唯心主义 神秘化的批判

在上面的討論中，对个别論的批判說明了否认历史規律存在的一个流派的部分的概念；这个流派直率而公开地否认客观規律性以及反映它的历史发展規律的存在。我們所以說，我們对这个問題的分析是部分的，是因为我們只分析了这个流派的某些重要的代表人物，因为我們的分析只涉及那一流派；它表面上追求科学性，同时宣布这样一个論題：仿佛史学的方法論特点就在于它的个别論的观点。我們有意不提所有其他的理論，它們由于推崇非理性主义，把历史过程解釋成以“自由意志”为根据的，因而就不受任何因素决定的“創造物”（柏格森主义、法西斯主义学說、生存主义等等）。

但是，我們已經說过，个别論只是資产階級科学否认历史規律的一个流派。还有另一个通过唯心主义的神秘化来否认历史規律的流派。

馬克思主义的历史方法論指出，科学的史学不是与一般地承认历史发展規律，而是与承认历史发展規律的唯物主义的学說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因为，不仅那些直接否认历史过程的客观規律性的人否认它，而且那些間接地使它唯心主义神秘化的人也否认它；这些人或者把历史发展規律理解为精神发展的規律（客观唯心主义），或者认为，这些規律是个人的心理所

創造的(主觀唯心主義),或者把思辨的公式硬套在現實上(主觀主義的變種),或者以為,規律是天意的有目的的活動的表現(宗教),等等。史學中的科學觀點與發現歷史過程中的重復性和客觀規律性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從而也就是與唯物主義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史學中的唯心主義不管它表面上是否承認歷史規律的存在,實際上否認歷史中客觀規律性的存在,因而也就是否認史學的科學性。

在分析馬克思以後的時期資產階級史學否認客觀歷史規律的這兩個流派時候,應該指出,儘管表面上有所不同,這兩個流派都是資產階級對革命的工人運動的思想、對歷史科學領域中的這種思想的反動的表現。對於這兩個流派哪一個在思想上更加危險的問題,應該回答說,它們都是一樣危險,因為資產階級在不同階段和不同條件下,時而利用這一派,時而利用那一派,以力求達到同一個目的——否認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資產階級思想體系中一些最反動的派別如法西斯主義,則同時利用這兩種否認規律的形式。它們宣揚唯意志論,承認偉人,即“領袖”的意志是歷史發展的推動力,同時並肯定血統、種族、民族精神的“規律”等等的存在。關於史學作為個別論擺脫方法論的論題,宣揚北方人種在歷史上優越於其他人種的規律的論題,認為歷史規律是從“理想典型”之類的虛構的論題,系統說明“永久的無產階級”的“歷史規律”,或循環發展的論題,——所有這些論題雖然彼此不同,但它們在思想鬥爭的一定階段都起着一個相同的作用:它們都是同一個資產階級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科學觀點的反動的不同形式。但在分析史學中的唯心主義理論,及揭露其基礎(否認客觀歷史規律)的時候,決不可忘記分析和批判的歷史立場。這就是說,對馬克思以後出現的,使歷史發展規律神秘化的那些唯心主義流派的評價,與對馬克思主義以前的



时期诞生的那些唯心主义流派的評價，应有所不同。在馬克思主义出現后的时期，無論如何，从上世紀末叶起，这些唯心主义流派只是资产階級对馬克思主义的反动的各种变种；而在馬克思主义以前的时期，在唯心主义的神秘化的外壳之下，却往往隱藏着合理的內核。我們以黑格尔或乔巴蒂斯塔·維科以及他們的追隨者为例。黑格尔是把历史发展規律看作客观精神发展規律的理論的創始人；新黑格尔主义者，特别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家如京梯尔这些人，在原則上重复了他的話。然而黑格尔的历史辯证法，尽管有神秘化的形式，我們却在其中看到了他的天才的思想，这些思想构成了馬克思后来发展了的那一理論的合理的內核；而新黑格尔主义者則不过是反对科学的反动而已。維科的循环說(ricorso)是唯心主义的理論。它具有循环发展說的一切錯誤。然而在維科的理論中也有一些进步的因素，就是，他試圖发现历史的規律性，試圖用“人的”眼光来看历史，因此，这一理論在历史哲学发展中曾起了进步的作用。而在两个世紀以后重复維科思想的，例如卡济梅日·凱列斯-克拉烏茲的观点，則應該承认完全是反动的，有害的。在这里应当遵循以历史的态度来解决历史問題的原則。同一現象，同一理論，在不同的条件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涵义和客观意义会与原来的完全不同。以神秘化形式表現出来的黑格尔的历史发展概念，反映了客观的发展規律，这就是他的概念的天才性，合理的內核所在。在馬克思以前的时期，在完全科学的社会发展的理論誕生以前，黑格尔的理論的确含有科学进步的因素，只是因为这样，它才能成为馬克思主义的思想源泉之一。馬克思主义这一完全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論一出現，情况就起了根本的变化；在前一个历史时期能起过相当进步作用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变成了明显的反动思想。因為我們在估价某一現象时所采用的标准

改变了。

从这些論述中可以得出什么实际結論呢？結論是：对各个观点的評價應該始終是具体的，應該考虑到地点和时间的具体条件。

在作了这一总的声明以后，就可以开始来批判地分析属于第二个流派的一些观点，——分析把历史規律神秘化的流派，资产阶级在思想上攻击客观历史規律的理論，就是根据这些观点来进行的。乍看起来，这样的理論和观点形形色色，名目繁多。但比較深入地分析以后就可看出，可以把它們分为具有明确輪廓的两派：一派是根据客观唯心主义的原則，另一派以主观唯心主义为依据。

自然，还有“混合的”理論，不能完全列于这一派或那一派。但实际上，这一分类原則是正确的，它提供深入地了解所分析的理論的可能性。應該附帶声明，我們完全不想对我們感到兴趣的各派都作詳尽的解釋，而且在这本非历史性而只是分析批判性的著作里，这样做也是不正确的。我們只限于举一些典型例子來說明上述两派的观点。

## 第一节 客观唯心主义派

(把历史发展規律神秘化地說成是  
客观精神发展的規律)

### 1. 黑格尔及其追隨者

毫無疑問，在根据客观唯心主义使历史規律神秘化的理論中，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那一流派。但如果說黑格尔的理論中含有合理的、甚至天才思想，那么他的追隨者

們則只不过是公开的反动和蒙昧主义。

扼要地说，黑格爾的天才首先在于发现和系統說明辯證法的規律，虽然这些規律具有神秘化的形式，但却一般地反映了发展过程的客观規律性，特别是社会现实发展过程的客观規律性；順便提一下，黑格爾的观点的弱点和反动性在于，他是唯心主义地理解这种規律性及反映它的規律，把它作为絕對精神的表现。

了解和評價黑格爾史学的关键在于了解他的辯證法；应当在他的《邏輯学》中去探索《历史哲学》的关键。因为辯證法是整个现实，也就是社会历史现实发展的最一般的理論。在黑格爾看来，部分領域內的发展理論，可以作为一般的学說。可見辯證法規律是从某些部門的科学（社会史也是这种部門科学）的總結中得出的。因此，它可以用来研究这些部門科学，可成为它們的一般的方法論。黑格爾的辯證法的錯誤和成就应当在他对于部門科学的理解中得到独特的反映。应当在一般理論的这些优点中，去找尋解釋他在历史哲学中提出的一些具体問題的鎖钥。

在《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著名的跋文里，卡尔·馬克思对黑格爾的辯證法作了最概括的，同时也是全面的評價：

“我的辯證法，不仅在根本上与黑格爾的辯證法不同，且正相反对。在黑格爾，思維过程——他給以‘观念’的名称下，把它轉化为一个独立的主体——是现实的創造主；现实仅为思維过程的外部現象。但在我，观念界却不外是移植在人类头脑中的物质界。”<sup>①</sup>

在这段引文的后几行，我們又讀到下面的話：

“辯證法虽在黑格爾手中神秘化了，但綜合地，有意識地，叙述辯證法一般运动形态的，仍須以他为第一人。在他手上，辯證

---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頁。

法是倒立着。必須順過來，然後才能在神秘的外殼中，發現合理的核。”<sup>①</sup>

馬克思在這裡簡括地說出了他的明白易曉的，但是天才的思想；黑格爾的辯證法有力的一面是他的辯證法第一次詳盡地，有意識地說明運動的形態，而它的無力的一面則是他把這一說明神秘化了，給了它以唯心主義的形式，把問題完全顛倒了。

這種唯心主義的神秘化的內容是什麼呢？原來黑格爾的辯證法是概念、思想發展的理論，而現實的發展則彷彿是這些概念、思想的體現。概念的發展成了現實的創造者，而按其實質來說，概念只是客觀現實發展的反映。因此，根據黑格爾哲學作出的一切規律，都具有神秘性，都是以歪曲的目光來看現實的問題。

如果注意到這一點，那麼，黑格爾的辯證法怎麼會有任何意義，怎麼會含有馬克思所說的“合理的內核”呢？雖然黑格爾把辯證法規律神秘化了，但他卻描繪了反映在意識、思維中的世界的客觀規律性。黑格爾的理論就它作出了這種反映而論，它是有意義的；但就這一反映是在唯心主義的基礎上被神秘化了而言，它是有意義的、是反動的。由此可見，雖然黑格爾的辯證法在原則上是唯心主義的，是反動的，反科學的，但其中卻含有“合理的內核”，應該把它從“神秘的外殼”中解放出來，使這一理論顛倒過來，也就是說，不是唯心主義地把辯證法看作是創造現實的概念發展的理論，而是唯物主義地、也就是科學地把它看作是現實的反映。

這是馬克思主義在評價黑格爾主義及馬克思的辯證法與黑格爾的辯證法的關係這個問題上的基本真理。誰懂得這條真理，誰就容易懂得把它具體地應用於知識的各個具體領域，因而也

---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11頁。

包括应用于哲学史的領域。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思辨性的，在它的正面說明中沒有許多有价值的內容；按照列宁在《哲学筆記》中所作的評價，它已經过时了，應該把它送到档案庫去。

《历史哲学》这部书具有黑格尔主义的先天缺憾：即直接导向信仰主义和僧侶主义的客观唯心主义。在黑格尔的史学中，一切积极的东西都是与他的思想体系的“合理的内核”分不开的；馬克思曾用他的妙手把这个核的外壳剝掉；在当时，即在馬克思以前的时期，它曾是人类社会史的知識領域中的一个进步因素。

大家知道，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对法国革命和作为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思想的法国唯物主义的貴族的反动。与黑格尔的法律和国家哲学不可分割地联在一起的历史哲学是这一反动的明显表现。关于历史是世界精神自我发展的表现，以及关于各个历史阶段是民族精神的活动的表现，也就是世界精神自我发展的阶段的表现，这些唯心主义的思辨，都是为了把一些具体的，极其反动的目的隐蔽起来；这些目的就是：为容克貴族的普魯士国家辯护，贊揚軍国主义、歌頌德国人压迫和掠夺其他民族（按照这种思辨，德国人是“統治民族”）。无怪乎在这块土壤上后来生长了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十分乐于求教黑格尔的一般哲学，尤其是他的国家哲学。德国史学中所有的反动派别也都爭先恐后地从这个源泉中汲取养料，如历史学派及其在法律学及政治经济学中的各支派，后来的狄尔泰及脱胎于他的人文学方法論，最后是成为法西斯主义思想体系重要的世界观因素之一的新黑格尔主义。可見对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反动性，是无可怀疑，也不能有任何怀疑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年輕时代，即在四十年代就已抱这种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馬克思在《哲学底貧困》中，好像作为他对黑格尔史学的評价的結束語，揭露了黑格尔把历史規律唯心主义地神秘化的根源：

“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維中发生的一切。因此，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沒有‘适应時間次序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順序’。他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設世界；其实，他只是根据自己的絕對方法把所有人們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統的改組和排列而已。”<sup>①</sup>

我們最好根据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的下面一段引文来理解这番話；在这段引文里，在說明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的观点的同时，馬克思明确地說明了他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关系：

“前面我們談到了德国的哲学的历史观。在圣麦克斯这里，我們找到这种历史观的光輝范例。思辨的观念，抽象的观点变成了历史的动力，因此历史也就变成了單純的哲学史……这样，历史便成为單純的先入之見的历史，关于精神和怪影的神話，而构造这些神話的基础的真实的經驗的历史，却仅仅被利用来赋予这些怪影以形体，从中借用一些必要的名称来把这些怪影装点得仿佛真有实在性似的。”<sup>②</sup>

恩格斯也着重指出黑格尔及其学派所构造的規律的思辨性。在《傅立叶論商业》的跋文里，恩格斯說：

“傅立叶是在正确地認識了过去和現在之后才按照自己的看法想像未来的，德国的理論却是首先随意地清算一下过去的历史，然后又随意地給未来加上一个方向。譬如請把傅立叶所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3頁

② 同上，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1—132頁。

提出的社会发展的几个时期(蒙昧时期、宗法时期、野蛮时期、文明时期)及其特征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比较一下吧!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历尽千辛万苦才为自己开辟了穿过历史迷宫的道路,并终于不顾实际上有四大世界帝国而勉强建立起一个三分法的外貌。至于黑格尔之后的那些结构,就更不必谈了;因为黑格尔的结构毕竟还有某种内容,虽然是歪曲了的内容,而黑格尔之后的一些体系的发明家的结构已经没有任何内容了。”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指出黑格尔的结构的思想性,指出它的主要缺陷就是唯心主义性质。黑格尔设想,“思维运动创造世界”,按照他的体系,实际上只是人的思维安排世界。抽象的观念变为历史的动力。黑格尔的神秘化的基本因素就在于此。在黑格尔的著作中,首先在《历史哲学》和《百科全书》中,我们很容易找到这个因素。黑格尔的基本历史哲学概念是这样的论断:历史是世界精神自我发展的表现。这说明了历史过程的规律性。为了举例说明,我们引证黑格尔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言论之一:

“从世界历史的观察,我们知道世界历史的进程是一种合理的过程;知道这一种历史已经形成了‘世界精神’的合理的必然的路线——这个‘世界精神’的本性永远是同一的,而且它在世界存在的各种现象中,显示了它这种单一和同一的本性。”②

从“世界精神”到上帝只差一步。说得更确切些,在黑格尔看来,世界精神,总的理性和上帝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

“哲学要我们养成这种认识——同那些理想恰好正是相反的——就是知道所谓‘现实世界须如它应该的那样’,还有,所谓‘真正的善’——‘普遍的神圣的理性’不是一个单纯的抽象概念,而是一个强有力的、能够实现它自己的原则。这种善,这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58页。

② 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48页。

理性，在它的最具体的形式里，便是上帝。上帝統治着世界；而‘世界历史’便是上帝的实际行政，便是上帝計劃的見諸实行。哲学要理解的便是这个計劃，因为只有从这計劃所发生的一切事件，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凡是不符合这計劃的，都是消极的、毫无价值的存在。一个扑朔迷离的世界幻像，便在这个神圣的‘观念’——它不是單純的理想——的清彻光輝下，完完全全地消散了。哲学希图发现那实体的宗旨，那神圣观念的实在方面，并且要替那被人极端侮蔑的现实作辯护。因为‘理性’便是要領悟上帝的神圣工作。”①

上面这段引文不仅从其中明显地表现出来的信仰主义来看，很有代表性。它还說明了黑格尔的一个著名論题：凡是真实的，都是有理性的。如果不了解，在黑格尔看来，不是所有的存在都是真实的；只有实现了的普遍的理性，按照黑格尔的意见，也就是实现了的上帝的計劃，才是真实的，那就不可能理解这种思想。对他來說，任何其他的存在都不是现实，而是“毫无价值的存在”。这个問題我們不过順便提一下。我們所感到兴趣的是黑格尔把世界精神，普遍的理性与上帝等同起来。

上面提到的黑格尔的历史概念的有力一面是強調历史过程的規律性。但是，他在表示这种正确观点，反对历史发展偶然性的理論时，却立刻把自己的这一論点神秘化了。历史过程的这种規律性是由什么东西引起的呢？黑格尔回答說，是因为历史过程是发展的表現，說得更确切些，是精神的自我发展的表現。

按照黑格尔的意见，划分自然界和社会的界綫是由发展的問題决定的，这里的发展被理解为运行的发展。就是說，在自然界中沒有发展，而只有循环运动。

---

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76頁。



“凡是在自然界里发生的变化，无论它们怎样地种类庞杂，永远只是表现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在自然界里真是‘太阳下面没有新的东西’，而它的种种现象的五光十色也不过徒然使人感到无聊。只有在‘精神’领域里的那些变化之中，才有新的东西发生。”①

因此，“发展”只可能是力求达到“不断完善”。黑格尔把发展过程看作是历史过程的基本规律性。但是，这种规律性来自何处呢？黑格尔明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发展的原则包含一个更广阔的原则，就是有一个内在的决定、一个在本身存在的、自己实现自己的假定作为一切发展的基础。这一形式上的决定，根本上就是‘精神’，它有世界历史做它的舞台、它的财产和它的实现的场合。‘精神’在本性上不是给偶然事故任意摆布的，它却是万物的绝对的决定者；它全然不被偶然事故所动摇，而且它还利用它们、支配它们。”②

由此可见，对黑格尔来说，绝对观念这个概念是出发点。这是自然界、社会和精神世界中占统治地位的力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因果关系的原则，即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是观念内在地固有的东西的射影，其实现是具体历史。而用马克思和列宁的话来说，绝对观念则不外是离开具体的人的意识绝对化。黑格尔不仅在说明世界历史的一般规律性时，而且在说明其各个时代和时期的规律性时，都把精神发展作为出发点。为了这个目的，除世界精神以外，他还提出了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代表绝对精神的各个发展阶段，应当说明各个时期的特征。

“……每一个阶段都和任何其他阶段不同，所以都有它的一定的特殊的原则。在历史当中，这种原则便是‘精神’的特性——

---

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94页。

② 同上，第95页。

一种特别的‘民族精神’。”<sup>①</sup>

“这里順次要說起的，就是在世界历史的行程中，一个特殊的民族精神應該当做只是一个个人。因为世界历史是‘精神’在各种最高形态里的、神圣的、絕对的过程的表现——‘精神’經过了这种发展阶段的行程，才取得它的真理和自觉。这些阶段的各种形态就是世界历史上各种‘民族精神’；就是它們的道德生活、它們的政府、它們的艺术、宗教和科学的特殊性。‘世界精神’的无限冲动——它的不可抗拒的压力——就是要实现这些阶段；因为这样区分和实现就是它的‘概念’。世界历史是专门从事于表现‘精神’怎样逐渐地达到自觉和‘真理’的欲望；它本身中的黎明来了，它开始发现要点，最后它达到了完全的意識。”<sup>②</sup>

这些关于世界精神和民族精神的論題的神秘化思辨明显地指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具有什么性质。它不仅是对真理的曲解，对客观历史过程的唯心主义的神秘化，而且是为一定的反动目的服务的神秘化。就是說，这一整个理論是为德国民族和普魯士国家的优越性作反动的辯护的。黑格尔写道：“东方人还不知道，‘精神’——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因为他們不知道，所以他們不自由。……各日尔曼民族在基督教的影响下，首先取得了这个意識，知道人类之为人类是自由的。”<sup>③</sup> 由此可見，在絕对观念这个論題上的思辨导致这样的結論：絕对观念获得了自我認識和自我完善；在理論上是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在政治上是普魯士国家，在宗教上是新教，它使德国民族有可能意識到人是自由的。

这整个神秘化的基础和根源是以唯心主义的公式来代替唯

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 1956 年版，第 104 頁。

② 同上，第 93—94 頁。

③ 同上，第 56—57 頁。

物主义的分析。我們在馬克思以批判黑格爾的理論為基礎的對蒲魯東的公式所作的批判中，找到對這種神秘化的駁斥：

“我們……假定：現實的歷史，適應時間次序的歷史是觀念、範疇和原理在其中出現的那種歷史順序。

“每個原理都有其出現的世紀。例如，與權威原理相適應的是 11 世紀，與個人主義原理相適應的是 18 世紀。推其因果，我們應當說，不是原理屬於世紀，而是世紀屬於原理。換句話說，不是歷史創造原理，而是原理創造歷史。但是，如果為了顧全原理和歷史我們再進一步自問一下，為什麼該原理出現在 11 世紀或者 18 世紀，而不出現在其他某一世紀，我們就必然要仔細研究一下：11 世紀的人們是怎樣的，18 世紀的人們是怎樣的，在每個世紀中，人們的需求、生產力、生產方式以及生產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樣的；最後，由這一切生存條件所產生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難道探討這一切問題不就是研究每個世紀中人們的現實的、世俗的歷史，不就是把這些人既當成劇作者又當成劇中人物嗎？但是，只要你們把人們當成他們本身歷史的劇中人物和劇作者，你們就是迂迴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發點，因為你們拋棄了最初作為出發點的永恆的原理。”<sup>①</sup>

馬克思這些論點的意義很簡單，即不是觀念決定人們的社會存在，反之，是社會存在決定觀念。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不應該從唯心主義的立場，而應該從唯物主義的立場來對待歷史。其次，又可得出結論：黑格爾把分析弄顛倒了，必須使它“倒轉過來”，也就是從唯物主義的立場來解釋它。但是，那一合理的內容，那個應當從唯心主義體系的外殼里面解放出來的“合理的內核”將是什麼呢？

---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48—149 頁。

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合理的内核”不仅使他超越于唯心主义者而且也超越于机械唯物论者，“合理的内核”就是把辩证法有意识地应用于对历史过程的分析。黑格尔的力量就在于此。但同时，这又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这也就是它的弱点。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深深了解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无力一面，了解他的辩证法的神秘性。但他們也知道其中含有“合理的内核”。下面是恩格斯关于这个問題的一段話：

“黑格尔的思維方法不同于其他哲学家的思維方法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以广大的历史知觉为依据。虽然它的形式是极端抽象和唯心的，但是他的思想发展进程却总是和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平行不背，而后者本来只是前者的证实。尽管真实的关系是因此而被颠倒过来和头脚倒置了，然而现实的内容终究是到处浸入哲学中，何况黑格尔并不像他的門徒們那样炫耀自己的无知，而是一切时代中最有学識的人物之一。他是最初第一人企图来阐明历史发展进程和内在联系；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有很多东西在我們現在看来十分奇怪，但他的基本观点的精深性在今天也值得惊奇，尤其是如果拿他的前輩人物或者拿那些在他以后敢于乱对历史进行一般思考的人們与他相比，就更加显得如此。在現象学、美学及哲学史中，处处都貫穿这个精深的历史观，并且处处都从历史方面，在与历史保持一定的——固然是歪曲的抽象的——联系中处理材料。

“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原是新唯物主义見解的直接理論前提，因此就为邏輯方法也提供了一个出发点。既然这个被遺忘了的辩证法，甚至从‘純粹思維’方面来看也已引起了这样的結果，既然它此外又好像是很容易地清算了所有以前的邏輯学和形而上学，那就是說，它里面除了單純詭辯和煩瑣玩意外，还包

含有什么更重大的东西。但是，对这个方法进行批判，却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任务；全部正式哲学都曾害怕而且现在也还害怕担起这个任务哩。”①

在这段引文里，含有这样一种思想：历史过程应该理解为合乎规律的过程，而不是偶然的过程。正是这种思想使得黑格尔能够在同样的程度上，既克服了那种认为历史科学的任务在于搜集事实的浅见的经验主义，又克服了把历史看成是个人的创造的启蒙运动时期的主观主义。黑格尔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倒过来了，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肯定的，在他的哲学里也贯穿着实在的内容。黑格尔把历史过程的客观规律性问题神秘化了，然而他是第一个这样有意识地、深刻地研究这个问题的人。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才能够宣称：“这种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在理论上的直接前提……”。应当怎样来理解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问题呢？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明了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必然性在人们的偶然性活动中为自己敷设了道路。

“……在历史里面，人类行动除掉产生它们目的在取得的那种结果——除掉他们直接知道欲望的那种结果以外，通常又产生一种附加的结果。他们满足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还有潜伏在这些行动中的某种东西，虽然它们没有呈现在他们意识中，而且也并不包括在他们的企图中，却也一起完成了。”②

这一问题本身表现在黑格尔对伟人的历史作用的十分深刻的分析中，表现在他的深刻理解中，他理解到，伟人的活动不仅与历史必然性不相矛盾，而且相反，是以历史必然性的存在为条件的。黑格尔了解历史中的客观规律性问题，尽管他把这种规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50页。

② 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66页。

律性神秘化了。因此，在理解历史过程方面，他不仅胜过他的前辈和同时代人，而且也胜过大多数现代唯心主义的历史解释家。正因为如此，列宁分析黑格尔所引证的一些历史事件的“内在精神”的神秘化一面，同时也强调指出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正面成就：

“这种‘内在精神’是唯心主义的和神秘主义的东西，但却非常深刻地指出各种事件的历史原因。黑格尔充分地用因果性把历史归纳起来，而且他对因果性的理解，要比现在的许许多多‘学者们’深刻和丰富千百倍。”<sup>①</sup>

因此，从我们的论述中可以得出结论：黑格尔的社会发展理论在一定的地点和时间的条件下含有“合理的内核”，含有马克思主义能够继承，而且实际上已经继承了的科学发展的因素。

从马克思主义出现的时候起，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在新的条件下，在历史知识更高的水平面前，旧的内容改变着自己的性质；当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合理的内核”已经充分地、彻底地体现在马克思主义里面的时候，他的一些神秘化的构造现在就仅仅成为反动的东西，尤其是黑格尔的那些有生命的东西，在其追随者手中就变成了僵死的公式。

“官方黑格尔学派从老师的辩证法中只学会搬弄最简单的技巧……”<sup>②</sup>

在《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了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的观点以毁灭性的批判，指出了他们的观点空洞无物，毫无意义。在这些著作中，首先在《神圣家族》中的批判里，主要谈到了与社会发展及其动力有关的一些问题。青

<sup>①</sup>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版，第169页。

<sup>②</sup>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78页。

年黑格尔主义者从老师的学说中，窃取了老师的一切落后的反动的东西，完全丧失了他的“合理的内核”。由于承认伟人创造历史，而人民群众，“群氓”则阻碍发展，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甚至以黑格尔的那种神秘化的形式否认历史规律性的观念。在他们那里只剩下了黑格尔的理论无力的和反动的一面，即导向僧侣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极端唯心主义。

与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相反，俄国和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观点虽然具有局限性，但是他们却看到和发觉黑格尔辩证法的有力一面。当然，这是与他们的革命实践，政治信仰有着最密切的联系，正如决不能离开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反动的政治立场来看他们在史学领域内的观点的反动性一样。

即使我们撇开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不谈，这种对待黑格尔体系的突出的两面性态度，也可以补充说明这一影响极大的史学流派的实质。

许多不同的派别都与黑格尔的哲学，特别是与他的历史哲学有着密切联系；毫无疑问，这些派别不管怎样都是追随黑格尔主义这个最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还在帝国主义时期以前，黑格尔的影响就以所谓新黑格尔主义的形式恢复了。在新康德主义好像占绝对统治的时期，黑格尔的理论的影响特别明显地进入了历史哲学的领域。这种影响还清楚地表现在个别论的德国代表人物的观点中，他们把否认历史规律的主观唯心主义与在价值论方面的客观唯心主义结合了起来。的确，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以及他们的追随者的价值论都是以黑格尔主义为依据的。不能不承认，施普朗格的意见是对的；作为“精神哲学”的先驱者，狄尔泰的继承人，他认为，最近时期的一切唯心主义派别在价值论方面都脱胎于黑格尔。<sup>①</sup>

但是，从与我们有关的论题的角度来看，首先应当注意历史

学派及其“民族精神”这一黑格尔的概念；这一概念曾对整个资产阶级史学，其中也包括波兰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历史学派（薩文尼、浦赫特）的根源是浪漫主义，在其他一些人中間，赫尔达，斯来格尔，費希特和謝林也影响了这一派代表人物的观点。但毫无疑问，这一学派的基本概念——民族精神是道德和法律的創造者——无论在术语方面或者在内容方面，都脱胎于黑格尔。德国历史学派对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影 响是大家知道的。这种影响通过法律史更深入地渗到史学里面，其中包括波兰史学。作为民族——創造者的特征及民族史的动力的表达者的“民族精神”学说，成了唯心主义史学所寵爱的理論，成了主观主义的英雄主义概念的非常合适的附加物。“民族精神”学说不但出现在一些重要著作中，也出现在一些沒有科学意义的著作里面。因此在思想意識斗争中，资产阶级往往利用那些甚至与资产阶级的典范著作相比也不能算是科学的著作。无怪乎“民族精神”这个怪影經常在这样的著作里显露出来。这些著作毫无科学价值之可言，但如果我們因而就不去评价资产阶级的状况和价值，那就不对了。恰恰相反，对于进行这样的评价来说，这些著作本身出现的可能性，就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阿·霍

- ① 亨利·列維博士引证施普朗格，并 从新黑格尔主义的立場来批評他：“正如施普朗格、李凯尔特、現象学者以及追随狄尔泰的人們曾經表示的一样，我們大家一道参加偉大的斗争，为了爭取在历史上或超历史上的時間以外的东西，为了爭取理性世界及其在已經實現的，具体的文化中的历史表现，为了爭取价值論，这种理論超出了主观的范围，导向客观的和具有固定意义的东西（zum Objektivem und Geltenden）……越来越明显……新的精神哲学的輪廓現在已經出現。它或許只有在德国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因为我們（德国人）力求創造性地掌握黑格尔的遺產，从而掌握我們时代的人类精神在理解世界方面已達到的那种最偉大、最丰富的、最完备的东西。”（亨利·列維：《德国哲学中黑格尔派复兴》，沙罗頓堡 1927 年德文版，第 20 頁）



洛涅夫斯基的《波兰史精神》就属于这一类的著作。<sup>①</sup>叶甫根尼·勃朗的枯燥无味的《波兰历史之谜》小册子，也属于这一类（这本书1938年曾在华沙再版）。

黑格尔主义及其绝对唯心主义体系，甚至在新康德主义的最盛时代，也没有退出舞台。在德国，特别是巴敦学派曾依靠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以便至少可设法巩固它在价值论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同时，黑格尔主义在英国（斯提林、格林·布拉德里和伍德）和意大利（贝·柯罗齐，京梯尔）也有（虽然不及新康德主义发展得那么繁荣）。黑格尔的信徒们的一般特点和他們同时代的康德的信徒一样，是拒绝德国哲学经典作家的不彻底性、两面性的因素，以便有利于公开地、彻底地反对科学。新康德主义者扔掉了“自在之物”这个概念，因为它具有勾引起康德在唯物主义方面的不彻底性的危险；而黑格尔的信徒们又攻击黑格尔的唯理论<sup>②</sup>，甚至攻击精神的客观存在这个论题（京梯尔

① 关于这部书，斯·扎克热夫斯基在《历史问题结构的意识形态》（第1卷，1933年版）中写道：难得会碰到这种“在理解波兰史和一般史学方面含有如此故意的粗俗浅陋”的著作（176页），“忽视历史真理——这就是霍洛涅夫斯基的历史哲学的特征”（179页），“从这些篇章中飘来了死气沉沉的、麻醉人的空洞思想，陈腐之见在眼前一一接踵而来”（同页）。因此，弗·康诺普钦斯基在亚哥龙大学演讲时对霍洛涅夫斯基所作的热烈评价，具有一种特殊的味儿，他说：“霍洛涅夫斯基明显地、勇敢地、有时甚至是引人入胜地把世界未来所争取的思想搬到我们的土壤上来。（康诺普钦斯基：《从苏维斯基到克秋斯基》，华沙1921年版，第14页）这段话使人注意，尤其是因为康诺普钦斯基宣称两种历史科学的必要性，一种是霍洛涅夫斯基的，是为了“小人”的，另一种是严格科学的，是为了知识分子的，他写道：“愿我们的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发展的领导人和守卫者。大胆地从事科学著作，争取教育人，武装人和解放人的绝对真理。”（同上，第23页）对“小人”来说是有意识的谎话，对知识分子来说是真理——独特的真理！请看！还有什么能更好地说明资产阶级史学家的党性呢？

② 柯罗齐：《黑格尔哲学中的活的和死的东西》，巴黎1910年法文版。

的“行为論”把精神理解为行为<sup>①</sup>。

当然，要比較詳盡地分析新黑格尔主义，就必须分析它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著作。但这样非我們力所能及，因为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比較多，他們的观点又是五花八門。因此，我們只能举一个例子：分析一下貝尼迪托·柯罗齐的史学观点。由于两方面的原因，我們可以认为柯罗齐的理論足以代表这整个派别：第一，柯罗齐的观点清楚地表现出新黑格尔主义者和黑格尔的真正关系；第二，柯罗齐曾对现代资产哲学家发生过巨大的影响，他从事于历史哲学問題的研究有五十多年之久。

我們先簡短地說明一下柯罗齐對我們感到兴趣的历史規律問題的观点。應該說，他是史学中的个别論的代表之一，而在某种意义上，他又是个別論的共同創作者之一。因此，我們要立刻提出一个不說明新黑格尔主义的实质就无法了解的主要問題，这就是：黑格尔的拥护者怎么会站到个别論的观点上去的？黑格尔主义者把自己的整个概念置于精神观念的基础上，以便必要时求助于个别論，正如新康德主义者一样，也把自己的整个概念以个别論为根据，以便必要时在自己的价值論中求助于黑格尔。

柯罗齐至少在他的早期活动时期，试图通过把史学与艺术等同起来以論证个别論，因而导致否认史学的科学性。誠然，这不是柯罗齐自己的“发明”。在受階級利益指使的反对史学的科学性的斗争中，史学是一种艺术这一概念，是这个斗争中的武器之一。关于史学和艺术相同的思想，狄尔泰在1883年，齐麦耳在1892年早就提出过。文德尔班也同意这种概念。1893年，柯罗齐在《艺术概念簡史》一书中，沿用了并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同时又明确地引证了他的前驅者的話。

---

① 京佛尔：《精神是純行为的理論》，倫敦1922年英文版。

柯罗齐的思想是这样：艺术是对个别方面直觉的深入，是关于个别方面的知識。史学所关心的是具体个别的事实；柯罗齐說，历史只有一項义务，即“叙述事实”。按照这种意見，史学不是“記載科学”，因为这个名詞在应用于它的时候，是有矛盾的形容法（*contradictio in adjecto*）。史学只不过是一种艺术，其間只有一种差别，即艺术所談的是可能的东西，而史学所談的是真正发生过的东西。1902年柯罗齐在《美学》一书中，重复了这种观点；他宣称，史学不从事于探索規律，不創造概念，而只是叙述。

这里我們所談的是极端否认史学的科学性問題，也就是与极端个别論有着最密切联系的問題。其后，特别是在1909年出版的《邏輯学》里，柯罗齐改变了他的論据，但这个概念仍旧沒有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柯罗齐的个别論是与那种以所謂現在主义为表現形式的极端主观主义結合在一起的。如我們所說过的，在这方面柯罗齐对現代史学，特别是对美国的史学，也发生过巨大的影响。

柯罗齐坚决地反对在自然科学中找寻支持的哲学；他认为，一切都是历史，历史在自然科学之上，它与哲学是同一的。但他也同样坚决地反对“先驗的”概念，甚至也反对黑格尔哲学从客观唯心主义来理解的这个概念。这样，他就反对承认甚至以神秘化形式表現出来的客观存在的存在；他是从极端主观主义的“精神哲学”的立場来反对的。按照这种概念，只存在一种现实，即“精神”，它与主动性，即在“生活的永恒創造”中所表現的自由是同一的。这里我們所說的是一种极端“內在論”的概念，它采取了“創造的哲学”的形式，在这一点上柯罗齐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很是接近。从一切都是精神的創造这种观点出发，他們也同样地把历史看作是精神的創造。

史学中的直觉主义者們甚至剝夺了历史事实的意义。柯罗齐也輕視历史的原始資料，他說，这是因为“历史原始資料不可能是我們的真理，而历史則要求我們从自己本身最深刻的經驗中吸取来的真理”。<sup>①</sup>

末了，因果概念、因而也就是历史規律是“精神哲学”所不能接受的。“不能特別有力地強調这个簡單的、具有基本意义的真理，它对許多被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所征服的头脑來說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因果概念……是与历史格格不入的，而且應該与它格格不入，因为因果概念产生于自然科学的領域，只能滿足自然科学的需要。”<sup>②</sup>自然，在柯罗齐看来，如果因果关系問題不成立，历史中的預見問題也就不成立了。历史預見仿佛是与人类自由对立的。<sup>③</sup>

“現在主义”就是在这种主观主义的概念的土壤上成长的。历史“不是来自我們的外部，而是生活在我們之中”<sup>④</sup>。在把历史与今天密切联系起来的实际需要的影响下，过去的事件便在我們之中复活：

“每一历史判断所依据的实际需要，給了历史以这种特点，即历史(永远)是‘現代史’，因为，实际上……历史总是与某种現代需要，某种实际情况有关的。”<sup>⑤</sup>

对柯罗齐的个别論概念來說，这种主观主义不是来自外部的某种东西；相反地，它是与柯罗齐的个别論概念在同一个土壤上成长的，这就是說，柯罗齐的个别論概念也是从历史是对个别

---

① 柯罗齐：《历史是思想和行为》，伯尔尼 1944 年德文版，第 37 頁。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 58—59 頁。

④ 同上，第 43 頁。

⑤ 同上，第 41 頁。

的直覺評論這一論斷中產生出來的。

但是自然而然要發生一個問題，即所有這一切與黑格爾主義有什麼共同之處呢？的確，這種個別論的主觀主義概念與黑格爾的原理相反，而柯羅齊也明顯地批判這種概念。但是有一點是明確的，即在精神學說方面，柯羅齊保持了——雖然並不是始終一貫地——對黑格爾主義的忠誠。他扔掉了黑格爾辯證法中的合理的內核，但卻附和黑格爾體系中的反動因素。他力求哪怕是在表面上擺脫極端的、破壞一切的相對主義，因而求助於黑格爾的精神。自然，他作這一點是不徹底的，因為他的主觀主義概念不可能同意像黑格爾的“客觀精神”那樣的“先驗”說。所以他最後還是批判了這個概念。但他不得不承認在歷史變動的洪流中存在着某種超時間東西，否則人們將責備他縱容了混亂和極端相對主義。這個超時間的“某種東西”就是精神；按照柯羅齊的理論，就是歷史上存在的精神；但同時這種精神又是超時間的，因為它在什麼程度上要求本身，也就在同樣的程度上要求一般的東西。這種理論很費解，完全是神秘化的。無怪乎它與明顯的僧侶主義結了不解緣：

“基督教的上帝也是我們的‘上帝’，而我們所服膺的哲學家則稱它為‘精神’，它永遠處在我們之上，同時又永遠處在我們自己之中。如果我們不願把它作為宗教神秘劇來對待，這是因為我們知道，對那種被不正確地尊為‘人的邏輯’的抽象理性邏輯來說，它將是宗教神秘劇；但如果這個定義從它的基督教的意義上來理解，把它作為人經常仰慕的東西，這種東西永遠把人与上帝結合起來，使它真正地成為人，那麼對那種被正確地稱為‘神的’邏輯的具體邏輯來說，它是明顯的真理。”<sup>①</sup>

---

① 柯羅齊：《我的哲學》，倫敦1951年英文版，第47頁。

这就是柯罗齐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东西，这就是意大利的黑格尔主义。同时应当指出，柯罗齐本人是一个史学家，他在实践中应用了他的学說的原则，和他的那种影响了直觉主义在史学中形成的思想。

认清了柯罗齐与黑格尔的真正关系，使我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柯罗齐怎么能够站在黑格尔主义的基础上而成为一个主观主义者和个别論者？

如果从新黑格尔主义者对黑格尔的解釋来看，这是毫不足奇的，因为这个黑格尔已經被改造成主观主义者，被“剝淨了”一切不彻底性，这个黑格尔体系已經沒有黑格尔辯证法的“合理的内核”。对黑格尔的这种解釋說明了新黑格尔主义与新康德主义之間的密切联系，它們是以現代主观主义同一流派为基础的相互“补充”的不同变种。

目前的黑格尔主义的复兴发生在第一次世界战争以后，那时法西斯主义利用黑格尔主义的一些最反动的因素，以便創立它所需要的意識形态。1930年成立了所謂“黑格尔联盟”(Hege lbund)，在海牙举行了第一次會議。新黑格尔主义的书刊充斥于哲学市場。<sup>①</sup>

我們根据德国新黑格尔主义者的“領袖”黑格尔联盟主席里哈德·克罗納的話，來說明李凯尔特早在1907年<sup>②</sup>，文德尔班

---

① 可以举出下面几部主要著作为例：R. 克罗納：《从康德到黑格尔》，1—2卷，杜平根 1921—1924 年德文版；列維：《德国哲学中的黑格尔派复兴》，康恩：《辯证法理論》，萊比錫 1923 年德文版；馬尔克：《現代哲学中的辯证法》，杜平根 1929 年德文版；P. 巴尔特：《黑格尔和馬克思及哈特曼以前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試評》，萊比錫 1925 年德文版；莫克：《黑格尔与黑格尔学派》，慕尼黑 1930 年德文版。

② 李凯尔特在他的《历史哲学問題》中第 1 頁提出了这个口号。

早在 1910 年<sup>①</sup>就已提出的“回到黑格尔”这一口号的真正意义。

克罗纳在分析黑格尔对“概念”和“思维”的理解，并强调指出黑格尔的思维过程是概念的自我发展的过程的时候，从而得出结论说，黑格尔是一个非理性论者和神秘主义者。

“在黑格尔的思维的唯一理论本身里面，含有一定的非理性论；这种概念为自己设定界限，仅仅由于这样而成了为自己设定界限的概念，并且这些为自己设定的界限又会重新消灭……”

“黑格尔的思维在同样的程度上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超理性的或反理性的；它在同样的程度上既是思维，又不是思维……”

“其实，在黑格尔以前，还从来没有一个像他这样哲学上的、思维上的和科学上的非理性论者；还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非理性论者，因为他认为有可能，而且有必要使任何非理性论的动机成为具有占统治地位的、无可争辩的动机性。毫无疑问，黑格尔是一个在哲学史上出现过的仅有的最伟大的非理性论者……”<sup>②</sup>

克罗纳从黑格尔著作中举出许多引文来支持自己的论断。

这些引文证明，黑格尔的哲学是反动的哲学，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导向神秘主义和僧侣主义。毫不奇怪，克罗纳在黑格尔的著作里找到的正是这些引文。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也恰恰是克罗纳在黑格尔的理论中所找寻和选择的东西。问题是这样摆着，克罗纳和柯罗齐、京梯尔及其他新黑格尔主义者一样，没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他的哲学中的合理的内核，而是相反，试图伪造这个合理的内核或避而不谈。新黑格尔主义者从黑格尔的哲学里，吸取了其中一开始是僵死的、反动的东西。柯罗齐和所有新黑格尔主义者一样，完全相反地解决他在《黑格尔哲学中活的和死的

① 1910 年文德尔班作了以《黑格尔主义的复兴》为题的报告。

② 克罗纳：《从康德到黑格尔》，第 2 卷，德文版，第 270—271 页。

东西》中所提出的問題：把黑格尔的死的東西——他的反動的，唯心主義的體系，反動的国家學說，民族主義等等——認作是活的，而對他的真正活的東西——他的辯證法的合理的內核——却一脚踢開。但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社会需要正是這些，新黑格爾主義者們在意識形態上滿足了這種需要。一般說來黑格爾的“復興”的意義，特別是他的歷史哲學“復興”的意義就在於此。

我們指出了黑格爾哲學所固有的兩面性，即它的內部矛盾：黑格爾也有獨創的地方，馬克思主義在某種程度上也繼承了黑格爾。

這種兩面性也是黑格爾的歷史哲學的特徵，特別是他的歷史發展規律理論的特徵。在他的歷史哲學里，除了神秘化以外，還有獨創性和科學進步的內核。資產階級的黑格爾的信徒們從他的哲學里吸收了其中反動的、僵死的東西——黑格爾體系的反動內容——，而扔掉其中的一切活的、有創造性的東西。他們這樣做是符合自己的資本主義老板們的意旨的。結果，只剩下了光禿禿的神秘化。歷史學派和新黑格爾主義者的那種形式的黑格爾主義，作為意大利和德國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態的那種黑格爾主義，只不過是一種反動而已。這是一種對科學、對馬克思主義，即對革命的工人運動的意識形態的反動。

## 2. 循環發展和階段發展論

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下面一些學說獲得了發展：它們以黑格爾哲學為依據（雖然也受了維科、孔德、斯賓塞的影響），把歷史發展看作是周而復始的循環發展，或者看成是由生到死的生物的發展。這些學說還作出了一些相應的歷史發展“規律”。這些規律具有明顯的思辨性，它們是作為規律而制訂的，或者是由於過早的、不成熟的總結而產生的。它們的共同特徵是唯心



主义的性质，因为所有这些“规律”都与某种思想、意识、文明、文化等等的发展有关，而且总是以某种方式客观存在的精神因素的内在发展。所有这些学说及其所制订的“规律”的客观唯心主义性质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它们所执行的那种社会职能也决勿庸怀疑，这种职能就是要“证明”现状不仅是自然规律起作用的结果，而且同时也是无可避免的最终发展阶段。循环发展学说由来已久。古代柏拉图、波利比、文艺复兴时代马基雅弗里，以及后来的康帕里拉都有这种概念。维科自己引证了关于三个时期——神，英雄，人——依次更替的希伯来传说故事。在《新科学》中，他发展了循环（ricorsi）学说，即历史循环学说；这种历史循环与人类生活中从幼年、少年到成年的时期相似，也必须经过三个时期：神、英雄和人。这个最后的时期实际上是一种理想，即资产阶级社会的实现。但达到这个发展的顶点以后，人类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重新开始循环的发展。

维科的循环概念是神秘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循环“规律”在这里被应用于精神上面。此外，十四世纪资产阶级社会学固有的一些理论有意采用的把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等同起来的这一学说，是完全错误的。然而，尽管有其唯心主义的局限性，维科的学说在十八世纪的条件却有其有力的一面，以致马克思能够认为其中具有“独创性的闪光”。<sup>①</sup>维科的学说的有力一面是他的这种论断：社会发展服从于内部的客观规律，这意味着否认预见支配社会发展的目的论概念。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维科的学说含有进步的因素。

在现代，在彻底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学说出现了的时期，循环论的追随者们情况就不同了。我们可以根据波

<sup>①</sup> 《马克思给斐·拉萨尔的信，一八六二年四月二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俄文版，第399页。

兰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这里指的是凱列斯—克拉烏茲的“变革的回顾”学說。

卡济梅日·凱列斯—克拉烏茲，追隨維科的循环概念，在1894年和1895年两次国际社会学学会的会议上系統說明了“变革的回顾規律”，1898年又在《回顾的社会学規律》一书中說明了自己的这种学說。

克拉烏茲宣布了“一元經濟主义”的概念，承认意識的一切表現对經濟的直接依賴，以客观唯心主义来补充自己庸俗的“經濟唯物主义”的观点。“变革的回顾規律”这种思想使他承认，仿佛有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互相敌对的永恒因素在人类精神中并不起什么作用。在变革时期，人們从过去吸取自己的思想，唤醒其中的一个因素。按照克拉烏茲的意見，社会主义思想是由于模糊地回顾原始社会而产生的；它不可能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产生。对历史的一元經濟主义的解釋，把思想意識与社会发展的經濟基础的关系問題庸俗化了，就使这一現象的解釋成为不可能。显然，克拉烏茲既然自己阻塞了合理地解釋社会主义思想在資本主义社会中起源的道路，他就只剩下一条唯一的途徑：以唯心主义来“补充”庸俗的唯物主义。归根到底，这不过是普通的常見的东西——把經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結合起来，而唯物主义的任何庸俗化必然导向唯心主义。

克拉烏茲的概念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变种。他追隨維科和黑格尔，接受了循环发展学說，即思想的循环。但他所引证的这些思想家的唯心主义理論却含有“合理的內核”，有其有力的，进步的一面，而在新历史条件下克拉烏茲所創造的学說，則不过是对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的純粹的反动而已。

循环发展論与阶段发展論出自同一源流。当然，阶段发展論也作出了自己的发展“規律”。这些学說的創始人因襲了黑格

尔的許多东西，同时又借助于孔德的发展三阶段的学說，或在斯宾塞的生物学說中去找精神上的支持。

我們試举两部法国的这一类著作为例。

1881年路易·龐罗惠在巴黎出版了《历史規律》这部书。

在这本书里，社会发展被认为是与人的机体从幼年到成年的发展相同的。按照作者的思想，这种发展应该与人的智能的发展有联系。作者把一句意味深长的題詞——“人类精神是人类历史的尺度”——写在論人类进化的动力那一章的导言里，他指出，有一种与人的这种精神改变相类似的改变就是人类理想的改变。这些理想应该是从人类摆脱野蛮状态开始依次排列的：即真、善、美的理想。作者不仅“发现”以这些理想为动力的历史发展的抽象“規律”，而且除此以外，还用“經驗的”方法来确定，这些理想中每一种所支配的时期应该有多长。

他认为，原来每一个这样的时期都是一个循环，其时间是1500年，一个循环可以划分为五个时期，每个时期为300年；而每个时期又可分为各为150年的两个阶段。可以想像，既然作者在探寻“經驗的”证据当中削足适履地硬把历史事实来适应他的学說，那么书中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当然，一切都弄成自圓其說，作者想用他所搜集的，为他的思辨作辯解的事实来“說服”我們。但我們稍微感到不安的是想到我們正处在第三个循环，即最后一个循环的中期。出路只有两种，二者必居其一：或者世界末日来临，或者重新开始这种“人类的喜剧”。

当然，这是荒謬絕倫的胡說。但資產階級所承认的一些“規律”却正是这样，說得更确切些，在資產階級著作中把历史規律神秘化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当然，龐罗惠并非独出心裁，在这样的神秘化方面，他并不是唯一的壟断者。例如，有一位恩斯特·米拉尔先生就在与他

不相上下；在《历史規律》这部多卷集的著作中，米拉尔力图指出，还有比这个更荒謬的东西。

米拉尔把人类历史分为由五个阶段組成的循环周期，每个阶段各为 250 年。他制定了相应的“精确的”規律；当然，他并根据“經驗”材料“证明”这一規律的真实性。自然，这并不麻煩，因为，如果采用这些方法，就可以用适当地选择好的历史日期来“論证”精神所希望的一切。米拉尔先生是一个“博学”之士。他不仅希望在数学上“論证”他的“規律”，而且希望推究社会发展的更深刻的，“物理的”原因。原来历史的节奏是由磁流决定的，而磁流又决定于太阳上面的各种現象。的确，这样来制定規律該是多么“高深淵博”和多么“精确”啊！

但有些人可能說：在上一世紀，这是可能的，而現在情况不同了，在現代的条件下，就不可能有这种学說了。因此，我們就来看看我們这个世紀，看一看德国法西斯主义思想家之一奥·施宾格勒所写的一部名著。他的《西方国家的沒落》在资产階級世界曾經風行一时，但这本书尽管表面上看来内容淵博，却并不比龐罗惠或米拉尔的“著作”具有更大的思想上的独创性和发明。

根据对九个世界文明周期进行的“淵博”的分析，施宾格勒作出了自己的文明发展“規律”。他說，每一个文明周期又可分为几个順序出現的必要的阶段——誕生、发展、衰落——而每一个循环周期长达 1400 年。既然过去的八个文明周期证实了这条規律的作用，那么第九个文明周期——我們的文明也一定会证实它。西方文明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

可以大胆地說，对于一个“博学的”写作家的这两厚册书來說，成績是相当小的。無論如何，龐罗惠和米拉尔都比他更快地做到了这点 而且自己和讀者所化的精力都比他少。同时，他們也沒有陷入施宾格勒不得不陷入的那些前所未聞的矛盾，而是

力图把否认发展规律的极端唯意志論与承认这种狭隘的“规律”——文明的发展和灭亡规律——结合起来(而施宾格勒最后又把这一规律与另一个“规律”——种族规律联系起来)。这是资产阶级科学腐化的一个例子，同时也是我們称之为把规律神秘化的一个明显的现象。

如果施宾格勒的倾向使人讨厌，那么为了多样化起见，我們可以举出当代资产阶级“科学”的代表，即湯因比“本人”。的确，我們在这里也不能期望湯因比有什么新的或有趣的东西，因为他的学說的原则是向他的老同行施宾格勒的学說抄来的。如果从表面上看，湯因比可以反对这种评价，因为他可以引证这样的事实：即他的确否认文明的发展与种族因素作用的联系，以及更重要的是，他扔掉了施宾格勒所作的文明的发展与机体的发展之间的相同点。

然而他的一个具有原则性意义的文明发展循环周期的概念——这个循环周期从诞生开始，最后是瓦解，他把这个循环理解为文明发展的“规律”——則是抄襲施宾格勒的学說的。自然，湯因比也对这一学說作出了“贡献”，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他也沒有像施宾格勒那样，把循环限制在严格規定的时间框框内。但所有这些归根結底都是次要的問題；主要的是这一个事实：他是站在极端唯心主义的、簡直是信仰主义的立場，他宣揚按阶段发展的“规律”，他的整个概念的意义——这也說明资产阶级世界之所以“接受”它——就在于为了反对革命运动的意識形态，是为帝国主义服务。资产阶级学者，荷兰史学家彼得·盖尔对湯因比思想体系作了这样的评价(真是一針見血！)：

“无论如何，尽管在他(指湯因比——亚当·沙夫)与施宾格勒之間存在着一切差别，但他的体系更加与历史唯物主义完全对立。湯因比能够提到规律，他的脑子里能够装满科学概念，从

其中他經常借用一些名詞和形象；但实际上首先使他感兴趣的是精神自主和精神自由；对他來說，聖經本文是某种比普通的論据的裝飾更重要的东西，因为他自己的最深奧的眞理在經文中得到了表現和证实。在基督的形像中表現的上帝变成了人，对他來說，是历史的眞正涵义。”<sup>①</sup>

湯因比教授于 1939 年出版了以《历史研究》<sup>②</sup>为名的六卷世界史，現在正在准备出版以后的几卷。他为自己提出了研究文明的任务。自然，他和他的前輩（特别是施宾格勒）一样，是独立地理解文明，即是根据极端唯心主义的概念来理解的。在他看来，眞正的历史单位是文明，而不是国家和他所非常輕視的民族，他也像帝国主义思想家所做的那样，否认民族的自我意識是“民族主义”。宗教是他公开附和的一种意識形态，并期待由此而获得“拯救”。正如盖尔教授所公正地指出的，他的学說的矛头指向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意識形态。湯因比的确拚命地想“证明”，历史的动力是精神因素，而物质因素（湯因比提到环境和技术）并不起重要的作用；历史創造者是杰出的个人和“有創造性的少数人”，而不是群众；物质福利对人类发展沒有意义，因为发展的刺激因素不是良好条件，而恰恰相反，是恶劣条件；无产阶级是永恆的現象，因为“內部的”和“外部的”无产阶级作为社会瓦解的产物，总是一直会产生；能挽救社会免于灭亡的不是斗争（內部斗争是瓦解的产物，而不是消除瓦解的手段。），而是信仰，即改变信仰等等。湯因比帶了这种意識形态的貨色来研究世界史；他一共列举了廿一种文明，而施宾格勒所举的要比他少得多，这使施宾格勒也不免要感到慚愧了。这种研究的結果，湯因比制訂了一系列“規律”公式。應該說，在这方面他非常慷慨，他給讀

① 彼得·盖尔：《湯因比的文明体系》，英文版，第 12—13 頁。

② 《历史論文集》。——編者注

者准备了大量的各种各样“规律”，一般的规律和限于一定时期或典型现象的规律。盖尔教授說得很对，湯因比想在經驗的材料中为这些规律找寻支持，这种尝试是完全錯誤的，因为他只选择那些适合于他事先接受的理論的事实，而扔掉了不符合这些理論的事实，但这也一切思辨的結構不可避免的命运。

湯因比說的是什么样的“规律”呢？首先是关于文明发展的三个节奏的规律：誕生、发展、衰落（第三个部分又分为三个阶段：衰落的开始、瓦解、解决）。在上面引证的論湯因比的文集里，皮蒂利姆·索罗京写道：他的（即湯因比）社会发展概念“可能是关于文明更替的一切現有的图解之中最不成功的一种。”<sup>①</sup>

这是一个唯心主义的社会学家的声明，而从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里根本談不到什么规律，而只能是神秘化，其社会意义是非常明显的。

按照湯因比的意見，在这个一般的发展“规律”的範圍內，一些局部的规律在起作用。这样，他就制訂了一个“对答律”，这个规律应当解釋文明的起源及其发展。湯因比力图指出，引起发展的因素不是有利的条件，而是一些恶劣的不利的地理条件，敌人的进攻等等。湯因比把这个规律表述如下：需求愈大，刺激也愈大。他提到的其它“规律”是属于发展时期的，如“精神感召”规律及“简化机构和技术的规律”。在提出技术进步与文明进步之間不存在联系这一論点的时候，他宣称，环境这个因素的意义在减少，这表现在“精神感召规律”上面。这个“规律”有各种不同的表述，但特別典型的是下面这种表述：“精神从世界、肉体 and 魔鬼轉向天国。”<sup>②</sup>

① 索罗京：《湯因比的历史哲学》，見盖尔，湯因比，索罗京論文集：《过去的范例：我們能决定它么？》波士頓 1949 年英文版，第 12—13 頁。

② 盖尔：《湯因比的文明体系》，英文版，第 13 頁。

这样說明湯因比的“規律”的涵义已經够了。虽然他也作出了一些其他的更明确地表示方向性的“規律”公式：如“内部无产階級”划分的“規律”，“救星”出現的“規律”等等。正如他对民族主义的斗争，以及他的大吹大擂的信仰一样，所有这些規律都具有明显的社会意义，都有其目的和在階級斗争中的使命。这一切与科学毫无共同之处，甚至像索罗京和盖尔这种类型的资产階級批評家也間接地证明了这一点，虽然他們对湯因比也不惜大加贊揚和恭維。

最后，我們要指出一点，說明湯因比写的那些长篇大論的“科学”价值。他虽然宣揚循环发展“規律”及其他一些类似的“規律”，却在他自己的学說不愉快的后果的事实面前停下来了，按照他的学說，资本主义社会正处在衰敗时期。湯因比防备自己受到施宾格勒的悲观主义結論的影响，找到了这样的結論：可以通过求助于上帝，經過改邪归正走向天国，来避免大灾难。

“‘变容’<sup>①</sup>的目的是使那些处在黑暗中的人們得見光明；……因此，‘变容’的目的是进入天国。”<sup>②</sup>

“在‘時間’的紡車上牽紡的‘地上精灵’的产物是‘人’的古往今来的历史，这种历史表现为人类社会的誕生、发展、衰落和瓦解……”<sup>③</sup>

應該指出，說这句话的不是圣奥古斯丁，不是过时的米拉尔或龐罗惠，也不是施宾格勒，而是阿尔諾德·湯因比“本人”。资产階級科学沒落的面貌就是这样。

---

① “变容”(transfiguration)一詞系指耶穌在他的門徒面前显圣，突然变了形象，臉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这个神話故事出自《新約全书》《馬太福音》第17章。——譯者

② 索罗京：《湯因比的历史哲学》，第105頁。

③ 同上。



## 第二节 主观唯心主义派

(用个人心理或个人心理創造的发展規律的形式来使历史規律神秘化)

在唯心主义的哲学著作中，規律的神秘化是以客观唯心主义的形式出現的。客观唯心主义把規律看成是精神、思想等等发展中的經常規律性，这只是神秘化的一种說法。另一种說法也是与精神联系在一起的，但这一次不是与客观的，超个人的精神联系在一起，而是与个人的主观精神联系在一起。但在客观唯心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这两种說法之間的区别是相对的，因为客观精神不外是主观精神在个人范围，即絕對范围内的射影。无怪乎这两种概念的道路不可分割地交錯在一起，而其交結点則是宗教。

从許多主观唯心主义的流派中，我們只举出四种来加以說明：实证主义的关于意識发展規律的概念(以保克耳为例)，瑪克斯·韦伯的“理想典型”学說，心理概念(以拉姆普勒赫特为例)，思辨公式概念(以布雷瑞为例)。我們也将尽可能分析各个流派在波兰的代表人物的观点。

### 1. 实证主义的社会規律学說

亨利·托馬斯·保克耳在其活动中是孔德的继承人。他属于实证主义的流派，几乎是在史学中宣傳孔德的思想的最重要的人物。《英国文明史》一书在十九世紀资产階級史学的发展中，曾起过巨大作用，同时也影响了这个时期的波兰史学。

保克耳宣称，必須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历史科学，必須揭示历史規律，并把史学建立在这些規律的基础之上。

这是所有的实证主义者，包括穆勒和泰恩的共同观点。但保克耳贯彻这种观点最为坚决。根据这一原则写成的《英国文明史》，实质上是对史学的一篇重要的绪论，通过这本书，他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史学，较之他人有过之无不及。但是保克耳的言行不符，也是特别明显。因为，尽管他郑重其事地宣称，将要通过发现历史发展的新规律来改造史学，但他不仅没有发现这些规律，而是使规律神秘化了，实际上他是否认了客观历史规律。因此，为了指出唯心主义的，使发展规律神秘化的实证主义本质，分析一下保克耳的观点是特别合适的。

保克耳的书从攻击不了解科学任务的编年史开始；他认为科学的任务在于作出以报道事实为限的总结：

“人类历史的一个不幸的特征是，虽然有人把它的各个部分写得非常精彩，但却很少有人下决心把它们组成一个整体并揭示其中的相互联系。在每个其他的研究领域内，都承认有总结事物的普遍需要，并且正在成功地努力于把局部的事实提高到一般的、有指导性的规则。而史学家在通常的情况下还远没有做到这一点，在他们中间流行着一种令人惊奇的意见：仿佛他们的任务只在于叙述事件，这种叙述只是在有的时候和有的地方，由于某种道德或政治性的评述在这个或那个史学家自认为或多或少算是恰当和有益的，才显得有声有色。”<sup>①</sup>

保克耳这样低估这一类型的史学家，因而确定他们不配在史学这个知识领域内工作。他不仅不承认这种史学是科学，而且相反地把它看成是搜集真实史料的障碍；这种史学使研究者注意荒唐不经的资料，造成对科学有重要意义的一些领域内的落后性。

---

① 保克耳：《英国文明史》，俄译本，第3页。

保克耳认为史学中的情况不能令人滿意，认为其原因是由于在总结方面史学落后于其他科学。他为自己提出了填补这个空白的光荣任务：

“完全合乎理想地完成这项任务，可能性不大；但我仍然希望，我在人类历史这个领域内所完成的工作，至少将与其他研究者在其他自然科学领域内所完成的工作相同。”<sup>①</sup>

保克耳放弃了无法在历史中确定规律性这种无根据的论点。如像他所肯定的，这种观点的产生是由于认为史学家不如自然科学家有天才，他们的研究对象比较复杂。为了打开这种僵局，应当解决下面一个问题：

“人的活动，也就是社会的活动，是否服从于固定的规律，它们究竟是偶然事件，还是超自然力量的结果呢？”<sup>②</sup>

在研究社会的时候，保克耳得出结论说，社会发展服从于规律；统计学首先指出了这一点。他把两种在社会中起作用的规律区别开来，并根据人是身心并用的生物这一点而划分为精神规律和自然界规律。它们相互影响，相互变位。这里发生了一个问题：其中哪一些规律具有更重要的决定意义呢？

在进一步的讨论过程中，保克耳得出结论说，精神规律更加重要，因为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自然界对人类的影响的比重不断减少。但是在谈到精神规律的时候，我们不是指一些同一样式的规律而言，因为还有道德的规律和理性的规律。按照保克耳的意见，既然道德因素是静止的因素，而理性因素是易变的因素，因为后一个因素（据保克耳得出的结论）并没有决定的意义，那么，理性规律、思维规律就在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就成了历史本身所固有的规律。

<sup>①</sup> 保克耳：《英国文明史》，俄译本，第4页。

<sup>②</sup> 同上，第6页。

从这里可以得出两个原则性的结论。第一，整个历史发展决定于知识的总和和方向；第二，历史的真正动力是伟人，知识就是在他们的头脑中产生的。

这样，我们就找到了保克耳的公设的真正涵义。他的“科学的史学”不是别的，而是唯心主义的英雄主义的史学，它远离准确科学的程度并不亚于他所驳斥的编年史学。他向我们提供的不是规律，而是使历史规律神秘化。

同时，即使从表面上来看问题，他的研究成果也太贫乏。他所作出的四个历史“规律”，不论在内容上，或是在形式上都算不得是规律，除此以外，就只剩下一条空洞的原理：进步决定于知识，而教会和国家的干预是进步的阻碍。无怪乎保克耳甚至使他的拥护者也感到失望。下面一段引文就是华沙学派实证主义史学家之一巴文斯基的意见：

“谁仔细地读过《文明史》的前几章，并正确地记起他在绪言中隐约地透露的那些思想和意见，那么在看到上述的结果的时候，都会感到某种失望……在他的言行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甚至保克耳的最热心的崇拜者，读过《文明史》之后也毫无疑问地会产生这种印象。为了实现他在这部书的绪言中所作的诺言……必须以其他的规律来真正地充实历史。他的诺言就是要完成别的学者早已在其他自然科学领域所完成的工作。”<sup>①</sup>

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来分析保克耳的学说的原则，他的研究结果是十分明显的。唯心主义把规律神秘化是现实在人脑中的反映，它把派生的因素变为第一性的因素，即变为整个发展的基础，因此它不能导致任何肯定的结果。英国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保克耳把自己的意识形态的理论用来作为为这个阶级服

<sup>①</sup> 巴文斯基：《保克耳》，见《华沙图书馆》，第4卷，1868年波兰文版，第383页。

务的思想武器。

\* \* \*

实证主义，特别是保克耳的学说，在十九世纪后半叶波兰的一些主要历史学派中找到了追随者。但这不是单纯的模仿，因为实证主义的理論在波兰要适合于资产阶级—地主联盟的阶级利益。因此，在效法英国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經驗时，它的波兰弟兄却不得不对实证主义的观点作許多修改、补充和掩飾。在残酷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的条件下，对波兰的有产阶级来说，甚至这种思想上的“穷人湯”也是不堪下咽的。华沙学派是打着实证主义的旗帜正式出現的。但克拉科夫学派，尽管有所不同，也受到了实证主义的影响，并且不止一次地使用了它的一套冠冕堂皇的空話。

在这里我們不打算更深入地分析波兰实证主义的起源，以及十九世纪下半叶波兰史学中华沙学派与克拉科夫学派的关系，尤其是因为讀者自己可以在蔡琳娜·波宾斯卡的有意义的研究著作中找到对这些问题的正确說明。<sup>①</sup>我們只研究直接处在我們的論題以內的问题的那个方面，并在必要的程度上涉及一般的问题。

在波兰，实证主义是作为资产阶级—地主联盟的意識形态，作为对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社会和民族綱領的反动出現的。因此，当时实证主义的资产阶级史学重新考虑对待人民起义的态度问题，并不是偶然的。<sup>②</sup>从这一角度来看，克拉科夫学派的領袖之一丁·舒依斯基的意見是有代表性的；他在《我們历史中的几个真理》一书中写道：

① 波宾斯卡：《斯摩梭斯基通信选集序言》，华沙 1954 年波兰文版。

②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閱 M. X. 謝列伊斯基的《展望 20 世紀初期資本主义波兰的史学》，見《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第 1 卷，1950 年波兰文版。

“現在，在解放以后出現了这样的情况：进行秘密活动、地下活动成为绝对不正确的，而正常的，有組織的工作則成为绝对正确的。

“为什么？因为 1863 年永远結束了一个时代，在波兰土地上，在社会关系中沒有留下一个被奴役的人。1863 年人民获得了解放，在人民中間进行地下活动曾經是一种难免的災禍。但在 1863 年以后，以任何形式繼續延长地下状态就不必要了，这并不是爭取独立的斗争，因为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也未能通过阴谋和秘密活动获得独立；这也不是 1863 年結束的社会革命的延續，——为了这次革命而付出的代价是：人民遭到了屠杀，莫斯科在这次屠杀中为所欲为。不管是‘五三宪法’以后的塔尔戈維茨式的否决权自由 (*liberum veto*)<sup>①</sup> 也好，或是人民得到自主以后的同意权自由 (*liberum conspiro*) 也好，其形式只是更加可怕而已。这不是自由，而是社会主义，不是独立，而是莫斯科侵占了这个国家。”<sup>②</sup>

从上面这段引文中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舒依斯基害怕革命，这种恐惧迫使他宣布，“我們这里沒有社会問題”，<sup>③</sup> 并肯定說，在人民起义当中社会問題比民族問題更占优势。

我們虽然认为实证主义的起源与对革命的民主主义的反动是联系在一起的，但这不能充分說明实证主义。作为资产阶级—地主的一种意識形态，实证主义是对当时最威胁有产阶级統治地位的那种理論的反动。因此，它有朝一日会成为对革

① “否决权自由”原指 17—18 世紀波兰国会中的一种特殊否决权形式，只要有一个議員反对就不能通过決議。——譯者

② J. 舒依斯基：《我們历史中的几个眞理》第 1 卷，克拉科夫 1885 年波兰文版，第 281—282 頁。

③ J. 舒依斯基：《論国会任务》，見《波兰研究》1871—1872 年波兰文版，第 1 卷，第 2 期，第 231 頁。

命的工人运动及其意識形态的反动。無論如何,在八十年代“大无产阶级党”活动的时期,实证主义明显地定形下来,成为对馬克思主义的反动。一些实证主义者自己的声明(斯文托霍夫斯基在1878年反对社会主义的論文)证明了这一点;八十年代的一些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如克魯辛斯基、克尔希維茨基等人把他們的批判矛头首先指向实证主义(因为这一时期馬克思主义的影响大大增长了),这个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为了评价实证主义对史学的影响,了解实证主义的起源和历史演化是有其重要的意义的,同时应当注意,华沙学派是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扩大了它的活动的。<sup>①</sup>

現在簡短地叙述一下华沙学派与克拉科夫学派的关系。

这两个学派,虽然在思想領域內都代表資產階級—地主联盟的利益,反映有产階級的利益,是反对历史上形成的革命运动的反动派,但它們还是彼此不同的。这种差别的根源是这两个史学派别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不同。

克拉科夫学派是在地主分子占优势的,經濟落后的加里西亚的土壤上成长的。它与一批“斯坦契克党人”<sup>②</sup>有着最密切联系,它继承了反对列列維尔的 K. B. 霍夫曼的傳統。<sup>③</sup>克拉科夫学派的观点是明显地反动的,而坚持天主教保守主义精神的

---

① 评价文艺著作中的实证主义,这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我們絲毫无意反对,在普魯斯、奧熱什科的創作中,特别是在康諾普尼茨卡雅的创作中具有进步的因素。从这些偉大作家在他們的著作中真实地反映现实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些因素表現的程度。但这与他們的实证主义有什么关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在这里我們自然不能加以分析。

② 参閱宁·阿苏罗多勃拉伊的著作:《論史学史中的进步性标准问题》,見《历史季刊》,1953年第4期。

③ “斯坦契克党”(Stańczyk),即“保守党”,系十九世紀下半叶代表加里西亚地主和天主教会利益的波兰保守政党。——譯者

史学是为反动的国内政策并效忠于占领者服务的。从一开始，克拉科夫学派就反对列列維尔学派的民主傳統。

社会问题是說明这种反对民主傳統的立場的根本問題。但表面上，克拉科夫学派抓住了列列維尔的概念的弱点：这就是它有时經不住唯心主义，特别是浪漫主义的攻击。这种对唯心主义的让步，如承认“民族精神”的存在，就使实证主义能够攻击在列列維尔学派中出現的階級斗争学說，以及这个学派所承认的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实证主义者有着极其明确的政治目的，他們不管怎样就是要否认列列維尔学派的理論中所承认的历史发展中的規律性。

列列維尔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是一个革命家；克拉科夫学派的代表人物和华沙的实证主义正是害怕这一点，和希望避开这一点。它們指責列列維尔及其学派是主观主义，缺乏科学的客观主义。过了相当长的时期以后，在二十世紀初，有一个波兰资产階級史学的代表評論列列維尔說：

“他的与众不同之处不是在于科学的批判方法，因为当时还没有这种方法；并不是在于他的著作有不朽的价值，因为这些著作很快地过时了；也不是在于他的观点是冷淡主义，因为列列維尔是一个民主主义思想家……”

“列列維尔所創立的这个学派的人数众多，但是他的学生却不如先生高明，因此只继承了先生的缺点，而没有继承他的許多优点。……”

“他們主要从綜合技术的小圈子的观点来看历史……几乎所有关于1840年至1870年之間的波兰历史的作者都难免受到这种反科学的党性的指責……”<sup>①</sup>

<sup>①</sup> 科汉諾夫斯基：《十九世紀下半叶波兰史学的发展》，第34—35頁。（着重点是我加的。——亚当·沙夫）



在这种“党性”中使科汉諾夫斯基和他的克拉科夫学派的前輩同样感到不安的是什么呢？很明显，就是列列維尔的民主主义。他們的“客观主义”就是反对这一点的。

在这样的掩护下，最容易夹带“斯坦契克党人”的反动的党性。因此，克拉科夫学派的代表們那么大叫大喊地宣傳他們的客观主义，忠实于科学和崇尚博学多聞。二十世紀的資產階級史学理論家們在这方面重复了他們的所作所为，支持关于“博学的客观主义”的神話，而归根結底是为了十分明确的階級目的。<sup>①</sup>

应当說，某些后来出版的关于实证主义的著作，如謝列伊斯

---

① 馬尔采里·汉德尔斯曼 1925 年在《历史綜合評論》上(39 卷)发表了《波兰历史研究及波兰历史思想的傾向》一篇論文。在涉及 1870 年后波兰史学的一段引文中，我們讀到：“加里西亚的社会生活和教育的波兰化，使波兰的这个地区成为我国所有其他省份精神上統一的地点。加里西亚在长时間內成了科学活动的中心，它满怀热心特别乐意于用新的眼光使自己对 1870 年以前的傾向。与国外(法国)或国内建立的一些重要的历史学結論相反，在那些地方很快地創立了一些还只是部分地得到論证的适合于先驗思想的政治概念；这种思想預定……要在波兰形成的絕望的形势之下作为引路人，而新的波兰学派却首先想成为科学的学派。这个学派把总结与分析对立起来，把重要的、往往是模糊的，早产的体系与文献，准确性和理性对立起来，把綜合結論与博学对立起来。它摒棄了令人回忆过去时代的一切，以便永远处在首先是从偉大的德国‘研究班’中学来的方法的範圍內，……这个学派摒棄了政治活动，埋头于純粹的科学研究，只关心一件事，即尽可能使自己的学科和方法接近准确科学……”(第 66—67 頁，着重点是我加的。——亚当·沙夫)

A. 捷姆宾斯基于 1933 年在华沙举行的国际史学家代表大会上的演讲中宣称：“在这种科学的气氛中形成了一个称为克拉科夫学派的新学派。”但这个“学派”既沒有共同的老师，又沒有共同的意識形态，因为这个学派的創始人甚至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也相互糾纏不清。不过有一个共同的，已經成为心理上的需要的指导思想把他們联系起来。这就是，不顾一切棘手的問題和誹謗，他們使自己的决定都以现实、文献和宣布历史真相为根据。(《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波兰史学》，华沙 1933 年，第 6—7 頁)

基在給斯摩梭斯基的《波兰历史学派》所写的序言，以自己的錯誤分析来支持这种神話。

十九世紀下半叶的波兰資產階級史学在反对前一时期史学中的民主派的时候，首先反对它的民主民族的政治傾向。它反对民主派面向群众，自己建立一种个人主义的，“英雄主义”的史学。它反对历史的客观規律性，摒棄历史規律的理論或者本着唯心主义精神使規律神秘化。它力图以自己的所謂客观主义和“批判的博学”来破坏旧学派的威信。

显然，对那些与“斯坦契克党人”有最密切联系的保守的史学家來說，客观主义和“批判的博学”只是夹带最反动的政策的遮蔽物。克拉科夫学派的著作中的反动內容及其明显的反革命的方向表明，在舒依斯基，加林卡，斯莫尔卡和其他人，以及后来的汉德尔斯曼，捷姆宾斯基等人所大肆吹嘘的“科学客观主义”的幕布后面所隱藏的是什么；当时相互竞争的波兰資產階級史学派別——克拉科夫学派和华沙实证主义学派——在爭論时无意中脱出的实話也表明了这一点。1890年塔杜什·科尔逊在里沃夫举行的波兰史学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反对克拉科夫学派的假仁假义的演說，是在波兰資產階級史学狡猾地伪装自己本来面目的气氛中投下的一枚真正的“炸彈”。科尔逊指出这个学派具有政治成見，以此来駁斥它冠冕堂皇的“科学的客观主义”的說法；指出这个学派的反科学性，以此来駁斥它的“批判的博学”的說法。当然，科尔逊的演說不是沒有錯誤的，要知道，他也属于資產階級史学的陣营。但他的演說有助于揭露克拉科夫学派的反动党性和主观主义。至于科尔逊本人的观点与上面所指出的克拉科夫学派的观点相差并不大，这是另一回事。的确，正是这个科尔逊在論实证主义史学家的文章中，大罵他們从历史中排除了……預見。

斯摩棱斯基在《波兰的历史学派》中也对克拉科夫学派作了类似的评价。他指责克拉科夫学派“认为历史是生活的教师”，“在历史中找寻实践的科学”。这种指责的实质是：属于克拉科夫学派的史学家们从今天的立场来评价过去，使这种评价适合于当前的政治需要。斯摩棱斯基同意：应该与“以现代自由主义的尺度来衡量过去”的列列维尔学派的观点作斗争，但他反对以反动来代替自由主义。在分析史学家的著作中歪曲过去面貌的原因时，斯摩棱斯基说：

“一些有明确的实际目的政治家也从事于历史研究。除了用来实现政治纲领的其他手段以外，他们也求助于历史。这样，在他们手中历史便成了政治手段，而不是科学的目的。”<sup>①</sup>

华沙学派的学说是另一种环境、即在工商业比较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形成的，它是在资产阶级—地主联盟中占领导地位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在思想上的反映。在原则上这并没有改变华沙实证主义在对有产阶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上的立场；例如，它敌视民族解放斗争，敌视通过革命途径来解决农民问题，敌视革命的工人运动。但同时它也反对封建主义的某些残余，因为这些残余阻碍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使资产阶级不能完全战胜它的对手——地主。当然，它反对封建主义的残余是有限度的，即不能使人民群众的愤怒和群众积极性的增长对它造成威胁。不过，甚至在这个限度内，华沙实证主义还是可以支持为发展工业所那么需要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华沙实证主义代表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倾向，反对克拉科夫学派的“历史悲观主义”；其目的是在人民的过去中找寻巩固反动政策和以君主制度与“实力政权”思想为依据的论据。因此，就华沙学派批

<sup>①</sup> 斯摩棱斯基：《波兰的历史学派》，弗劳兹拉夫1952年波兰文版，第143页。

判封建残余这一点而言，它是相对地进步的，是与克拉科夫学派对立的。因此，它能够写出一些經得住時間考驗的著作，例如斯摩棱斯基的《十八世紀波兰的思想变革》或《庫茲尼查·科隆塔育夫斯卡通信选集》；这两部书我們現在还在利用，甚至还重新再版了。自然，連这种相对的进步性也有其一定的历史界限；应当在具体分析的过程中找寻这种进步性因素；我們不是指这整个学派，而是指注意其中每一个个别的代表。同时，应当注意被分析的观点的完整性，避免人为地只把一些积极因素标志出来，否則就必然使我們作出歪曲的評價。我們承认，华沙实证主义中含有相对的进步因素，但这并没有改变这一事实：它和克拉科夫学派一样，都是保护有产阶级的利益的。因此，这两个学派之間尽管有差别，但在根本性的問題上，它們是彼此联系着的；这些問題决定了它們原則上同一的阶级性。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共同阶级利益和对人民群众的共同恐惧心理把资产阶级和地主联合起来了。

“組織工作”这个口号也是表现这两个有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和願望的共同口号。对人民群众的恐惧心理，以及波兰的地主已沿着资本主义經濟的道路发展的共同基础，使它們之間的差别失去意义；实际上这些差别已經成为过去。关于这一点，1898年德魯斯基写道：

“地租和利息，不管以加里西亚的‘土地銀行’的扣息形式取得也好，或是以罗茲和华沙商品生产的利潤的形式取得也好，实质上是把两种乍看起来好像是各不相容的因素凝結起来的水泥，是把宗教的概念和社会的概念之間的鋒利邊緣磨平的宝石。”①

① 乙·多里瓦(K·德魯斯基)：《波兰资本主义的出現》，苏黎世1898年波兰文版。  
引自謝列伊斯基为斯摩棱斯基的《历史学派》所作的序言(第 XI 頁)。

根据这一点，謝列伊斯基在斯摩棱斯基的《历史学派》一书的緒言中，对华沙学派所作的評價，看来是錯誤的。这样的評價片面地以华沙学派一些代表的个别著作中的进步因素为根据，而没有看到階級斗争的原則性問題及这个时期划分思想意識的原則性界綫。这里出現了史学分析中的公式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毛病，在謝列伊斯基的論K. B. 霍夫曼的那部书里也帶有这种毛病，宁納·阿苏罗多勃拉伊在上面引证的著作中也向作者指出了这一点。

結果就成了为华沙学派辯护，从而歪曲了对这一学派的階級性的了解，使这个学派的繼續变成完全不可理解。

查明波兰实证主义的起源，及其階級职能，以及当时波兰史学中这两个主要学派的相互关系，可以使我們了解这两个学派在解决历史規律問題中所采取的立場。波兰实证主义者在形式上追随孔德的观点，特别是保克耳的观点，因此他們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华沙学派的斯摩棱斯基，克拉科夫学派的鮑勃尔任斯基）才完全承认历史規律；当然这是以实证主义的精神神秘化了的規律。在这个問題上他們通常采取动摇不定和极其含糊的立場，同时在实践史学中以自己始終一貫的英雄主义概念完全取消承认任何历史規律性存在的外貌。归根到底，对当时史学的分析恰恰证明，方法論的表白并不足以确定史学家的立場。毫無疑問，当时关于历史規律的方法論的議論都出自鮑勃尔任斯基的手笔，<sup>①</sup>然而他与“斯坦契克党人”集团有关的全部政治活动，及其以英雄主义史学的精神写成的一些历史著作（对英雄主义的史学來說，上帝的天意是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却反駁了他

---

① 鮑勃尔任斯基：《为了历史眞理》一书中，和与苏依斯基、加林卡及斯莫尔卡爭論的論文中（《波兰历史时期的分类》）以及在《波兰簡史》再版的序言中，保卫承认历史規律的学說。

的方法論表白。

但一般說來，克拉科夫學派在談到歷史規律時是非常謹慎而且勿寧說是抱着否定態度的。

在克拉科夫學派中關於歷史規律的觀點，占優勢的不是以鮑勃爾任斯基為代表，而是以斯莫爾卡為代表。在攻擊保克耳的學說認為歷史是研究支配人類社會的規律的科學時（我們知道，這些規律是被唯心主義地理解的意識發展的規律），斯莫爾卡寫道：

“……至今還從來沒有人揭露出，這些無條件的、不受任何東西破壞的規律真正支配着人類的生活和發展，還從來沒有人把這種觀點提高到科學定理的程度，因此，我們有完全自由同意或不同意這些規律。

“……我們不是一定要反對這些規律，而是承認，如果這些規律存在的話，那麼我們並不知道它們……”<sup>①</sup>

實際上，斯莫爾卡是否認歷史規律的存在；在他看來，連保克耳的唯心主義的規律概念也不能接受。但他寧可以謹慎的形式來表示這種否認，借口這些規律還沒有形成。從他後來關於個人作用的議論中，我們完全可以知道，在這裡使他感到興趣的是什麼。歷史規律的理論與英雄主義的史學是不能相容的，因此，必須反對這種理論。這就是斯莫爾卡的真實思想；必須承認，從他的政治和理論立場來看，他這一思想是始終一貫的。他說：“史學家們的行會反對歷史規律的理論，因為……它首先記得一些對人類發展起了重大影響的個別歷史人物在歷史中的巨大作用，記得那些使人類發展無條件地向新的道路進行的事件，雖然決不能把這些事件的起源和經過塞在那些支配人類的確定

<sup>①</sup> S. 斯莫爾卡：《論歷史》（歷史論文集）第1卷，華沙1882年波蘭文版，第295—296頁。

不移地起作用的規律的硬框框內。因为在这些規律的理論里，根本沒有历史人物作用的地位……”<sup>①</sup>

斯莫尔卡十分坚决地认为，历史“是与某个一定的对象有关的一切事件的总和，从它的存在的最初特征起，一直到它的存在结束时止。”<sup>②</sup>

斯摩棱斯基在所著《历史学派》一书中批判斯莫尔卡的时候說，把史学归結为純記載的这种作法，取消了从具体資料中得出一般規律的可能性，从而勾銷了史学的科学性；这种意見是正确的。斯莫尔卡也了解这一点。他写道，如果“科学”这个概念与发现規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那么，历史就不是“科学”，而宁可說是一种艺术：

“如果历史不配叫做科学，那么按其本质來說，它就应当是一种不受欢迎的科学，应当是一种艺术。”

斯莫尔卡的观点，对克拉科夫学派來說，是有代表性的。否认甚至以神秘化形式表現的历史規律，与杰出人物創造历史的唯心主义的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与否认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克拉科夫学派所有代表人物都一致否认这一点。这一学派所依据的社会基础，它的保卫社会中最反动的一部分人的利益的社会职能，——这一切使得它的代表人物所受到的实证主义的影响也是以极其“冲淡”的形式出現的，只有上面談到的鮑勃尔任斯基是例外。

华沙学派的代表們，尽管正式承认实证主义和往往与克拉科夫学派的观点进行激烈的爭論，但他們仍是动搖不定和模稜两可地談到实证主义的历史規律概念。

一些溫和的实证主义者如塔·科尔逊等人，采取了与斯莫

① 斯莫尔卡：《論历史》，波兰文版，第 296 頁。

② 同上，第 304 頁。

尔卡相似的立場，所不同的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以更加小心謹慎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在論实证主义史学家的一篇批判論文中，科尔逊自己也指責克拉克夫学派缺乏客观主义，他写道：

“至于我們，那么我們和保克耳一样相信，無論在道德世界中，或在人类生活中都应该存在有固定規律；但同时我們还认为，为了确定这些規律，認識它們的意义和起作用的条件，以及把迄今为止已經作出的空洞的和不准确的結論确定为科学定理，研究者们現在所有的資料是太少了。詳細地研究这些規律尚有待于遙远的、无法估計的将来；目前这些規律还只能是信念和洞察的对象，而不是知識的对象。”<sup>①</sup>

因此，科尔逊不是直接拒絕历史規律，而把它列入信念的範圍內。同时，如果我們注意到，他的絆脚石不是对社会生活发展規律的正确理解，而是实证主义者人为地制造的意識发展的假規律，并把它們作为仿佛是社会生活发展的基础，那么，問題的实际情况如何就很明显了。

在另一处，科尔逊更明显地否认历史規律的存在，把历史过程与人們的自由意志的表現联系起来。在給《插图本大百科全书》所作的題为《历史》的那篇論文中，科尔逊确定历史是“文明科学”（这与李凱尔特的“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相似）。按照科尔逊的意見，史学与自然科学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对象——文明——是人們的創造。他因此得出結論說，只是屬於人們生活中的自然性质的过程問題，才應該去向自然科学家請教：

“……但我們不承认物理的或机械的自然規律对人的精神

---

<sup>①</sup> 塔·科尔逊：《历史实证主义者：布克萊、德拉貝和考尔布》，見《華沙圖書館》，1870年波兰文版，第3卷，第45—46頁。



活动有绝对统治之权，因为，不论在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与自由的人类意志和力量这两个领域之间的界限有无争论，这第二个领域毕竟属于历史，是最卓越、最现实地发挥思想的舞台，其中含有判断行为的道德价值的一切根据。”<sup>①</sup>

在这里我们还没有提到，科尔逊为了便于反对规律的学说，采用的办法是把规律当作是将物理规律机械地搬用于人的精神活动。同时，我们不应忽视他把历史与脱离了必然性作用的范围的自由意志的领域等同起来。在这部《插图本大百科全书》的《历史哲学》那篇论文里，他重新回到这个问题。在结束对历史哲学学说的评论时，他写道：“在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要附带说一下我自己关于对象的一些概念，在《历史》那篇文章中我已顺便提到过这个对象，这就是关于自由意志与必然性的关系以及规律的统治地位。当人们为了入睡而计算呼吸的次数时，常常因为算错而停止计算；但呼吸并不因此而停止，因为呼吸是不以自我的意志为转移的，这种运动只服从于自然规律；如果杀人犯以窒息的方法停止我的呼吸，那么，我自己的自由意志也和生命一起受到危害。但是，如果我起床的时候感到很健康，或者窒息已经过去，那么，我将行使我的自己意志，进行计算或停止计算，我将享受生活的一切幸福，不再担心解剖学和生理学的规律；如果我在世时作了某种有历史价值的事，只要是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做的，我就将进入历史。不仅我，而且你，也拥有不是由你的意志所创造的身体中的同样的自由；同样，如果我们完成了某种社会事业，那么不论是他，是他们，我们大家都能在‘历史’上扬名后世。”<sup>②</sup>

实证主义者科尔逊就是这样利用“自由意志”的论据来反对

---

① 科尔逊：《历史》，第 79 页。

② 科尔逊：《历史哲学》，第 144 页。

历史规律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与克拉科夫学派的一些最极端的代表们有哪些区别呢？

同属于温和的实证主义者的阿道尔夫·巴文斯基，采取了稍微有所不同的立场。他放弃了保克耳的企图，正确地把它看作是沒有成功的企图，同时认为发现发展规律是史学家本身的任务。他把规律与因果律等同起来（“因果关系是与规律概念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sup>①</sup>），而摒棄穆勒的所謂“經驗”规律。在規定规律的等級时（这些规律由于作用的範圍不同而彼此不同），他把规律分为高級的和低級的，比較局部的和比較一般的。他說：“彻底研究这些原則性的规律，比較一般的规律，这才是科学的最高目的。”<sup>②</sup>但迄今为止，人們还不知道这样的历史规律：

“規律性或在产生根源相同的各种社会現象的某一領域中重复性的同一性，是自然的和簡單的結果。

“找寻这种在低級的、有限的領域中出現的同一性，对科学來說，將是一个意义不大的細微成果。因此，在历史中談的是一般的、原則性的规律；这种规律在历史生活发展中的意义，就像万有引力律对宇宙力学的意义一样。”<sup>③</sup>

在历史规律問題上，斯摩棱斯基采取最坚决的立场。在他的《历史学派》一书中，我們讀到：

“……历史科学也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除了檢驗和研究現象的本质以达到发现支配人类的規律的目的以外，沒有其他任务。”<sup>④</sup>

斯摩棱斯基不仅能够批判斯莫尔卡在方法論方面的缺点，

---

① 巴文斯基：《保克耳》，波兰文版，第 377 頁。

② 同上，第 378 頁。

③ 同上，第 379—380 頁。

④ 斯摩棱斯基：《波兰历史学派》，波兰文版，第 144 頁。

而且也找到了鮑勃尔任斯基在这方面的缺点。只有当他公开地轉到政治反动的立場的时期，才放棄自己过去的方法論观点，才背棄承认历史規律性的理論，站到主观主义和个别論方面去。然而在八十和九十年代，当他写作一些大型的历史著作的时候，他却能够克服实证主义方法論的局限性。順便提一下，这一点是与他作为一个史学家的成就分不开的。

## 2. 瑪·韦伯的“理想典型”学說

“理想典型”学說是直接依据巴敦学派的学說，想使历史发展規律唯心主义地神秘化的一种嘗試。

瑪克斯·韦伯对我们感到兴趣的問題所发的議論的出发点，就是我们在现实的一切現象中根据什么来选择那些构成科学方法的东西。他完全同意李凯尔特的意見，反对把注意規律性和排斥偶然性作为选择的根据；按照他的意見，只有从現象与文化价值观念的关系来看現象所具有的意义，才是选择的根据。韦伯說，如果我们沒有具备这个先决条件就着手研究现实，即不考虑这些观念及与其有关的意义，那么，我們看到的就只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个别观察。

“在每一个場合，使我们感到兴趣并对我們有意义的只是个别的现实的一部分，因为只有这一部分才属于我們用以研究现实的文化价值观念；只有这种情况才会把秩序带到这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里面去。在不可胜数的，各种不同的个别現象之中只有某些方面值得認識，这就是其中我們承认有一般的文化意义的那些方面；只有这些方面才是需要作因果說明的对象。”<sup>①</sup>

当韦伯宣称，在研究始終是“历史上个别的”文化現象时，我

---

① 瑪·韦伯：《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認識的“客观性”》，見《科学講座論文集》，杜平根 1922 年德文版，第 177—178 頁。

們不是研究規律，而是研究具体联系，这时候，出現在我們面前的仍然是李凱尔特。只有当韦伯宣称，在文化科学領域中一般的概念是可能的时候，他才开始离开李凱尔特的概念，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是这样的。

“从这一切可以得出什么結論呢？自然不是指：仿佛在文化科学領域中不承认对一般的認識、抽象典型概念的形成，以及对規律性和企图制訂‘規律’根据的联系的認識，在科学上是有同样意义的。恰恰相反：如果史学家的因果認識就是把具体結果歸結为具体原因，那么，不运用‘規律的’知識，即关于因果联系的規律性的知識，而要把任何个別的结果作相应的歸結，是根本不可能的。”<sup>①</sup>

當我們試問，韦伯对“文化科学”中的一般这个概念是怎样理解的，上面所提到的“規律的”知識是什么涵义的时候，他拋棄李凱尔特而承认社会发展規律性存在的表面姿态也就立刻消失了。分析一下韦伯对唯心主义人文学方法論作出的“个人貢獻”——“理想典型”理論，就可以為我們解答這個問題：

“抽象的經濟理論是那些習慣上被称为历史現象‘观念’的綜合的范例。这种理論給我們提供了在以交換經濟、自由競爭和严格的合理活动为基础的社会組織中，商品市場上的各种事件的理想方式。

“这种思想方式把历史生活的某些关系和事件統一在內部无矛盾的意識到的联系的宇宙之中。就其内容而言，这种构造具有烏托邦的性质；我們是通过在思想上加强现实中的某些因素而获得这种烏托邦的。这种純概念形式的思想方式，在现实

<sup>①</sup> 韦伯：《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認識的“客观性”》，見《科学講座論文集》，杜平根 1922 年德文版，第 178—179 頁。

中不可能以經驗表現出來，它是一種烏托邦。摆在历史工作面前的任务，就是要确定在每一种个别情况下，现实与这种理想方式相距的远近。”<sup>①</sup>

随后，韦伯解释了“理想典型”对史学家工作的意义：

“但是，每一次詳尽地分析历史表象的概念因素就可以表明：如果只要史学家除了一般地确定具体联系以外，还试图确定最简单的个别事件的文化意义，并试图加以‘说明’，那么，他就只有利用而且应该利用通常只能在理想典型中明显而肯定地表现出来的那些概念来进行工作。难道可以通过‘不依据先决条件的’某一具体现象的记载，或者通过许多具体现象中共有的抽象联系，来从内容方面确定这些概念，如‘个人主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重商主义’、‘约定的’……以及其他无数类的概念么？理想典型是一种思想方式，它不是历史现实，尤其不是‘目前的现实’；它更不是作为使现实与之适合的一个公式而存在；作为现实的体现，这个公式有着純理想的最終概念的意义，我們用它来衡量现实；把现实与这一概念来作比較，以強調现实的經驗内容的某些重要組成部分。”

韦伯把这样理解的“理想典型”应用到規律上：

“我們有意不提对我們來說最重要的范例——即用馬克思來說明像理想典型这种結構的問題……因此，在这里我們只指出：一切特殊的馬克思主义的发展‘規律’和公式，就其理論上沒有錯誤而言，当然具有理想典型的性质。凡运用馬克思主义概念的人，如果用它們来与现实相比較，就都会知道这些理想典型具有卓越的独特的启发作用的意义，如果把它們看作有經驗意义的东西，甚至看作是真实的，实质上就是形而上学的‘行动力

<sup>①</sup> 韦伯：《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認識的“客觀性”》，見《科学講座論文集》，杜平根 1922 年德文版，第 193—194 頁。

量’、‘潮流’等等，他也会知道这些理想典型的危险性。”<sup>①</sup>

现在，韦伯的“理想典型”概念的内容已经很明显了。“理想典型”就是思辨性的构造，是一种虚构；它与唯心主义的价值论有着最密切的联系，这种虚构应与某种客观唯心主义的价值和意义的世界一起组成一个理想的标准，我们用这个标准来与现实相比较，并用它来评价现实。韦伯非常明显地把科学规律归结为“理想典型”的范畴，把马克思主义所发现的规律称为“理想典型”，这就意味着否认规律的客观性，把规律变为智慧的构造，即变为一种虚构，在现实中没有客观地与它相似的东西。

韦伯的“理想典型”学说与选择历史上重要的事实的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本书第三编中将要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只批判与这个问题有关的韦伯的结论，然后就立刻转到一个基本问题，即说明抽象法在认识社会过程中的作用。

韦伯认为，历史过程这个观念不包括现实中数不尽的全部事实，而只包括其中的一部分。对选择的标准是什么这个问题，韦伯回答说，这里指的是具有意义的事实。

但是这丝毫无补于事，因为马上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哪些事实具有历史意义呢？

在齐麦耳之类的相对主义者和主观主义者看来，这个问题并不难，因为作者的个人兴趣就是选择的标准，作者就是被提出的历史过程的创造者，就是作为这样的过程，而不是各种事件的杂乱无章的总和。但韦伯想保持科学性的外貌，因此不得不去找寻与意义有关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就是文化价值。

韦伯的价值论直接来源于李凯尔特，间接来源于狄尔泰。

<sup>①</sup> 韦伯：《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认识的“客观性”》，见《科学讲座论文集》，杜平根 1922 年德文版，第 204—205 页。

这里所談的是被理解为客观的价值世界，它十分接近于柏拉图主义。这样，便存在着某些客观的和真实的（这一点李凯尔特和韦伯都沒有直接說出来，但从他們的概念中可以間接地作出这样的推論）价值，如善、正义、平等等等。用韦伯的話來說，凡屬於这样理解的价值現象都具有一般的“文化意义”。这是一种学說，但这种学說是极端形而上学的，甚至是神秘化的；信仰主义者的天国及其一切奇迹和这种“价值世界”就相差不多。由此可见，这是一种学說，但是明显的唯心主义的（客观唯心主义）学說，我們要根据那些一般的論据把它作为反科学的和蒙昧主义的学說加以摒棄；唯物主义就是从科学的立場以这些論据来证明一切唯心主义，特别是客观唯心主义的毫无根据。

我們現在就可以对韦伯的意义和文化价值的学說試作合理的解釋。我們固然可以試将客观唯心主义的对价值的解釋拋棄不要。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学說还剩下什么东西呢？“有价值”就是意味着“有意义”。这样，我們所得到的不是什么解釋，而是一种同义詞的反复：某种东西在有价值，即有意义的时候才具有意义。因此，或者是由于接受客观唯心主义的解釋而承认科学的破产，或者是由于把問題归結为同义詞的反复的修辞法而承认同样的科学的破产——这就是摆在韦伯的学說的拥护者面前的必須抉擇的两条道路。

上面我們已經查明，按照韦伯的意見，科学的理論和規律是“理想典型”，是一种理智的构造，它起着最高概念作用，我們就借助这种概念来衡量和評價现实。他正确地強調指出，我們在理論中所創造的現實的面貌是抽象的結果（如他所說的，这是在“思想上加强现实中的某些因素”的結果）。虽然他自己认为，现实是抽象的出发点，但他却把抽象的結果确定为“烏托邦”和“虛构”，以及“不是历史现实”的某种东西。这种概念的反动性，它

的反动的社会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为了科学地批判它，需要說明一下，哪怕是簡略地說明一下它对概括和抽象在科学認識中的作用这个問題所采取的立場。

馬克思主义把概括和抽象，因而也就是把概念形成的过程，看作是認識现实的阶段。与感性的观察不同，这种对现实的認識是从个别現象及其个别屬性之中抽象出来的，同时它再现了某一类对象所共有的重要屬性，因而使認識一般的東西成为可能。

我們讀到列宁的一句話：

“認識向客体的运动从来只能是辯证地进行的：为了更准确地前进而后退——为了更好的跃进(認識?)而后退。”<sup>①</sup>

在另一处列宁写道：

“当思維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它不是离开——如果它是正确的(注意)(而康德和所有的哲学家都在談論正确的思維)——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质的抽象，自然規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話，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sup>②</sup>

我們通过对某一类对象、現象、关系等等的重要特征的概括而形成概念；由于从区别它們的个别的屬性(从这一类的观点来看这些屬性是偶然的)之中来抽象，这往往是可能的。由此可见，概念是抽象和概括的复杂过程的结果；它不是什么“直接給予的东西”，而是“思維的结果”。当韦伯强调后一点的时候，他是对的。但他由此而作出的結論則是錯誤的和反动的。

馬克思主义认为概念是思維过程的产物，是“思維的结果”，同时也着重指出它的客观屬性。按照馬克思主义的看法，概念是

①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0頁。

② 同上，第188頁。



现实反映的形式。說得更确切些，与感性印象比起来，它是现实反映的最高形式，正如列宁所說的，概念比感性知觉更完全地，更正确地反映现实。

由此可見，概念并不是什么虚构或者烏托邦；如果从思維的随意构造这个涵义来理解的話，它也不是“思維的結果”；概念有其以某一类对象、現象、关系等等的一般屬性为表现形式的客观的类似物（在这个意义上我們說，概念是一般的反映，是表现在个別的存在之中的）。因此，很明显，这样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尤其沒有具有高度复杂性的社会过程，它們会在“純粹的形式”下提出什么是概念的内容。“純粹資本主义”，即沒有残余和混合物的制度，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不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只有概念才能是“純粹”的，而且这也只是在思想上从一切偶然性、从一切純个別的特征中抽象出来的結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实是比较复杂的。但概念是否因此就变为沒有客观的类似物的构造、虚构、烏托邦、“最高的概念”，一句話，变为韦伯的“理想典型”呢？自然不会。韦伯的“理想典型”是唯心主义的构造，这是一种漏洞百出的学說。

当韦伯告訴史学家說，利用历史事件的任何企图都应该以理想典型的“烏托邦”为依据；当他力图指出，“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之类的概念是智慧的虚构，是随意的构造，而不是“所有許多具体現象中共同的东西的抽象联系”，那么这一学說的涵义就完全暴露出来了。当韦伯警告史学家不要承认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历史規律的經驗意义，而力图把历史規律表述为“理想典型”，即具有某种英雄主义涵义的虚构时，我們就可以明确地揭露出，实际上他的企图是什么。韦伯的构造的目的是这样：否认历史規律的客观性，以唯心主义的精神使历史規律神秘化，結果就是利用“科学客观主义”的口号歪曲社会事实。这是唯心主义

在历史中的又一个变种，是使历史规律神秘化的又一个尝试。<sup>①</sup>

### 3. 社会规律的心理学说

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替之际，在德国史学界中，围绕拉姆普勒赫特展开了强烈的抨击。一般流行的意见是认为他是社会发展规律学说的捍卫者，因而要对他施加攻击。也许在个别论的拥护者们看来，拉姆普勒赫特坚持把历史规律的存在作为纲领性主张，这是不能接受的。正是对他的这种批评却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他不过是口头上保卫历史规律学说，而实际上则保卫神秘化了的规律的概念。在我们看来，拉姆普勒赫特所杜撰的规律的心理神秘化，是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反对史学中的科学观点的又一个别有用心企图。

为了了解拉姆普勒赫特研究规律的态度实质，首先应当了解他对历史过程的心理学的解释。下面是他写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一段话：

“历史本身不是别的，而是实用心理学；因此，很显然，理论心理学为理解历史的内在实质提供了一条指导的线索。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常常有人把心理学一般地称为精神科学、特别是历史科学的力学！但了解这种关系还不等于实现它。为此还必须使历史的理解达到最深刻的原始的过程，即首先由心理学所说明的那些过程，为此还必须使心理学至少是个人的心理学，发展

---

① 关于对韦伯的观点的分析，我要向读者指出与韦伯相接近的弗朗茨·奥兰堡的著作。作者在这里没有对它们进行批判。我指的是1910, 1911, 1912年以《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及《论历史中的规律性》为题，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丛》上发表的三篇论文。顺便提一下，1950年莱蒙德·阿龙在巴黎出版的《历史哲学批判》一书证明，韦伯的观点对现代资产阶级历史著作来说，仍有现实的意义。

到在認識論方面对这些过程占有完全的統治地位。”<sup>①</sup>

拉姆普勒赫特之所以能提出史学是实用心理学这个論題，只是因为他把“集合精神”作为历史科学的对象。按照他的意見，人民是社会心理学所研究的“集合的个人”。而社会心理学被归結为个人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的規律被归結为个人心理学的規律。由此可見，史学是研究“社会精神”的，归根到底就是研究个人的精神；于是历史被归結为这种个人精神的过程，也就是原始的过程。由此可見，拉姆普勒赫特的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交織在一起的。

当拉姆普勒赫特宣称，历史过程的規律性就是“社会精神”的規律性的时候，他完全是前后一致的，因为他假定，历史科学的对象是“社会精神”，支配“社会精神”的規律是个人心理学的規律。从历史上来看是变化无常的和决定着文化时期的性质的心理气质，也决定整个历史的过程。在分析德国史的时候，拉姆普勒赫特按照心理的改变划分了五个时期：即象征主义时期、表象主义时期、協約論时期、个人主义时期和主观主义时期。在指出这些时期的准确的时间界限时，他自以为发现了“发展規律”，他认为任何一个比較深刻地观察事物的研究者都不能反对这种規律。他还断定，他所发现的規律具有一般性，这种規律甚至与其他民族历史发展的經驗資料相对照的时候，也經得起考驗。因此，按照拉姆普勒赫特的意見，應該到心理中去找寻关于历史发展过程的解釋。固然他并不否认，心理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于經濟的和社会的改变，但这不过是說說而已，因为正是这个问题沒有放在他的历史分析范围之列，因为他的概念具有心理的性质。为了不致使人产生任何怀疑，他明显地摒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片面性”。

<sup>①</sup> 拉姆普勒赫特：《現代史学》，柏林1920年德文版，第16—17頁。

在本世紀开始时，貢普洛維奇批判了拉姆普勒赫特的观点。他的批判沒有提出，也不可能提出原則性的反对唯心主义的意見；虽然他是从錯誤的立場来进行批判的，但毕竟正确地看出了拉姆普勒赫特的概念具有思辨性，使規律神秘化的性质。

“实质上，拉姆普勒赫特的史学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而是类似黑格尔哲学的思辨哲学。他对我們讲的关于各个世紀心理情緒的一切，不是也不可能是实在的真相，而只是主观的幻象……我們应当承认，拉姆普勒赫特富于幻想和灵活手法，即使在这里我們已經把心理規律不是、也不可能是历史規律这一层撇开不談，但我們还是不能承认，好像他已經发现了‘历史发展的心理規律’。因为历史的对象是社会，而不是个人精神，尤其不是还有待于证明其存在的集合精神。”<sup>①</sup>

我們还記起拉姆普勒赫特的学生瓦茨拉夫·索貝斯基。他在論述老师的一篇文章中分析了拉姆普勒赫特的观点。<sup>②</sup>他带着一定的保留，根据拉姆普勒赫特的精神承认規律的存在，但是他的議論却暴露了老师的面貌。他在分析拉姆普勒赫特反对历史过程一次性这个論題的論据时写道：

“按照拉姆普勒赫特的意見，在人类历史中看到規律是合理的。在这方面，他与这样一些重要的历史研究者如德国的迈耶或法国的蒙諾没有什么不同。而且他甚至毫不迟疑地指出，这种发展的規律性并不是什么具体的东西，而只是我們的思維和对現象理解的范疇。”<sup>③</sup>（着重点是我加的。——亚当·沙夫）

这段話看来无須再作解釋了。

最后，我們要談一談心理神秘化的另一种說法，其創始人是

① 貢普洛維奇：《史学与社会学》，德文版，第15頁。

② 索貝斯基：《德国历史哲学片断》，华沙1904年波兰文版。

③ 同上，第284—288頁。

波兰史学家科汉諾夫斯基。

在二十世紀最初几年，科汉諾夫斯基在《現代史学流派和科学的史学概覽》那部书中完全支持个别論的观点，把它与历史的个人主义解釋密切地結合起来：

“历史研究精神的正常发展，即逐漸的发展充分证明，在另一些更明确的任务面前采取暫时的折衷主义是正当的；（历史中）的这些任务的产生，是因为在根本上需要有系統地發現某一个重要时期生活状况（status vitae）所固有的最重要的事实和現象。

“这种需要直到現在还在妨碍、而且将来也要妨碍史学向‘新的真理’的大海实行深思熟虑的或輕率的进攻，以便使史学免于陷入一切科学部門所力求摆脱的那种幻境。

“因此，現在怎么就能贊成史学家—社会学家所創立的反英雄主义的派別呢？！当然，这个派別是对現代史学來說未免为时过早的論題的天然标志，这个論題就是：社会現象的进化是由群众力量所引起的并受固定的历史規律所支配的自然职能的特殊結果。”<sup>①</sup>

这一段話是保卫英雄主义的流派和攻击承认历史規律的公开宣言。几年以后，科汉諾夫斯基写了一部簡直是荒謬透頂的书《时代的回声和現代历史規律的閃現》。这本书从一些非常含糊的、甚至超过了資產階級史学所采取的任何含糊不清的“标准”的概念之中，突出了某种承认“規律”的存在的輪廓。

这里所指的是什么“規律”呢？

科汉諾夫斯基首先断定，自然界及其規律影响着人类历史，而文化作为它的反映則是某种第二性的东西。接着我們可以看到，在社会发展之中含有某种邏輯，同时偶然性的观念也有客观

<sup>①</sup> 科汉諾夫斯基：《現代史学流派和科学的史学概覽》，波兰文版，第9—10頁。

性，只是反映我們自己对現象的无知而已……

“‘偶然事件’只是我們自己对这个現象的无知的反映，而不是精确的、絕對‘邏輯’的自然規律的实体缺点。

“我們的意識的薄幕掩盖着未知物的巨大基础，透过这层薄幕这些基础几乎在每一步都以成堆的‘偶然事件’穿透出来；我們越想深入現象，偶然事件也就愈来愈多。

“对大多数人來說是容易了解的生活的表面，就好像是一面神秘的水鏡，一条不知名的怪魚在水底假眠。假如說，它造成了許多垂直地冒向水面的气泡，那么我們知道，每一个这样的气泡一碰到水面就会破裂，留下一个整齐的圓圈的痕迹。

“这是我們作为感觉所感受到的发展的邏輯形式。

“但是当我們在水面上看到，一个圓圈与另一个圓圈相遇，变为一条折断的綫，而这些无数的綫形成了‘意想不到的图案’的混合物，这时我們为什么感到惊奇，并把它称为‘偶然事件’呢？”①

由此可見，作者显然不了解偶然性的問題，而是机械地对待这个问题。但是我們还不知道，他指的是怎样的发展“規律”和怎样的发展“邏輯”。不过，我們稍微研究一下就可以知道，他从社会发展这一事实中得出了如下的結論：相对地固定的人的观念是一种虛构，“人类的全部历史”按照現代科学的理解則相应地是虛构的历史及其对人类的影响。②于是我們就开始不安起来。我們随后‘又知道’，他认为偶然事件和虛构是同一个东西。③最后他又提出了一种极其罕見的說法：“历史的虛构这个

① 科汉諾夫斯基：《时代的回声和現代历史規律的閃現》，华沙 1910 年波兰文版，第 50—51 頁。

② 同上，第 54 頁。

③ 同上，第 57 頁。

一切文化和文明的軸心由来已久，它是自从有了人类以来就已存在。应当承认这是人的人性与自己万能的兽性因素作斗争的表现和口号。”<sup>①</sup>

在这种令人叹为观止的“发现”以后，就可以随便捏造规律和把规律神秘化了。科汉诺夫斯基是从心理学的立场来进行捏造和神秘化的。

“如果人类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完善的话，那么只有心理学可以用来证明那些曾说过‘起初是一群动物’的研究家（如阿特京逊）的观点的正确性。而且看来，首先还是发展得更加完善的、更加深刻的、比目前与社会学更加密切联系的心理学的，将成为有可能发现‘支配人类的规律’的那门科学。”<sup>②</sup>

在这个基础上，科汉诺夫斯基发展了自己的，从原始“动物群”产生出来的，“低级”和“高级”类型的，“向心”发展与“离心”发展的“规律”。这一切都是不可思议的。为了说明问题，我们援引下面一段引文。科汉诺夫斯基认为，现在我们是处在“幻觉的时期”，“虚假的理想”时期，在发展方面，这是一个高级时期：

“但这是什么理想呢？这的确是‘动物群的理想！’——你会说……是的，因为我们大家还生活在动物群的时代……或许仅仅处在这个时代转折的边缘……

“曾经有一个时候，高级类型的理想只是在黑夜里才能在世界上浪游。因为只是不久以前，它们还披着斗篷在光天化日之下旋转……

“因为它们解放时期还没有来到……

“因为那个美满的、真诚的、天上的交响曲、自我颂赞的时代

---

① 科汉诺夫斯基：《时代的回声和现代历史规律的闪现》，华沙 1910 年波兰文版，第 57—58 页。

② 同上，第 97 页。

还没有来到……

“曾經是这样的，在上古时代人們坦率地受自‘我’的冲动而进行破坏……

“而現在人們自己已經能够自动地进行創造了。

“……将来則是这样，人在遙远的未来将会自动地去創造，而且只是去創造……

“通过量变，产生了这种神異的质”。<sup>①</sup>

上面这段引文，除了刪节号以外，与原文一字不差。或許讀者要問，这与科学有什么共同之点。当然沒有。大多数人可能表示惊讶，因为我們还有一些史学家真正相信，科汉諾夫斯基是在談某种历史規律。在他的保卫英雄主义的史学立場与这些发展“規律”的概念之間的确是并行不悖的。

#### 4. 作为思辨公式的規律

在下面我們將以庫尔特·布雷瑞<sup>②</sup>为例來說明主观唯心主义把規律神秘化的一种說法，这种說法的依据是，把臆造的、不符合历史經驗的公式认作是历史規律。我們当然并不以为，其他的神秘化，無論是客观唯心主义的，或者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神秘化就沒有思辨的性质了。自黑格尔起到拉姆普勒赫特止，所有的神秘化說法都具有思辨的性质。这里指的只是，布雷瑞沒有利用“客观精神”，“集合精神”，以及对历史的心理的或宗教的理解，而只是限于由幻想所制造出来的那个冒充历史的“天生的規律”的范围。

布雷瑞不仅坚持說他已經发现了規律，而且认为，这种发现

---

① 科汉諾夫斯基：《时代的回声和現代历史規律的閃現》，华沙 1910 年波兰文版，第 108—109 頁。

② 庫·布雷瑞：《世界历史的結構与規律》。



所依据的是經驗的資料，虽然这种資料还不够广泛：“……然而甚至确定最一般的輪廓，已經足以发现历史过程的某些規則，这些規則无疑只是暂时性的，可能还需要作一定的限制，或者甚至需要修正。可是至少这些規則还有如下的缺憾：它們沒有依据那种抽象的純概念的构造，这种构造类似黑格尔的規律，在很大程度上是思辨的結果；或者在对待历史现实方面它們也像保克耳的規律那样，沒有做到大致不差的和表面的理解，保克耳的規律部分地不能令人滿意也正是在这方面，因為它們具有概念的形式。”<sup>①</sup>

請看，这就是布雷瑞关于自己的“規律”的高見。我們不妨来看看这是些什么規律。他共有二十四条規律。我們不拟一一列举，只以其中能說明几种类型的若干条为例。例如，第一条說，从原始的混交关系中應該分辨出有由一个男子和一个或几个女子組成的家庭；不难看出，这第一条規律就是与科学資料相矛盾的。第二条規律談到在家庭的基础上产生比較广泛的血統关系的必然性。第三条談到，当这些血統关系获得一定的形式时，产生由这些关系結合成的国家的必然性；这条“規律”不仅证明了整个概念的思辨性，而且也证明了布雷瑞在社会发展的原則性問題上的任意制造。这样，我們就可依次了解其余的“規律”，在經濟，行政等方面社会“應該”按照这些“規律”发展。这都是一些形形色色完全出于幻想的毫无历史根据的观点；例如，第十一条就不顧邏輯和事实地說，在一个几乎沒有階級的社会里，强大的君主政体應該会产生貴族。

但布雷瑞並沒有停留在这二十四条規律上。他还根据这些規律推論出一些具有方法論性质的第二級規律。有两条这种“規

---

<sup>①</sup> 庫·布雷瑞：《世界历史的結構与規律》，德文版，第107頁。

律”具有完備的形式。這就是：社會所必經的“階段”順序發展的規律，以及“個人主義時期與集體主義時期”相互交替遞變的“規律”。布雷瑞沒有明確地說出其他的高級“規律”，只是提出了與它們有關的一系列假設和臆斷。

說明布雷瑞的觀點也就等於批判他的觀點；這裡我們碰到的是幻想與無知相結合的思辨體系。讓我們再一次引用貢普洛維奇的話作為證明：互相抨擊的資產階級科學的代表誰也不會指責對方的“資產階級党性”的。貢普洛維奇在說明布雷瑞的觀點時寫道：

“是否還需要陳述有關布雷瑞對於‘規律’的見解呢？如果史學真的只要通過‘發現’這些規律就會提高到‘科學’的水平的話，那麼，就最好把它留在‘藝術’的領域內。因為每一個史學家由於布雷瑞的‘規律’，都寧願作一個如詩人、畫家、雕刻家那樣的藝術家，而不願作一個‘科學的’研究者。我們只要補充一句：布雷瑞的這二十四條規律就好像是某種文化史或社會學史中的物品清單……”

“但布雷瑞向我們提出的‘物品清單’完全不是什麼規律，而是以社會發展為背景的在某些地方部分地得到檢驗的幻想。”<sup>①</sup>

顯然，布雷瑞的“歷史規律”概念，或說得更確切些，歷史規律的神秘化，不是別的，就是否認歷史發展的規律。

當然，這一類的思辨在波蘭史學著作中也不少。我們舉信仰主義者和天主教擁護者費利克斯·科涅奇納的觀點為例。他反對社會科學中因果原則的假設，否認歷史規律的客觀性。同時他還利用了“創造哲學”的陳腐論據，認為在承認因果聯繫的基礎上，新事物的起源是無法解釋的。

① 貢普洛維奇：《史學與社會學》，第 11 頁。

但是,这并不妨碍科涅奇納同时宣称“历史規律”的存在。历史发展似乎决定于“三規律”(家庭規律、财产規律、继承規律),以及决定于构成人类生存的梅花形(quincunx)范疇的五个精神的和物质的原則(善、真、健康、物质幸福、美)。社会发展的方向决定于三規律和存在范疇的方法。

方法中的协调性似乎是决定性的发展規律;

“从上述討論中可以得出一个結論:方法是統一的基础。

“如果发展需要这种协调性,那么,可比性和彻底性的协调性就只是一种方法;因此,只有在某种方法上反映出来的那种統一才是发展的。发展的程度决定于方法的正确性和准确性。”<sup>①</sup>

这种以“規律性”的言詞伪装起来的唯心主义的思辨导向何处呢?在这种思辨的基础上对天主教会的文明作用的“論证”回答了这个问题。<sup>②</sup>

科涅奇納的例子特別明显地說明了以否认历史規律客观性为表現的对历史規律的神秘化,同时也說明了这种否认的政治意义。

\* \* \*

我們已經以某些著作为例,說明了客观唯心主义把历史規律神秘化的内容是什么。从这些討論中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这里所談的实际上是关于反对历史发展規律的理論概念的斗争,是关于对历史发展規律的否认。如果到意識、个人心理或个人心理的形成中去找寻历史“規律”的話,那么,实际上就是把問題本末倒置,就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場来否认,就是否认历史規律的客观性。历史唯物主义始終不渝地站在承认发展規律的客观性的立場上,并在它所作出的規律中真实地反映客观现实的

① 費·科涅奇納:《波兰之道和倫理》,德文版,第14—18頁。

② 費·科涅奇納:《論多种文明》,波兰文版,第152頁。

运动；对于这种理論說来，在人們头脑中产生的观点的改变，人們意識的改变，就是客观規律性的反映。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排斥主观主义的思辨，排斥“創造”发展規律的概念。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这本书的矛头就是指向这个概念的。斯大林指出，規律是既不能創造，又不能廢除，也不能改造的；只能認識規律并运用它来为社会利益服务。誰反对这一点，反对規律的客观性，以唯心主义的精神使規律神秘化，誰就实际上反对規律，否认規律。由此可见，主观唯心主义的把規律神秘化，也像客观唯心主义的神秘化一样，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个別論的补充，在反对馬克思主义思想斗爭中实际上起着相同的作用。唯心主义把发展規律神秘化的实质就在于此；为了正确地評價这种神秘化的各个变种以及它們所代表的各种学說，意識到这一点是必要的。

### 第三节 历史規律的神秘化和史学实践中的公式主义与社会学观

#### 1

从否认历史客观規律的两大流派——直接否认和神秘化——中滋长了对史学的两种实际的危險性：个别論与公式主义，后者也叫做“庸俗的社会学观”。这两种危險性往往結合在一起，并相互补充。根据个别論的要求从事于罗列事实的史学家們，往往以把規律神秘化来补充自己的方法論观点，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历史公式主义的泥坑；例如迈耶和华列克·契尔涅茨基很明显地就是这样做的；他們以个别論为根据，按照循环学說的公式，来进行不正确的历史类比。虽然这两种危險是一起出

現的，但我們要分別加以分析。关于个别論对史学实践的有害影响，在前面我們已經說过；現在我們想簡短地說明問題的另一方面，即以公式主义形式出現的把历史規律神秘化的有害影响。

在我們史学家中間，愈来愈頻繁地发出了謹防社会学化的呼声，认为这是威胁我們史学的主要危險。在一定的場合，这甚至引起了对个别論的危險性的不正确的忽視。但在原則上这是一种正确的信号，它所依据的是对实践中出現的在改正公式主义、社会学化方面的某种曲解的观察。在我們的条件下，这种曲解多半由于史学家們沒有充分掌握馬克思主义的方法論，而是錯誤地、公式主义地理解它的原則。恩格斯曾警告要防止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变成使历史事实屈从于它的公式。苏联历史科学的經驗，对于把历史科学推到庸俗社会学观点方面去的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的这种曲解的批判，在我們与同样的錯誤所作的斗争中武装了我們，向我們指出了这种巨大的危險的现实性。但如果我們把史学中的社会学化、公式主义与馬克思主义方法論的錯誤应用等同起来，那就不对了。公式主义——这是相当大的危險性，它的威胁是在一切錯誤地理解历史規律的情况下产生的。

在这以前，我們已經談过以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两种形式出現的对規律的神秘化。同时我們有意沒有涉及把社会发展規律神秘化，并以庸俗化的唯物主义概念为依据的那一整个流派；地理学說，人口統計学說，人类学說以及所謂經濟唯物主义都屬於这一流派。既然我們是举例来批判资产阶级的观点，那么我們沒有单独地分析上述的每一个学說，这首先是因为所有这些学說都是以一定的方式与唯心主义的神秘化有着联系。我們一面尖銳地譴責历史中的社会学化及公式主义，它們所表現的錯誤傾向就是以忽視事实及其具体历史屬性（反历史

主义)的各种公式,来代替真正生动的具体历史;但同时也应当謹防另一种危险性,即低估理論特别是社会学理論对史学实践的意义。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学,正如有各种各样的哲学一样。有这样一种资产阶级社会学,史学中的社会学化的毛病与它有着最紧密的联系。因为,正是在这种以“形式主义”、“典型主义”、“心理学”的傾向为表现的资产阶级社会学里,明显地出现了反历史主义,在我国,甚至在战后出版的某些社会学著作中还常常可碰到它。但是也存在着科学的社会学,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即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与史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不等于就是史学。在本书第三編里我們还要回到这个論題上来;我們这里只是防止在我們的专门著作中有时可能出现的錯誤,不要把对庸俗化的社会学化的正确批判变成某种对想把社会发展学說与历史科学区别开来的企图的敌視。

\* \* \*

如果我們提出一种公式,例如历史的誕生—发展—衰落的循环周期来代替具体的历史分析,以事实来迁就死板的公式,那么,不言而喻,結果除了公式主义和对待現象的反历史的态度以外,我們不能得到任何別的东西。这种“科学”一定不是別的,而只是一种伪造,因为它的依据是,使选择事实迁就公式,同时并歪曲那些专门挑选出来的事实;这种“科学”无法在历史上为这些事实找到适当的地位,因而也无法解釋它們。阿尔諾德-湯因比的史学活动就是这类曲解的例证。我們举湯因比著作中明确地提出的所謂内部无产阶级的問題为例。

湯因比所站的是經過修改过的英雄主义概念的立場;即少数統治者,也就是統治階級在創造历史。下面这一事实应当证明統治階級的意义;从作者所分析的二十种文明中,在十五种場

合統治階級建立了統一的国家。如果現在我們想确定他从几千年历史中举出的許多例子的实质是什么,那么可以看出,他只不过是肯定統治階級在每一个階級社会中的存在。

但湯因比对无产階級的問題特別感到兴趣,他把无产階級分为內部的和外部的两种。他不止一次地在运用某些現代術語时,使它們具有某种特殊的、不同于一般公认的意义。归根到底,他改变这些術語的涵义是有其政治方向的,是为一定的目的服务的。所謂內部无产階級就是这样的情况,按照他的意見,在各个不同的时代,在世界上各个不同的地区,在各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我們都会碰到內部无产階級。按照他的意見,內部无产階級过去在希腊、巴比倫、波斯都存在过,現在也存在于“西方文明”中。按照他的意見,这个无产階級究竟是什么呢?

关于这一点他写道:“……因为‘无产状况’是一种感情状态而不是一种实际上的物质处境。當我們第一次使用‘无产者’这个名詞的时候,为了我們的目的,我們曾把它的定义說成是在一个社会历史的某一个阶段里的一个社会成分或社会集体,‘在’社会中而又不‘屬於’社会;这个定义包括被放逐了的斯巴达人克里尔刻斯以及小居魯士的希腊雇佣兵里的貴族出身的队长們,色諾芬已經替我們描写过了他們祖先的面貌,还包括在托勒密或馬魯斯之类人的旗帜下招募起来的出身于最下等的失业工人队伍中的雇佣兵。无产者的真正标志既不是貧穷也不是下等出身,而是一种心理上的自觉状态——还有由这种自觉状态所刺激出来的仇恨心里——认为是从他的社会上的世襲地位中被排挤出来了。”<sup>①</sup>我們来研究一下湯因比所制造的这个定义。第一,他在这里公开地捏造现实,企图把无产階級从一个其存在与生

---

① 湯因比:《历史研究》,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70頁。

产资料私有制与人剥削人制度联系着的社会阶级，变为一个“有不满情绪的”人们的“心理”集团。第二，他想把无产阶级描写为一个虽然处在这个社会里，但却不属于社会的集团。这又是公开地捏造事实，它完全不符合自古迄今的一切历史事实。这个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湯因比显然在这里玩假牌。在现代阶级斗争的背景下这种玩假牌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正是这个斗争的目的决定了湯因比学说的一条根本原理：这样理解的内部无产阶级是一种出现在所有社会和所有文明中的经常现象。因此，这是一种历史规律性。他根据赫梯人，马依人，印加人，日本人，印度人，中国人等等的生活中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于是他就完全暴露了自己对群众的憎恨和蔑视，把群众看作是社会中的异体。下面一段引文可以说明这一点：

“赫梯社会是许多解体的社会之一，它在解体的过程还没有走完的时候就被一家邻居吞噬了。因此，它的内部无产者以冷淡的甚至是得意的心情对待它的少数统治者的命运乃是一种很自然的事。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在西班牙的军人们突然入侵时，安地斯统一国家的内部无产者所采取的行为。那些特权贵族也许是在任何一个解体社会中所出现的最为仁慈的少数统治者，但是到了他们要经受考验的日子里，他们的仁慈对于他们可说是毫无用处。他们的经受过悉心照顾的人的牧群以他们过去接受印卡秩序的同样毫无表现的顺从接受了西班牙人的征服。”<sup>①</sup>

在这段引文的每一字中都透露出对群众，对“人群”的鄙视。同时，从这番话中还可以得出这样一种道德标准：不应当作一个好心肠的“人群”的牧人，因为这是没有好处的。我们了解，这些

---

<sup>①</sup> 湯因比：《历史研究》，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76页。



結論的矛頭是間接地指向現代無產階級，現代階級鬥爭的，其政治意義是非常明顯的。

湯因比是怎樣理解現代“西方”無產階級的問題的呢？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原來只是受“西方”奴役的殖民地國家的人民，以及在道德上異己的“背離親人的”分子。（湯因比提到資本主義，他所說的一切與他捏造的無產階級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的全部概念是一致的。）他不承認在西方國家中存在着自己的無產階級。但他却認為西方無產階級的同盟者是知識分子。我們已經知道，知識分子“是一些背離親人的人”，不過只是在精神上，而不是在肉體上。正是這個起着“變壓器”作用的階級，應該使生活適合於別人的環境。知識分子由此成了與兩種社會都是格格不入的。這樣，它便成了社會中的“異體”，從而也是無產階級的組成部分：

“因此這些知識分子如果按照我們所下的內部無產者的定義來說，乃是雙重的，他們不但是‘在’而‘不屬於’一個社會，而且還‘在’而‘不屬於’兩個社會。”<sup>①</sup>

湯因比憎恨知識分子如像他憎恨無產階級一樣。因此，他硬說，知識分子“是受到自己的人民的憎恨和鄙視的”，<sup>②</sup>知識分子是“早產的胎兒”等等。仿佛知識分子只出現在兩種文明相遇的地方，其中之一吞噬了另一種，同時形成了內部無產階級。湯因比寫道：“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是天生不幸的”。<sup>③</sup>下面我們還要再討論這些很明顯的歷史捏造的方法論前提。這裡我們只指出這種捏造的政治意義，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憎恨，特別是被奴役的國家中與無產階級並肩前進的知識分子的憎恨。因此，他

① 湯因比：《歷史研究》，中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92頁。

② 同上，第191頁。

③ 同上。

希望破坏知識分子的威信。他在这里談到(反动的說明)关于存在于現代階級社会中的“两种人民”的观念。

我們还看到湯因比是怎样解釋現代无产階級的出現及其意識形态的。

湯因比在书中解釋說，所謂中国的內部无产階級是怎样由于改造佛教哲学而形成自己的宗教——大乘教派。現在我們知道，有另一种来源的西方无产階級，通过完全改造馬克思主义而建立自己的宗教；按照湯因比的意見，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主义的变种：

“在我們企图在西方內部无产者的經驗里寻觅一个新宗教的同时，我們应当提到古代中国內部无产者所建立的大乘佛教，这个宗教和它的前身，佛教哲学，可以說是变得大不相同了。在我們西方的近代哲学里也有一个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恶名的事例。这个哲学在一代之久就变成一个无法辨認的无产者的宗教，以暴力的手段在俄罗斯的平原上建起它的新的耶路撒冷。”<sup>①</sup>

湯因比认为，馬克思是黑格尔的学生，基督教和犹太教影响了这个学生。

在对馬克思主义的起源和本质作了如此“明白”的解釋以后，湯因比就轉向托洛茨基主义的武庫以破坏馬克思主义的威信，把它作为“民族主义的純地方性的变种”；这个变种在向“右”边走的时候，半路上碰到了向“左”走的法西斯主义的以及一般的資本主义国家。

这些結論的政治意义非常明显，即企图利用法西斯主义思想武庫所固有的那种最荒誕不經的謊言和伪造来破坏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理論的威信。

---

① 湯因比：《历史研究》，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197 頁。

湯因比以預言來結束自己的結論。雖然內部無產階級在所有文明中是文明解體的因素（這是湯因比所捏造的規律之一），但在西方文明的情況下，可能不是這樣，因為“基督教的病毒或是仙丹已經進入我們西方人的血液”。<sup>①</sup> 只有宗教復興才能挽救西方文明，只有教會伸出手來，才能使它免于衰落。到那時候，“一個背叛了宗教信仰的西方基督教社會終於獲得了上帝的恩典，以一個基督教共和國的身分獲得新生，這本來是它原來的應該努力爭取的理想。”<sup>②</sup> 湯因比制訂了這樣一條歷史規律：在所有的社會都會有少數統治者和內部無產階級。如果暫時不問湯因比分析中的錯誤，而合理地解釋他的術語，那就可以說，他是肯定在對抗性的社會中存在着各個階級；當然，這不是什麼新的東西，而是馬克思主義早已弄清楚了。這些觀點儘管外貌相像，但它們之間毫無真正相似之處。

歷史唯物主義在分析歷史資料及總結其結果的基礎上制定了這一論題：即在對抗性的社會中存在着各個階級，階級鬥爭是這個社會發展的動力。這是一條普遍的、抽象的原理，是歷史發展的一般理論的組成部分。但在形成階級鬥爭這個一般的历史規律的同時，馬克思主義又宣布在方法論上要求真理的具體性，這就是要求在應用每一條原理、每一條規律的時候，必須考慮地點和時間的具體條件。因此，在承認每一個對抗性社會中存在着各個階級的同時，馬克思主義還看到這些階級特點，並要求史學家研究這種特點。因此，社會經濟形態的理論（也包括階級鬥爭的理論）是史學家手中真正的寶貴的方法論工具。歷史唯物主義是與一切公式主義，反歷史的社會學化相對立的，因此它才能成為認識和改造社會的真正的工具。

① 湯因比：《歷史研究》，中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99頁。

② 同上，第202頁。

湯因比恰恰与此相反。他使用的是“类比法”和抽象法。但这是一种錯誤的非科学的抽象法，因而就得出了腐烂的果实。内部无产者既存在于亚述国，也存在于現代的英国，既存在印加人的国家，也存在于現代的美国。湯因比得出結論說，因此之故，所有社会中的内部无产階級都是同样的，都具有同样的本质、同样的意图。这种結論是从何而来的呢？他扔掉了历史主义的公設，即真理的具体性的公設，把分析仅仅归結为人与人之間的关系的外部形式。这是馮·維澤的形式主义学派的最典型的社会学化。正是这一学派有计划地把自己的兴趣局限于一般的形式，如合作关系，或剝削关系等等，而摒棄对具体性的内容作任何研究。因此这一学派的研究就丧失了对历史科学來說的一切意义和价值，把这种歪曲了的社会学与历史对立了起来。湯因比在把他的“規律”应用于历史研究的时候，所依据的是最恶劣的社会学观点的形式。这种反历史主义的、在亚述与現代英国，巴比倫与現代美国的社会关系之間划一个等号的結果，不能不是十足的胡說八道。对历史研究說来，社会学化是一种完全沒有益处的、捏造和歪曲研究結果的工具。正因为如此，湯因比受階級斗争利益的驅使才采用了这种工具。

湯因比一本正經地捧出了这些胡說八道的东西，因为他企图使人們相信，这是“研究”的結果！我們从他那里知道，現代无产階級——这就是資本主义硬把它作为外部无产階級拖上自己的軌道的附屬国和殖民地的人民。在任何一个史学家看来，这是非常明显的历史捏造，其目的是为了掩盖每一个資产階級国家內存在着自己的无产階級和階級斗争的事实，是为了把无产階級看成是社会的“異体”，看成是社会和文明解体的因素。我們还从他那里知道，知識分子按其出身來說是屬於国家内部的，而按其职能來說，則是受外来影响的“变压器”，因而是民族的“異

体”，是受到本国人民憎恨和受到“高等”人民鄙視的“早产的胎儿”，仿佛“高等”人民的影响是知識分子轉让給它的。对任何一个史学家來說，这是一种显而易見的伪造，其目的是为了污辱革命无产阶级的意識形态。

这是不是偶然的“錯誤”呢？

显然不是的。这是应用一种与历史研究的实质相違背的研究方法的結果。这种反历史主义的方法的应用也不是偶然的，这是湯因比的階級立場所决定的；作为帝国主义的辯护士，他憎恨无产階級及其意識形态。最可以暴露湯因比的目的的，是他号召垂死的資本主义世界不要去追求“对物质的自然界的表面胜利”，而要在“教堂的怀抱中”去找寻拯救。

湯因比的方法是社会学化的一个极端的例子。除了歪曲历史真相以外，这种方法还能給史学家什么別的东西呢？对于还没有那么深刻地受到憎恨革命的工人运动的毒素，为了基督共和国就可以牺牲历史真相的每一个史学家來說，这种危險性应该是防止社会学化和公式主义的有力警告。

## 2

在波兰的历史著作中也出現了社会学化和公式主义的危險。

首先是在我們碰到把历史規律神秘化的場合出現了对待历史現象的公式主义的、反历史态度的危險。我們的历史著作中可以作为典型例子的是霍洛涅夫斯基的《波兰史精神》一书；在这部书里作者以死板的思辨公式代替了历史过程的生动的內容，并曲解和捏造历史进程。

但在以个别論为依据的那些著作中也出現了这种危險。我們还记得濫用历史类比的华列克·契尔涅茨基，因为他坚信，历

史事件的过程絕對准确地重复着，而不决定于具体的社会历史形态。实际上，这是类似湯因比的方法的社会学化，因为它的論点的基础是同一类型的反历史主义的理解。

在克拉科夫学派的著作中也出現这种危險。这个学派濫用历史作为生活的教师(*magistrae vitae*)的职能这个概念，力图使历史成为反动政策的工具，机械地不考虑历史条件就把对过去事件的分析中得出的結論生搬硬套到現代，并且反过来，从对現代事件的分析中得出的結論用于过去。因此，有些人弄錯了，他們以为只有在脱离历史事实的活的材料，不顾这个时期和这些事件的特征，机械地采用社会經濟形态的公式来代替具体历史分析的場合，才会出現社会学化和公式主义的危險。另外一些人摒棄社会經濟形态的概念，以事件的表面类似作为自己的构造的依据，实际上沒有看到事件的历史具体性，从而也沒有看到事件的特殊性，他們同样是錯誤的。虽然公式主义和庸俗化社会学观点的代表在上述两种情况下的出发点不同，但他們却得出同样錯誤的結論，因为他們的学說的根据都是其固有的同样毛病——反历史主义。

正因为如此，所以虽然看起来好像似是而非，但反历史主义和社会学化却往往与那些反对社会学和輕視理論的“純粹的”史学家，与那些宣揚“大无畏的”和“純記載的”历史原則的史学家的活动糾纏在一起。因为史学家既然在这里套用恩格斯关于自然科学家的著名言論，就不能为所欲为地輕視哲学，遭到陷入时髦的，最坏的哲学——唯心主义哲学的危險的威胁。

自然不能由此而得出結論說，凡重視理論和方法論的意义的人，都会自然而然地避免遭受这种威胁。我們从經驗中知道，甚至对于那些在原則上已經轉到馬克思主义立場的理論家，也决不能这样說。但对于那些有意識地站在資產階級哲学的立場

的理論家，我們能說什么呢？如我們从汉德尔斯曼的例子可以看到，他們将成为史学中唯心主义方法論的有意識的傳播者，或者想从科学上找寻徒劳无益的出路，成为自己的理論观点的奴隶。

这种情况的典型例子是布雅克；由于他概念中的社会学观点和公式主义，我們要在这里分析一下他的观点。

法兰杰塞克·布雅克在1923年写了一本論历史綜合法的著作，在书中批判了个别論。但这并不意味着像我們乍一看来的那样，证明他站在承认历史規律的立場上。在他的著作中（特别是法文著作中）的一个叫做“历史綜合法”的著名观点，再一次证明，資产階級科学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

布雅克自己承认，他的观点是历史綜合法学派的观点。<sup>①</sup>他說，他的观点与拉貢勃的观点，以及嘗試編輯关于历史的一般概念的“問題博覽”的謝尼奧博斯的观点有着血統关系。我們还要补充說明，《历史綜合法評論》的創辦人安利·培尔也曾提出这些观点。他們組成了社会发展規律神秘化的流派之一。

按照布雅克的意見，科学研究的基本标志，在于从一些简单的概念开始，經過一些复杂的概念，轉到重新創造整个事物的进化。他认为，史学应当研究同类事实并以此区别于其他科学的这一論点是錯誤的。在批評李凱尔特的時候，他指出，被研究的現象的一次性这个論題也完全能屬於自然科学。在一定的意义上所有的自然科学都是历史科学。在历史現象中與我們注意到意識性这一事实也不起重大的作用，因为历史过程可以从其不以人們自己提出的目的为轉移的进程的观点来研究。

从这些議論中布雅克得出了下面的結論：

“……为了使历史能对生活作出指示（这是一切科学，也是

---

① 法·布雅克：《历史綜合法問題》，第1—2頁。

历史的意义和目的)，它应当无条件地与其他科学相同，也就是应当从事于把现象进行分类及揭露它们出现和经过的规律性。”<sup>①</sup>

看来，我们在这里碰到了一种很有趣的情况，即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理解史学的科学性。但我们听一听他接下去说些什么，就可以看出，他们和我们之间是没有共同语言的。

布雅克强调指出：像地理学或生物学这些科学，尽管其研究的事实具有个别性，并不仅仅限于记载这些事实，而且还要弄清楚支配它们的规律性；与此同时他也向史学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但是是以下面的方式来论证这些要求的：

“由此而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历史说明它所研究的现象，而不对这些现象加以类比和总结。要知道，史学家也不能反对：历史现象就是从心理中产生出来的人们共处和相互作用的現象；这种心理在原则上是相同的，因为所有的人的思维、感觉和活动在原则上是相同的，好像形成起来同一的生物外貌。”<sup>②</sup>

因此，我们就处在心理学的基础上了，而历史过程也被确定为理想的过程。由此又得出了进一步的结论：

“为了整个地区的目的，应该限于利用个人心理学来确定因果联系，不是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而是着重回答怎样、在什么条件下、在哪些因素参与下产生了这些事实的问题。

“这种立场比较稳重，但在历史和哲学方面比较有根据，因为确定真正的、比较深刻的原因是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这个任务往往被随心所欲地解决，或根本没有解决。即使不提认识论方面的一切原则性的疑问，在个人心理学的基础上来解释的因果

① 布雅克：《历史综合法问题》，第 12 页。

② 同上，第 17 页。



性，对史学来说也是一条死胡同。”<sup>①</sup>

布雅克的进一步的结论是，应该编一部明确的历史概念辞典，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种科学，这种科学将成为“人类社会的生物学，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将成为从历史观点来看是有组织的社会学。”<sup>②</sup>

在类似的情况下，有一句俄罗斯谚语：“先说好的，后说坏的”。布雅克先是批评个别论和研究社会发展规律性的科学的史学这个公设，然而最后却是唯心主义地歪曲历史过程，把它看成是心理的过程，否认历史中的因果性，而制定个别论的公设，即不须研究原因（为什么？），而只要记载原因（怎么样？）。而且，他把这个要求制订成一个理论上软弱无力的论题，连他自己也感到有证实之必要。编写一部概念辞典一直到研究具体资料的要求，就是承袭最坏的，有思辨性的传统。像布雅克所要求的这种编概念辞典的尝试是完全没有益处的。1885年安里·德-图尔维尔曾经编了一部，约有三百个名词的社会事物名称词典；后来以艾德蒙·德莫林为首的一个研究小组在《社会科学》杂志上继续了他的工作；谢尼奥博斯也作过同样的尝试。不难逆料，这些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可见布雅克的构想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只不过是想在理论上论证史学中社会学观的又一次尝试而已。

于是又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布雅克表现得这样不坚定？为什么他半途而废？在读到他的著作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印象，即作者看到了某种前景，自己被它吓倒了，因而放棄了所采取的观点。这里指的是一种在科学和政治方面无疑是十分复杂的现象。

这种现象证明，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可

---

① 布雅克：《历史综合法问题》，第17页。

② 同上，第21页。

能解决史学的科学性問題，因为还很少看到科学及科学状况中的缺点，还必须去找寻积极的解决。由于布雅克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局限性，所以他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他轉到了“历史綜合合法”的立場，这种方法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把他引导到神秘化，而不是去解决問題。这是那些沒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武装自己的人們，在对待史学及其方法論的問題时所不能避免的命运；这些人由于階級和政治的理由而扔掉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布雅克还效法卡克梅日·台曼涅茨基<sup>①</sup>。台曼涅茨基虽然正确地批判了李凱尔特的个别論，并指出作为一系列不重复的現象的历史概念是經不住考驗的，但他却沒有把这种观点貫徹到底。結果，他作出了这样錯誤的理論：重复現象属于历史的静止的一面，而与个别的、不重复的現象联系着的現象，則形成历史的运动的一面。在研究事件方面作者是否承认規律，这一点仍然不大明确，正如他的整个概念不大明确一样，这个概念的积极一面导向反对李凱尔特的理論。台曼涅茨基的概念的消极一面是他明显地崇拜社会学观点；不仅在作者的理論观点中，而且在他的历史著作中，我們都可以找到这种社会学观点的影响。

史学中社会学观点和公式主义的另一类例子是一些只涉及德国内部关系的历史問題的著作。我們可以举約瑟夫·費尔特曼的著作來說明。<sup>②</sup>

費尔特曼在其著作中試圖总结十个世紀的长时期中波德两个民族之間的关系。因此，他最后得出的思想和他在整个討論过程中的指导思想非常簡單，即在波德两国关系之間存在着—

① 参閱台曼涅茨基：《古代波兰的領土》，波茲南波兰文版，第2—4頁，以及他在波兰史学家第一次方法論會議上的講話。

② 費尔特曼：《历史上的波德問題》，卡托維茲1946年波兰文版。

种承續性，它反映着两个民族的“精神”中的差别。这种僵死的思想意識的公式使詳細研究成为不可能，使这部书丧失了科学价值。費尔特曼写道：“無論在战时或是在和平时期，在一千年的波德关系中，两国的活动方法及共同生活的一般概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在尽可能簡短地闡明这个問題的时候，可以說，在波兰方面通常是溫和而友好的手段占优势，而暴力和背信棄义則是德国的最后論据。”①

“在著名的赫龙宴会上杀害了几个邀請来的斯拉夫亲王；波列斯拉夫一世（猛王）到梅尔謝堡訪問亨利皇帝，由于德国强盜的进攻，这次訪問几乎以波兰国王的死亡而告終；1308年在圣多米尼克的紀念日，革旦斯克的斯拉夫居民被屠杀；从以上这些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希特勒德国大規模地屠杀波兰居民，在这整个一千年的长时期間发生了一連串的现象，证明在波德关系之間存在着把它們的不同部分統一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承續性因素。”②

同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最主要的是，这部书的内容只說明一个基本論題。其結果怎样呢？是完全歪曲了现实的真面貌。費尔特曼沒有看到在一千年的长时期間中各个社会形态的区别；沒有看到德国和波兰的階級斗争；沒有看到“另一个德国”，这个德国在十九世紀曾以著名的波兰歌曲欢迎起义失敗后退到西方的波兰起义者，这个德国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中曾始終不渝地为波兰的独立而进行斗争。所有这些費尔特曼都沒有看到，因为他以关于两个民族的“精神”僵死公式来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結果他是根据資產階級民族主义的精神捏造历史。

① 費尔特曼：《历史上的波德問題》，第20頁。

② 同上，第22頁。

这是史学中典型的公式主义、典型的反历史主义、典型的社会学观点。

历史科学中的公式主义、偏爱公式以及社会学化，必然导向歪曲历史研究的性质，必然导向捏造客观历史过程；这种捏造是受反动阶级利益驱使的。公式主义和社会学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的表现；不管其外表形式如何，总是基于否认历史客观规律的存在。在我们史学中尤其有必要与之进行斗争。



## 第三編

# 从历史客观規律理論中得出的 几点方法論上的結論

---

## 第六章

### 从社会发展客观規律的理論来看 历史中的个别对一般的关系

阿納托尔·法兰斯在《企鵝島》的序言中，以他所特有的諷刺筆調描述了一位企鵝史學家獵奇的故事。這位史學家在同考古學家和古生物學家談判失敗之後，便去向道德科學院院士求教。因為這兩位學者認為自己的任務只是出版原始文件，並以懷疑的態度來對待他寫歷史的願望。而道德科學院院士也教導他說，歷史不是創作的，只是重述眾所周知的事實，必須避免獨出心裁的意圖，應當強調自己對統治階級機構的尊重。我們這位史學家為了想對企鵝藝術史問題征詢意見，就去拜訪敬愛的學者富爾耿采·塔比爾。塔比爾掌握有企鵝的全部資料，已按字母次序分類裝在卡片箱抽斗里，抽斗里裝滿了無數卡片。當這位客人想利用這些卡片來作為自己寫作的資料時，卻發生了災難……

“……我還沒來得及打開這要命的抽斗，那淡藍色的卡片就已從里面掙脫出來，滑過我的指縫，像暴雨一般地向下傾瀉。旁

边的一些抽斗由于同情这只抽斗，也几乎同时都自己打了开来，从其中像河流奔腾似地倾泻出无数玫瑰色的、绿色的和白色的卡片；各色卡片从所有抽斗挨次倾泻出来时，像四月山溪一样发出淙淙的声响。一会儿，地板上已盖满了密密层层纸片。这些卡片从取之不尽的仓库中像澎湃的怒潮似地向外奔流，每一瞬间都在加速湍急的流速。富尔耿采·塔比尔被卡片淹没到膝盖，全神注视着洪水泛滥。他懂得泛滥的原因，吓得面色惨白。

“他高声喊道：‘多么妙呀！’

我一面喊他，一面弯下身去想帮他爬上已被卡片的暴风雨冲弯了的梯子。可是已经太晚了。他惊慌失措，现出一副可怜相，丝绒帽和金丝边眼镜也失落了，徒然地在他那双短小的手臂在与那淹没到他胸口的洪流搏斗。突然袭来了一阵可怕的卡片风暴，把他卷入巨大的漩涡。一瞬间，我从漩涡中还看见这位学者的光秃的头顶和那双肥胖的小手，接着，这深渊便合拢起来，泛滥的洪水静止不动了。我深恐自己同梯子一起被吞没，就从最高一个窗口上跳了出来”<sup>①</sup>。

阿纳托尔·法兰斯，在这段讽刺性的引文中能够用富有诗意的形象指出史学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历史科学中个别事实的问题。吞没敬爱的富尔耿采·塔比尔的洪水，是记载式的个别论史学代表们所无力对付的个别事实的洪流。我们的史学家是从窗子的最高窗口上脱险的。不过，如果史学要成其为科学，则这个问题对史学来讲仍然是个问题。

资产阶级史学中关于个别对一般的关系问题已经经过种种曲折坎坷不平的漫长过程，而这种漫长过程使我们相信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容易的事。个别论就在这个问题上被难住了，因为

---

<sup>①</sup> 阿·法兰斯：《企鵝島》，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34年俄文版，第12頁。

个别論把个别絕對化，把个别从更广泛的客观联系中抽出来，当作是一时的和不重复的事件看待，这个問題也是唯心主义把发展規律神秘化的基础，因为唯心主义的神秘化或者把个人意識提高为絕對（客观唯心主义），或者把个人的意識变为现实的直接創造者（主观唯心主义），从而重新又面对个别对一般的关系問題，即面对根据唯心主义方法論所不能解決的問題。

我們在批判資產階級史学否定发展規律时，已經碰到了这个問題。由于这种批判，特别是由于批判个别論的观点，我們也发表好些涉及上述問題的积极的意見。这些意見是为了更加看清楚結論的消极一面所必須的，然而这些意見还具有表面的、而且实质上又是局部的意义。現在我們在这里重新回到这些問題，实际上是在繼續討論那由于批判資產階級学說而中断的、馬克思主义在史学領域中所完成的变革問題。否則，这些討論就不够充分，因為我們在指出馬克思主义揭示历史客观規律对史学变成科学的意义时，則应当同时指出馬克思主义是怎样解决个别和个别对一般关系的問題的，特别是馬克思主义怎样看待个人的，尤其是偉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問題的，以及个人对群众的关系問題。个别对一般的关系問題只有根据馬克思主义方法論，只有根据馬克思主义的客观发展規律的概念，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

这一問題包括許多方面，我們只选出其中三个方面，而且只根据严格确定的一个观点来加以討論。因此，我們在对这个問題作了一般理論上的探討之后，将要談到下列一些問題：如史学对社会学的关系問題；历史上个人同群众的关系問題；我們也要研究馬克思主义解决这些問題所得出的若干結論，因为这些結論与史学家的創作有关。

\*     \*     \*

只要瞧一下社会生活，我們首先就会发现无数与某些人們



现实生活有关的个别事件。例如在矿井或工厂里做工的合理化工作者，拟定了一个预计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新方案；柯列索夫由于采用新的切削工具把金属的切削速度加快了許多倍；諸如此类。如苏維埃爱国志士馬特洛索夫用他自己的身体堵住敌人机枪口，为他的部队打开了道路。又如聶維尔里写作了一本《紙浆工厂日記》；“烏尔苏斯”工厂全体工人提前完成生产計劃等等。成千成万、成百万、成亿万の个别事实、个别事件。既有偉大的事件，即能震撼社会生活，并往往为社会鋪平道路，永远载入史册的偉大事件；也有細小的平凡事件，即不見經傳的，但对別人說来还是有意义的事件。譬如揚爱上了瑪丽亚；保罗家里生了儿子；斯塔尼斯拉夫当了司机，斯梯芬完成了月度生产計劃的349%，等等事实。这些事件中的每一件事，这些事实中的每一个事实，都是个别的、亦即具体的事实，它們只涉及这些人而不涉及其他人，就在这里发生而不在什么地方发生，正在这时候而不在别的时候发生，正就在这些条件下而不在其他条件下发生。就某种意义來說，每一件这类事件都是一次性的、不重复的。例如这片橡树叶子，照它的具体性讲在自然界中再也会有复生的同一树叶，正是就这种意义來說，它是不重复的，是一次性。

史学家正是这样把社会事件看作是个別的和具体的。古代的記事者都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观察社会事件，他們用楔形文字或象形文字把打胜仗的消息、亚述或埃及君主死亡的消息永久流傳下来。現代的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科学为基础，本着对社会发展規律的了解，在对事件进行分析，例如对十月革命时期俄国的階級斗争进行分析时做到这一点。这其間的差別——而且是巨大的差別——就在于后者了解到社会事件的联系和制約性，揭示它們的規律性；这就是史学发展的科学前阶段和科学阶

段的差別。不过，上述两种情形所談到的事实，都是个别的又是具体的，而就其具体性來說又是不重复的。

馬拉松战役与同时代其他战役有許多共同点，有許多足以引起这些战役的共同的經濟和社会因素，許多共同的因素。但是該一具体战役正就是这一个而不是別一个战役，因此，就其具体性来讲是不重复的。史学家也不是一般地研究古代战役，而是研究具体的战役，并在这个基础上来叙述他的一般論断。

希罗陀特是这样来写馬拉松战役的，他在写其他战役时沒重述过这些字句：

“馬拉松的战役的时期持續得很久。蛮族人突破了波斯人和薩基人所防守的雅典战綫的中部。他們在这里击潰了守軍取得了胜利，把雅典人一直赶到大陆的內地；但是两翼的胜利还是屬於雅典人和普拉底人。胜利后的两翼軍队沒有追击潰逃的敌军，而是把自己的队伍合围起来，同突破他們中部战綫的蛮族人作战，雅典人在这里获得了胜利。他們追击和杀戮潰逃的波斯人，一直追到海岸边；到海岸边以后他們又用火攻，并且夺取船只”。<sup>①</sup>

由此可見，历史事实千千万万，它們个别存在同时又是彼此交替的；具体的事实，就其具体性而言又是不重复的事实；史学家应当从其中选择事实，因为事实的数量是无穷无尽的，誰也不能完成这种数不胜数无穷无尽的計数奇迹。但是怎样，根据什么，用什么标准，可能而且应当去作好这种选择呢？这就是对史学具有根本意义的問題，而史学的科学性也取决于这一問題是怎样解决的。可是这一問題的解决又取决于史学中个别和一般相互关系問題的相应解决，取决于对个别的作用和意义的相应

---

<sup>①</sup> 希罗陀特，《历史》第2卷，1886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15頁。

評價和理解。

社会生活的发展乃是历史研究的对象，而断定社会生活是由个别事件构成这样一种事实是平凡无奇的。但是这种判断需要进一步的具体化，需要解释这一具有一般性质的评价。这种判断究竟会变为真理或者谎言就要看它的进一步具体化。甚至就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这一简单事实也足以表明这一点：一方面是唯心主义方法论拥护者的观点，他们主张把科学划分为规律科学和个别科学；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观点，他们维护史学的科学性。而这两派都同意社会生活是由个别和具体事件所构成的，不过从这同一的论断中却得出背道而驰的结论。个别论的拥护者从这里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史学既然是研究由个别和具体事件所构成的社会生活的发展，那么史学的研究对象只能是一次性的和不重复的事物，因此，史学同研究重复事件的自然科学有质的区别。马克思主义者，科学的史学拥护者却认为现实中的社会生活的个别和具体的事件，作为具体的整体是不重复的，可是它们是发展锁链上的环节，并不是孤立的事实，而且也包含有重复的因素。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史学既提供发展的具体景象，就应当揭示事件中成为一般的、重复的东西，揭示发生这些事件的过程的规律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史学就应当像自然科学一样准确地行事。因此，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区别这两种观点的东西都集中在“个别”对“一般”关系问题的周围。

为了便于作出进一步的结论，必须毫无贰义地确定我们在本编中将使用的“个别”和“一般”这两个概念的含义。

我们往往把不同于一般的个别理解为具体对象或事件，而这种对象或事件与大部分对象或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一般特征或属性相对立。从这点意义上说，这棵绿树是个别，而绿色的属

性是一般。

但是这样的概念也有另一种含义。我們談到个别对一般的关系时，其含义是指这些事物所特有的一些不重复方面的因素对也出現于其他事物中的因素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个别意味着个别化的特征，而这种特征把該事物在属于同一类的其他事物中間划分出来。这种特征总是該事物所有特征的总和，而該事物作为一种整体来讲是某种不重复的东西。不过，这种特征也可能是对該类事物或現象的不重复的屬性（例如，正在当时发生的某种事物的屬性，当然同时还发生了无数事实，不过类型不同）。

“个别”和“一般”两个术语的两套含义，从实质上讲，彼此是有区别的，然而它們相互間又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因为如果不分析这些事物的质量，就談不到把个别对一般的关系当作具体对象和事件对一般屬性的关系。

提出这些意見之后，我們又可以回到討論的主要綫索上来了。我們在批評唯心主义方法論的时候已經知道，它的拥护者力图貫徹下列基本上錯誤的論点：似乎存在着个别的和不重复的事实，也存在着另一种类型的，即一般的和重复的事实。第一类事实由历史科学来研究，而第二类事实則由自然科学来研究。可是分析自然科学所研究的事实——如分析关于植物、动物、矿物的事实——却表明这些事实也是个别的和具体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下也和同历史科学所研究那些事实一样，也是不重复的。反之，对构成历史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活事实的分析，能指出它們的重复性，而这种重复性是和說明自然科学所研究的事实的那种重复性相同的。这就摧毁了把科学划分为規律科学和个别科学的杜撰的标准。个别对一般的对立，不重复对重复的对立，并不在于把事实划分为不同范疇——重复的和不重复的——的

幻想分界綫上；事实的这种不同范畴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分界綫应当在什么别的东西中去找，在事实和事件本身中、它們的屬性中、因素中、个别和一般关系中、不重复和重复的关系中去找。

在批評李凱尔特的观点时，我們曾經引证了列宁《談談辯证法問題》的片断。列宁在該文中指出，在每一个事物、每一个事件、每一个概念、每一个判断中間都包含有个别对一般关系的辯证法。列宁从諸如“伊凡是人”、“哈巴狗是狗”这样簡單的判断出发，指出“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出現于上述判断中的小前提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每一个单独的事物都包含有与其他事物共同的因素，即一般的因素。这显然不仅指物，而且也是指事件。也可以这样考察相反关系的辯证法——一般对个别关系的辯证法。列宁說：“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

因此，事物和現象中的个别和一般并没有截然的分界綫能把它們划分开来。無論如何，个别和一般并不会以特殊事物或特殊事件的方式出現，不过只能从这些事物的质量和屬性中加以划分。

我們且举任何一件簡單事件作为說明，例如某一农业生产合作社根据合同在某时交售九百公斤肉，合作社借此可以从采购站以規定价格換得一定量的煤。这一事件是个别的和具体的事件，在一定意义下是不重复的：正是这个合作社在这个时候正好交售这些肥育的家畜肉，而且換得正是这批煤。但是在这一事件中存在着不知多少也出現于其他类似事件中的一般因素，就这种意义來說，也就是存在着不知多少重复的因素！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以合同当事人的資格出現的（这是由一定社会制度的存在而决定的）；这里，城乡之間的产品交换是由專門的合同以

特殊的方式进行的；这种交换是按一定比例进行的；諸如此类。因此，我們可以使用諸如“合同”、“經濟結合”、“价格”等一般概念，把所研究的具体事件也像其他也具有其个别特点的成千上万的事例一样归結于这些概念。这里所发生的是我們在創造概念的任何过程中所观察到的同样东西，我們根据对于所有事例都是共同的那些因素，对某一类各別事例的个别特点加以抽象化得出概念，再把它們当作一个一般名称的記号，例如“人”、“桌子”、“櫥”等等来加以考察。

當我們从联系中去考察对象和現象时，个别和一般是处于不可分离的联系中：个别会导至一般，而一般只在个别中出现。當我們孤立地考察对象和現象时，當我們破坏了存在于对象和現象之間的客观联系时，我們也就破坏了存在于个别和一般之間的客观联系，我們就会把个别和一般形而上地絕對化起来，把它們当作两极一样地对立起来。这样，我們也就打开了通向个别論所使用的某些个别和一般事物的思辨概念的途徑；这种概念是使認識过程的一个方面絕對化的无結果的抽象的产品。

因此，我們在把个别对一般的关系問題，以及不重复对重复的关系問題，轉到相应的方面来时，即轉到事物和現象及其关系的各个方面、特点、因素的領域中时，我們就可以避免任何形而上学，就能够最充分地、合理地解决这一問題：在每一个事物和每一个現象中，都包含着个别和一般的，不重复的和重复的因素。客观的发展規律是区别它們的标准。

現在我們进入一个領域，在这个領域里表現出了馬克思主义的客观发展規律理論与我們感兴趣的关于个别对一般关系的問題之間的联系；这里特別清楚地看到闡述馬克思主义在史学中所完成变革那一章所作的論断与本章的結論之間的联系。現在必須提出論断中一个为了进一步了解思想过程所必要的重要

因素。这里指的是把历史事实相应地解释为发展鎖鏈中的环节，解释为历史过程的組成部分。

上面談的是观察历史过程的辯证态度和形而上学态度之間的区别。这种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从事物和現象的总的联系和相互依賴的規律观点来考察研究的对象，而后者则是从孤立事物和現象的分析观点来考察研究对象。我們从其他一些方面，即从考察发展过程的邏輯方法对历史方法的关系問題的立場探討这些問題时，我們还要回到这些問題上来。而这里应当着重指出下述思想。当我们談到的正是关于历史事实或历史事件的时候，我們总是在同抽象的結果打交道。要知道社会发展的过程是真实地存在的，这种过程的各个方面和因素是处于相互联系中并且是相互依存的。正是这种过程成为社会科学，其中也包括史学的研究对象。在社会科学中也像在自然科学中一样，对所研究的过程的个别事件或方面作科学的抽象，借此而造成的特殊化、孤立化是合理的，因为这可以保证更深入地分析其組成部分，結果一定会达到相应的目的，即整体的研究。

因此，我們就在史学中接触到历史事件，接触到我們称为个别历史事实的东西。我們就是从这方面来談历史事件或历史事实的，如十月革命、斯大林格勒大会战、苏联发现在工业上利用原子能的方法等等。詳尽分析这种历史事实乃是史学的直接任务。这里只有一个保留，不过从方法論观点上是重要的保留，即每一种这样的事实，将与历史过程联系起来考察，把它看作是过程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一个发展阶段。只有这样，我們才能避免孤立地考察历史事件的危險，才能避免錯誤地用形而上学的态度解释历史事实的危險。我們上面已經提到过，只有这样，我們才能用分析的方法发现历史事件的重复和不重复因素，从而加深我們对已知的发展規律性的知識，并揭示新的、未知的規

律性。

在提出这些简单而非常重要的说明之后，重新回到我们的讨论时，我们又要求助于例子。一家工厂安排好成批生产例如“华沙”型汽车。这种生产是使用传送带的生产，这就首先需要有一定的工时测定和有輪替工序的准确的重复率。我们要把传送带的一个循环作为我们研究的一个事件来考察，在这一个循环时间里将制造出一辆“华沙”牌新汽车。我们在研究这样各别的事件时，应当肯定它们是像孪生子一样地彼此相仿。但是，尽管如此，其中每一件还是个别的、具体的、在一定意义下是不重复的。因为在一种情况下是第一班工作，在另一种情况下是第二班工作，余此类推。各种各样个别化的情况可能具有多少不同的意义。不过可以肯定地说，全体工人一定会牢牢记得这样一个事实，即当第五百辆汽车装配好时，工厂因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的胜利而获得了流动红旗。

試把这些論断总结一下。在上述的例子中，事件的一般的、重复的因素清楚地被提到了首位，而个别因素、不重复因素退到了次要的地位。但是重复的因素与不重复的、个别的因素密切地交織在一起。重复的因素是与生产过程的客观规律性联系着：它们是由汽车生产过程中因果的必要連續性而产生的。而不重复的因素并不与这种规律性相联系；从生产过程的观点来说，它们是可有可无的，是偶然性的。

再举一个例子。例如苏联进行的反对希特勒德国的偉大卫国战争是由小規模的交战、較大的接仗和大会战所构成的。战斗的次数很多——計有成千上万次。而其中有一次强大的、具有轉折意义的是斯大林格勒大会战。它代表特殊的“个别性”，代表战争史中的特殊一章。不仅就該战役在空間時間上的布置来说，而且就其策略、战略計劃来说，也是英勇无比的，在城市保卫



史上也是无与倫比的。因此，斯大林格勒战役不仅是史学家的极好题材，而且也是作家的极好题材。該战役的个别性、具体细节上的不重复性是无可置疑的。但是难道这里就沒有重复的因素了嗎？当然有。战争史学家把斯大林格勒战役同过去的偉大战役比較，特别是同苏联偉大卫国战争年代的其他战役比較就很容易指出重复的因素。他可以指出这一时期所有战役中的重复因素——这将是同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全部过程所独有的特点。不过，这一事实决不会貶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特点，也并不否定該战役的不重复性的命題。这一例子同第一个例子的根本区别是在于个别化的、不重复的因素在这里被提到了首位，而重复的因素退到了次要的地位。

但是，再把这些論断加以总结时，就会发觉我們所得出的結果与第一个事例中所得到的結果完全一样。因为这里重复的因素与不重复的因素交織成了一个整体。这里重复的因素是由該过程的規律性产生的，从这一观点来看，不重复的因素則是偶然的。不同的只是这些因素的結合，因为存在着过程中的另一些条件。

現在我們且更深入思考一下这两个例子所涉及的問題。

我們談过了事件的重复和不重复的因素、方面和特点等。显然，只有在我們不是孤立地，而是注意到事件的客观联系和依存性来分析某事件时，这种区别才有意义。孤立的事件正是这一事件而不是另一事件；这里当然談不到任何重复的因素。不过这只是因为該事件是被人为地特殊化起来，把它同所有现实的真实联系人为地分隔开来而已。丢掉这种歪曲现实景象的形而上学，从事物和現象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依存性的观点来考察我們感到兴趣的事件，在我們眼前也会出現上述事件同时发生，或者在它前后发生的其他类似的事件。但是这时候会开始出現同

样由于經常有效力量的結果的某些方面，因而也就是事件的重复方面；同时，也会出现另外一些方面，这些方面是某些因果序列同經常有效力量的序列，亦即事件不重复的，經常变化的方面相互交叉的結果。前者因为是同我們称为某种过程的規律相联系，所以应当在該事件中出現，因为并不存在事件的一般重复因素和重复方面以外的規律。而后者可能在該事件中出現，也可能不在該事件中出現，因为它们是偶然的。

这里回忆一下馬克思主义辯证法的这个命題是适宜的。这个命題說，給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只有通过偶然性来实现。如果我們注意到现实的整体性，注意到事物和現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賴，則这一命題是十分明显的。因此，不存在只包含重复因素或者只包含不重复因素的現象，也不存在只包含必然因素或者只包含偶然因素的現象，因为在每一事件中，必然性是同偶然性相互交叉的。如果我們注意到现实总是由无数互相交叉的因果序列所构成的話，那么便可知道別的情况是不会有的。

从上述論证可以十分明显地得出結論：为什么对每一种科学來說，特别是对社会科学來說，具有头等意义的問題的乃是发现事件的重复因素，因为这实际上是同揭示支配这些事件在其中出現的过程的規律相吻合的。从这一論证可以十分明显地得出在解釋下一命題中唯心主义方法論和馬克思主义方法論之間的差別：这一命題是說，社会生活是由个别事件組成的。唯心主义方法論把社会事件的不重复因素加以絕对化，并且把它們变成这些事件的唯一因素，从而就把个别与只由这些不重复因素所构成的事件等同起来。而馬克思主义方法論认为个别是指具体的事件，在这种具体的事件中既出現重复的因素，也出現不重复的因素；从这一角度上看，个别事件正由于它的具体性，当作一个整体来讲是不重复的，不过它包含有，而且应当含有重复的

因素。問題的第一種解決方法是形而上學的，第二種解決方法是辯證法的。第一種解決方法不是招致否定發展規律，便是照例(ad usum)用作對這種否定的公開支持；第二種解決方法則引向更深入地了解發展的規律，了解規律的客觀性和必然性，而同時也了解事件的客觀性。

分析個別對一般關係問題的結果，對於史學家的研究工作具有很重要實際意義。

我們在前面已經談過——雖然這種談論是平凡無奇的——史學家在研究社會生活的發展時，會遇到無數的借以構成這種生活的個別事件。歷史文獻也談到這類事件，告訴我們各種戰役、帝王的生活、經濟事實等等。根據上面的說明，就產生第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即史學家在所研究的事實中應當探求什麼，他應當從其中吸取什麼？沒有文獻，沒有事實，顯然誰也不能寫歷史。不過問題是在於怎樣處理這些事實：史學家限於或多或少“記載式”地羅列這些事實呢，還是力求從其中取得一般，取得發展的規律性呢？我們在戰前用作中學必修的扎克歇夫斯基的《古代史》以及不久以前出版的謝爾蓋也夫的《古希臘史》這兩本教材可以作為例子，來說明對歷史作這樣兩種不同的評價。對史學家具有創造性實際重大意義的是從方法論上認識，他應當怎樣對待如同《撒母耳·皮普斯日記》那樣的文件，因為這是關於十七世紀英國社會生活知識的非常寶貴的史料。

關於這點，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可以作出十分確定的結論。馬克思主義研究社會發展的具體過程，因此要求在事件的具體細節中去研究個別事件，就是既確定事件的一般的重復的因素，也要確定其不重復的因素。從這裡可以得出結論，歷史研究既拿具體個別事件作為出發點，就應當確定它們的規律性，從而也就應當研究發展的規律。因此，歷史研究如果進行得恰當，那就不

仅可能，而且也应当成为科学的研究。但是，史学从个别事件中同时揭示其一般，把这些事件看作历史过程的环节时，那就要从其整个具体细节中，从伴同着种种偶然特征的“活生生的生活中”去研究这些事件，这就是說，照这些事件实际发展的样子去加以研究。而且，作为一門科学的历史的特点就在于此。我們在分析史学对社会学的关系时，还要回到这一問題上来。因此，如果我們研究如十月革命这件事时，我們作为史学家就应当根据各种各样經過适当查核和批判过的史料来对这一事件作完全忠实的記述。但是我們不能只限于此：我們应当从所叙述的事件中，抽取一般的，重复的因素，应当揭示这一事件在其中出現的那个历史过程的发展規律。如实地反映史学家所認識的现实，从而正确地解决个别对一般的关系問題，这就是善于揭示一般发展規律的源泉，一般发展規律是各种个别事件的基础，而这种善于揭示規律的能力却是科学地研究历史的基本条件。

上面所提出的任务，就是从个别事件中抽取一般的因素，抽取該发展过程的規律。从这个任务中就产生出一个密切有关但并不与之合一的任务：即在个别中表达一般的任务，或者完全一样，即选取能表达一般的个别事件的任务。这多少使人想到文学作品的任务，虽然作为科学的历史，和作为艺术的文学，是运用不同的手段，而且是以不同方式表現现实。

我們現在再回到一开始所提出的对史学家的創作具有重要的意义的問題上来：应该选择怎样的事实来如实地表达历史过程，承认哪些事件是历史上重要的事件，应该把怎样的事件当作丧失意义的事件来拋棄掉？

在唯心主义方法論的面前也面临着这一問題。唯心主义方法論把史学家变成历史的創造者，求助于客观意义来作为选择历史上“多义的”事实的标准。被作为现实存在来了解的这些客

观意义，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对主体的绝对化的认识。这样一来，我们实际上处于极端主观主义的王国，而这种主观主义否认选择历史事实的客观标准的可能性。如果根据这种概念，每件事都是不重复的、一时的，其意义就是它只包含有不重复的因素，结果是它不受制于任何规律性，而只能根据它同某种外界标准的相互联系来把它划分出来。这里已很清楚，个别论的拥护者——实际上是不可能彻底实现这种立场的，——也只能选取那些被视作是“多义”的历史事实。同样明显的是，这种选择是受该史学家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所制约的，因为史学家是受阶级所制约的，并且在执行一定的阶级职能。

因此，用形而上学的态度把个别对一般对立起来，又变成解决具体研究问题道路上的真正障碍。只要去掉这种路障，就可以在研究领域中打开新的广阔的前景。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做了，它向史学家提出了这样选择历史事实的要求，要使这些事实能成为当时的典型事实，或者一般地对研究对象能成为典型的事实。这里，典型的，应当不是指普通的意义，而是指揭示发展规律的意思。

由此可见，不是每一事件在历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的，而只有足以发现或更深入理解当时发展规律的事件和在个别中给我们指出一般的规律在历史上才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一论点应当从字面的最广义上去了解，因此，是从这样的意义上去了解，即在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不仅有直接正面地表达规律发生作用的那种事件，而且也有无论从抑制意义来说，或者从变形意义来说都足以影响规律的发生作用的事件。正是在这里展开了所谓历史偶然性活动的广阔园地，而这种偶然性也是在科学基础上进行研究的史学家的注意对象。因此，在历史研究中选取典型事实的原则要求，并不与每个史学家所必须遵循的最高指导

原則相矛盾。这种最高指导原則在于史学家在研究活生生历史过程的时候，总是希望在他所作的科学描写中，力求尽可能更生动、更具体，更全面地反映这种过程。这一指示不仅不排斥事实的知識、史学家的淵博学識，而且恰恰相反，还要求这种事实的知識和史学家的淵博学識。

当必須对事实进行具体选择的时候，当必須給史学家提供意見，应该把哪些事实认为是典型事实的时候，显然就发生了困难。应当清楚地說明，关于这一点并不存在任何通用的处方。通常总是应当研究具体資料，具体的历史过程作为起点。要知道史学家在研究过程中揭示和系統說明历史发展規律，而决不限于闡釋其他史料中已为众所周知的規律。这当然并不是說，史学家毫无配备就着手研究，因为他掌握了过去历史研究的成就和結果以及社会发展的理論之类的有效工具。社会发展的共同理論——历史唯物主义——教导史学家，要他一定把下列那样的事实当作典型事实看待：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必須相适应的規律的作用，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間的关系，社会經濟形态的性质和发展，階級和階級斗争等等事实。史学家当然不可能只限于最一般性的指示。更具体的指示包括在现实領域的理論中，而现实領域的历史写出的是：法权理論、艺术理論、語言学理論、貿易理論系統說明这些領域內发生作用的具体規律，这就使史学家能够至少可以事前辨別一下資料，并把典型事实同丧失严正历史意义的事实区分开来。最后，当我们写闡釋某一問題、某一时代的历史专著的时候，或者写作杰出人物的傳記的时候我們应当确定所研究的对象的特殊規律性，作为相应地考察其历史的前提。的确，这往往是在研究过程中和研究結果后才这样做的；但是这也沒有什么矛盾，因为研究过程的辯证法就是如此。

可見，社会发展的客观規律乃是选取历史重要事实的客观标准。这是否意味着，史学家已經得到一張可靠的处方，使他能够对事实作单一的选择呢？当然，不是的；这就像作家不可能得到一張現成的处方一样，因为作家是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則，必須以个别的、具体的形象，来表明过程的本质，过程发展的規律。为了要提供一幅完全合乎要求的，不走样的历史过程的景象，除了在解决取得历史真理的任务时首先依賴的科学上的无产阶级的党性立場之外，还必須掌握对象的具体知識，而且还应当具备才能。任务是否能完成，而且如何完成，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才能的程度。时常有許多許多这样的历史事实，它們在某种程度上在揭示某一时代或某一阶段现实的发展規律时，可以更具体深入地考察已知的規律，而且也可以揭示未知道的新規律。对现实某种程度上的成功的反映，运用理智和讀者的意見的能力，都要取决于对事实的适当的选择和确切的对比，取决于对事实的解釋，取决于表达事实的方式，并且取决于許多其他因素。因此，两位史学家，即使他們有同样的政治立場，同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論，如果他們在对对象的具体知識上，甚至在他們各自的能力上有重大差別的話，那么他們也会写出价值不同的作品。因此，在好些情况下，在表述同一历史对象时可能有严重的差別；因此，必須經常不断地充实我們的历史認識，使認識越来越接近完全的、客观的历史真理。不过，考虑到这一点时，应当特別用力強調指出，承认社会发展客观規律辯证地解决个别对一般的关系問題的馬克思主义方法論，給史学家对选择历史事实的問題提出了宝贵的原則性指示；而这些历史事实对确定历史真理是具有科学意义的。

## 第一节 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

个别对一般关系问题的解决，同时为史学建立了回答另一个问题的基础；即史学对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学的关系如何。这一问题对确定历史研究的方向和性质，具有严肃的理论意义，同时也具有巨大实践意义。

这一问题决不是新的问题。史学对社会学的关系问题，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交结时期就已是资产阶级科学中长期激烈争论的对象。争论是在记载史学拥护者和社会学化的“科学的史学”拥护者之间进行的；这种争论再一次证明，如果不使用辩证法的武器，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

马克思曾说列奥波尔德·冯·兰克写历史的方法只是在“收集奇闻佚事并把一切重大事件化为繁琐闲话”。他把兰克称之为“跳舞的侏儒”。当时兰克曾提出一种口号，而这种口号从那时起就成为整个资产阶级记载史学的号召：

“……历史被认为有权判断过去，并为未来的幸福而指导当代人；真正的意图并不指望起多么崇高的作用；我只想指出如实发生之事而已”。<sup>①</sup>

所谓历史应该说明“如实发生之事”这个公设，在兰克及其学派的评价中成为“繁琐”记载史学的公设。这种史学似乎是被用来表示科学的真实性和客观主义；实际上这种伪客观主义只是充当极端阶级党性的盾牌，而这种党性则在于不根据任何规律选择最合乎兰克及其学派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倾向的一些事实。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概念个别论是兰克口号的理论基础。在这种形式下，兰克的口号就成为资产阶级官方史学的信

<sup>①</sup> 列·冯·兰克：《1494—1514年罗曼斯和德意志民族史》，1885年德文版，第VII页。



条,这种信条把历史科学中某种特殊的方法作为公設,摒棄历史的一切規律,把史学作为个别科学来和其他科学特别是和社会学明显地对立起来。于是便产生了关于史学对社会学关系問題的两种敌对概念中一种概念,而这种概念把史学和社会学截然区分和对立起来。

十九世紀末保罗·拉貢勃以及同他名字有关而在法国流傳极广的“历史綜合”派,反对这种概念。他把一批信徒团結在《历史綜合評論》的周圍(保罗·拉貢勃、沙尔·謝尼奧博斯、沙尔·梁格路亚、安利·培尔等人)。这一流派的拥护者把“科学的历史”同社会学等同起来,而拉貢勃甚至硬說,个别事实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历史綜合”派的拥护者把历史科学变为社会学的公式,从而得出編撰历史概念“辞典”的荒唐的、形而上学的构想,并认为这些概念应当成为史学的基础。这是企图用形而上学地、反科学地理解的社会学来代替历史。因此,就产生了关于史学对社会学关系問題两个互相敌对的概念中的第二个概念,这种概念把史学和社会学等同起来。<sup>①</sup>

不难发现,这两种概念的基础中都存在着同一个原則性的錯誤;即非辯证的、形而上学的解決問題的方法。这种錯誤支配着个别論,因为个别論是把史学同探求規律的科学对立起来,錯誤地、非辯证地解决个别对一般的关系問題。这一錯誤也支配着社会学化的史学家,因为他们把史学同社会学(請注意,它实际上是被錯誤地理解的)等同起来,同样錯誤地、非辯证地解决

① 应当指出,“历史綜合派”拥护者所进行的反对个别論的論战是特别不彻底的,至于他們的其他錯誤姑且不談。这最突出例子就是拉貢勃和李凱尔特在《历史綜合評論》杂志上展开的論战(特别是《历史是科学,兼評李凱尔特的言論》一文,載于《历史綜合評論》,1901年第7期,第3卷)。拉貢勃在該文中承认存在着两种概念,但他实际上又同意李凱尔特的概念是两种可能概念中的一种。

个别对一般关系的問題。

我們要反对资产階級科学中对問題的两种形而上学的歪曲，但在我們把对科学的史学所提出的要求加以具体化之前，姑且先从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回答一个問題：史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我們先从确定这两部門科学的研究对象开始。

我們談到史学，談到历史的时候，指的是人描写社会发展的客观过程，是說社会的客观历史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因此，我們在这里有意識地使用只限于社会生活发展問題的較狹义的“历史”、“史学”的概念。因为一說到較广义的历史，也就是說到事物和过程在時間上的客观变化过程时，我們所指的是这种变化客观地显示出来的所有地方，也就是整个现实。大家知道，土地有土地的历史，植物有植物的历史，动物有动物的历史，矿物有矿物的历史，样样都有自己的历史。如果它們所有的历史就是時間上的客观变化的过程，那么就有人描写这种客观变化过程來說，亦即就史学來說，它們才具有或者才能够具有自己的历史。人类社会的历史和史学只是較广义的历史和史学的极小部分和片断，这一点只要用下一事实就可以說明，即人类社会只是客观现实的一个很小部分。不过，为了簡化問題，我們將从狹义来分析这些概念。當我們提出問題，即問到什么是史学研究的对象时，我們指的正是这种比較狹隘的含义。

不过，當我們要作出明确的单一含义的回答时，我們就会遇到同另一个多义性有关的困难；而这另一个多义性是同上面所引用的这一术语的多义性有所区别的。當我們限于描写人类社会历史的时候，指的究竟是怎样一种作为科学的历史呢？科学的傳統确定了同个别民族的历史相对照的“通史”的概念。同时，各种不同的局部的历史，社会生活各个領域的历史，例如艺

术史、文学史、道德史、战争史、科学史、哲学史、经济史等等，都同时取得了公认，它们或者是对一个国家来编写的，或者是比较广阔的范围来编写的。就传统意义来说，通史所研究是什么呢？这主要是政治史，最多不过是兼带涉及经济史以及社会制度史片断的政治史。我们且不深入讨论，通史科学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历史科学应当保持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只要指出，在谈到史学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并不只局限于通史科学的传统领域，而是把这一概念加以更广泛的解释，也就是说，我们用它来包括社会生活各方面历史的总和；换句话说，我们把史学理解为一种力图尽可能充分描述社会发展客观过程的、社会生活发展的科学；要知道，社会生活所构成的一定整体便成为更广阔的整体——客观现实活动的组成部分。<sup>①</sup>

- ① 当史学家主张“通史”是一定的整体的时候，他们常常由于这一术语的多义性而在这里把两个问题混淆起来。第一，这一术语是指史实 (*res gestae*)，而且这里强调历史是通史这一点；它具有一种意义，就是历史虽有其不同方面和角度，却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就这方面说，“通史”对史学家是非常宝贵的概念，是他所不能拒绝的概念。第二，这一术语是指科学地反映客观历史过程的史学。显然，这种反映涉及到称为通史的统一的历史过程。但是这种反映在史学家的实践中是怎样进行的呢？它所采取的形式是：史学反映社会生活的各种不同方面。史学家专门研究政治史、经济史，专门研究社会制度史，专门研究意识形态各种不同形式的历史，如思想史、艺术史、科学史、道德史等等。在这一意义下，“通史”只在作为局部历史的总和时才有可能，虽然即使是最渊博的史学家（应当特别注意，顾名思义 (*ex definitione*)，这里是指包括所有民族的过程），这种可能也是有限的。看来没有必要重复说明，这也决不会妨碍把通史理解为客观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在历史科学的各个具体领域中得到反映。同样，学校课本所称的“通史”，通常只包括主要民族的历史，实质上是包括（我们是说良好的课本）政治史、经济史的因素，也包括文化史的因素，但可惜的是，文化史中不大能代表意识形态的历史。为了教学目的，这样的区分通史教学和民族史教学，是有其意义的。不过，这并不与下一论点相矛盾，即就史学来说，“通史”实际上是统一的历史过程的种种局部反映的总和。

这样說来，我們可以断定，史学的概念应当包括社会发展（而不是整个现实的发展）客观过程的反映，即从社会发展的总体中把社会发展当作社会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思想生活（不是社会各个孤立方面）的发展的反映。我們这样确定了所分析的概念的意义之后，就可以答复上面所提的問題：历史科学研究的对象乃是社会发展和发展的規律，或者換句話說，乃是社会生活的发展和發展規律。

那么，作为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

历史唯物主义乃是社会发展的一般理論，或者換句話說，乃是社会发展最一般規律的科学。正因为它是这样的发展理論，所以才可能成为，而且也真正成为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論，从而也是历史科学的一般方法論。从这一观点來說，它与辯证唯物主义完全相同，因为辯证唯物主义是整个现实发展的最一般規律的科学，同时正因为如此，它也就成了一切科学的一般方法論。这是因为科学研究的方法同发展的理論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某种程度上又是发展理論的反面；当我们考察现实的发展的时候，由此便可得出一种标准，基于这种标准要求这样而不是那样地对待这种发展的研究。

因此，我們在談到历史唯物主义是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时候，我們所指的是社会发展的最一般的理論。但是如果我們清楚地說明我們这样分析的概念，那么我們就可以肯定地回答上面所提出的問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乃是社会的发展和发展的規律，或者換句話說，乃是社会生活的发展和發展規律。

这样一来，我們可以认定，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同一个研究对象——社会生活的发展和發展規律。而唯心主义方法論的有些代表或許也同意这种一般性的說明。但当我们轉而去研

究这些科学的特点时，研究和确定区别它们的因素时，就立刻分道揚鑣了。大家知道，斯大林在《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一书中曾經指出，宝贵的正是研究这种特点。

我們坚决排斥下述个别論的論点：說什么史学和社会学是彼此完全对立的，它认为一个是研究发展規律，而另一个則不研究这个規律；除了用研究支配社会发展的規律以外，就不可能研究社会发展。然而我們也坚决地排斥关于“社会学化史学家”的論点，因为他們把史学和社会学等同起来，否认它们的特点。

把两个研究領域的科学作品比較一下，就可以說明这种特点是存在的。一方面，我們举出馬克思的历史著作，如《路易·波拿巴政变記》、《法兰西階級斗争》；另一方面，举出馬克思的《資本論》。《資本論》是經濟著作，但同时这也是一本社会学的著作，其中包括了具体的社会形态——資本主义——的分析。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著作中指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并不限于确定社会形态的經濟骨骼是什么，而且在探究适合于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时，把“整个資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活生生的东西”<sup>①</sup>指出給讀者看。因此，我們見到同一位作家，对同一个社会形态的两个类型的作品——历史著作和一定意义下的社会学著作。两者之間是否有区别呢？描写法国階級斗争和反映“資本主义社会的解剖”的著作之間是否有区别呢？絲毫无可怀疑的，是有区别的。第一种著作虽然包含有許多社会学的总结，可是是以对事件的編年的叙述为基础的；我們暫且不深入研究对那些事件是怎样叙述的。而另一种著作，虽然也沒有越出一定历史时代的范围，却根据一定的历史事实，利用广泛的历史实例（例如，爭取縮短工作日斗争史），一句話，虽然在一定意义下也是历史著作，但是所写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35年版，第121頁。

的却不是事件的編年紀錄，而是這些事件的邏輯、它們的發展規律、發展的动力、發展的結構等等。這是暫時的、初步的定義，但是這種定義已經能夠表明，存在於所研究的著作之間的客觀區別是怎樣的，表明這兩種著作所代表的科學領域之間可以清楚地觀察得到的差別。

不過，這種根據直覺對科學差別所下的定義是不夠充分的。那麼，根據科學的要求，這種差別究竟何在呢？

恩格斯關於敘述發展的历史方法和邏輯方法的統一性問題的意見是提供給我們解答這一問題的鑰匙。恩格斯寫道：

“馬克思曾經是而且現在還是這樣唯一的一個人，他能於擔起重大任務來從黑格爾的邏輯中取出那包含有黑格爾在這方面所作真正發現的內核，從而恢復辯證法，除去它的唯心主義的外殼而賦予它以使它成為唯一正確思想發展形式的純朴形態。作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基礎的方法的制定，在我們看來是意義未必亞於唯物主義基本觀點的成果。

“對於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即令按照已經獲得的方法，也可以用兩種方式進行：依照历史或者依照邏輯。既然在历史本身方面，也如历史在文獻上的反映方面一樣，發展進程整個說來是從最簡單關係向着較複雜關係的推移，那末，政治經濟學文獻的历史發展進程就提供了進行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基本綫索，並且經濟學的種種範疇整個說來同時也會按照像在邏輯發展進程中那樣順序地出現。這種形式初看起來彷彿是具有更大的明了性這一優點，因為這裡可以追溯現實的發展進程，但事實上這種形式至多只是較為通俗而已。历史的行程往往是通过飛躍和迂迴曲折的，如果一定處處都跟着它走，那就勢必不僅要去注意許多不大重要的材料，並且要常常打斷思路……因此，邏輯的研究方式乃是唯一適當的方式。但是這一方式本質上也還是历史的

方式，只是摆脱了它的历史形式和对它起着破坏作用的偶然现象而已（着重点是我加的——亚·沙夫）。历史从什么地方开始，思路也应从什么地方开始，并且它的进一步的运动也不外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和理論上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它是被修正了的反映，但这是依据实际历史过程本身所提供的規律来修正的，并且这时对于每一个因素可以在它的发展过程达到完全成熟和典型形式的那一点上加以考察”。<sup>①</sup>

上面我們已經确定，史学和社会学具有研究的共同对象，社会发展和发展的規律。現在我們可以认定，它們在研究方法和表达它們研究成果的方法上有着不同方式：在一种情形下是历史方式，在另一种情形下是邏輯方式。

这一区别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从恩格斯的議論中可以看出，这种区别是在于我們用历史方式，表达发展的全部丰富内容和詳情细节，这就是說，叙述其重复和不重复因素的統一性中的个别事件，指出其中什么是規律性的和偶然性的东西，反映事件及其全部飞跃和曲折的进程。同时，也存在着一种危險：即我們叙述的景象还会包含一些較次要的事件；其中所叙述的曲折和飞跃会打断思路，不过因此倒会反映事物的真实进程，并成为更容易理解的了。我們用邏輯方法，根据真实的历史过程本身所提出的規律，以修正过了的型式来表达发展，摒棄这一过程已达到成熟的发展点中偶然的東西，而在这一点上发展达到了成熟的程度。因此，我們是以抽象的形式来反映历史过程，我們所得到的是修正过了的反映。因此，邏輯方式正好就是摆脱了历史形式，摆脱了历史发展过程所含有的偶然性的历史方式。恩格斯认为，作为《資本論》胚胎形式的《政治經濟学批判》一书，因此也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50—351頁。

是历史著作，虽然它的形式不是历史的，而是抽象邏輯的。

邏輯方式能够用消除……偶然因素的方法来取得对历史过程“修正了的”反映，——这一事实，又与另一非常重要的問題，即邏輯方式对历史方式的关系問題有联系，这个問題在上面引述的恩格斯一段文章中最后几句话里曾提到过。

恩格斯強調邏輯方式的积极方面，认为运用这一方式可以“在历史过程达到完全成熟和典型形式的那一个发展点上”研究每一个因素。恩格斯这种意見乃是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写著名的方法論命題的繼續。馬克思在該文中写道，

“資本主义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最复杂的生产組織。因此，表現它的各种关系的种种范疇，关于它的結構的理解，同时对于一切已經复灭了的社会形态的結構和生产关系提供了透彻理解的可能性，——資本主义社会是在这些社会的殘片和因素上建立起来的，这些殘片和因素，一部分被它当作未克服的遗迹而保存着，一部分仅仅是征象的东西被它发展为十分显著的东西，諸如此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在下等动物身上所透露的高等动物的征象，反而只有在已經認識了高等动物之后才能理解……所謂历史发展，一般是安放在这样的基础上，即后一形态把前一形态看成是向自己发展的梯級……”<sup>①</sup>。

这一方法論的意見的主要思想是在于要求不要把任何一件事、任何一个事实孤立地去考察，而要放在发展过程中去加以考察，把它們当作发展的长鎖鏈中的一节来加以考察。因此，我們可以在发展的低級阶段发现高級形态的萌芽，并从发展的結果来观察发展。要求考虑到发展过程的成熟形式来研究发展过程的原則性指示，乃是非常重要的方法論上的成就；这种成就能够

---

<sup>①</sup> 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7—168頁。



說明我們感興趣的邏輯方式對歷史方式的关系問題。

馬克思用諸如地租和資本這樣一些經濟範疇的歷史起源和實際作用的具体例子來表明對問題的歷史和邏輯态度的區別。在歷史發展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地租範疇，可是資本範疇是經濟分析的起點和終點，而在政治經濟學中應該在地租之前首先考察這個範疇。

“因此，把各種經濟範疇順着它們在歷史上起決定作用的先後次序來處理，是不行的，錯誤的。它們的次序倒是應該照它們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相互关系來決定的，這種关系，同看來是它們的合於自然的關係或合於歷史發展的次序，恰好是相反的”。<sup>①</sup>

因此，“人體解剖對於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這一觀點，對所研究的資料的邏輯評價开辟了新的廣闊前景。歷史過程的反映的“修正”，在這裡獲得新的含義。問題首先是關於消除歷史發展的偶然因素，這裡也包括事實的起源次序問題。這一問題對歷史態度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而在邏輯態度中則退居次要地位。因此，邏輯的態度能夠“拉直”歷史的曲折，在這個意義上它也能夠幫助分析出新形態的胚芽和指出它們的發展，“清除”景象中種種偶然的曲折，而這種曲折在現實生活中是經常出現的。可是這樣一來，關於從“人體解剖”的觀點來進行研究的原則性指示就給狹義的 (*sensu stricto*) 歷史研究开辟了新的前景。正是這種原則性的指示才能為適當選擇和解釋史料提供了可能性（例如，從標誌馬克思主義產生的變革觀點來研究哲學史的方法論上的意義）。

這裡必須指出在我們討論的開始部分中所涉及到的問題的

---

<sup>①</sup>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69 頁。

新的理論方面，即科学研究中的党性問題。

“把人体解剖作为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在認識高級社会形态的范疇和結構的基础上去研究低級社会形态——这一原則性指示的含义是什么，我們已經知道了。由此可以得出——既对史学家來說，也对社会学家來說——一个結論：現代的階級斗争是理解社会发展的钥匙，只有从階級斗争的角度来看，才能明白，过去的事件导致了怎样的結果，包含在这些結果中的有些什么样的胚芽，这些胚芽的性质如何。工人階級的观点原来是一种最高的观点，这个观点能够揭示和使人理解事件发展的相应路綫。因此，馬克思主义含有党性这一公式，对我們來說，又取得了新的意义。十分显然，只有有意識地站在无产階級党性基础上进行研究，才可能是真正客观的研究。

現在我們再来談恩格斯的意見和我們感兴趣的史学对社会学的关系問題。

恩格斯的結論是完全符合馬克思主义在个别对一般关系問題中的立場的，而且是对这一立場的彻底补充。如果作为具体事件的每一个別事件，乃是一般因素、即重复因素同个别因素、即不重复因素的統一，那么很明显，我們通常在把这些个别事件（具体过程、历史）当作出发点时，就可能从它們的全部詳情細节中去研究它們（历史方法），或者也可以抛开其中一切偶然的因素，集中注意于具有規律性的因素（邏輯方法）。但是在这后一情形下，我們也应当从具体事件出发，探究它們的具体发展（邏輯方法和历史方法的統一）。

从这些議論中所得出的实际結論是：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虽用不同的方法，但却研究同一个对象。史学家正是就整个細节来研究和描述社会生活的发展（发展的各个方面和角度），并指出这些过程在历史上，按照怎样的順序发生的。而社会学家則

从发展的規律性观点来研究和描述社会生活的发展，从事件中把偶然因素抽出来。例如，史学家能以時間先后的順序提供給我們資本主义世界主要国家中的政治事件；而社会学家不能給我們提供这样一副事件发展的景象，但却能根据事件給我們指出这些事件中存在的規律性；他能說明社会經濟形态，在資本主义制度下活动的階級、階級斗争的結構等等。

在这里，方法上的区别是很明显的，不过并不是絕对的；相反地，这种区别是在根本統一的基础上产生的，我們在进一步討論史学和社会学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問題时将会明确地強調这一点。这里，再一次出現了馬克思主义考察問題和唯心主义方法論之間的一种根本的对立。大家知道，这种对立特別体现在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理論中，他們宣称，史学和社会学首先是以方法来区别的，前者是个別化的方法，后者是綜合化的方法。不过，这初看是一种絕对的差别，在两个学科之間形成了不可逾越的鴻沟，因为这种不可逾越的鴻沟似乎應該把个别同一般隔开。馬克思主义在談到两种学科方法上的差别时指出，差别是在它們根本統一的基础上形成的，邏輯方法只是历史方法的抽象形式，因为在个别和一般之間，在具体和抽象之間，並沒有任何鴻沟，而是恰恰相反，它們彼此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考察历史过程方法的双重性，起源于这些过程中的根本因素——个别因素和一般因素——的双重性；对于这些因素要分別来考察并強調这两种方法中的每一种。考察历史过程的方法之間的联系正是起源于这些因素的联系。

社会学和史学采用的方法的区别，并不是絕对的，这也是由于在这兩門学科之間并不存在——从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也不可能存在——任何特別明显的界綫。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史学总结史料，就会像我們在后面要表明的那样，提供出一幅具体的

历史景象，研究并揭示出发展的规律；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同社会学所做的完全一样。另一方面，社会学依靠具体史料，揭示和系统说明发展规律；对社会学来说，历史并不只是阐释的史料，而且也是构成社会学的真实基础。因此，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同史学所做的完全一样。可见，社会学和史学的差别乃是相对的，这不仅因为奠定这两门科学基础的方法是对同一个历史过程所采取的不同态度，而且这些方法实际上也是归结到同一个基础的。这种差别之所以是相对的，也因为每一个历史著作，如果在科学态度上是彻底的话，那么也应当是社会学的著作；反之，社会学的著作往往同时也是历史著作，这不仅就其总结的根源意义上说，而且也是就其直接意义上来说，即就研究和表达所研究的实际资料意义上来说。

我们在上面所说的一切，证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唯心主义方法论在史学和社会学对揭示历史规律的关系问题上的原则性的对立。唯心主义方法论的代表们否认史学在这一领域中的资格，把垄断权留给社会学。他们用不同方法辩护他们的立场，虽然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依旧未变。反之，马克思主义在指出两门学科方法的差别时，强调指出它们的统一；而这种统一不仅是根据这些方法实质上是历史的方法，而且也根据这些方法在两种情形下都能揭示和系统说明历史规律。正是在这种基础上才清楚地表现出史学和社会学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辩证法。根据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发展一般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总结具体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时，能够揭示和系统说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社会发展的一般理论由于情势使然同时也是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论，因而也是作为科学的史学的一般方法论。史学在其研究中是以历史唯物主义所作成的规律为根据的。可是，史学的作用决不在于用具体材料来

闡釋這些規律或者根據材料來檢驗這些規律的活動力量。史學在研究具體史料時，揭示和系統說明各個時代和各個時期的新的特殊規律，為揭示和系統說明新的歷史規律提供資料。

這裡必須扼要研究一下我們前面所用過的兩個概念的相互關係問題：“社會發展規律”和“歷史規律”。

我們談到在歷史過程中以客觀規律性出現的歷史規律，則如前面已經指出過的，我們所談的是支配社會歷史發展過程的規律。因此，歷史規律是同社會發展規律相同的，歷史規律通常也就是社會發展的規律，因為除支配社會歷史的規律之外，並沒有其他的社會發展規律。就這種意義來說，我們才能把“歷史規律”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概念，當作等價的概念來使用。

當我們把“規律”的概念作為“規律性”的來使用時，問題才是這樣的。而當我們就反映客觀規律性的科學規律的含義來談規律的時候，情形就比較複雜了。這裡便涉及到史學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關係，以及這兩門學科對具體的社會科學的關係的新的問題①。

當我們就科學所作出的規律的意義來談社會發展規律時，我們所指的不只是歷史唯物主義、社會學所作出的規律，這就是說，不僅僅指最一般的发展規律；其實我們也是指諸如政治經濟學、民族志學、民族學、法學、藝術理論等等具體社會科學所作出的規律的總和。作為科學社會學的歷史唯物主義和具體社會科學之間的關係，是同辯證唯物主義對關於現實的具體科學之間的關係相似的：歷史唯物主義總結具體社會科學研究的成果。因此，它能夠完全相同地系統說明社會發展的最一般規律；因此，

---

① 我在評論尤·郭赫費爾特教授在華沙大學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教研室討論會中所提出意見時，曾着重提出了社會學對史學和具體科學的關係的思想。

它也能够成为这些具体科学的方法論。从而历史唯物主义也是历史的方法論。

但是，作为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科学的关系是怎樣的呢？这里的困难是在于，史学并不是具体科学之一，而是同每一門具体社会科学发生独特的联系。

馬克思曾經說过，他只知道一門科学，即历史科学，它又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sup>①</sup>。

这种說法的涵义又同馬克思主义貫穿在全部科学中的历史主义有关，因为整个现实是在不断变化和不断发展的，因为整个现实是一种过程，是一部历史，所以，我們也只有以历史态度来研究现实时，才能够完全認識现实。馬克思談到已丧失生存权的旧哲学时，甚至认为，“能够取而代之以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結果的綜合”<sup>②</sup>。

馬克思把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識，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联系等等的原理也认为是这种抽象之列。不过馬克思作了一个保留，认为这些抽象只有同现实的历史結合时才有意义。

“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們只能对整理历史資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資料的各个层次間的連貫性。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們不提供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們着手考察和整理資料（不管是有关过去的还是有关現代的）的时候，在实际闡述資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現。这些困难的克服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約，这些前提在这里根本是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是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得出的”<sup>③</sup>。

---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0頁。

② 同上，第31頁。

③ 同上。

恩格斯在晚年时在他的一封信中也是这样說的：

“……不把唯物主义的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导綫索，而把它当作現成的公式，将历史的事实宰割和剪裁得适合于它，那末唯物主义的方法就要适得其反了”<sup>①</sup>。

因此，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科学之間存在着最密切的联系，社会学的范疇是从分析历史过程中而加以抽象的方法引伸出来的，而且除此之外，这些范疇还充作整理历史资料的根据。我們知道，这是在研究同一个历史过程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两种科学的学科；考察历史过程的邏輯形式，即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邏輯形式，只是在它的清除了偶然性的抽象性上与历史形式有所不同。因此很明显，沒有历史科学或者在历史科学之外，就不可能有科学的社会学；只有两者的統一才能給我們充分存真地反映现实。不仅如此，这一个学科如果沒有另一个学科就不可能正常地发展，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由于总结具体的历史資料而不断地丰富起来的，而史学所以有其彻底的科学性也应归功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論的基础。

我們在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和史学之間存在着不可分离的联系时，为了說明問題起見就应当介紹具体科学的中間环节。我們知道，历史唯物主义乃是具体科学研究成果的总结，因为我們总是借助于总结具体科学所作出的局部規律来系統說明社会现实发展的最一般的規律。而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作为历史科学的“修正的”形式从历史科学中成长起来的。这两种論断之間是否有矛盾？它們彼此間是否会冲突呢？

更精确的分析表明，这些論断是处于和諧的关系中，它們之間沒有矛盾。不过，这个問題需要补充說明。

---

<sup>①</sup> 《恩格斯給愛因斯特的信，一八九〇年六月五日》，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28 頁。

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乃是具体科学研究成果的总结——这一论断是什么意思？这些具体的社会科学对史学还保持怎样的关系？

前面已经说明，我们谈到一般史学时，所指的乃是关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历史概念的总和。现在我们可以再向前迈进一步，断定每一门科学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和理论。例如，法学有法学的历史和理论，艺术、文学、经济学等等也都如此。如果我们谈到社会史，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它的抽象理解，那么，我们所指的正是关于社会生活个别方面的这些局部历史的总和。但是在这些局部历史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通常是有一个中间环节——即这些具体部门的理论。大家知道，其中每一个部门都出现同一个规律性：作为某一过程具体反映的历史（以历史科学的含义来说）就是每一部门理论的基础；而从作为“修正”形式的历史中，从作为逻辑观的历史中就生长出该部门的理论。每一个具体科学部门的理论都会作成发展的特殊规律。总结这些规律，依靠科学的抽象来找出这些规律的一般因素，我们就能得到社会现实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些规律就是社会发展的一般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

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真正是从历史科学中生长出来的，或者直接，或者间接从历史科学中生长出来的——通过具体科学的理论。因此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在上述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对史学和对具体科学的关系问题的论断之间没有任何矛盾：历史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从历史中汲取它的资料，虽然它不是经常直接地，而往往是间接地，通过理论上总结具体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的方法来汲取。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比较具体地来探讨一下上述的命题，即史学和社会学虽然有自己的特点，可是这两门学科却能揭示和



系統說明社会发展的規律，即历史的規律。历史唯物主义根据具体科学研究的总结，并綜合这些总结，从而揭示和系統說明社会发展的一般規律；而这种一般規律在社会生活每一领域中各自独特地表现出来，并且构成社会科学所有具体学科的方法論基础。而历史科学，更确切些說，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历史科学揭示和系統說明对各个时代、各个领域等等有关的局部規律。因此，相互依賴关系看起来并不像下面的情形，即历史科学以社会学所作出的規律为基础，用新的材料来闡明和檢驗它，并加以具体化(虽然这在科学方面也是重要的职能)；历史科学揭示和系統說明在一定时期和一定领域中发生作用的新規律，因此，它便为新的社会学的总结为系統說明新的发展規律提供了資料。

苏联历史科学就是这样規定自己任务的：

“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論基础上的苏联历史科学的主要任务，恰恰就是認識每一个时代所特有多种多样的历史規律，以及在每一个国家的条件下这些規律发生作用的特点……

“因此，历史研究决不在于簡單收集闡釋一定的、业已发现的、永远老一套的一般規律作用的例子。一方面，它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規律具体化，而另一方面又以揭示历史发展的規律性来丰富历史唯物主义”<sup>①</sup>。

对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相互关系問題的分析可以把史学家的任务具体化，武装他們去反对反科学曲解的威胁。

从这一分析得出的結論是：史学家的任务乃是具体反映历史过程的全部丰富內容。史学家所用的方法应当是历史的方法，也就是說，从事件的发展中，从事件按時間先后的順序和起源的

<sup>①</sup> 《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科学的理論基础》，苏联《历史問題》，1952年第7期，第12頁。

联系中来考察事件的方法。史学家使用这一方法，应当既汲取事件的重复因素，也汲取其不重复因素；既反映规律性的事件，也反映偶然性事件，同时并把求得关于研究对象的发展规律性的概念作为主要的要求。因此，史学家在选择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实时，就有了标准；这些事实中既包括表现发展规律性的事件，也包括阻碍或者改变这种规律性的作用的，因而也就是偶然性的事件。

史学家首先可以借助于科学方法论，即历史唯物主义来实现他复杂的任务。历史发展的一般理论，既然同时也是史学的一般方法论，所以对史学来说，并不是什么外在的东西；相反，作为理解历史过程的逻辑形式的历史唯物主义乃是总结社会科学过去研究的结果。史学家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方针，借助于这种研究所取得的总结和规律来研究历史过程。对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相互关系的适当理解，能够武装史学家去进行反对两种曲解的斗争。

第一种曲解是把历史科学变为“纯记载”，变为根据主观的标准积累事实，这就取消了史学的科学性。

另一种曲解在于借口反对个别论而把历史科学变为死板的社会学公式。

把历史科学建筑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基础上和适当地理解这两门学科的相互关系问题，乃是抵抗两种曲解的抗毒剂。

## 第二节 历史过程中的个人和群众

托马斯·卡莱尔于1840年在作关于英雄和英雄崇拜的讲学时，曾经说过：

“……所以，据我看来，通史也就是记述人类在世界上所做

所为的历史，实质上乃是在历史上活动的偉人的历史。这些偉人曾經是領袖、是雕塑家，他們显现出自己是人类的典范，是广义的、人类大众想要做的或想要达到的一切的創造者。世界上所完成的一切，实际上是外在的、物质的結果，是这些天賜的偉人思想的实际实现和具体化；所以可以很公道地說，这些偉人的历史，乃是通史的灵魂”<sup>①</sup>。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簡明教程》总结了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在历史中作用問題的意見：

“不是观念决定人們底社会經濟地位，而是人們底社会經濟地位决定人們底观念。如果杰出人物底观念和願望竟与社会底經濟发展背道而馳，竟与先进階級的要求背道而馳，那末这种杰出人物就会变成无用之物；反之，如果杰出人物底观念和願望正确表現着社会經濟发展底要求，正确表現着先进階級的要求，那他們就能成为真正杰出的人物。

“当民粹派认为大众是群氓，认为只有英雄才能創造历史并把群氓变为人民的时候，馬克思主义者便回答他們說：并不是英雄創造历史，而是历史創造英雄，也就是說，不是英雄創造人民，而是人民創造英雄并推进历史。英雄，杰出人物，只有当他們能正确了解社会发展条件，了解应如何改进这些条件的时候，才能在社会生活中起重大的作用。英雄和杰出人物如果不能正确了解社会底发展条件，却竟不顾社会的历史要求而胡作乱为，儼然以历史底‘創造者’自居，那他們就会变成滑稽可笑，一錢不值的倒霉人物”<sup>②</sup>。

---

① 托馬斯·卡萊尔：《論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事蹟》，倫敦 1890 年英文版，第 1 頁。

②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18 頁。

在下面又从唯物史观的基本論題中得出結論說：

“由此可見，社会发展史同时也就是物质資料生产者本身底历史，即身为生产过程中基本力量并实现着社会生存所必需物质資料生产的那些劳动群众底历史。

“由此可見，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便不能再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底行动，归结为国家‘侵略者’和‘征服者’底行动，而是首先应当研究物质資料生产者底历史，劳动群众底历史，各国人民底历史”<sup>①</sup>。

这些議論談到了对个人在历史上作用問題的直接对立的两种观点：即唯心主义的英雄主义史学观点和強調人民群众在历史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唯物主义史学观点。

我們可以把卡萊尔的立場当作是古典的或者英雄主义的史学；而“主观社会学”、个别論、“推理”社会学之类的唯心主义的近代流派，在这里則沒有提出任何新的东西。我們可以从現代資產階級历史文献中举出大量例子来证明这种概念的活动力，证明敌視人民群众的态度，证明崇拜“領袖主义”的英雄主义理論。整个法西斯史学都渗透了这种精神；湯因比現在就是以这种精神在写作<sup>②</sup>，所有把个人历史与群众历史割裂开来的人实际上都是以这种精神在写作（我国文献中可以作为例子的有属于不同时期的著作，如斯塔尼斯拉夫·洛斯的《馬里和苏拉》，以及亨利希·維列錫茨基的《約瑟夫·毕苏斯基》）。从近代历史文献中，还可以举出这样一本著作来作为从理論上論证这种立場的例子：如W·福格尔的《論西欧历史生活的节奏》<sup>③</sup>。作者把历

---

①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59頁。

② 湯因比：《經受考驗的文明》，1948年紐約英文版。

③ 《历史杂志》，129卷，1924年德文版，第16—20頁。

史看作是人類意志的產品，把同人民群眾相對立的社会上层分子看做是历史的真正創造者。福格爾用明确的詞句 (*expressis verbis*) 承認自己的概念是卡萊爾觀點的繼續。

從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前面引用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原文中所表達的觀點，乃是經典的觀點。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對青年黑格爾派 B. 鮑威爾等人的著名論戰，在馬克思主義文獻中奠定了這種觀點的基礎。青年黑格爾派的信徒們把精神同群眾對立起來，實際上是把杰出人物變為历史的創造者。

這兩種觀點的對立表現在於什麼地方呢？它表現在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對研究历史過程的態度上的根本對立。

以卡萊爾為承宣官的英雄主義的史學，是在宣稱觀念支配历史，創造历史的历史唯心主義的基礎上生長起來的。因此，這種史學結果就提出這樣一種論題，認為杰出人物——觀念的體現者和創造者——是历史的創造者，認為历史發展的規律是沒有的，因為創造历史的個人是作為“自由人”出現的，而“創造”的過程也是以“自由的”、名符其實的 (*ex definitione*) 非決定論的過程出現的。

以历史唯物主義原則為基礎的科學的史學則與英雄主義的史學截然相反，因為科學的史學，認為不是社会意識決定社会存在，而恰恰相反，是社会存在決定社会意識。因此，這種史學結果就提出這樣一種論題，認為實際上是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历史，不過不是任意地創造历史；從這一角度來看，特別是杰出人物也是历史創造的產品。馬克思主義對杰出人物的作用給予了完全正確的評價。同時，人民群眾的作用被提到了首位，而承認這種人民群眾的作用是与承認历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性有機地聯繫着的。

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考察历史過程的不同方法特別表現在

对个别和一般关系问题的不同的态度上。人民群众中的个人问题，人民群众在历史过程中的关系和作用问题——这就是通过社会发展具体问题表现出来的个别和一般的问题。前面的论断现在应当能帮助我们解决这样一种问题，而这种问题是更一般问题、即关于个别对一般的关系问题的具体化。因此，我们在考察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时，我们应当明确地着重指出，我们的任务决不是全面叙述这一复杂问题，因为这一问题需要一部专门著作来加以研究。我们只给自己提出比较简单的任务，限于这一问题一个方面，即成为本章中心点的一个方面。

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英雄主义的史学，因为它把个人变成历史的创造者，把伟人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从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则维护这样一种论点，即认为个人从属于阶级，个人是阶级的作品。

唯心主义对个人在历史中作用的观点所本的前提彼此心照不宣，那就是个人，至少是伟人，是完全自由的，并不受社会条件影响。如果没有这种前提，则把历史当作杰出人物的“创造”的英雄主义历史观就得破产。正如这类说法中所常见的那样，其主要错误的根源就在于理论的出发点。在这种情况下，这一错误的根源在于完全不了解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正如我们已经指出过的，这就是基本的、最初的唯心主义基本论题的二度表现；而这种唯心主义论点认为，人的意识、观念决定历史的发展。

唯心主义的这种在社会上孤立的个人的观点乃是无效果的抽象的结果。它是各类“鲁滨逊幻想”的残余，这种鲁滨逊幻想曾在早期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中起过多少重大的作用，而且是属于社会科学的史前时期。马克思主义提出具体个人的科学观点来和抽象个人的这种科学以前的观点相对抗。因为后者孤立地

来考察个人，并把个人同群众对立起来；所以馬克思主义把个人不仅当作是社会的組成部分，而且也当作社会的創造来加以考察，决定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馬克思在《費尔巴哈論綱》中写道：

“費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①</sup>。

馬克思在《論綱》中反对費尔巴哈，因为費尔巴哈把抽象的、孤立的单个人的观点作为自己概念的前提。实在的个人并不是抽象的。实在的个人并不孤立地在生活。个人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誕生和受教育，在一定社会階級中形成的。这一階級的利益和意图反映在他的活动中。个人也取得階級所积累的經驗，个人是在业經存在的生产关系的条件下活动，并由現存的上层建筑所形成的。在某一社会和某一时期中占統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总和，首先是社会各階級之間的关系，决定着在某个历史社会中所誕生的个人的面貌；甚至是偉人，甚至是循着改造这一社会基础的方向进行革命活动的个人的面貌，也取决于它。因为这种行为和这种革命立場乃是客观地完成变革的反映。我們談到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时，其意义正是指，即使杰出人物的立場与活动也是这些客观关系的反映。

但是如果我們承认这一論題，如果我們因此而承认唯物主义的論題，即承认人是条件的产物这一論題（馬克思有一个重要的保留：即人在改变条件，“教育者自己應該受教育”），那么，用英雄主义的观点解釋历史的可能性就破灭了；而观念形成历史发展这一論題，以及个人与群众对立、个人是历史的創造者的論題，

---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頁。

也一起不能存在了。个人是人民群众的組成部分，是人民群众的产物。偉人和“英雄”也是这样的，因为率领这些群众，并领导这些群众的人也是人民群众的一个組成部分。

了解个人同群众的客观关系，就打破了在考察历史过程中的主观主义，因此也为社会科学开辟了道路。因为并不存在沒有客观規律性的科学，而承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規律性，是与承认人民群众(在其活动中表现了重复性)的作用有不可分离的联系的。

列宁写道：

“司徒卢威先生完全正确地指出，階級斗争理論可以說在完成着社会学的总意图——把‘个人因素’归結为‘社会根源’……階級斗争理論所以是社会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因为它十分确切地而肯定地規定了把个人因素归結为社会根源的方法。第一，这个理論制定了社会經濟形态的概念……第二，‘个人’在每个社会經濟形态范围内的活动，这些极为多样的似乎不能加以任何系統化的活动，已被綜合起来，归結为……个人的集团的活动……归結为階級的活动，而这些階級的斗争决定着社会的发展……主观主义被把社会过程看做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代替了，沒有这种观点，当然也就无所谓社会科学。司徒卢威先生很正确地指出：‘忽视社会学中的个人，或者确切些說，从社会学中把个人一笔勾銷，实质上是追求科学認識的个别場合’……‘个体’不仅存在于精神世界中，而且存在于物质世界中。全部問題在于：‘个体’受某些一般規律支配，这就物质世界來說早已肯定，而就社会方面來說則只是由馬克思的理論确定下来的”<sup>①</sup>。

很久以后，在1914年时，列宁在他的《卡尔·馬克思》一书

---

①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37—339頁。



中，再次着重指出下述事实，即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现象的研究变为科学，正是因为它同时创造了研究人民群众活动的可能：

“……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历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sup>①</sup>。

我们所涉及的关于个人对群众关系的问题在这里与社会发展的规律问题直接发生联系。

英雄主义观点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这种否认的社会根源，早已在1880年刊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的一篇对卡莱尔的书评中加以揭发了<sup>②</sup>。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文中指出，天才的崇拜是以关于永恒的发展规律作用的理论原理为基础的，而这种规律只有借助于“高贵的”理智才能加以认识；这种天才崇拜在关于有产阶级特殊作用的结论中表现出自己的阶级内容。因此，有教养的人，也就是卡莱尔所理解的“高贵的”人只有从有产阶级中产生。否认群众作用，从而也就是否认历史中的规律性的作用，其根源就在于替有产阶级的统治辩护。

承认历史中群众作用的观点，是以历史过程中的重复性为根据的，从而也就是以规律性为根据的。但是上述观点同马克思主义解决个别和一般问题的方法，怎样联系起来呢？

如果我们不是像社会学中主观主义者所做那样，抽象地，孤立地，考察个人，而是具体地，就是把个人的本质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例子来表明个别对一般关系的全部辩证法。

---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8页。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评托马斯·卡莱尔〈当代评论（一）当前的时代。（二）模范监狱〉》，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00—312页。

我們在个人活动中，在个人立場上，在个人傾向上可以看到社会关系的反映。因此，我們研究这些关系时，同时也要研究个人。

“……唯物主义的社会学者把人与人之间一定的社会关系当做自己研究的对象，从而也就是研究真实的个人，因为这些关系是由个人的活动組成的”<sup>①</sup>。

不过，我們研究的并不就是这个一定个别的个人，而是每一个个人，他屬於一定的社会集团，一定的阶级，根据一定的社会关系来活动，在一定意义下成为这些关系的总和。因此，由于在每一个人的活动中，在他的立場上和傾向中，存在着整个阶级所特有的共同因素，所以，在每一个这样的个人中，在他的活动中就会有規律表现出来。大家知道，具有客观規律性意义的規律是重复过程的特点；而这种重复性在个人活动中所表现的程度应以个人的活动，就是为整个阶级所共有的主观条件的反映为准。同样，个人也不是，而且也不可能同他所屬的社会集团相对立；只有个人所屬的社会集团同人民群众对立的时候，个人才可能同人民群众相对立。

个人活动中也表现出某种一般的因素即屬於較大的集团所有的，并把个人和阶级結合起来的一般因素；因此，在个人的活动中就表现出一定的客观規律。但是同时，每一个人具有只有他所特有的特点，即不重复的特点，把他同周围其他个人区别开来的特点，如外貌、嗜好、才能等等。对偉人来说，他在某一方面的专有特点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些专有的特点使某一个个人能够成为偉大的艺术家、学者、將軍、政治家，使他能够比別人“更能高瞻远矚和热衷事业”，因此能够比別人更好和更有效地

---

①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84頁。

起作用。从我們上面所說关于个人对階級的关系来看，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偉人的能力总是根据一定社会階級的利益，而且在一定社会階級利益范围之内表现出来；正是这些利益决定个人能力表现的性质，而且还往往决定个人能力表现的一般可能性。

因此，每一个人的活动中都表现出一般因素和只有个人所特有的个别因素的統一。在每一个人的活动中都表现出规律和偶然性。当我们談到具体的个性时，所指的就是这点。

因此，个人对社会階級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因为个人一方面是社会階級的組成部分，在他的活动中表现一定的一般規律性，同时他又是一个个别的人。在每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重复因素和不重复因素，即一次因素。我們在个人身上发现階級的反映，而同时个人也具有他自己的个别特点，把他同周圍一切其他个人区别开来。这是既指平常人、“普通”人，也指特殊天賦的个人；后者比別人能够更好地在其活动中反映階級利益，并且在有利条件下能够起到政治和思想領袖的作用。例如，莫里斯·多列士，这位“人民的儿子”，具有他的整个階級所共有的特点，是該階級的卓越代表，但同时，他也有把他同如杜克洛或其他人区别开来的个别特点。真正的艺术家善于从个别中去捕捉一般的典型的东西，能够从个人中去表达階級，而不会使自己英雄的个性丧失掉任何东西。高尔基著作《母亲》中的母亲，聶維尔里著作的《紙浆工厂日記》中的辛斯基，就是一个例子。

要解决个人对人民群众的关系問題，要解决个人对社会階級的关系問題，只有根据个别对一般关系的辯证法才有可能；而这种解决就成为解决就理論和实践观点上看来都感兴趣的关于偉人作用問題的基础。分析这一复杂問題并不是我們的任务。我們只指出，馬克思主义把偉大的杰出的人物看作社会关系的产物，看作是一定階級的产物，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的偉大并不

在于他能自由地“創造”历史，而在于实现历史客观規律的要求。然而，这并不与充分承认和正确评价杰出人物独有特点相矛盾。

作为工人阶级意識形态的馬克思主义对于偉人的作用，特别是人民群众領袖的作用予以十分正确的估价。但是馬克思主义也正确地决定了个人的地位，并且看到总是人民群众起决定性的作用，而偉人只是历史必然性的体现者。

斯大林在和艾米尔·路德維希談話中令人信服地着重指出的正是这种因素：

“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們誕生的时候就已經具备的一定的現成条件。偉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認識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如果他們不認識这些条件而想凭自己的幻想去改变这些条件，那末他們这些人就会陷于唐·吉訶德的境地”<sup>①</sup>。

从这一立場可以为政治实践和史学实践得出一些实际的結論。

第一个結論表示导至个人解放的爭取群众解放斗争的必要性。

第二个結論在于历史科学应当研究的不是个人的历史，而是群众的历史。

科学地解决历史过程中个人对群众的关系問題，从而就是解决偉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問題，乃是馬克思主义方法論的巨大成就。由于社会科学中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場，由于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立場，由于对待个别对一般关系問題的辩证态度，这种解决才有可能。个人对人民群众的关系問題，不仅具有理論意义，而且也具有实践意义。正因为如此，这一問題才成为两种敌

<sup>①</sup> 斯大林：《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維希的談話》，見《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4頁。

对哲学陣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同时也成为两种敌对政治陣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冲突面；这种冲突既表现在争取解放人民群众的实际斗争的問題上（解放人民群众是解放个人的前提），也表现在于科学的史学的問題上，因为科学的史学要求研究物质财富生产者即人民群众的历史。

我們知道，英雄主义观念包含要取消历史的客观規律性，从而就是要取消科学的史学的可能性。这种观念在资产阶级历史方法論中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現在姑且从現代英国文献的无数例子中举出一个例子来作为說明。下面引用的这段話的作者是一位资产阶级科学界中公认的权威人士。

“我反对‘进步’和‘进化’的含糊理論，也就是說我不相信这样的理論，因为我认为历史是一系列决非必然的事件，因此，我們应当提出出現完全特殊人物，即那些其实为数不多的人物的无可怀疑的事实；这些人物能給事件以意想不到的傾向，而这些傾向通常与当时事物自然过程所表现那种傾向又完全不同。托馬斯·卡莱尔的理論現在是不会受到欢迎的；然而他所持的这样一种观点并没有錯：即他称之为特殊人物的‘英雄’在一定情形下不仅給自己的时代，而且还給未来的許多世紀打上了烙印”<sup>①</sup>。

反对史学中反科学的、主观主义立場的斗争就必须用尽一切方法：如借助于批評和用积极证明馬克思主义立場的优越性的方法来进行，但这一切从方法論观点上看来是以有利于史学家創作为出发点的。現在我們試用历史著作中具体例子分析具体問題来证明这种实际效益。

---

<sup>①</sup> 查·阿曼：《論历史的編写》，倫敦 1939 年英文版，第 130 頁。

### 第三节 对史学家創作的結論

上面我們談的是些抽象的問題。不錯，我們也附帶指出了這些問題对史学家研究工作的實踐意义，不过这只能算是提出問題，不能算是分析問題。現在应当来填补这块空白。

我們且試以根据对研究工作的實踐具有重要意义的問題的 analysis 来做这件工作。我們試用下述方法来。例如現在有一些历史事件，它們已成为用馬克思主义方法論和唯心主义方法論进行研究的对象。对比研究的結果可以更好地評價所用方法的效果。我們可举馬克思的历史著作《路易·波拿巴政变記》作为以馬克思主义方法論为基础的科学著作的例子，該书对法国1848—1851年的事变作了分析。这一时期也是資產階級史学家研究的对象。为了排除使問題意外复杂化的因素，我們举出一个在資產階級著作中享有科学权威和客观史学家称誉的著作者。我們現在具体地来談談在《19世紀史》这部集体著作（拉維斯和藍博主編）<sup>①</sup>中所引用的謝尼奧博斯所作的評價。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政变記》一书中采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謝尼奧博斯虽然同情“历史綜合”派，但在自己的概論中却采用了与英雄主义观和个别論有关的唯心主义方法。拿在階級立場上和方法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方法——显著对立的两位作家的研究結果进行对比，就能表明：对于我們在前面叙述时比較抽象地探討的那些問題所采用的这样或那样的考察方法将会在研究實踐中导致什么样的結果。同时，也必須再一次提出一个保留意見，我們決不想对馬克思的天才著作，以及

<sup>①</sup> 沙尔·謝尼奧博斯：《1848年革命和1848—1852年法国的反革命》，見《19世紀史》，1938年莫斯科俄譯本，第5—41頁。

謝尼奧博斯的作品进行全面和詳盡的分析；我們只想談幾個問題，把它們作為例子加以探討。

\*     \*     \*

我們在對比上面所提到的著作時，當然應當記住馬克思的天才獨創能力。顯然，即使謝尼奧博斯也應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那也是無法與馬克思的天才獨創能力相比的。《路易·波拿巴政變記》，無論從方法和科學正確性觀點來說，還是從藝術形式的觀點來說，都是馬克思的傑出作品。

但是，甚至注意到這些保留意見時，把馬克思的著作同謝尼奧博斯的作品進行對比，還是會顯出一幅驚人的景象。這一對比之所以驚人，正因為兩者不僅在階級立場上，而且在科學價值上都有完全不同的差別：在馬克思是方法論上的成熟性、科學的精確性及歷史事件反映的真實性，而謝尼奧博斯在科學上則是難以想像的平庸和無知。

肯定這一事實使史學家不得不思考一下：為什麼會引起這樣深刻和根本的差別呢？

我們先從我們前面所說過的對科學研究的客觀性和研究者的党性立場之間不可分離的聯繫問題的意見開始。

馬克思從工人階級徹底的黨性的立場來分析波拿巴政變史。正因為這樣，他才能够對事件作出正確的精密的科學分析，才能揭示並指明真正在發生作用的社会階級，指出它們的意圖和它們的錯誤，它們的利益和鬥爭。從上述關於歷史研究中邏輯方法和歷史方法統一問題的結論中很明顯地可以看出，這種立場顯示了在研究工作中方法論上充分的成熟性，因為這種立場能接觸到，作為歷史發展的一個環節的每一事件，因此，也就揭開了真實的歷史過程，如果需要的話還可以從它更高的發展觀點來評價或放過歷史上的偶然曲折。由此可見，馬克思採用

的方法，特別是選擇歷史上重要事實的標準，是與他的無產階級黨性有着不可分離的聯系的。

謝尼奧博斯從自由資產階級立場來寫了一部1848—1952年的歷史，而這種立場的局限性和無能曾遭到馬克思的嘲笑。因此，謝尼奧博斯採取了與馬克思完全相反的黨的立場。正因為階級立場的這種局限性首先決定了歷史真理在謝尼奧博斯著作中反映的有限可能性，對他所採用錯誤的唯心主義的方法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我們不去深入研究細節，只看看馬克思和謝尼奧博斯在研究方面給自己提出了哪些任務。

馬克思從1851年12月開始來敘述政變史，即當時最重要的時事史。他所寫的歷史是根據衛登麥爾的要求而寫的歷史，因為他分析按時間先後順序排列的事件的全部詳情細節。但正因為馬克思力求爭取高度的歷史正確性，所以能指出所描寫的事件的規律性，從而也就揭示和表達出事件動力的機制。馬克思使自己的著作成為社會階級及其政黨的歷史是從一定立場、即從工人階級立場來考察的階級鬥爭史。

謝尼奧博斯同馬克思相反，他限于對事件作或多或少忠實於“個別論的”表達。結果，他便得到了一種事實的混合物，這個混合物是以偷偷運用個人乃是歷史創造者的前提為基礎的；因此，所描寫的過程的規律性，從而也就是這一過程的階級機制都看不見了。結果，我們看到馬克思的是科學地反映歷史真實，而謝尼奧博斯的對事件的非科學的平淡的記述。這就是採用“規律論”和“個別論”方法——借用資產階級史學的傳統術語——結果的差別，而這就是在比較上述著作時使人感到驚訝的地方。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政變記》第二版序言中寫道：

“……本書是根據對於事件的直接觀感寫成的，……”



“在與我這部著作差不多同時出現並且是專論同一問題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只有兩部：雨果著的《小拿破侖》和蒲魯東著的《政變》。

“雨果只是對政變事件負責發動人作了些辛辣和諷刺的詈罵。事變本身在他的筆下却竟繪成了晴天的霹靂。他認為這個事變只是一個人的暴力行為。他沒有覺察到，當他說這個人表現過世界歷史上空前強大的個人主動作用時，他就不是輕蔑而是抬舉了這個人哩。蒲魯東呢，他想要把政變描述成為先前歷史發展的結果；但是，他對於這個政變所作的歷史的說明，却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對於政變主人公所作的歷史的辯護了。這樣，他就陷入了我們那班所謂客觀歷史家所犯的錯誤。反之，我所作的論述是說明法國階級鬥爭怎樣創造了一些條件和情勢，使得一個平凡而可笑的人物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sup>①</sup>。

在上段引文中不僅包含着對歷史事件錯誤態度的批判，而且也包含着對於正確解決問題的積極指示：用揭示歷史過程的階級鬥爭機制的辦法揭示出歷史過程的規律性。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才能在自己的著作中達到科學的結果，恩格斯在德文第三版序文中對這些結果評論得最好：

“的確，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在一個事變——這個事變像晴天霹靂般震驚了整個政治界，這個事變在一些人中間受到了道義憤怒的高聲叫罵，在另一些人中間被看作是從革命中解救出來的出路和對於革命誤入歧途的懲罰，但是這個事變在所有一切人們中間都是只引起過驚異，而卻沒有被任何人了解的，——在這樣一個事變剛一發生之後，馬克思立即發表一篇簡短的諷刺作品，里面敘述了二月事變以來法國全部歷史過程的

<sup>①</sup> 馬克思：《波拿巴政變記》，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19—220頁。

內在联系，把十二月二日的奇迹解釋为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結果，并且他这样解釋时除了对政变主人公表示完全應該的輕蔑之外，是用不着采取其他态度的。馬克思把图画描繪得如此巧妙，使得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一些新的证据来证明这幅图画曾是把现实反映得极为真确的。他对当前的活的历史了解得如此卓越，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把事变的意义洞察得如此明白，这真是无可倫比的”①。

恩格斯說明了为什么这会可能之后，进一步指出下一事实，就是馬克思发现了階級斗争的規律是一个偉大的历史发展的規律；而这种发展是建筑在生产方式是整个历史过程的基础这一点上面的。

“这个規律对于历史的意义，是与‘能力轉化律’对于自然科学的意义相同的，它在这里也是供馬克思用以理解第二法兰西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在本书里，他用这段历史檢驗了他所发现的这个規律的正确性；虽然時間已过了三十三年，但我們还是必得承认这个試驗获得了光輝的成就”②。

馬克思从階級斗争的角度来对革命的性质和外部形式，进行方法論的分析，特別对法国 1848 年的二月革命进行了分析。他从階級斗争的角度来把事件的全部过程在邏輯关系中表达出来；而这些事件在具体历史条件下使得 1851 年 12 月 2 日所发生的政变成为可能。他从階級斗争的角度提出关于 1848—1851 年事件分期的非常重要的問題。馬克思在这里划分了三个主要时期：(1) 受到无产階級深刻影响的二月时期；(2) 从 1848 年 5 月 4 日到 1849 年 5 月 28 日的时期，也就是立宪国民議会时期，当时团结在《国民报》周围的資產階級共和党人起着主要的作用；(3)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221 頁。

② 同上，第 222 頁。

从 1849 年 5 月 28 日到 1851 年 12 月 2 日的时期，当时以资产阶级保皇党人为首的“秩序党”占居了领导地位。如果我们在这里再补充指出该书最后一章中马克思对法国农民的作用所作的天才的评论的话，那么当时起作用的一些主要社会力量就都显示出来了。因此，发展的规律性已非常明显，同时，事件的“英雄”面貌也获得相应的规模。

马克思叙述了路易·波拿巴所完成的政变。他把这次政变并不是当作创造历史的个人的事，而是当作由历史“推选出来的”个人的事来看待。分析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分析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的机制就能说明拿破仑三世型那样的冒险家为什么并怎样会夺到政权的，更确切些说，资产阶级自己为什么会把政权交给他的。我们举马克思对当时在法国起作用的阶级力量的分析来作为说明：

“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继立宪党统治之后而起的是吉伦特党的统治；继吉伦特党之后而起的是雅各宾党的统治。这些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都是依靠更进步政党的。只要某一个政党已把革命引导再不是它所能跟着行进，尤其不是它所能领导行进的时候，这个政党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大胆的同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去。这样，革命是沿着上升路线行进的。

“1848 年革命中的情形却是相反。当时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小资产阶级民主党的附属物。后者叛变了前者并促使前者在四月十六日、五月十五日和六月事变中遭受了失败。民主党则全靠资产阶级共和党双肩支持。当资产阶级共和党刚刚感到自己立足稳固时，它马上就把这些麻烦同志抛棄，而自己就慌忙跑去依靠秩序党双肩支持。但秩序党聳了聳肩膀，抛开资产阶级共和党人，自己站到武装力量肩膀上去；它还继续以为是坐于武装力量的肩膀上时，忽然一天发现这肩膀已经变成了刺刀。每个

政党都脚踢那从背后扑来的政党，而从前面伏着那向后退走的政党。无怪乎它在这种可笑的姿态中失去平衡，装出必然的怪脸和作着可怪的跳跃而跌倒下去。这样，革命是沿着下降路线进行的。在二月起义的最后街垒还没有拆去，而最初的革命政权还没有建立以前，革命就已陷于这种后退的运动状态了”<sup>①</sup>。

这就是对事变的简短记载，但是这种记载是以对当时发生作用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进行非常深刻和精确的分析为基础的。

“英雄”的作用就在这种基础上非常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当资产阶级自己毫不违反法国演剧格式定型规则而以最认真的姿态表现着十足的滑稽剧时，当它一半被欺骗一半被说服而自以为是表演得庄严堂皇时，——在这样的时候，一个把滑稽剧简单看作滑稽剧的冒险家，当然是一定要获得胜利的了。只有当他已经战胜了穿着仪装的敌人，并且认真演起自己的皇帝角色，在拿破仑假面具下装作真正拿破仑的时候，他才成了他自己的世界观的牺牲品，成了一个再不把世界历史看作滑稽剧而是把自己的滑稽剧看作世界历史的认真的丑角了”<sup>②</sup>。

马克思完全正确地评价个人及主观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大家知道，就在《路易·波拿巴政变记》的开场白的头几段文章中，马克思已指出历史发展中传统的作用。但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确定个人在客观上起作用的规律中的地位。正因为这样，他对历史的态度才与英雄主义的态度直接相反；因为他根据可靠的唯物主义基础，提供了历史过程的科学景象。

我们已经说过，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马克思的科学成就是导源于他的立场的无产阶级党性的。与这种立场有关的是马克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5页。

<sup>②</sup> 同上，第272页。

恩在分析材料的基础上所作的历史总结，而这些总结是论断史学和社会学的关系的极好的说明。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政变记》一书中给史学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提出了明显的教训：他的著作说明，当史学家用他自己的研究对社会发展的已知规律性加以新的说明，发现和系统说明新的规律性时这意味着什么；他的著作还说明，他发现了哪些新的规律性，并且是怎样发现的。我们且试用一个例子来分析所涉及的问题，这例子就是马克思主义考察资产阶级国家本质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关系问题。同时，这也是一个补充的证据，证明马克思整个研究工作中所充满的，并构成其真正力量的那种深刻的党性。

《路易·波拿巴政变记》是一部历史著作。当马克思接受卫登麦尔要求时，也是这样理解的；恩格斯在自己的序言也是这样估价的，从著作中所采用的历史方法的角度来看，情况实际上也是这样；历史方法把事件依其时间先后顺序和其全部详情细节来加以考察。但是马克思根据无产阶级的党性立场，——马克思用确切的辞句(*expressis verbis*)把无产阶级党性立场同所谓客观史学家的立场对立起来——从决定当事人的地位和作用的阶级斗争的角度上来考察历史过程。马克思有意地应用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统一的原则来研究和发现在阶级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发展的规律性，结果便写出一部同“客观的”“纯”记载完全相反的著作。《路易·波拿巴政变记》一书中，在历史记载和作成规律或使规律在一定条件下具体化的总结之间没有任何明显的界限。

这决不意味着，在史学同作为社会发展一般理论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差别在这里已经消失了。正相反，上面引用的恩格斯的言论恰恰证明，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想

要檢查历史唯物主义和他所作出的作为历史发展的基本規律的階級斗争規律的正确性。因此，馬克思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規律的知識武装起来着手研究 1848—1851 年的历史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們看到，他也并不只把闡釋已知規律的职能当作历史研究。

馬克思在研究具体历史材料时，还要作广泛的总结，而这些总结还包括历史系統說明唯物主义的基本規律，例如，社会存在决定于社会意識的規律。因此，例如，在分析合法王朝派和奥尔良派之間的矛盾时，馬克思指出，这些矛盾可归结为利益的矛盾，因为前者是与大土地所有制有联系，而后者是与大金融資本家有着联系。这种分析的結果，馬克思就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学的总结：

“所以，这两个集团彼此間分离并不是由于所謂原則，而是由于有本身生存的不同物质条件，由于有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由于城市和农村間的旧有对立，由于資本与地产間的竞争。至于同时把它們与某一王朝联结起来的还有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見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則——这点有誰会否认呢？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有由各种不同感情、幻想、思想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由整个階級在其物质条件及与其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来創造和确定着一切。单个的个体既然是通过傳統和教育来获得自己的感情和观点，所以他会以为这些感情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sup>①</sup>。

包含在上述引文中的一般原理是对非常重要的一条最一般的社会学規律的簡述。这里看得出从历史材料到根据这些材料

---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249 頁。

所作的總結的直接过程。然而，馬克思基本上用同样的方法系統說明多半是屬於較短时期的規律，即屬於資本主义时期階級斗争規律性的規律。国家問題也屬於这种總結。

我們再重說一遍，馬克思并不像冷漠无情的“客观的”史学家那样来研究法国 1848—1851 年的階級斗争的。馬克思是从一定的階級——无产阶级——的观点来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任务，他是作为这一階級的領袖来研究这些历史任务的；为未来的战无不胜的战斗作出結論和吸取教訓。正是这种党性观点才能使馬克思从偶然事件的外表下面发现从資產階級真实意图中所产生的某种規律性。偶然事件，对社会輿論來說就像晴天霹靂一样爆发的。

像路易·波拿巴那样的小人怎么会胜利，他为什么会取得政权呢？“客观的”史学家回答說，这是偶然。无产阶级党的史学家回答說：不，这是合乎規律的；这是从資產階級意图中所产生的規律性，是从資產階級惧怕它自己階級統治的命运而产生的規律性；这种恐惧迫使資產階級放棄国家的某些形式，去求助于冒險家，在同最反动階級的妥协中去寻求支援。馬克思主义所作的分析旨在說明法国資產階級向平庸的冒險家投降的具体情况，这也实际上解釋了害怕人民，害怕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达成的資產階級—地主妥协的階級根源。

馬克思在分析国民議會中的階級斗争和政党斗争时指出，“秩序党”向所有不合它意的傾向和意图斗争，甚至向显然是資產階級的，但却当作是社会主义的傾向和意图进行斗争。这种現象的根源何在呢？从美国麦卡錫所煽起的“潑妇案”的角度看，馬克思話的含义多么肯切和新穎。馬克思說，資產階級为反对封建主义所鍛炼出来的武器——民法和进步机构——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轉而反对它的創造者，威胁它們的階級統治，因此成为

“社会主义”的了。接着馬克思指出說，不过法国資產階級还不懂得，在具体的情况下，它自己的国会制度也轉而反对它自己，因为国会制度面向着大多数人时，就威胁少数人的階級統治。

“总之，既然資產階級把它从前当作‘自由主义’提倡的东西指斥为‘社会主义’，那它就是承認說：它本身的利益迫使它要逃避自治制的危險；为要恢复国内的安宁，首先必須使它的資產階級国会安靜下来；为要完整地保持它的社会权力，就不免要摧毀它的政治权力；只有在資產階級作为一个階級被注定要与其他階級在政治上同样处于低微地位的条件下，个别資产者才能繼續剝削其他階級，安逸地享受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的福利；为要挽救它的錢包，必須把它头上的王冠摘下，而使那个保护它的利劍像达摩克拉劍一样悬在它自己的头上”。<sup>①</sup>

上面一段引文是在总结具体历史資料的基础上作成規律的典型例子。我們这里是同一定历史时期的規律打交道，同构成史学的典型規律打交道。这一規律对研究資產階級社会史是多么重要和多么富有成果！要知道这一規律对 1848 年后德国的資產階級—容克貴族的联合作了新的解釋，对在八十年代奥地利人占領的波兰地区所推行的“斯坦契克党人”的政策等等作出了新的解釋。

从害怕丧失自己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否认国会制度的观点来看，馬克思对国家問題感到兴趣，而且他根据对具体的历史研究更加深入地看到資產階級国家的階級本质。

馬克思分析六月事变和无产階級的失敗时，揭示出作为資產階級階級統治的組織資產階級共和国的本质：

“六月起义者的失敗，固然为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国准备和扫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264—265 頁。



清了基地，但同时它指明，欧洲的問題并不在于‘共和国还是君主国的爭論’，而在于其他某种事情上。这一失败已揭示出，資產階級共和国在这里是表示一个階級对其他階級的无限制的专制統治。它表明出，在那些有着发展了的階級构成，有着現代生产条件，有着那种因数百年来的工作而融化了一切傳統观念的精神意識的旧文明国度中，共和国一般只是資產階級社会变革的政治形式，而不……是保持这社会生存的生活形式……”<sup>①</sup>。

这里所作出的規律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規律加以具体化，因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是一定階級統治的机器。我們在这里又与总结具体历史材料的規律打交道。馬克思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对資產階級国家的官僚机器进行研究的。

研究的出发点是对 1851 年 12 月发生的事件进行具体的分析。路易·波拿巴的胜利和宪制共和国的灭亡证明，它只是反对封建主义的資產階級社会的一种政变形式，不过决不是实行改变的唯一形式。議會共和国的灭亡意味着行政权制服立法权的胜利。

“这个行政权力有龐大的官僚机构和軍事机构，有复杂和人造的国家机器，有五十万人的官吏队伍另加上五十万人的軍隊，——这个儼如密网一般纏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专制君主国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潰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潰”<sup>②</sup>。

这种軍事官僚組織消灭了封建主义的分散性，加强了为建立資產階級民族統一所必需的中央集权制。因此，也就連續发生了資產階級的政变——1789 年革命、拿破侖、复辟、宪制共和国——而这些政变都利用这种組織，并且在同革命作斗争中巩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231 頁。

② 同上，第 309 頁。

固这种組織。

“迄今一切政变都只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起来，而不是把它毁坏。那些爭夺統治权而相继更替的政党，都把这个龐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視為自己胜利时的主要胜利品”<sup>①</sup>。

深刻分析資產国家的本质，分析軍事官僚机器的本质是直接根据具体历史資料来进行的；历史記載和总结历史过程規律性在这里交織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貫穿着整个論断过程的无产階級党性特別尖銳地表现在結論中。

馬克思把国家問題同十二月事件直接联系起来分析。而这种具体的历史分析所得出的結論成为馬克思主义的无产階級专政国家理論的基础，同时确定了无产階級革命打击的主要路綫：

“随着小块土地所有制日益加厉的解体，奠立在它上面的国家建筑物也就倒塌下去。現代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中央集权制，只能在与封建制度斗争中鍛炼出来的軍事官僚政府机关的廢墟上建立起来”<sup>②</sup>。

后来，馬克思談到巴黎公社的經驗时，在給庫格曼的信中写道：

“如果你談到我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記》一书最后一章，那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下一次的嘗試，不应如迄今以前一样把官僚軍事机器从甲手轉交乙手，而是要把它毁坏。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个真正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們英勇的巴黎同志們的嘗試恰巧就是如此”<sup>③</sup>。

此外，下列事实也证明这一分析的党性；馬克思把这一分析同无产階級在其反对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国家的斗争中寻求和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09頁

② 同上，第317頁。

③ 同上，第2卷，第463頁。

查明自己的階級同盟者結合起來。農民正是這種同盟者。馬克思根據歷史的分析指出農民的利益已經不像拿破崙時代那樣符合資產階級的利益，而是同資產階級利益發生矛盾時寫道，農民把“負有推翻資產階級制度使命的城市無產階級看作是自己天然的同盟者和領導者”<sup>①</sup>。在1852年舊版中曾經有一段文章，而這段文章後來在1864年新版中被刪掉了，在這段文章中馬克思從在小土地和資產階級秩序下生活的農民失望中得出結論說，農民將成為無產階級的同盟者。馬克思在強調指出農民國家中這一同盟對革命的必要性時，寫過這樣一句有意義的話：

“……無產階級革命就會得到一種合唱，若沒有這種合唱，它在一切農民國度中的獨唱是不免要變成孤鴻哀鳴的”<sup>②</sup>。

我們在這裡又遇到根據具體歷史分析來揭示和系統說明一定社會形態發展的新規律性的例子。

照我們的計劃 我們研究的只是一個問題——即國家問題。這一問題使我們能夠具體認清馬克思著作中發生於歷史記載、總結和系統說明規律之間的，以及發生於史學和歷史唯物主義之間的那些辯證關係。這使我們能夠具體闡釋無產階級黨性立場，對歷史研究所得出結論的科學性和客觀性的意義這一論題。

我們並不算詳盡地分析這段文章，不過我們可以肯定指出，馬克思這一著作的力量及其科學性，就在於這一著作是從無產階級黨性立場寫成的歷史，是真正起作用的社會力量的歷史；就在於這部歷史是在它們的真實運動和相互關係中表明這些力量；就在於它顯示出歷史發展的規律性，因此也為深入了解事件從而為了解在這些事件中起作用的個人的實際作用、觀點和傳統的影響等等創造了可能性。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14頁。

<sup>②</sup> 同上，第317頁。

我們在謝尼奧博斯著作中見到的是完全相反的情形。這是一本站在資產階級階級立場上來寫的唯心主義著作，是一本犯了個別論和對事件採取英雄主義態度的錯誤的著作。

在謝尼奧博斯的書里，甚至連相應地了解社會事實作用，首先是階級鬥爭及其經濟基礎的影子都沒有。歷史被歸結為登錄事實，而歷史事實被歸結是個人的行為和言論。現在舉一個有代表性的例子。看謝尼奧博斯是怎樣記載 1848 年二月事件和怎樣描述路易·菲力普的倒台的。

全文是從被國王深夜召見的梯也爾的談話開始的：

“唔，”國王說“你是否已組成內閣了？”

“陛下問我是否已組成內閣了嗎？我正是為了征詢陛下的意旨而來的。”

“噢，那麼說！你不願意為王朝服務嗎？”

“不，陛下，我不願意在您的王朝服務”<sup>①</sup>。

接着就是國王退位的情景：

“路易·菲力普同自己的兩個兒子談話，然後走進王后的大殿，那里齊集着王后、奧爾良公爵夫人、聶慕爾公爵夫人、蒙巴西埃公爵夫人、她們的孩子們、宮廷最高女官、基佐和德一布洛伊。流淚和嘆氣的情景延續了十分鐘。路易·菲力普轉來後即被王族貴婦們包圍了起來，坐到御座上。奧爾良公爵夫人喊道：‘陛下，不要退位！王冠對我們是太為沉重了，只有您一個人能夠戴它。’”<sup>②</sup>

這段“歷史”就是這樣。同時，絲毫也沒有說明歷史事件更深刻的原因，不了解黨和階級的最簡單的聯繫，不懂得這些政黨

① 謝尼奧博斯：《1848 年革命和 1848—1852 年的法國反革命》，俄譯本，第 8 頁。

② 同上，第 12 頁。

的階級性質。在許多情況下表現出由於不了解事件階級結構而產生的最平庸的無知，例如，謝尼奧博斯把代表小資產階級民主的“改良”黨歸入社會主義陣營。

謝尼奧博斯看不到發展的規律性，並且也不懂得這些規律性。他認為，個人是歷史的創造者，而歷史科學被歸結為對個別事件的登錄。顯然，這樣的“歷史”不可能提供歷史現實的科學景象。

有時可以聽到一種論證，說也可以這樣寫歷史，雖然這並不是最好的方式。必須與這種立場劃清界線，儘可能堅決反對這種立場。要知道這裡指的不是量的差別，而是非科學的編年史和歷史科學之間的質的差別。如果注意到研究的科學性要求的話，那麼這樣寫歷史是無論如何不可以的。

這樣，我們在這裡看到了兩種不同的觀念。一方面是馬克思主義的觀念，即把歷史看作人民群眾的歷史，把歷史過程看作規律性的過程，而個人的歷史作用也包含在這種歷史過程之中。另一方面是唯心主義的觀念，實質上是個別論的觀念，即把歷史看作個人的產品，實際上就是否定人民群眾在歷史過程中的作用和包含在這些過程中的規律性。

此外，我們這裡所談的不僅是兩種理論的觀念，而且也是它們以一定的歷史著作形式表現的實際結果，因為這些著作的目的是描寫一定事件。這些結果對史學家說來是最有說服力的，因為這些結果給史學家指出了，為自己的創作、為研究工作的成效所選擇的方法的意義。從理論觀點來看，我們應該感到驚奇的是下述事實，即馬克思主義方法為更廣泛，同時更深入地反映現實提供了可能性，因為馬克思主義方法在打開唯心主義史學通常所不注意的新眼界時，能夠同時充分注意到個人和主觀事

实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从实际观点来看，应当使我們感到惊奇的是，我們所分析的两部著作所代表的研究結果的巨大差別。特别是主观主义方法完全无法正确反映社会现实的进程。历史預見是个特殊的問題，下一章里将要談到；这一問題只能够在科学基础上，在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方法基础上来加以探討。

\* \* \*

关于史学家选择事实的問題我們曾提到过两次；即批判瑪·韦伯和談到个别对一般关系問題的时候。我們这里又第三次談到这个問題，但不是从理論上来探討这个問題，而只想对这个問題作些具体的說明。

馬克思和謝尼奧博斯都描述了法国 1848—1851 年的事件。但是怎样描述这些事件呢？他們在自己的著作中选择了和描述了哪些事件，而忽略的又是哪些事件呢？为什么他們正好进行这样选择、而他們的基础是什么呢？这些就是与史学家研究工作发生最密切联系的一系列問題，即对史学家創作具有重大意义的一系列問題。

我們在上面从謝尼奧博斯著作中引用了两段文章作为說明，即国王同梯也尔的談話，以及对路易·菲力普退位情景的記載。这样的文章还可以引用很多。例如，謝尼奧博斯是这样記載国民立宪議會解散的历史的：

“晚上，路易·拿破侖在爱丽舍宮同尙加尔涅、梯也尔、莫莱和德—布洛伊举行秘密會議；尙加尔涅想用武力解散議會。梯也尔說这种想法是荒唐的〔……〕路易·拿破侖保持着照例的緘默，他同意推迟采取强制手段。而尙加尔涅走出来对梯也尔說：‘你看到了吧，总统扮的是什么鬼臉。归根到底，这是个懦夫。’”<sup>①</sup>

<sup>①</sup> 謝尼奧博斯：《1848年革命和1848—1852年的法国反革命》，俄譯本，第29—30頁。

謝尼奧博斯所用的差不多都是趣聞逸事的資料，這與他所採用的唯心主義的方法，與他的史學中的英雄主義和個別論的觀念有着密切的關係。在記載中引用趣聞逸事資料本身並不是什麼壞事。大家知道，這是馬克思所常用的使敘述更加生動活潑的一種方式。不過，利用趣聞逸事的資料，把這些資料穿插到科學的歷史景象中去是一回事；而企圖把這幅景象專門變為趣聞逸事的匯集，則又是另一回事了。我們在謝尼奧博斯書里遇到的正就是這一種企圖。

當然，馬克思選擇事實則完全不同；我們在他著作中發現的是表明歷史發展一定規律性的典型事實。馬克思對參加1848—1851年事件的各黨派的活动以及它們的階級背景，作了深入細致的分析。因此，他在第二章里對所謂三色共和黨人做了評價。他在第三章中對所謂“秩序黨”作了階級分析，特別是對兩個派別——合法王朝黨人和奧爾良派人——作了典型的分析。我們在這一章里見到對小資產階級山岳派及其領袖賴得律—羅蘭的評價。

我們在謝尼奧博斯那里是否也能找到類似的東西呢？不，謝尼奧博斯對這種問題總是不感興趣的，而任意把山岳派和賴得律—羅蘭列入社會主義陣營這一點證明，他不懂得與這一時期階級鬥爭有聯繫的問題。

馬克思在第四章中分析1850年5月31日（選舉）法的反動性質。在第五章里評論了所謂“十二月十日會”。在第六章中對1851年法國資產階級地位作了經濟分析，這種分析可以說明法國資產階級投向路易·波拿巴的原因。在第七章中我們見到對成為波拿巴後備力量的法國農民地位的分析。

我們在謝尼奧博斯那里是否能找到這樣任何一種因素呢？不。謝尼奧博斯對這些問題不感興趣，因而迴避了這些問題。

兩位作者選擇事實的差別顯然是與歷史著作觀念的差別有關的：一方面是個人主義的觀念，另一方面則是強調人民群眾作用和歷史過程規律性的觀念。

馬克思在他的著作的開頭地方評價路易·波拿巴政變時寫道：

“像法國人那樣說他們的民族遭受了偷襲，那是不夠的。民族和婦女即使片刻疏忽而讓隨便一個冒險家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寬恕的。這樣的言談，並沒有把啞謎解答，而只是把它換了一個說法罷了。還應當說明，為什麼三千六百萬人的民族竟會被三個騙子弄得措手不及，不予抵抗而被其俘虜了呢”<sup>①</sup>。

馬克思並不是單純地記載事實，而是在說明事實，探求事實的原因和支配這些事實的規律性。因此，他是這樣來選擇事實的，即為了便於強調指出一定的發展路綫：經濟路綫、政治路綫和思想路綫。我們知道，弄清這些發展路綫，揭示這些路綫的規律性，是同馬克思主義選擇和評價歷史事實的方法的兩個基本要點有關的。第一，這裡指的是貫徹馬克思全部著作的無產階級黨性。第二，所指的是把歷史事實當作歷史過程的環節來考察，從這一過程的成熟形式的觀點來說，是當作歷史發展的階段來考察。正是這些特點說明一個事實，即階級鬥爭的總問題在馬克思方面是中心問題。只有在这种基礎上才發生個人問題，因此，這一問題就在一定範圍之內和按一定的比例出現。

馬克思考察路易·波拿巴政變的階級背景問題乃是馬克思主義寫歷史方法的特別顯著的例子。

唯心主義個人主義的史學，在這裡看不到任何問題，因為一切都由於個人的活動——好的或壞的——而簡單地這樣而不是

---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8頁。



那样发生。因此，就只是把这些活动及其由此而发生的事件予以登录而已。

从科学的史学角度来看，問題就完全换了另一个样子，因为科学的史学用社会力量的作用来说明个人的行为。这里不可能只停留于記載事件，必須从階級斗争的机制观点来说明这些事件。馬克思就是这样做的。

在君主专制的时代，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在拿破侖时代，随后在路易·菲力普时代，官僚制度是統治階級的工具。在路易·波拿巴时代，国家仿佛成为完全无所依靠了。正因为如此，路易·波拿巴型的冒險家才能站在国家的头上。从这里是否可以得出結論，說国家政权是超階級的，不依赖于階級呢？請看馬克思怎样說的：

“虽然如此，国家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拿巴是代表着一个階級，而且代表着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階級，即代表着小农的”<sup>①</sup>。

这里接着就是巧妙地、典型地記載农民的地位，在农民中間发生作用的力量和傾向，这些力量和傾向說明农民对波拿巴主义的同情。在这一記載中包含着具体的历史材料，社会学的总结以及这样一些論断，例如法国农民在具体条件下究竟是否成为一个階級。結果，这便是馬克思主义著作中最成功的最优良的一个片段。

个别論拥护者問道——不过，这能算是历史嗎？是历史，而且是最可靠的历史。正就是这些以具体历史資料为基础的論断和总结，对史学科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謝尼奧博斯和他一流者那里当然連这种論断和总结的影

---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0頁。

子也沒有。不过，由它們發展成的史記學並不是歷史科學。

或多或少可靠的事件編年史同科學的史學之間的差別正在於，科學不僅只限於記錄事實，而是要揭示和系統說明發展規律。這裡指的是非常辯證的過程：規律是在分析經驗資料的基礎上揭示出來的，而這種資料的選擇和配置同時也是在已認識的規律基礎上進行的。馬克思主義方法的意義就在於此，因為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總結具體的歷史材料，它是研究材料的基礎，因此，這一方法本身就在不斷地發展和豐富中。

但是科學的方法只給研究者提供最一般的指示。因此，它是研究的最強有力的武器，但並不是什麼靈芝仙草，並不是萬應藥方。可是，我們已經說過，為要適當地應用這一方法，在研究工作中就必須具有廣泛的具體的知識和豐富的實踐經驗，且不說還必須有一定的天才。因此，凡是有意識地站在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基礎上的史學家就應當學會掌握這一武器。馬克思主義歷史著作的經典范例對研究者的寶貴助益也正在於此，對這些歷史著作中的具體分析能夠是，而且應該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的培育所。

## 第七章

### 从历史客观規律的理論 来看历史預見

#### 第一节 历史規律的客观性是 历史預見的基础

“人們慣以历史上經驗的教訓，特別介紹給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經驗和历史所昭示我們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沒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沒有依据历史上演繹出来的法則行事。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环境，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使它的举动行事，不得不全由自己来考虑、自己来决定。当重大事变紛乘交迫的时候，一般的籠統的法則，毫无裨益。回忆过去的同样情形，也是徒劳无功。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現在’的生动和自由。”<sup>①</sup>

黑格尔在这里是反对西塞罗把历史看作“生活的教师”（*magistra vitae*）的庸俗解釋。黑格尔的話实际上并不是反对根据支配历史的客观規律的認識的历史預見，而是反对被庸俗地理解的历史类比。辯证法教导說，真理是具体的，也就是說，判断正确或錯誤取决于正确断定所要判断的具体情况；在某些条件下是正确的意見，在另一些条件可能是錯誤的。黑格尔是辯证論者，虽然他以唯心主义的精神把辯证法神秘化了；正是作

<sup>①</sup> 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 1956 年版，第 44 頁。

为一个辩证論者，他反对把适用于一个时期的真理，机械地套用于另一个时期已經改变的条件。所以他也正确地警告要防止把关于历史是生活的教师的論題庸俗化，因为庸俗化是叫人承认永恒真理，即在符合某一历史条件的情况下形成的，后来被机械地套用于其他一切历史条件的所謂真理。

但是在拋棄庸俗化的时候，我們并不拋棄关于历史預見和历史作为生活的教师的作用这个論題相应的涵义。是否能在科学的基础上預見历史发展及其方向和趋势呢？是否能科学地和以科学的准确性来作出預見，因而不是作出猜測或預言，而正是作出預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來說，历史是否是生活的教师呢？

在資產階級的文献中我們遇到的不仅是对这一論題的庸俗化，而且是完全否认这一論題。那些否认历史規律的客观性、或根本否认这种規律存在的可能性的人，都否认这一論題。这种观点是有其連貫性的，因为如果不存在发展的客观規律性，如果发展具有随意的、偶然的性质，那么当然不能在科学的基础对发展作出預見了。

为了說明这个問題，我們举两个否认历史預見的可能性的例子，它們是从最近的資產階級文献中取来的。

兰尼埃在1950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

“在自然界規律和历史規律所能运用的方法之間，存在着具有突出的根本差別。这就是在自然科学与我們称之为历史的学科之間所产生的差別。科学能够 and 應該作出預言——而史学家不作預言……預言既不屬於史学家的任务，也不屬於他的職責範圍。

“……史学家不願預言未来。史学家也不能預言未来。”<sup>①</sup>

---

① 兰尼埃：《历史，历史的目的和方法》，英文版，第222—223頁。

兰尼埃为了替这种否认找論据而引用了历史是不会重复的这一原理。

在考令伍德的一本书里，我們遇到了相似的观点，不过論据略有不同。考令伍德在分析中世紀的史学問題时写道：

“史学家的任务是了解过去，而不是未来；不管史学家如何反复宣称他們能預知未来，我們就总是一再表示相信，他們对历史的基本概念的情况并不妙。”<sup>①</sup>

考令伍德接着解釋，承认預見历史事件的可能性的人是怎样“歪曲”历史的基本概念的。他认为这些人錯誤地解决一般与具体的关系問題；认为他們人为地隔裂統一的历史过程，結果就产生了一种表面样子，似乎历史过程的一个部分决定着另一部分。

作者举出这两种說法作为例子，它們至少对一部分资产階級史学家來說是典型的。

在这里必須十分明确地肯定，正像一部分资产階級历史著作把历史規律神秘化、从而实际上否认它們一样，资产階級史学的某些流派把历史預見的問題神秘化、从而把它引上了非科学思辨的錯誤道路。这里所指的是形形色色的循环論的变种，它們从所謂发展的不可避免的周而复始得出了臆造的某些事件必然重复的結論。施宾格勒以此为根据而預言西方文明的复灭。湯因比认为“国内的”和“国外的”无产階級的事业，前途也是如此，但是他預言——不太悲观地——万能的教会将会給予解救。从这两个作者的学說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些“預言”的涵义。施宾格勒作为“人民社会主义”的思想預言家，暗示了德意志帝国主义的光荣結局。湯因比则是从思想上来論证力求实现“全能

---

<sup>①</sup> 考令伍德：《历史概念》，英文版，第 54 頁。

国家”的美帝国主义的扩张。显然，这种把历史预见神秘化的做法，只不过是承认历史预见的一种形式。

资产阶级思想家这样那样地否认历史规律的客观性，从而否认历史预见的可能性。这种否认具有十分明显的阶级根源。

驱使有产阶级的思想家反对历史客观规律的概念的社会本质的因素，正是和预见历史发展问题有关的，因为这些衰亡的阶级在千方百计地争取维持其政权。历史发展的预见道破了剥削阶级统治的必然崩溃，它是与这些阶级的利益相矛盾的。所以剥削阶级的思想家在否认历史规律的客观性的同时，也否认预见社会发展的可能性。

兰克的论题的涵义正是这样。按照他的意见，史学家应该只是记载事件，不应奢想从这些事件中得出结论和在历史的基础上讲求道德。

这里涉及的问题不仅对理论、而且对史学家的实践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这里又从另一个方面产生了一个问题：史学家应该在自己的著作中研究什么和提供什么？人们要问：历史作为一门科学，是否只研究过去的事件，或者也研究现在和未来？

按照兰克的要求来写的记载历史，它就只限于过去的事件，因为它的范围是名符其实地(ex definitione)记载过去的事件。但是，如果我们把历史真正当作一门科学来看待，如果我们认为历史的任务是具体研究和记载社会发展，因而就是研究和揭示并系统说明社会发展规律——虽然我们知道它是独特地、用特殊的方法来完成这个任务的——，那么我们就不能接受历史科学的范围只限于过去事件这种原理。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客观上也是没有任何壁垒的。现在是从过去中成长起来的，未来是从现在中成长起来的，而未来又是由过去和现在决定的。因此，我们研究过去，也就是研究未来，揭露它的发展根源和方向：

史学家如果能像一个学者所应该做的那样，不仅記載事件，而且揭露它們的根源和原因，判定它們的发展方向，并从发展的具体可能性来估計它們，那么不管怎样他也就是作了历史預見。这条道路不仅引导他从过去走向未来，而且也相反地引导他从現在走向过去。按照馬克思的論題：“……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我們可以說，对于过去往往只有在考虑到稍后时期的远景时，才成为易于了解。这与波克罗夫斯基的錯誤論題——把历史看作是今天轉向过去的政治——沒有任何相同之处。問題簡單明了：往往只是发展的結果，才使我們有可能了解和估价引起这一发展的力量。可見，对史学家的工作來說，在过去、現在和将来之間沒有也不可能有壁壘；史学家如果把历史作为一門科学来研究，就不能只限于記載过去事件。

我們肯定在过去、現在和将来之間并不存在壁壘时，正是指历史过程各个阶段之間的紧密联系的表现。这是一个創造性的方法論論題。它认为，历史事实不应孤立地来看，而应看作事件的鏈条中的一个环节，看作比較广泛的整体中的一个部分。这是看待历史事件的唯一正确的、彻底的历史观点，它使我們有可能在发展的低級阶段发现高級阶段的萌芽形式，揭示发展趋势。只有在研究者由其階級所决定的立場不阻碍这一发展的时候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問題，与它的党性問題有着直接的联系。只有这种彻底的从发展观点来对待历史事件的态度，才能作为真正的科学历史預見的基础。

历史預見是历史科学的一个組成部分。上面已經說过，它与历史規律的客观性以及历史規律的可知性問題有着最密切的联系。在解决历史規律（社会发展規律）的問題时，科学的观点不論与公开的主观主义，或是与它的伪装形式、即与不可知論，都是不能相容的。社会发展規律不仅是客观的，即是不以人們

意識為轉移的，而且也是可知的。以認識歷史規律為依據的實踐指出了這一點。

我們應該記住，關於歷史規律的客觀性和以歷史規律為根據的歷史預見的問題，不是只有史學家才感到興趣和在他的書齋里靜悄悄地解決的問題，而首先是活生生的實踐的問題，這個問題也使政治活動家感到興趣，它是在階級鬥爭和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过程中得到解決的。

如果把史學看作是科學的話，那麼認為史學家應該只從事於記載事件，而另一種人，譬如說社會學家，應該從事於從事件中得出社會發展的規律及以規律為基礎預見的這一公式，是不能接受的。研究歷史規律，即研究社會發展規律，既是史學家，又是社會學家，而且也是政治活動家的任務。我們在從事政治活動時，也應該預見到，一定的活動會導致什麼結果；這個問題與活動成敗的可能性有着密切的聯繫。實踐家的預見往往以鬥爭經驗為根據，而不是以理論前提為根據；理論家則首先以理論前提為根據。把理論家和實踐家的能力結合在一起的人們，他們的活動是歷史預見的最高典型。這種預見的典型往往出現在現代工人運動領袖的活動中，他們出色地把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給我們提供了歷史預見的典范。當然，在這種情況下所談的不僅是理論與實踐的緊密聯繫（雖然這一聯繫的作用無疑是巨大的），而且首先是理論所產生的根源，是無產階級領袖活動的階級制約性。我們應該記得，在研究過去和預見未來的時候，研究者由其階級決定的活動起着決定的作用。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來看很明顯（我們不打算在這裡詳細發揮這個問題），科學的客觀性、完全如实地反映現實（這種反映符合我們關於世界的知識在某一發展階段的可能性），並不表示在思想爭論中的中立的、“超黨性的”立場，而是在這些問題中與黨性立場、與進步的



革命階級的立場有着最緊密的聯繫。無產階級是其本身利益與對抗的制度沒有聯繫的階級，是切身關心最徹底地支持社會進步的階級。所以，表達無產階級利益的思想家對於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研究所得出的結論，毫無所畏懼。所以，他們能夠對過去、對決定未來的發展趨勢，能夠提供而且也的確提供了客觀的徹底科學的景象。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性明顯地表現在一切社會科學中，它與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與工人階級在爭取進步的鬥爭中所採取的特殊立場有着聯繫。這種立場正是表現在馬克思主義的黨性之中。工人階級的領袖根據這種黨性，能夠作出科學的歷史預見的範例。

讓我們來舉幾個例子：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分析了資產階級社會中的階級關係、各階級的發展趨勢、以及它們所進行的鬥爭，在第一章結束時闡明了關於這一鬥爭結果的結論。這是以歷史觀點分析社會發展的有效規律為根據的典型的歷史預見：

“資產者階級生存和統治的基本條件是財富積累在私人手中，是資本的形成和增殖。資本的生存條件是僱傭勞動制。僱傭勞動制是全靠工人們自相競爭來支持的。但資產者不由地造成而又無力抵抗的工業進步，卻使工人們經過互相聯合而達到的革命團結代替了他們因互相競爭引起的分散狀態。於是隨着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所借以生產和占有產品的基礎本身就從它腳底下抽去了。它所生產的首先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同樣是不可避免的”。<sup>①</sup>

十多年以後，馬克思在全面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解剖”及支配資本主義社會的規律的基礎上，作出了關於資本主義必然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0—21頁。

崩潰的結論。這是歷史預見的又一個新的范例：

“把這個轉變過程的利益橫加掠奪，並實行獨占的大資本家老爺的人數，在不斷減少，同時，窮乏、壓迫、奴役、退化、榨取之量，却在增加。但同時，人數不絕膨大的，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自身的機構所訓練、所統一、所組織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也在增長。資本獨占，成了和這種獨占在一起，並在這種獨占下開花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與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之點。這種外殼會被破裂。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響起來了。剝奪者被剝奪。”<sup>①</sup>

這兩段引文講的都是對一個長時期的預見，它是分析生產關係必須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的作用為根據的。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中，我們也可以找到限於較小規模和較短時期的預見的例子。例如，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關於資本主義世界即將來到的經濟危機的言論。在1927年，在所謂繁榮時期，差不多就在胡佛硬說經濟危機不會再重復的同一個時候，斯大林指出了新的危機的必然性，同時指出了國際工人運動的新的策略路綫：

“這一切是不是說明資本主義的穩定因此就是持久的、巩固的呢？當然不是！……恰恰相反，正是從這種穩定中，從生產增長，貿易擴大，技術進步，生產能力提高，而世界市場、世界市場範圍和各個帝國主義集團的勢力範圍仍舊相當固定的情況中，——正是從這種情況中產生着最深刻最尖銳的世界資本主義危機，這種危機孕育着新戰爭和威脅着任何穩定的存在。

“從局部穩定中產生出資本主義危機的劇烈化，日益增長的危機又破壞着穩定，——這就是現今歷史時期資本主義發展的

---

<sup>①</sup>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64頁。

辯證法。”①

斯大林接着分析了市場問題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爭奪市場的鬥爭，並作出結論說：

“用和平的方法解決市場問題，對資本主義已經行不通了。資本主義唯一的‘出路’就是通過武力、軍事衝突、新的帝國主義戰爭來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劃分勢力範圍。

“從穩定中產生着資本主義危機的增長。”②

在此基礎上，斯大林作出了關於革命運動發展路綫的結論：

“資本主義的穩定日益動搖和不穩固了。

“如果大約兩年前可以說並且應該說歐洲革命浪潮是在退落，那末現在我們却有充分的根據可以肯定說歐洲顯然正在進入新的革命高潮時期。殖民地和附屬國更不必說了，因為帝國主義者在那裏的處境已經愈來愈不可收拾了。”③

不論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資本主義必然崩潰的高瞻遠矚的預見，或者是斯大林關於資本主義在相對穩定的時期以後將產生新的危機的比較短時期的預見，都已經在實踐中得到證實。這兩種預見都是以對社會發展規律及其作用的知識為基礎的。它們都是以歷史知識、以歷史規律的知識為基礎的典型的歷史預見。因此我們就可以具體地來回答歷史預見的性質問題，即可以科學地預見歷史發展的問題。

現在我們先簡單地談一下——以後我們還要回到這個問題上來——歷史發展的總方向及其結果是可以預見的，而這種結果是從自然必然性起作用的規律中得出的；但對各個個別事件，事件發生的準確地點和日期等等則不可能科學地預見，總之，不

① 《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34頁。

② 同上，第235頁。

③ 同上，第244頁。

能預見构成社会发展中偶然因素的东西。<sup>①</sup>因此，馬克思能够預見資本主义的发展方向及其灭亡的必然性，但同时他并不能預見参加历史事件的个别人物的命运，不能預見这些事件发生的准确日期等等。所以持有个别論观念的史学家认为，这里所指的是經濟的或社会学的預見，而不是历史的預見。这个結論与所由得出这种結論的論題本身，即宣称历史只研究个别事件的論題本身一样，都是錯誤的。我們已經在前面的論述中指出了史学和社会学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联系也在这里表现出来，不过角度略有不同。因为这里所談的不是这些或那些史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作出这样的預見，而首先是不同的預見是在什么基础上作出来的，是什么知識領域为此目的提供了必要的材料。无容置疑，这一知識領域就是史学。如果它是被科学地理解和研究的話，那么它就是揭示和系統說明历史发展規律的基础，而历史发展規律就是这种預見、即历史預見的基础。

对怀疑論者必須首先指明实践中的这一事实，即历史預見是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在历史本身的建立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历史；現在，当人們越来越自觉地作这一工作的时候，当人类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开始从“必然的王国”向“自由的王国”过渡的时候，当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的活动越来越有計劃的时候，——正是現在，历史預見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历史預見是我們实践中已經实现的事实，是与認識和运用社会发展規律有关的事实。

因此，既然历史作为一門科学发现了这些規律，并提供了預見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那么它无疑就是生活的教师（*magistra vitae*）。

<sup>①</sup> 关于这个問題的某些有意义的思想，可以在阿道尔夫·哈尔納克的在一定程度上是錯誤的著作《关于历史認識的可靠性与界限》一书中找到。

但是正如我們上面已經指出的，对历史科学的作用的这种解釋，是与庸俗地理解历史类比的作用不一致的。对这个重要的問題必須予以特別注意。

## 第二节 历史預見和历史类比

十八世紀形而上学的史学以不变的自然規律概念为依据，从历史事件符合或不符合超过該类規律的永恒的規律的要求来看待具体历史事件的問題。自然，这种史学應該是承认历史类比的，但是它在探討时却把历史类比庸俗化了。按照这种态度，历史事件鏈条中的唯一的規律性就是人的行为符合或不符合不变的自然規律的要求的必然(好的或坏的)后果。于是，历史成了真正的生活的教师 (*magistra vitae*)，史学應該借助于以采用完全合乎規律的类比为基础的獨特方法来进行教导，因为这种类比总是与那些同样的不变的規律的作用联系着的。現代資產階級史学把这种形而上学的論題彻底庸俗化了，得出了这样的观点：即认为在实质上一切都曾經有过了，普天之下並沒有任何新的东西；这种观点順利地为越来越担心各种变革的資產階級服务着。

黑格尔反对十八世紀所特有的把历史看作生活的教师的形而上学的解釋，不是沒有根据的。为了指出这种概念的根本錯誤，哪怕只要稍微了解一下辯证法就够了。它所依据的只是形势的外貌相同点，而沒有深入具体的联系。但是要知道，孤立的現象是沒有的，它們是相互联系，处在相互依賴之中的。誰不了解这点，誰就不了解任何具体形势，并在說明形势的时候曲解涵义。草率地运用粗淺的历史类比違背了研究社会現象中的历史主义的要求，必然会把历史科学推上不正确的道路。在資產

階級史學中我們可以找到無數這樣的例子。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從有關古代歷史的著作中舉幾個例子，因為正是在歷史研究的這一領域中，類比才特別“誘人”（由於古代世界的歷史與資本主義世紀的歷史的某些外貌相同點）。這些類比的錯誤，特別令人驚異。

研究古代希臘史和羅馬史的資產階級史學家，根據某些歷史過程的一些外貌相同點，根據古代社會也曾有過所有制（當時是土地所有制）的集中化的各種後果、有過商品經濟而得出的相同點，常常提出這樣的論題：說現代社會發展只不過是古代史——在較大的規模上——的重複，說在那個時候我們就已經和資本主義、和我們現在所了解的共產主義運動、甚至和布爾什維主義打交道了。

例如，羅斯托夫采夫寫道：

“我們看來，在一切文明世界中正在進行着建立統一的、包括全世界的文明，以及相同的社會和經濟條件的過程。這是一個錯綜複雜的過程，往往不容易對它獲得一個明確的概念。我們也應該記得，我們生活在其中的條件並不是新的，如果從古代世界的社會和經濟條件來看，古代世界在許多世紀的長時期中就過着一致的生活了。從這個觀點來看，現代發展與古代的區別只是規模不同，而不在于實質……古代世界已經在較小的規模上經歷過我們現在所經歷的發展過程。”<sup>①</sup>

把資本主義和現代階級鬥爭的範疇運用于古代世界，是資產階級史學家慣用的手法。

例如在比爾曼關於古代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史的名著中，我們可以找到對柏拉圖批判公元前五——六世紀希臘社會關係的這種評價。

<sup>①</sup> 羅斯托夫采夫：《古代世界史》，第1卷，德文版，第16—17頁。

“……在当时这种社会政治景象中出現的恰恰就是資本主义貨币經濟的缺点，而且是最明显的方式出現的。”<sup>①</sup>

在愛·迈耶关于古代世界經濟史的名著中，更加明确地表述了相同的观点。在談到羅馬农业經濟的崩潰时，迈耶把城市作用的这一現象认为首先是由于“資本主义、貨币經濟、資產階級法权及其一切影响的充分发展”<sup>②</sup>所造成的。

当然，把資本主义的其他范疇輕率地套用于古代世界的情况，也是不少的。

在資產階級的著作中常常談到古代帝国主义，把它和現代帝国主义等同起来（例如，費尔糾逊在《希腊帝国主义》一书中，弗兰克在《羅馬帝国主义》一书中，等等）。列宁在談到这种类比时写道：

“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在資本主义現阶段以前，甚至在資本主义以前就已經有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羅馬推行过殖民政策，实行过帝国主义。但是，‘一般地’談論帝国主义而忘記或忽視各种社会經濟形态的根本区别，这样的議論必然会变成最空洞的廢話或怪誕不經的吹噓，像把‘大羅馬和大不列顛’拿来相提并論那样。就是过去資本主义各个阶段上的資本主义殖民政策同財政資本的殖民政策也是根本不同的。”<sup>③</sup>

列宁反对錯誤的历史类比的这些话十分尖銳地击中了像罗歇尔的論断那样在科学中的濫用行为，罗歇尔硬說“格拉古兄弟<sup>④</sup>的社会主义的甜言蜜語显示了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論的相同

① 比尔曼：《古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史》，第1卷，德文版，第199頁。

② 愛·迈耶：《古代經濟的发展》，見《國民經濟学与統計学年鑑》，第9卷，1895年，第741頁。

③ 《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2頁。

④ 蒂伯里·格拉古（公元前163—132年）和盖·格拉古（前153—121年）都是古羅馬的政治家，奴隶制时代民主政治的代表人物。——譯者

点”；<sup>①</sup> 击中了阿尔杜尔·罗森堡把奴隶起义和格拉古兄弟的运动看作“紅色国际”的定义；<sup>②</sup> 击中了把龐培和苏拉<sup>③</sup> 作为“布尔什維克”来消灭掉的运动的評价<sup>④</sup>；以及击中了替汪达尔人的国王让席里赫的政策加上同样的形容語的做法<sup>⑤</sup>。在比尔曼这本书的第2卷和罗斯托夫采夫的《羅馬帝国的社会和經濟史》一书（第480頁）中，也可以看到奴隶和佃农的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間的类比。高底士在《汪达尔国王让席里赫》一书（第一章）中也談到公元三世紀羅馬军队的所謂“布尔什維化”，并把这一时期与十月革命时期进行类比。

在波兰的历史著作中也存在着这种錯誤的类比。

爱德华·迈耶的学生华列克—契尔涅茨基追随着他的足迹。如果我們举他的《希腊史》为例，就会每一步都遇到古代的资本主义、古代的无产阶级、古代的资产阶级等等。譬如說，在第147—148頁我們可以讀到：

“在希腊中世紀晚期，到处发生了过去的貴族改造为……有产阶级，农业、工业和商业資本家阶级的情况……看来似乎比較真实的是，在希腊资本主义初期，不論在海上貿易方面，或是在

① 罗歇尔：《国民經濟原理》，什图特加特 1906 年德文版，第 222 頁。

② 阿·罗森堡：《羅馬共和国史》，萊比錫 1921 年德文版，第 59 頁。

③ 龐培，格內（Gnaeus Pompeius，公元前 106—48 年）羅馬統帥和政治家。——譯者

苏拉，魯齐（Lucius Cornelius Sulla，公元前 133—78 年）古羅馬的統帥和政治家，是大地主最反动的部分——“貴族派”的代表人物。——譯者

④ U. 卡尔斯特：《論罗伯特和皮尔曼的古代社会的社会問題和社会主义史》（評論），見《德国哥廷大学城学术評論》，第 188 卷，1926 年，第 4—6 期；《論塔恩的希腊化文明》（評論），見《德国哥廷大学城学术評論》，第 190 卷，1928 年，第 10 期，第 484 頁。

⑤ W. 卡貝尔：《日耳曼民族人口的移动》，什图特加特，1940 年德文版，第 67 頁。



殖民地化方面，貴族……都起了先鋒隊的作用……真正的无产階級的存在……是勿庸置疑的，因為我們所談的是希臘中世紀晚期經濟上比較發達的國家。這種无产階級由於事物的自然進程在工商業國家中人數特別眾多，但是在一系列農業國家中也可以找關於无产階級的證據。”

同樣的言論不勝枚舉，但是單從上面這段引文來看也已經足够了，因為它是華列克—契爾涅茨基的著作中典型的言論。

在揚·斯坦尼斯拉夫·洛斯的著作中庸俗化的歷史類比方法具有特別驚人的形式。其中特別明顯地暴露出這種類比借助於因襲過去的一些論據來干預當前的階級鬥爭的社會職能。

例如洛斯的《轉變時期的海拉達》一書，是反對進步運動的有黨性的著作，它的論據是從古代希臘取來的。

作者把類比的方法提高到原則的程度。<sup>①</sup> 例如，我們可以舉出雅典和德國之間的類比，科林斯和英國之間的類比；<sup>②</sup> 阿爾克梅奧尼特族和扎莫伊斯基一族之間的類比<sup>③</sup> 等等。但是下面的幾段引文可以證明這些類比的真正目的：

“雅典反對暴政的宣言，和在 1937 年，即在徭役租制被消滅了三百年以後的波蘭農民群眾集會上反對徭役制的宣言同樣流行。但是人民應該有他所害怕的錘鎚，有時他與怪影作鬥爭要比與某種活的真實的東西作鬥爭更好，否則人民能作出許多害事。”<sup>④</sup>

“不多久以前，農民還真正相信，構成大宗財產的土地儲量是取用不盡的，它永遠足夠劃出相當數量的份地，但是只過了幾

---

① 斯·洛斯：《轉變時期的海拉達》，華沙 1938 年波文版，第 9、139 頁。

② 同上，第 37—38 頁。

③ 同上，第 52—53 頁。

④ 同上，第 85 頁。

年，他們已經相信，土地儲量已經接近耗盡的地步，才真正開始着急起來……中歐和東歐的未來將在很大的程度上取決於農民階層和城市知識分子的無產階級之間的鬥爭結果。

“在古代希臘，城市無產階級取得了勝利，埃拉多斯（希臘）的歷史結束了……某種極其相似的東西可能在現代歐洲文明的各國人民中重復出現。

“群眾的政權可能像當時破壞希臘農村那樣，破壞現代的歐洲農村。”<sup>①</sup>

這樣的引文可以從這一本書里舉出許多來。我們勿須一一加以注釋——因為它們的社會意義是異常明顯的。1946年洛斯所作的題為《基督降生前二世紀到一世紀羅馬的土地問題》的講演明確地敘述了這種社會意義。

不錯，在這個演說的開端，他特別作了一個聲明，說在他的講演中沒有暗示現代事件（這裡談的是土地改革時期），但是實際上，洛斯把格拉古兄弟的改革看作無聊之舉，這是明顯地暗示今天。這位作者舉出廣泛的論據，證明格拉古兄弟所實施的分地制度在經濟上是不可能的，他嘲笑了相信法律萬能的羅馬國務活動家，強使法律實現它所不能實現的東西，——因此對下面的一段批評所指的是什麼，我們沒有任何懷疑：“請不要見笑，因為雖然從那時起已經過了二千年了，可是卻往往會見到這種國務活動家，他們既不是羅馬人，却要像他們那樣來考慮問題和管理國家。”<sup>②</sup>

完全不難看破，作者在講演開始時作的上述聲明懷有什麼目的！

---

① 斯·洛斯：《轉變時期的海拉達》，華沙1938年波蘭文版，第137頁。

② 斯·洛斯：《基督降生前二世紀到一世紀羅馬的土地問題》，盧布林1946年波蘭文版，第15頁。

作了这些探討以后我們就可以理解到，为什么李特在美国史学学会 1949 年年会上提出把过去与現在之間的类比看作是“历史科学的基本原则”<sup>①</sup>，在他的講話中充滿了极端主观主义的、显然浸透了资产階級党性的原理。

所有这些类比是为为什么服务的呢？首先，它們是要证明，普天之下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一切都曾經有过，都沒有得到什么結果，因此，現代的社会运动也不会得到什么結果。于是，与过去进行类比，就会使現在变得沒有价值。反之，与現在进行类比，就会使过去变得沒有价值，就会把对于現代現象的否定估价轉用于作者所仇視的过去的运动和形势。那么这种类比有什么科学意义呢？当然任何科学意义也沒有。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它們不是导致空洞的廢話就是导致公开地伪造所研究的现实的景象。

这种拙劣的类比还可以服务于另一个目的：引用对过去的虛假的教訓来证明某种政策是正确的。我們的克拉科夫学派就是用的这个方法。他們为了論证自己的“斯坦契克党人的”同情，运用了这样的論据：即波兰需要强力政权——当然是指君主制度——，因为沒有这种政权，就会导致貴族階級的波兰的崩潰。当斯摩棱斯基有力地譴責舒依斯基，捍卫历史是生活的教师这一論題时，他指的是克拉科夫学派濫用历史类比法来捍卫“斯坦契克党人”的反动政策。舒依斯基的一篇論战文章《論虛伪的历史是虛伪政策的教师》<sup>②</sup>，就是这种濫用的典型例子。

从这些結論来看，历史科学对生活的教师的作用有什么要求呢？

历史是生活的教师。但是只有在历史把自己这一职能建立

<sup>①</sup> 李特：《史学家的社会责任》，英文版，第 285 頁。

<sup>②</sup> 《舒依斯基文集》，第 3 卷，克拉科夫 1894 年波兰文版。

在对历史进行唯物主义的解釋基础上，建立在科学的历史預見基础上时，它才是生活的教师。当它采用非科学的形而上学的表面的历史类比法时，它就不是生活的教师。

科学的历史預見从唯物主义和辯证法的前提出发，考虑到研究中的历史主义和具体真理的原则的要求。科学的历史預見不在現在中找寻过去的痕迹，反过来说，也不把过去看成現在。它不是走容易的道路，即走在現成决定的基础上去“預見”当前过程結果的道路，而这些决定的使命是所謂提供过去的过程。相反，它看到并正确地估計到每一个这样的过程的历史特点。但同时它也考虑到事件的重复性，事件的一般因素，揭露出过程的規律性，并在此基础上决定事件的趨勢、发展方向，总之，預見发展方向及其一般結果。

以表面的类比为基础的“預見”方法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它从錯誤的反辯证法的前提出发，違背了历史主义，并把历史过程看作現成的形势的重复。結果，它就把科学推上了形而上学思辨的不正确的道路。可以大胆地说，这种方法是科学的史学的死敌之一。馬克思在自己的一封信里正是指出了这一点，他着重指出了在古羅馬剝夺平民和資本主义时期的階級剝削之間进行庸俗化的类比的反历史主义。

“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情况下发生的異常类似的事件，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結果。分別研究其中每一个进化，然后把它們加以对比，就很容易找到了解这一現象的钥匙；但是利用某种一般的历史哲学理論（其最高优点在于它的超历史性）的百宝钥匙，則永远不会达到这种了解。”<sup>①</sup>

我們这样尖銳地反对庸俗化的历史类比法，从科学地預見

<sup>①</sup> 馬克思：《致〈祖国紀事报〉編輯部的信。一八七七年十一月》（《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俄文版，第316頁）。

历史发展的立場給予抨击，决不是想完全否认类比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和意义。当然，类比是能起重要作用的，但只有在我們采用以辩证唯物主义前提为基础的科学类比的条件下，才能起这样的作用。

我們且来看一下在历史研究中正确地运用类比的例子。

我們知道，恩格斯在 1848 年革命失敗以后不久，就研究了十六世紀德国农民战争史。他研究这个问题是因为十六世紀的农民战争史使我們有可能——通过类比的方法——作出某些对现代无产阶级斗争具有重要意义的結論。恩格斯关于这个问题写道：

“德国 1525 年革命和 1848 至 1849 年革命間的类似处，是異常显眼的，以致我当时不能完全不談到它。但是除了事变进程中的相同点而外，即除了在前后两种場合都是由同一諸侯军队把各种地方起义相继镇压下去之外，除了当时城市资产阶级在这两种場合的行动都是相同得令人可笑之外，其間的差别也是十分明显的。”①

恩格斯是怎样和为了什么目的具体运用历史类比的呢？下面是一些說明。

恩格斯想說明十六世紀初德国的阶级关系，指出所有的人之間的斗争是主要原因，它使得把民族明显地划分为两个陣营成为不可能，如像十八世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出現过的那样。于是恩格斯在这里采用了类比；他引用了讀者从直接經驗中熟悉的現代关系，来帮助讀者更好地了解过去：

“今天的德意志民族是由封建貴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构成，实远不若当时情况复杂。我們如果回想

---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616 頁。

一下过去两年中这种阶级结构竟闹成什么样的混乱现象，那末对于当时各种利害关系，各种见解和各种企图的搅扰不清，就容易理解了。”①

再举一个例子。恩格斯在说明济金根领导的贵族起义遭到失败的情况时，指出不能与其他阶级结成联盟是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农民，它是当时德国最强大的革命力量，但是它不能与贵族走在一起。然而怎样才能最突出地向读者表明这一点呢？恩格斯又运用了类比，这一次是与1830—1846年的波兰起义进行类比：

“当时德国贵族与农民的关系同1830年和1846年的暴动中波兰贵族与他们的农民的关系完全一样。和现代的波兰的起义中的情形一样，当时在德国只有一切反对党派结成联盟，尤其是贵族要与农民联盟，才能使运动成功。但是恰恰这种联盟在两方面的情况中都是不可能的。贵族既没有到不得不放弃政治特权以及在农民身上享有的封建权利的地步，革命农民也不会根据还很渺茫的希望就和贵族，也就是压迫他们最厉害的这一等级结盟。和1830年波兰的情形一样，1522年的德国贵族已争取不到农民了。除非完全废除农奴制和依附农制，取消一切贵族特权，才有农村人民和贵族联合的可能。但是贵族和一切特权等级一样，丝毫不愿自动地放弃特权，放弃特殊地位，放弃其收入来源的绝大部分。”②

但是恩格斯运用类比的真正目的是要为现代从过去得出结论，是为了得出以类比同时也以差别为根据的历史预见。例如：

恩格斯指出十六世纪德国的分散性是革命力量分裂和反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98页。

② 同上，第439页。

命在斗争中能够得到胜利的主要原因，接着就立刻转到对1848年德国关系的分析：

“在此又很自然地可以和1848—1850年的运动作一番比较。1848年反对派各阶级之间也是利害冲突，各行其是……1525年农民之间的地方狭隘性并不比1848年参加运动的所有阶级之间的地方狭隘性还更严重些。成百的地方性革命，紧跟着也有成百的顺利进行的地方性反革命，小国林立状态保持不变等等，这一切都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上述情况。谁要是在1525年和1848年两次德国革命及其结局之后还会梦噬联邦共和国，那末他没有别的地方去，只配送到疯人院去。”<sup>①</sup>

恩格斯的这个在当时十分迫切和重要的政治结论，是以十六世纪和十九世纪的运动之间的类比为根据的。但同时他也指出了它们之间的差别，特别是指出革命运动的动力发生作用的范围扩大了，并在此基础上预见到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从1848年到1850年的革命就不能像1525年的革命那样结束。”<sup>②</sup>

我们已经有了在历史研究中科学地运用类比的具体例子，甚至也有了以类比为根据的预见。现在让我们把这些观察总结一下，并回答史学在什么时期才容许作什么样的类比的问题。

第一，必须排除形而上学的运用类比的方法，即只是根据外貌相同点，违反历史主义的要求来运用类比。对科学地运用类比来说，必须注意的不是外貌的相同点，而是起作用的发展规律的共同点。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定的因果继承性才能成为关于另一个因果链条的结论的基础。因此，只以某种外貌相同点为根据的在资本主义和古代世界奴隶制之间的类比，在现代阶级斗争和古代世界阶级斗争之间的类比，都是错误的。因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81—482页。

② 同上，第483页。

在这里起作用的是社会发展的不同的規律。但同时，拿 1525 年的德国和 1848 年的德国进行有效的类比，则是可以容許的。因为在这里所指的是两种革命形势之間的类比，而且恩格斯在这里所注意的主要問題，是在两种情况下都出現的关于农民是革命后备軍的問題。当然，恩格斯关心的是作为无产階級同盟軍的农民階級，而对农民战争的历史态度揭露了处于萌芽形式的規律性，这些規律是同在十九世紀资产階級民主革命中起作用的規律相似的。正是这种不把历史事实看作孤立的事实，而看作发展鏈条中的一个环节的态度，看到在发展的低級阶段包含着高級阶段的萌芽，认为高級阶段是一定的在先前已經出現的发展趋势的結果，正是这种認識使我們有可能揭露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起作用的規律之間的相同点，从而有可能运用历史类比。

第二，每一种历史类比都是不完全的，因而也是“冒險的”。因此，我們在运用类比时，始終應該为了历史真理也同时指出进行对比的事件之間的差别。在上述的例子中恩格斯正是这样做的。由此可见，历史类比不仅不具有不依时代为轉移的意义，不仅不能一劳永逸地作出解决某些情况和問題的現成范例，而且正确地运用类比，总是要求通过強調进行对比的事件之間的差别而获得的具体化的。

只要这种要求受到了注意，历史类比就是可以允許的，就能够成为历史預見的基础。以具有这种重要限制的通过类比的研究方法，可以为历史預見开辟肯定的可能性。

### 第三节 历史預見和历史可能性的問題

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历史預見按其本质來說是深刻地辯证的。在这里絲毫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地方，因为历史預見是



和社会发展有关，而社会发展按其本质来说是辩证的。而且这种辩证法还不仅仅表现在容許和运用历史类比的有关問題中。

預見的問題与个别对一般的关系問題、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我們可以預見到与現象的重复性、与出現在現象中的必然性有联系的东西。我們不能預見到与現象的个别方面有联系的东西，即不能預見到偶然的東西。只有就統計学方面研究大量过程的規律性來說，我們才能这样做。这些过程应理解为偶然現象的积累，既是主要原因、也是間接原因的結果，——但即使在这样的时候，研究的程序也会导致排除間接原因，而造成主要原因、即过程的規律性发生作用的景象。因此，这种研究方式和以此为基础的預見，并不妨碍我們的下述論題：即只能預見合乎規律的、因而是必然出現的現象。

但是我們知道，按照恩格斯的名言，偶然性是必然性的外部表現形式；在社会过程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主要原因和間接原因发生作用的綜合結果。在这里，我們不打算回到分析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全部辩证关系的問題上去，我們只是談一下這個問題的一个特殊的方面：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关系在历史預見中到底有什么表現。

預見到历史发展将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意味着，我們能够揭示这一发展的規律和認識規律，我們可以从因果继承性决定整个发展鏈条的某种結果。例如，馬克思揭示了資本主义发展的規律，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資本主义必然崩潰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結論。又例如斯大林以对支配資本主义經濟的規律的知識为基础，在1927年得出了新的經濟危机必然在最近几年爆发的結論。在这两种場合，預見都是指應該发生的現象，都是指某一发展規律預示必然发生的現象；否則我們就只是猜測或預言，而不是科学預見了。

但是每一次这样的預見又是抽象的結果。这种預見正是只注意純粹的必然性而从偶然性中抽象出来的。換句話說，它簡化了现实，突出了主要的因果序列，把它孤立地取出来，同时摒棄那些与它交叉的、从所研究的規律性来看是次要的因果序列。例如，馬克思在預見資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时，所注意的是在資本主义条件下起作用并决定其发展的主要力量。所以他既沒有指出事件发生的日期，也沒有指出事件形成的个别途徑。使他感到兴趣的只是从过程的动力来看應該发生的現象。

但是，对具体的行动來說，就需要某种比决定发展的一般趋向及其必然結果更多的东西。为了在我們的社会政治活动范围中有目的地和順利地行动，为了根据对事物的知識行事，我們不仅簡單地注意以“純粹的”形式出現的发展必然性，而且應該注意与偶然性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必然性，即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这一点我們做得愈正确、愈完整，我們就能愈正确、愈完整地認識具体的现实，并为自己創造旨在掌握和改造这一现实的有效行动的可能性。只有发展的总方向及其最終結果是必然的；这种必然性是发展規律——不以人們認識和意志为轉移的規律发生作用的表现。但是这一发展具体将怎样进行，将有怎样的速度，怎样的形式，这就屬於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辯证統一的結果了，也就是既是主要原因、又是間接原因作用的結果了。在各該过程中只有主要原因是經常出現的，是它的动力和构成它的必然性。同时出現的还有各种不同的次要原因，即与主要因果序列交叉在一起的各种不同的次要因果序列。在这些次要的原因中，哪一个原因将确实在这过程中出現，它将怎样以怎样的力量具体起作用——这要由各种不同的情况来决定。例如，在对抗的資本主义社会中，階級斗争是作为必然性、作为

发展动力在起作用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就是必然的、经常起作用的主要原因，它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革命，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但无产阶级的这一阶级斗争实际上将怎样进行，它将采取怎样的形式，以怎样的速度走向最终结果，——这要由各种不同的情况来决定。这些情况对过程的规律性来说是偶然的，从过程的主要动力来看是次要的。从这一观点来看，由于旱而引起的歉收是偶然的，其结果会导致群众革命运动的加强或削弱；从这一观点来看，由于领导所犯的策略上的错误而使运动暂时削弱是偶然的。因此，只注意必然性的作用的过程景象，与同时也考虑到次要原因的过程景象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是统计学中所谓整齐的等距序列，即排除了偶然的和暂时的波动的序列的曲线与所谓不整齐的完全以素材构成的等距序列的曲线之间的关系一样。

反映事物的这一状况的客观范畴是可能性。可能性的范畴所表现的是，从某一历史过程来看，某种东西可能来到，但也可能不来到。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可能性是与必然性，或者说应该来到的东西相对立的。但是它只是在这一意义上才有这种对立性；因为我们知道，必然性正是通过这种可能性来实现的。

我们在肯定必然性是在偶然性中实现的，并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时候，同时也肯定，必然性是在可能性中实现的，并通过可能性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具体的预见所应该注意的不仅是“纯粹的”必然性，而且也要注意这种必然性在其中实现的可能性。<sup>①</sup>

现在我们来举几个在具体预见中考虑到可能性的经典作家的例子。

列宁在1917年9月初写了《論妥協》一文。他从具体估計当时俄国情况出发，預見到由于布尔什維克与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之間暫时的不超出一定范围的妥協，俄国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同时列宁着重指出，这种机会是特殊的、极不长久的，是从具体的关系体系得出来的。总之，这里所談的是历史可能性，利用这种可能性是有利于人民的，但是不利用这种可能性当然也不会改变发展的必然方向，而只会給事件的具体进程以比較不利于社会的形式。列宁在当时写道：

“只是作为一种例外，只是由于情况特殊（显然，这种情况只能持續极短的时间），我們才能向这些政党建議妥協，而且我认为这是我們所应该做的。

“从我們方面來說，妥協就是回到七月前的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維埃，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的政府对苏維埃負責。

“現在，只是在現在，也許总共在几天或一两个星期的時間內，这种政府会完全和平地成立并得到巩固。它会保证（带有极大的可能性）整个俄国革命和平地向前推进，保证全世界爭取和平和爭取社会主义胜利的运动有最好的机会大踏步前进。

“我认为，只是为了革命的这种和平发展（这种可能性在历

---

① 关于正确理解必然性和历史可能性的这一辩证的作用，只要看一看資产阶级方法論把自己的思辨建立在形而上学地将它們对立起来的基础上这一事实，就可以得到证实。1952年在巴黎出版的皮埃尔·王德里埃斯的《論历史的可能性》一书可以作为例子。作者在书中宣揚“历史竟然論观念”，这种观念是以人在生理上和精神上“自治”的前提为基础的，也就是以“自由意志”为基础。这是反对历史决定論、反对历史規律的一个新的嘗試。卡尔·曼海姆在《意識形态和空想》一书中也以同样的方法（虽然对待问题的态度略有不同）利用錯誤的形而上学的二者中必居其一：即“或者是决定論，或者是承认历史发展的可能性”，来与历史决定論作斗争。在这里，个人的自由意志的概念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史上是非常小的，是非常可貴的，簡直是小到了極點的），只是爲了這種可能性，主張世界革命，主張採取革命方法的布爾什維克才可以而且應當謀這種妥協……

“也許這已經不可能實現了吧？也許。但是假如還有百分之一的機會，那還是值得來試一試把這種可能性變成現實的。”<sup>①</sup>

處於地下狀態的列寧沒有可能立刻把文章送給編輯部，過了幾天，他不得不加上注腳，認爲這種可能性已經不存在：

“……看了星期六和今天星期日的報紙以後，我對自己說：也許建議妥協已經晚了。也許革命還有和平發展的可能的那幾天也已經過去了。”<sup>②</sup>

下面是另一個例子。1915年列寧曾經反對托洛茨基提出的歐洲聯邦的口號。他在指出這個口號的反動內容時，提出了社會主義在一國勝利的可能性的著名論題：

“世界聯邦（而不是歐洲聯邦）是我們認爲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可能實現的民族聯合和自由發展的国家形式，直到共產主義的完全勝利使一切國家包括民主國家完全消滅爲止。然而把世界聯邦口號當做一個獨立的口號未必是正確的，因爲第一、它和社會主義混合起來了；第二、它會產生認爲社會主義不可能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不正確的見解，以及對這個國家和其餘各國間的不正確的見解。

“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者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沒有無產階級這一被壓迫階級的專政，便不能消滅階級。沒有各社會主義共和國對各落后國家的相當長期的頑強鬥爭，便不能實現各民族在社會主義中的自由

<sup>①</sup> 《列寧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00—301頁。

<sup>②</sup> 同上，第304頁。

联合。”<sup>①</sup>

由此可见，具体的历史预见要求我们不仅揭示必然地进行的主要发展路线，而且也要指出，某一历史过程的不同方案可能怎样，其中哪一种方案最合乎我们的愿望，因此应该创造怎样的条件来实现历史发展的这一方案，并排除其他比较不合愿望的或完全不合愿望的方案。因此，历史预见要求在揭示历史必然性的同时，也要揭示和解释实现历史必然性的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当然，我们谈到在作出历史预见时所必须注意的可能性，不是指一般的任何可能性，而是指抽象的可能性，然而恰恰是现实的可能性。列宁在他给恩·德·基克纳泽的信中所作的指示将能帮助我们划分这种区别和解释这里所谈的概念。

列宁在这封信中谈到变 1914—1918 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他排除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毫无结果的抽象的可能性的范畴，因为这种可能性不是以分析具体历史条件为根据的。列宁在把它与现实作对比时写道：

“如果您以为承认可能性便可以改变策略，我看，您是把可能的东西（这一点不是我开始谈的！！）和现实的东西混淆起来了。不合逻辑到了极点。

“我认为社会民主党人转化为资产者是可能的，反过来也是可能的。

“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我现在就认为目前的资产者普列汉诺夫是社会民主党人呢？不，不能。那末有没有可能呢？这要等可能变为现实时再说。

“仅仅是如此而已。这是说，应当在‘方法论’（您来信谈到它）上分清可能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321 页。

“任何轉化都是可能的，甚至傻瓜也可能轉变为聰明人，但是这种轉化很少成为现实。所以，我不能仅仅根据一种轉变的‘可能性’就认为这样的傻瓜不再是傻瓜了。”<sup>①</sup>

列宁的这些話对于划分可能性的两种范畴——抽象的和现实的——之間的区别，具有重大的意义。

抽象的可能性不注意现实的具体条件。列宁正是反对把这种思辨的、脱离现实条件的可能性作为預見的根据。科学的研究所要求的是另一种态度：檢驗事实，正是这些事实决定着事件的某些条件。列宁写道：

“馬克思主义是以事实，而不是以可能性为依据的。

“馬克思主义者只能以确切的、有凭有据的事实作为自己的政策的前提。”<sup>②</sup>

从这些話决不能得出結論說，不須要考虑任何可能性。在这里，論据的矛头只是指向抽象的可能性。一般地說一切都是可能的这种說法，容易和另一种論断混淆等同起来，那就是說在变化了的条件下事件会获得另一种形式。但是这种一般的說法对实际活动沒有任何意义，因为它沒有指出可能性的实际等級是怎樣的，可能性的真实程度是怎樣的，因而就不能动員我們去行动；同样地，关于一切都处在相互联系中的一般論断，对于帮助实际活动使能引起这些所期望的結果的这些原因发生作用來說，則又过于空泛了。因此，我們應該以事实为基础，确定事实，从而在一定的条件下，在存在一定的事实的情况下揭露过程的非抽象的可能性，而是现实的可能性。列宁排除了抽象的可能性，而承认现实的可能性。

历史預見以揭示事件的现实的可能性为依据。发展过程的

---

① 《列宁全集》，第 35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230—231 頁。

② 同上，第 230 頁。

必然性就表現在这种实在的可能性中。我們愈是准确地和完整地認識它們，就愈能自觉地和順利地行动，排除我們不能接受的可能性，帮助实现可以接受的可能性，办法是創造使規律能发生作用的适当条件。

正是由于把历史可能性的概念这样具体化了，我們才解决了它和历史預見的关系問題。同时，我們对可能性的概念也了解得更为确切，这对于进一步分析問題是会有好处的。

从上述的討論中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

第一，可能性是与不可能性相对立的。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是可能的；同时，沒有无产階級专政，要消灭階級是不可能的。事件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与某一过程的发展規律有关：凡与这一过程中的发展規律沒有矛盾的东西，就是可能的；而与它有矛盾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

第二，——这一点与第一点有着直接联系——可能性是与必然性相对立的。在某种必然性、某种主要原因的綜合經常起作用的历史过程中，实际上應該出現各种不同的、不是准确地规定的間接原因，而間接原因与主要原因的作用交錯在一起，为事件的具体过程、为必然性的具体实现創造着这样或那样的可能性。但是其中任何一种可能性本身都不能解决过程的最終后果的問題；它本身既不应该出現，也不应该被运用来达到这个結果。因此，我們在这里称为可能性的是指那些不是被过程本身性质、即支配着过程的規律排除掉的东西，相反，而是表现这些規律的某种具体化形式，并由条件决定的能出現或不能出現的东西。例如，資本主义的发展归根到底必然破坏农村中封建經濟关系的統治地位；但是这种必然性或者可能表现为所謂普魯士道路的形式，或者可能表现为所謂美国农业中資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形式。



第三，可能性是与现实性相对立的。正因为表现发展规律的各种不同的可能性的出现取决于具体情况，在这些可能性中不是每一个可能性都能实现，不是每一个可能性都能成为现实。为了把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应该遵守那些使其他与之竞争的可能性成为不可能的条件。这一点对可能性的竞争特别重要。这些可能性对于在某一过程中起作用的各社会阶级不是毫不相干的。譬如说，资本主义可能会在农业中取得胜利，或者是按照普鲁士的道路发展，或者是按照美国的道路发展；那么在这两种可能性中，哪一种会胜利，对群众、对代表人民群众的政党来说，都不是一个毫不相干的问题：因为美国的道路正是群众所争取实现的那个较好的可能性。这就是为我们开辟了关于历史预见的新的观点的基础，这些观点对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实际活动具有特殊的意义。

#### 第四节 历史预见对工人阶级 政党革命活动的意义

现在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前面已经形成的论断，即关于历史预见的可能性的争论是由实践解决的，而且首先不是记载历史的实践，而是创造历史的实践。

每一个自觉的当事人和自觉地力求实现一定目标的人，都能在一定的范围内作出预见。政治家和政党能够在更广泛的规模上作出预见。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领袖的预见多半 (par excellence) 是科学预见；这种预见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政策的基础，是这个政党战略和策略的基础。

我们已经看到，历史预见是与发展的一般趋势及其最终结果有关的。这种预见以揭示和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为根据，并

且是整个历史时期群众活动的基础。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发展规律——这种发展导致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和导致共产主义的胜利——，这一发现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并给了无产阶级以胜利的信心。

历史預見也可能只涉及比較短的时期，这时与它有关的就是已經認識的发展必然性所可能具有的表现形式。这种預見是无产階級階級斗争科学的战略和策略的直接基础。

按照斯大林的說法，战略就是决定无产阶级的主要打击方向和制定为革命发展的整个阶段配置革命力量的計劃；策略是决定无产阶级在运动高潮和低潮的相当短的时期中的行动路线。因此很清楚，策略是战略的一部分，是服从于战略的。不論选择战略目的，或是选择策略目的，都是和决定工人階級斗争的具体方向和形式有关的。只有在認識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和借助于历史預見，才能科学地决定这些目的。但是，这已經不是对于最一般的发展趋势的預見，而是考虑到客观实在可能性是规律性的表现形式的預見。我們在規定某一战略和策略目的时，力求完全符合发展规律，把作为可能性而产生的、最符合工人階級利益的那种发展的可能性变为现实。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們要动員和組織群众，提出某种口号，締結某种政治联盟等等，总之，我們要創造把期望的实在的可能性变为现实的条件，并从而力求消除不合願望的其他可能性。因此，战略和策略具有两个方面：客观方面，即在历史过程的某一段时期，与起作用的主要原因一起（即与必然性一起），同时存在着某些次要原因，这些次要原因創造着一定的表现必然性的可能性；以及主观方面，即党和群众以对事物的知識为根据的活动，这种活动力求把期望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給予必然性以一定的、期望的、客观上可能的表现形式。

我們來引用几段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与这一問題直接有关的講話。斯大林在这个报告中提出了苏維埃制度只为建成社会主义基础創造了一定的具体可能性的問題。党可以利用这一可能性，但也可能由于不正确的政策而丧失了这种可能性。斯大林特別举例說明这一論題。

“右傾机会主义者断定說，新經濟政策保证我們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因此可以不必为工业化的速度、国营农場和集体农庄的发展等等操心，反正胜利的到來会自流地得到保证。这种說法当然是不对的，愚蠢的。这样說，就是否认党在社会主义建設中的作用，否认党对这个建設事业所負的責任。列宁决沒有說过，新經濟政策保证我們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列宁只說过，‘新經濟政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們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經濟的基础。’但是，可能性还不是现实。要把可能性变成现实，首先必須摺棄机会主义的自流論，必須改建(改造)国民經济并向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坚决进攻。”<sup>①</sup>

接着斯大林又举出另一个例子：

“其次，右傾机会主义者断定說，在我国制度內不存在工人階級和农民之間发生分裂的基础，因此可以不必为制定对待农村各社会集团的正确政策操心，反正富农会长入社会主义，而工农联盟会所謂自流地得到保证。这种說法同样是不对的，愚蠢的。只有那些不了解党的政策(而且还是执政党的政策)是决定工农联盟命运的基本因素的人，才会这样說。列宁决沒有认为工人階級和农民之間沒有分裂的危險。列宁說过，‘在我国社会制度內不存在必然发生这种分裂的基础’，但是，‘如果在这两个階級之間发生严重的階級分歧，那末分裂将是不可避免的……’

---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第 12 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295 頁。

“可見工人階級和農民之間的分裂並不是不可能發生的，但也決不是一定要發生的，因為在我國制度內存在着防止這種分裂和鞏固工人階級和農民聯盟的可能性。為了把這種可能性變成現實，需要做些什麼呢？為了把防止分裂的可能性變成現實，首先必須埋葬機會主義的自流論，必須挖掉資本主義的根，建立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並由限制富農剝削趨向的政策過渡到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sup>①</sup>

在第一段引文中，斯大林談到工業化和集體化的政策，也就是談到把新經濟政策所提供的建成社會主義基礎的可能性變成現實的道路。斯大林粉碎了自流論，指出了黨和群眾的自覺活動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群眾的這種自覺活動表現在哪裏呢？正是表現在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戰略和策略中。在認識生產關係必須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基礎上，黨能夠科學地預見在新經濟政策的具体條件下發展的趨勢和可能性，並在這種預見的基礎上建立自己的戰略和策略；而且是這樣來建立，以致從群眾的利益來看可以實現最合乎期望的可能性。在新經濟政策具体條件下，這種預見導致工業化和集體化的政策。

在第二段引文中也說明了關於科學預見及以此為基礎的政策的問題，其中談到了在具体條件下所採用的鞏固工農聯盟的方法。

蘇維埃制度為在蘇聯建成社會主義創造了條件。後來斯大林曾經指出，甚至在資本主義包圍依然存在的情況下，蘇維埃制度仍為在蘇聯建成共產主義創造了條件。但是由此只能得出結論說：在這些條件下建成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實際可能性已

① 《斯大林全集》，第 12 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295—296 頁。

經产生了；这些条件本身决不能保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成。把这一具体的可能性变成现实，决不是自发的过程，而是自觉的、有目的的和顺利的行动的结果。但是也存在着在阶级斗争困难时期实际出现的另一种可能性，——工人运动在某种具体情况下失败的可能性。不仅在由于一系列情况（其中无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往往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使工人运动真正失利或遭到失败的地方，存在着这一种可能性；而且在由于正确的战略和策略的领导使可能性不再只是可能性的地方，即所期望的可能性已获得胜利的地方，也存在着这种可能性——苏联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这里十分有力地显示了历史预见的意义，它使工人运动有可能自觉地制定自己的战略和策略，以便实现最有利的可能性，例如通过适当运用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政策来战胜阶级敌人。

客观可能性始终是一定的规律性，即发展趋势的表现形式。哪里出现相互矛盾的趋势，哪里就当然会出现形成历史发展的各种不同的矛盾可能性。例如在苏联，我们知道，苏维埃制度的胜利创造了建成社会主义的实际可能性，但直到粉碎城乡阶级敌人，直到解决了“谁战胜谁？”的问题时为止，仍旧显然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工人运动的失败和国内反革命的胜利。又例如，目前存在着保持和平的可能性，只要各国人民把争取和平的事业担当起来的话；同时也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即开始战争的可能性，如果战争挑拨者得以欺骗群众，并把他们拖入新的战争冒险的话。

对工人运动、对群众来说，把所期望的可能性变成现实，具有哪些决定性意义呢？让我们重复一段上面引用过的斯大林的报告中的另一句话：

“要把可能性变成现实，就必须具备许多条件，其中党的路

綫和正确执行这条路綫起着远非次要的作用。”①

党的路綫表现在战略和策略中，表现在决定——在認識发展規律及它們所創造的可能性的基础上——工人运动在某一阶段的主要目的和任务中。在这里历史預見的問題把我們引到了关于历史現象的鏈条中的主要环节的問題。

然而，我們談到預見和以它为根据的行动时，并不是指事件在其中完成的一切条件，——在預見中考虑到一切条件是不可能的；也不是指随便什么条件——因为也存在着具有极小的实际意义的条件。我們指的是最重要的条件，首先是那些对其他条件起决定作用的条件。这样的条件或这种条件的綜合，我們称之为历史事件鏈条中的主要环节。

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写道：

“政治家的全部艺术就在于找到并且紧紧掌握住最不容易从手中被打掉、目前最重要而且最能保障掌握住它的人去掌握整个鏈条的那个环节。”②

在列宁的另一篇文章里我們可以讀到：

“仅仅一般地做个革命家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共产主义者，还是不够的。必須善于在每个时机里找出鏈条上的一个特别环节，并全力抓住这个环节，掌握整个鏈条，准备稳步地过渡到下一环节；同时，在历史事变发展的鏈条里，各个环节的次序，它們的形式，它們的关連，它們之間的区别，都不像铁匠所制成的普通鏈条那样简单，那样笨拙。”③

工人运动史，特别是苏联共产党的历史，給我們提供了許多事例，說明历史預見怎样使我們能够抓住这个主要环节，并在此

①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95頁。

② 《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73頁。

③ 同上，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2頁。

基础上建立党的战略和策略。上面談到的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政策，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定发展阶段找到主要环节的典范。

\* \* \*

我們說明历史預見对工人政党活动的意义时，再一次证实了关于認識和利用历史規律的階級基础的論題。階級利益可以促进这一認識——如果这种認識符合它的利益的話；階級利益也可能阻碍这一認識——如果这种認識与这个階級的利益相矛盾的話。所以工人階級的思想家为爭取历史研究中的科学真理而斗争，而资产階級的思想家則歪曲或干脆取消这种真理。

我們說明历史預見对工人政党活动的意义时，也明确地提出了关于历史作为一門科学的作用及其社会意义的问题。無論如何不能把历史科学归結为对过去的事件的“純記載”。它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是一門不仅記載，而且进行总结、并在总结时揭示历史发展規律的科学。这样理解的历史科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是自觉的人类活动发展規律的基础，是預見社会事件发展方向的基础。只有認識到历史預見的作用，我們才能深刻地理解史学的社会作用及其与政治的联系，才能理解史学家的社会责任。

对于思想斗争的复杂問題，只有当我們在科学方法的基础上来研究它的时候，才可以得到简单明了的解决。在解釋历史規律方面的理論斗争的实质时，情况也是这样。这一斗争归根結底是貫穿在现代社会全部生活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偉大的階級斗争的一个組成部分和因素。这一斗争的内容和进程再一次闡明了科学領域中无产阶级的进步性和资产阶级反动性的論題。这一斗争的内容和进程再一次着重指出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及其工作对我們祖国社会主义建設实践的意义。

## 参 考 书 目

- 卡尔·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 卡尔·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一八六四年九月七日》（《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7—219頁）。
- 卡尔·马克思：《致留·庫格曼的信，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63—464頁）。
- 卡尔·马克思：《致留·庫格曼的信，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七日》（《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64頁）。
- 卡尔·马克思：《致〈祖国紀事报〉編輯部的信，一八七七年十一月》（《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俄文版，第313—316頁）。
- 卡尔·马克思：《致弗·拉薩尔的信，一八六二年四月二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1934年俄文版，第397—400頁）。
- 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貧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1—198頁；又人民出版社1962年单行本）。
- 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記》（《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19—321頁。又參見《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人民出版社1962年单行本）。
- 卡尔·马克思：《政治經濟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 卡尔·马克思：《费尔巴哈論綱》（《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01—404頁）。
- 卡尔·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階級斗争》（《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95—218頁）。
- 卡尔·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52—525頁）。
- 卡尔·马克思：《〈政治經濟学批判〉导言》（見《政治經濟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33—161頁）。



- 卡尔·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1页）。
- 卡尔·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640页）。
- 卡尔·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268页）。
- 卡尔·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评托马斯·卡莱尔〈当代评论。〉（一）当前的时代。（二）模范监狱。〉》（评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00—342页）。
-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 弗·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 弗·恩格斯：《傅立叶论商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1929年俄文版，第43—89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中文版，第2卷，第654—661页；《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的前言和结束语）。
- 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55—165页）。
- 弗·恩格斯：《论卡尔·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44—353页）。
- 弗·恩格斯：《致亨·施塔尔肯堡的信，一八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04—507页）。
- 弗·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信，一八九〇年九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88—490页）。
- 弗·恩格斯：《致爱因斯特的信，一八九〇年六月五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7—31页）。
- 弗·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55—400页）。
- 弗·恩格斯：《马克思墓前演说》（《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6—168页）。
- 弗·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388—483 頁）。

- 弗·伊·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313—500 頁）。
- 弗·伊·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09—309 頁）。
- 弗·伊·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第 2 版。
- 弗·伊·列宁：《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 22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79—297 頁）。
- 弗·伊·列宁：《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 20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81—202 頁）。
- 弗·伊·列宁：《卡尔·馬克思》（《列宁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25—72 頁）。
- 弗·伊·列宁：《致恩·德·基克納澤的信》（《列宁全集》，第 35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224—225 頁）。
- 弗·伊·列宁：《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 14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3—382 頁）。
- 弗·伊·列宁：《苏維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 27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216—255 頁）。
- 弗·伊·列宁：《論欧洲联邦口号》（《列宁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318—322 頁）。
- 弗·伊·列宁：《論妥协》（《列宁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299—305 頁）。
- 弗·伊·列宁：《民粹主义的經濟內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判》（《列宁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311—481 頁）。
- 弗·伊·列宁：《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組成部分》（《列宁全集》，第 19 卷，第 3—10 頁）。
- 弗·伊·列宁：《爭取到的和記載下来的东西》（《列宁全集》，第 28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453—455 頁）。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出版后党的宣傳工作

- 的決議（《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匯編》，第四分冊，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501—521 頁）。
- 約·維·斯大林：《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斯大林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271—337 頁）。
- 約·維·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86—87 頁。
- 約·維·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55 頁。
- 約·維·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斯大林全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62—165 頁）。
- 約·維·斯大林：《和德國作家艾米爾·路德維希的談話》（《斯大林全集》，第 13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93—109 頁）。
- 約·維·斯大林：《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231—304 頁）。
- 約·維·斯大林：《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斯大林全集》，第 12 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207—324 頁）。
- 尼·謝·赫魯曉夫：《關於 1959—1965 年蘇聯發展國民經濟的控制數字報告》（見《蘇聯共產黨第二十一次代表大會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31—157 頁）。
- 尼·謝·赫魯曉夫：《在保加利亞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講》，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 1958 年俄文版。
- 萊·阿龍：《歷史哲學緒論》（試論歷史客觀性的範圍），巴黎版，第 350 頁。
- Aron R., 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Essai sur les limites de l'objectivité historique, Paris, p. 350.
- N. 阿蘇羅多勃拉伊：《論史學史中的進步性標準問題》，見《歷史季刊》，1953 年第 4 期，第 150—186 頁。
- Assorodobraj N., W sprawie kryterium postępowości w historii historiografii, w «Kwartalnik historyczny», R. 60, 1953, nr. 4, str. 150—186.

- H.巴恩斯:《历史和社会报道》,紐約1926年版,第XVIII,597頁。
- Barnes H., *History and Social Intelligence*, New York, 1926. p. XVIII, 597.
- P.巴尔特:《黑格尔和馬克思及哈特曼以前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試評》,萊比錫1925年第2版,第III,149頁。
- Barth P., *Die Geschichtsphilosophie Hegel's und der Hegelianer bis auf Marx und Hartmann. Ein kritischer Versuch*, 2. Auflage, Leipzig, 1925, S. III, 149.
- P.巴尔特:《历史哲学是一門社会学》,第1卷,《基本原理和述評》,第3—4卷,萊比錫1922年版,第XII,870頁。
- Barth P.,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als Soziologie, I, Grundlegung und kritische Übersicht*, 3. u. 4. Leipzig, 1922, S. XII, 870.
- 查·皮尔特和A.瓦格茨:《历史編纂学中的流行思潮》,見《美国历史評論》,1937年版,第42卷,第3期,第460—483頁。
- Beart Ch., Vagts A., *Currents of Thought in Historiography*, в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37, Vol. 42, No. 3, p. 460—483.
- C.貝克尔:《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史学家》,見《美国历史評論》,第37卷,1932年第2期,第221—236頁。
- Becker C., *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 в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37, 1932, No 2, p. 221—236.
- C.貝克尔:《历史認識的变迁》,見《新展望杂志》,第38卷,1927年版,第115—121頁。
- Becker C. H., *Der Wandel im geschichtlichen Bewusstsein*, в «Die Neue Rundschau», Bd. 38, 1927, S. 115—121.
- G.貝罗:《从解放战争至目前为止的德国历史文献:历史与文化史》,萊比錫1916年版,第XIII,184頁。
- Below G., *Die deutsche Geschichtschreibung von den Befreiungskriegen bis zu unseren Tagen. Geschichte und Kulturgeschichte*, Leipzig, 1916, p. XIII, 184.

- 路易·龐羅惠：《历史規律》，巴黎 1881 年版，第 400 頁。
- Benloew L., *Les lois de l'histoire*, Paris 1881, p. 400, *Bibliothèque historique et politique*.
- E. 伯恩罕：《历史方法与历史哲学教科书》，慕尼黑 1914 年版，X, 842 頁。
- Bernheim E., *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Mit Nachweis der wichtigsten Quellen und Hilfsmittel zum Studium der Geschichte. Unveränderter Abdruck der 5. und 6. Auflage*, München, 1914. S. X, 842.
- 亨利·培尔：《史学上的綜合法》，巴黎 1911 年版，XVI, 271 頁。
- Berr H., *La synthèse en histoire. Essai critique et théorique*, Paris, 1911 p. XVI, 271.
- 馬·比斯庫普：《1454—1466 年 13 年战争期間革旦斯克与卡伊密斯·雅格隆車克的关系》，托倫 1952 年版，第 238 頁。
- Biskup M., *Stosunek Gdańska do Kazimierza Jagiellończyka w okresie mojnny trzynastoletniej 1454—1466*, Toruń, 1952, str. 238 w "Rocz-i Tow. Nauk w Toruniu", R. 56, 1951, str. 1.
- 布洛赫·馬尔克·利奧波德·班賈明：《替史学家的历史或职业进行辯护》，巴黎 1949 年版，XVII, 110 頁，見《年鉴手冊》第 3 期。
- Bloch-Marc-Léopold-Benjamin, *Apologie pour l'histoire ou métier d'historien*, Paris, 1949, p. XVII, 110, *Cahiers des annales*, n° 3.
- 蔡·波賓斯卡：《斯摩梭斯基通信选集序言》，1954 年版，第 V—LXIX 頁。
- Bobńska C., *Wstęp w Smoleński W., Wybór pism.*, 1954, str. V—LXIX.
- M. 鮑勃尔任斯基：《波兰历史时期的分类》，第 1 卷，克拉科夫 1922 年版，第 36—62 頁。
- Bobrzyński M., *O podziale historii polskiej na okresy: Szkice i studia historyczne*, t. 1, Kr., 1922, str. 36—62.
- M. 鮑勃尔任斯基：《波兰簡史》的第 2 版序言，第 1 卷，克拉科夫 1922 年版，第 63—82 頁。

Bobrzyński M., *Przedmowa do drugiego wydania «Dziejów Polski w zarysie»*, *Szkice i studia historyczne*, t. 1, Kr., 1922, str. 63—82.

M.鮑勃尔任斯基:《为了历史真理(論历史任务和今天历史的作用)》,第1卷,克拉科夫1922年版,第1—35頁。

Bobrzyński M., *W imię prawdy dziejowej. Rzecz o zadaniu historii i dzisiejszym jej stanowisku: Szkice i studia historyczne*, t. 1, Kr., 1922, str. 1—35.

叶甫根尼·勃朗:《波兰历史之謎》。历史哲学試驗。华沙1938年版,第123頁。

Braun J., *Zagadka dziejowa Polski. Próba historiozofii*, W., 1938, str. 123.

庫尔特·布雷瑞:《馬克思和黑格尔在历史上对思維的分析:历史的形成,未来历史学說概論》,第2卷,什图特加特1926年版,第XXVIII, 622頁。

Breysig K., *Die Macht des Gedankens in der Geschichte in Auseinandersetzung mit Marx und Hegel: Vom geschichtlichen Werden. Umriss einer zukünftigen Geschichtslehre*, Stuttgart, 1926, Bd. 2, S. XXVIII, 622.

庫尔特·布雷瑞:《世界历史的結構与規律》,柏林1905年版,第III, 123頁。

Breysig K., *Der Stufen-Bau und die Gesetze der Weltgeschichte*, Berlin, 1905, S. III, 123.

法·布雅克:《历史綜合法問題》,見《历史季刊》,1923年第1—2期,第1—23頁。

Bujak F., *Zagadnienie syntezy w historii*, w «Kwartalnik historyczny», R. 37, 1923, z. 1—2, str. 1—23.

納·康貝尔:《物理学原理》,劍桥1920年版,第VII, 565頁。

Campbell N., *Physics. The Elements*, Cambridge, 1920, str. VII, 565.

W.卡貝尔:《日耳曼民族的移动》,什图特加特1940年版,第IX, 580

頁。

- Capelle W., *Die Germanen der Völkerwanderung. Auf Grund der zeitgenössischen Quellen dargestellt*, Stuttgart, 1940, S. IX, 580.
- 托·卡萊尔,《論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事迹》,倫敦 1890 年版,第 235 頁。
- Carlyle T., *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 London, 1890, p. 235.
- J.哈拉辛斯基:《社会研究的方法論問題》,見《哲学思想》,1951 年 1—2 期,第 75—105 頁。
- Chalasiński J., *Z zagadnień metodologii badań społecznych*, в «Myśl filozoficzna», 1951, nr. 1—2, str. 75—105
- E.彻奈,《历史規律》,見《美国历史評論》,第 29 卷,1924 年第 2 期,第 231—248 頁。
- Cheyney E., *Law in History*, в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29, 1924, No. 2, p. 231—248.
- 阿·霍洛涅夫斯基,《波兰历史精神》,克拉科夫 1917 年版,第 141 頁。
- Choloniewski A., *Duch dziejów Polski*, Kr., 1917, str. 141.
- 伊·康恩,《辩证法理論》(哲学讲义),莱比錫 1923 年,IV, 355 頁。
- Cohn J., *Theorie der Dialektik. Formenlehre der Philosophie*, Leipzig, 1923, S. IV, 355.
- 尔·考令伍德,《历史概念》,牛津 1951 年版,XXVI, 339 頁。
- Collingswood R., *The Idea of History*, Oxford, 1951, p. XXVI, 339.
- 阿·古尔諾,《試論認識的基础与哲学評論的性质》,巴黎 1922 年第 3 版, VII, 614 頁。
- Cournot A., *Essai sur les fondements de nos connaissances et sur les caractères de la critique philosophique*, éd. 3, Paris, 1922, p. VII, 614.
- 貝·柯罗齐,《反历史主义》,見《形而上学与倫理学評論》,1931 年第 1 期,第 1—12 頁。

- Croce B., *Antihistoricisme* в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1931, n° 1, p. 1—12.
- 貝·柯罗齐:《黑格尔哲学中活的和死的东西》, 巴黎 1910 年版, 第 VII, XX, 249 頁。
- Croce B., *Ce qui est vivant et ce qui est mort de la philosophie de Hegel. Etude critique, suivie d'un essai de bibliographie Hégélienne. traduite de l'italien avec l'autorisation de l'auteur par Henri Buriot* Paris. 1910. p. VII, XX, 249.
- 貝·柯罗齐,《历史是思想和行为》, 伯尔尼 1944 年版, 第 519 頁。
- Croce B., *Die Geschichte als Gedanke und als Tat. Einführung von Hans Barth*, Bern, 1944, S. 519
- 貝·柯罗齐:《我的哲学和其他关于现代道德与政治问题的论文》, 倫敦 1951 年版, 第 240 頁。
- Croce B., *My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on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Problems of our Time*, London, 1951, p. 240.
- 貝·柯罗齐,《盖姆巴梯斯特·魏克斯的哲学》, 杜平根 1927 年版, 第 XI, 266 頁。
- Croce B., *Die Philosophie Giambattista Vicos. Nach der 2. Auflage übersetzt von Erich Auerbach und Theodor Lücke, Gesammelte philosophische Schriften in deutscher Übertragung*, Tübingen, 1927, S. XI, 266.
- 貝·柯罗齐,《艺术概念简史》, 意大利巴里 1919 年版, 第 1—41 頁。
- Croce B., *La storia ridotta sotto il concetto generale dell'arte. Primi saggi*, Bari, 1919, p. 1—41.
- 貝·柯罗齐,《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杜平根 1915 年版, 第 VII, 269 頁。
- Croce B., *Zur Theorie und Geschichte der Historiographie Aus dem Italienischen übersetzt von Enrico Pizzo* Tübingen. 1915, S. VII, 269.
- W. 查普林斯基:《1632—1648 年的波兰和波罗的海》, 弗劳兹拉夫 1952 年版, 第 151 頁。



- Czaplinski W., *Polska a Bałtyk w latach 1632—1648. Dzieje floty i polityki morskiej*, 1952, str. 151, *Prace Wrocl. Tow. Nauk, Seria A, nr 44*.
- I. 冬布斯卡:《論科学規律》,里沃夫 1933 年版,第 65 頁。
- Dąbska I., *O prawach w nauce*. Lw., 1933, S 65.
- 奇·德斯特勞:《关于現代历史理論的几点意見》,見《美国历史評論》,第 55 卷,1950 年,第 3 期,第 503—529 頁。
- Destler Ch., *Some Observations on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Theory*, в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50, Vol. 55, No 3, p. 503—529.
- 約翰·杜威:《邏輯学,探討的理論》,紐約 1938 年版, VIII, 546 頁。
- Dewey J., *Logic. The Theory of Inquiry*, New York, 1938, p. VIII, 546.
- 威廉·狄尔泰:《精神科学中的历史世界的結構》,全集,第 7 卷,萊比錫 1922 年版,第 77—188 頁。
- Dilthey W., *Der Aufbau der geschichtlichen Welt in 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 Gesammelte Schriften*, Leipzig, 1927. Bd. 7, S. 77—188.
- 威廉·狄尔泰:《精神科学導論》,全集,第 1 卷,萊比錫 1923 年版, XX, 429 頁。
- Dilthey W., *Einleitung in 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 Versuch einer Grundlegung für das Studium der Gesellschaft und der Geschichte: Gesammelte Schriften*, Leipzig, 1923, Bd. I, S. XX. 429.
- Z. 多里瓦:《波兰資本主义的出現》,蘇黎世 1898 年版,第 197, 235 頁。
- Doliwa Z., *Objawy kapitalizmu w Polsce: Szkice historyczno-społeczne*. Zurych, 1898, str. 197, 235.
- E. 德羅遜:《史学概論》,萊比錫 1868 年版, VI, 84 頁。
- Droysen J., *Grundriss der Historik*. Leipzig, 1868, S. VI, 84.
- A. F. 道格納斯:《美国史学中的实用主义》,見《历史文庫》,倫敦 1950 年波兰文版,第 4 卷,第 1 期,第 1—28 頁。

- Dygnas A. F., Pragmatyzm w historiografii amerykańskiej, w «Teki historyczne», Londyn, 1950, t. 4, nr. 1, str. 1—28.
- W. 艾凯尔曼:《新史学(历史研究入门)》, 魯多耳施塔特 1949 年版, 第 289 頁。
- Eckermann W., Neu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Eine Einführung in ihr Studium, Rudolstadt, 1949, p. 289.
- 查·爱尔伍德:《社会学中的方法論》, 英国达腊姆 1933 年版, 第 XXXIV, 214 頁。
- Ellwood Ch., Methods in Sociology. A Critical Study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arold E. Jensen. Durham, 1933, p. XXXIV, 214.
- 弗朗茨·奥兰堡:《自然規律与社会規律》, 見《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丛》, 1910 年第 31 卷, 第 711—778 頁; 1911 年, 第 32 卷, 第 689—780 頁。
- Eulenburg F., Naturgesetze und soziale Gesetze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w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1910, Bd. 31, S. 711—778, 1911, Bd. 32, S. 689—780.
- 弗·奥兰堡:《历史規律是可能的》, 第 1 卷, 慕尼黑和莱比錫 1923 年版, 第 21—71 頁。
- Eulenburg F.. Sind “historische Gesetze” möglich. Eine methodologische Untersuchung, w “Erinnerungsgabe für Max Weber”. München und Leipzig, 1923, Bd. 1, S. 21—71.
- 弗·奥兰堡:《論历史中的規律性》, 見《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丛》, 1912 年, 第 35 卷, 第 299—365 頁。
- Eulenburg F., Über Gesetzmässigkeiten in der Geschichte (“historische Gesetze”).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w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1912, Bd. 35, S. 299—365.
- 約·費尔特曼:《历史上的波德問題》, 卡托維茲 1946 年版, 第 174 頁。
- Feldman J., Problem polsko-niemiecki w dziejach, Katowice, 1946, str. 174.

- W. 费尔糾遜:《希腊帝国主义》,波士頓—紐約,1913年版,XIV,258頁。
- Ferguson W., Greek Imperialism, Boston—New York, 1913, p. XIV, 258.
- T. 弗兰克:《羅馬帝国主义》,紐約1914年版,XIII,365頁。
- Frank T., Roman Imperialism, New York, 1914, p. XIII, 365.
- E. 高底士:《汪达尔王該薩利克》,巴黎1932年版,第326頁。
- Gauticz E., Genséric, roi des Vandales, Paris, 1932, p. 326
- G. 京梯尔:《精神是純行为的理論》,倫敦1922年版,第XXVII,280頁。
- Gentile G., The Theory of Mind as Pure Act, London, 1922, p. XXVII, 280.
- 彼得·盖尔:《湯因比的文明体系》,見《盖尔,湯因比,索罗金論文集》:《过去的面貌。我們能決定它嗎?》,波士頓1949年版,第3—72頁。
- Geyl P., Toynbee's System of Civilizations, a Geyl P., Toynbee A., Sorokin P., The Pattern of the Past. Can We Determine it?, Boston, 1949, p. 3—72.
- E. H. 高达特和P. A. 吉本斯:《文明或各种文明。斯宾勒的历史哲学論文》,倫敦,1926年,第XVI,230頁。
- Goddard E. H., Gibbons P. A., Civilisation or civilisations. An Essay in the Spenglerian Philosophy of History, London, 1926, p. XVI, 230.
- F. 戈特尔:《历史的界限》,萊比錫1904年版,第IX,142頁。
- Góttl F., Die Grenzen der Geschichte, Leipzig, 1904, S. IX, 142.
- 卡洛尔·古尔斯基:《論历史中的解釋和評价》,卢布林1948年版,第30頁。
- Górski K., O interpretacji i wartościowaniu w historii, Lubl., 1948, str. 30. Tow Nauk KUZ. Wykłady i przemowienia, 31.
- 卡洛尔·古尔斯基:《普魯士十字軍国》,革旦斯克1946年版,第295頁。
- Górski K., Państwo krzyżackie w Prusach, Gdańsk, 1946, str. 295.
- 卡洛尔·古尔斯基:《十三年战争时期的濱海区》,波茲南1932年版,第

308 頁。

Górski K., *Pomorze w dobie wojny trzynastoletniej*, Pozn., 1932, str. 308.

卡洛尔·古尔斯基：《波罗的海沿海地区的波兰人》，革旦斯克 1947 年版，VII, 238 頁。

Górski K., *Polska w rlewisku Bałtyku*, Gdańsk, 1947, str VII, 238.

L. 貢普洛維奇：《史学与社会学》，見《历史研究》1905 年第 1 期，第 6—23 頁。

Gumplowicz L., *Historia a socjologia*, в “Przegląd historyczny”, 1905, t. 1, str. 6—23.

奧·哈萊茨基：《历史分类》，見《华沙研究》1925 年第 2 期，第 129—148 頁。

Halecki O., *O podziale dziejów powszechnych na okresy*, в “Przegląd warszawski”, 1925, t. 2, str. 129—148.

L. 哈尔芬：《历史緒論》，巴黎 1948 年第 2 版，第 VIII, 85 頁。

Halphen L.,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éd. 2, Paris, 1948, p. VIII, 85.

馬·汉德尔斯曼：《亚当·查尔托里斯基》，华沙 1948—1950 年版，1—3 卷，第 XX, 334, 382, 754 頁。

Handelsman M., *Adam Czartoryski, W.*, 1948—1950, t. 1—3, str. XX, 334, 382, 754, *Tow. Nauk. Warsz.*

馬·汉德尔斯曼：《波兰历史研究及波兰历史思想的傾向》，見《历史綜合評論》，1925 年，第 39 卷，第 115—117 期，第 65—93 頁。

Handelsman M., *Les études d'histoire polonaise, et les tendances actuelles de la pensée historique en Pologne*, в “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 1925, t. 39, n° 115—117, p. 65—93.

馬·汉德尔斯曼：《史学家。方法論和历史認識論的原則》，1928 年，第 XIII, 332 頁。

Handelsman M., *Historyka. Zasade metodologii i teorii poznania historycznego*, 1928, str. XIII, 332.

馬·汉德尔斯曼：《历史过程中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华沙 1931 年版，第

1—13頁。

Handelsman M., *Możliwości i konieczności w procesie historycznym*, w "Księga pamiątkowa celem uczczenia 350-jej rocznicy założenia Uniwersytetu Stefana Batorego w Wilnie", W., 1931, str. 1—13.

馬·汉德尔斯曼:《現代民族的发展》,第VIII,268頁。

Handelsman M., *Rozwój narodowości nowoczesnej*, str. VIII, 268.

馬·汉德尔斯曼:《偉大的浪漫主义者。史学家約瑟夫·毕苏斯基》,見《历史杂志》,华沙1937年版,第83—117頁。

Handelsman M., *Wielki romantyk. Józef Pilsudski jako historyk*; «Historycy». *Portrety i profile*, W., 1937, str.83—117.

阿·哈尔納克:《关于历史認識的可靠性与界限》,慕尼黑1917年版,第23頁。

Harnack A., *Über die Sicherheit und die Grenzen geschichtlicher Erkenntnis*, München, 1917, S. 23.

L·M·哈特曼:《論历史的发展》(历史社会学六讲),德国戈塔1905年版,第VII,89頁。

Hartmann L. M., *Über historische Entwicklung, 6 Vorträge zur Einleitung in eine historische Soziologie*, Gotha, 1905, S. VII, 89.

黑格尔:《哲学百科全书》(《黑格尔全集》,第1卷,1930年版,第CIII,367頁)。

Гегель,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философских наук* (Соч., т. 1. 1930, стр. CIII, 367).

黑格尔:《历史哲学》,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

M.海茨曼:《考令伍德的历史認識論》,見《历史文庫》,倫敦1948年波兰文版,第2卷,第4期,第233—255頁。

Heitzman M., *Collingwooda teoria poznania historycznego*, w "Teki historyczne", Londyn, 1948, t. 2, nr. 4, str. 233—255.

C. G.汉普尔:《历史普遍規律的作用》,見《哲学杂志》,1942年,第39卷,第2期,35—48頁。

- Hempel C. G., 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s in History в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42, Vol. 39, No 2, p. 35—48.
- J·霍赫菲尔德:《历史唯物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几个对立面》,見《哲学思想》,1951年1—2期,第106—154頁。
- Hochfeld J., O niektórych aspektach przeciwstawności materializmu historycznego i socjologii burżuazyjnej, в «Myśl filozoficzna», 1951, nr 1—2, str. 106—154.
- A·霍夫斯台特:《历史判断中的一般与个别》,見《哲学杂志》,1945年,第42卷,第3期,第57—65頁。
- Hofstadter A., Generality and Singularity in Historical Judgment, в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45, Vol. 42, No 3, p. 57—65.
- K.雅斯柏斯:《历史的起源与目的》,苏黎世1949年版,第360頁。
- Jaspers K., 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 Zurich. 1949, S. 360.
- U.卡尔斯台特:《論馮·罗伯特和馮·皮尔曼的〈古代社会問題和社会主义史〉》(評論),見《德国哥廷大学城学术評論》,第188卷,1926年,第4—6期,第97—128頁。
- Kahrstedt U., "Geschichte der socialen Frage und des Sozialismus in der antiken Welt", von Robert V. Pöhlmann, рецензия 8, в "Göttingische gelehrte Anzeigen", Jahrgang 188, 1926, Nr 4—6, S. 97—128.
- U.卡尔斯台特:《論弗·弗·塔恩的〈希腊化文明〉》,見《德国哥廷大学城学术評論》,第190卷,1928年,第10期,第482—488頁。
- Kahrstedt U., Tarn W. W., "Hellenistic Civilisation", Рецензия в "Göttingische gelehrte Anzeigen", Jahrgang 190, 1928, Nr 10, S. 482—488.
- F.考夫曼:《社会科学的方法論》,倫敦—紐約—多倫多1944年版,第VIII. 272頁。
- Kaufmann F., Methodology of Social Sciences, London—New York—Toronto, 1944, p. VIII, 272.

- F. 考夫曼,《現代历史哲学》,柏林 1931 年版,第 138 頁,《哲学研究报告》,第 10 期。
- Kaufmann F., *Geschichtsphilosophie der Gegenwart*, Berlin, 1931, S. 138,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sberichte*, 10.
- J. K. 科汉諾夫斯基:《时代的回声和現代历史規律的閃現》,华沙 1910 年版,第 XII, 149 頁。
- Kochanowski J., *Echa prawnieku i błyskawice praw dziejowych na tle terażniejszości*. W., 1910, str. XII, 149.
- J. K. 科汉諾夫斯基:《現代史学流派和科学的史学概覽》,华沙 1908 年版,第 1—12 頁。
- Kochanowski J., *Najnowsze kierunki w historiografii a wskazania historiografii naukowej: Szkice i drobiazgi historyczne*, Seria 2, W., 1908, str. 1—12.
- J. K. 科汉諾夫斯基:《十九世紀下半叶波兰史学的发展》,华沙 1908 年版,第 29—45 頁。
- Kochanowski J., *Rozwój dziejopisarstwa polskiego w drugiej polowie XIX wieku: Szkice i drobiazgi historyczne*, Seria 2, W., 1908, str. 29—45.
- J. 科迪索娃:《历史的变迁及其規律》,見《哲学研究》,第 15 卷,1912 年第 1 期,第 100—134 頁。
- Kodisowa J., *Zmienność historyczna i jej prawa. Przyczynek do historyki*, в “*Przegląd filozoficzny*”, R. 15, 1912, 1, str. 100—134
- N. 康:《論历史科学的特点和任务問題》,見苏联《历史問題》,1951 年第 6 期,第 48—64 頁。
- Кон И., *К вопросу о специфике и задачах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науки*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No. 6 за 1951 год, стр. 48—64)
- 費·科涅奇納:《教会是人民的政治教养者》,华沙 1938 年版,第 43 頁。
- Koneczny F., *Kościół jako polityczny wychowawca narodów*, W., 1938, str. 43.
- 費·科涅奇納:《論多种文明》,克拉科夫 1935 年版,第 320 頁。

- Koneczny F., *O wielości cywilizacji*, Kr., 1935, str. 320.
- 費·科涅奇納：《波兰之道和倫理》，波茲南 1921 年版，第 1—2 卷。
- Koneczny F., *Polskie Logos a Ethos. Roztrząsanie o znaczeniu i celu Polski*, Pozn., 1921, t. 1—2.
- 弗·康諾普欽斯基：《巴尔联盟》，华沙 1936—1938 年版，1—2 卷，第 XVI, 559 頁和第 XII, 652 頁。
- Konopczyński W., *Konfederacja Barska*, W., 1936—1938, t. 1—2, str. XVI, 559 和 XII, 652.
- 弗·康諾普欽斯基：《从苏維斯基到克秋斯基》，华沙 1921 年版，第 353 頁。
- Konopczyński W., *Od Sobieskiego do Kościuszki. Szkicedrobiazgifraszki historyczne*, W., 1921, str. 353.
- 塔·科尔逊：《波兰历史建設中的史学錯誤》。
- Korzon T., *Błędy historiografii naszej w budowaniu dziejów Polski*, w "Pamiętnik drugiego zjazdu historyków polskich we Lwowie".
- 塔·科尔逊：《历史：公开信，談話，討論，研究》，华沙 1916 年版，第 2 卷，第 58—82 頁。
- Korzon T., *Historia: Listy otwarte, mowy, rozprawy, rozbiory*, W., 1916, t. 2, str. 58—82.
- 塔·科尔逊：《历史哲学：公开信，談話，討論，研究》，华沙 1916 年版，第 2 卷，第 126—145 頁。
- Korzon T., *Historiozofia: Listy otwarte, mowy, rozprawy, rozbiory*, W., 1916, t. 2, str. 126—145.
- 塔·科尔逊：《历史实证主义者：布克萊、德拉貝和考尔布》，見《华沙圖書館》，第 3 卷，1870 年，第 42—72 頁。
- Korzon T., *Historycy pozytywiści: Buckle, Draper, Kolb. Studium krytyczne*, w "Biblioteka warszawska", 1870, t. 3, str. 42—72.
- T. 科塔尔宾斯基：《認識論的因素，形式邏輯和科学方法論》，里沃夫 1929 年版，第 VIII, 483 頁。
- Kotarbiński T., *Elementy teorii poznania, logiki formalnej*



- l metodologii nauk, Lw., 1929, str. VIII, 483.
- 凱列斯·克拉烏茲:《回顧的社會學規律》,見《學會會刊》,1897年,第3卷,第264—277,465—481頁。
- Krauz K., Socjologiczne prawo retrospekcji, w "Atheneum", 1897, t. 3, str. 264—277, 465—481.
- R. 克羅納:《從康德到黑格爾》,杜平根 1921—1924年版,第1—2卷,第XIX, 612 和 XXIII, 526頁。
- Kroner R., Von Kant bis Hegel, Tübingen, 1921—1924, Bd. 1—2, S. XIX, 612 и XXIII. 526.
- 保羅·拉貢勃:《歷史是科學,兼評李凱爾特的言論》,見《歷史綜合評論》,1901年,第3卷,第7期,第1—9頁。
- Lacombe P., L'histoire comme science. A propos d'un article de M. Rickert в "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 1901, t. 3, n° 7, p. 1—9.
- K. 拉姆普勒赫特:《現代史學》(五講),柏林 1920年版,第130頁。
- Lamprecht K., Modern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5 Vorträge, 3. unveränderte Auflage, Berlin, 1920, S. 130.
- 狄·萊辛:《歷史是一種無意識的思想流派》,慕尼黑 1919年版,第VIII, 299頁。
- Lessing T., Geschichte als Sinngebung des Sinnlosen, München, 1919, S. VIII, 299.
- 亨利·列維:《德國哲學中的黑格爾派復興》,沙羅頓堡 1927年版,第95頁。
- Levy H., Die Hegel-Renaissance in der deutschen Philosophie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Neukantianismus, Charlottenburg, 1927, S. 95.
- G. 倫德堡:《社會科學中規律的概念》,見《科學的哲學》,1938年,第5卷,第2期,第189—203頁。
- Lundberg G., The Concept of Law in the Social Sciences, в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38, Vol. 5, No 2, p. 189—203.
- G. 倫德堡:《社會學基礎》,紐約 1939年版,第XX, 556頁。

Lundberg G., *Foundations of Sociology*, New York, 1939, p. XX, 556.

罗曼·魯特曼:《史学方法論原理》, 华沙 1948 年版, 第 2 卷, 第 19—28 頁。

Lutman R., *Podstawy metodologiczne historiografii*, w "Pamiętnik VII Powszechnego Zjazdu Historyków Polskich we Wrocławiu 19—22 września 1948", W., 1948, t. 2, z. 1. str. 19—28.

罗曼·魯特曼:《历史中的真理問題》, 里沃夫 1925 年版, 第 2 卷, 第 103—112 頁。

Lutman R., *Zagadnienie prawdy w historii*, w "Księga pamiątkowa ku czci Oswalda Balzera". Lw., 1925, t. 2, str. 103—112.

齐·列姆比茨基:《威廉·狄尔泰》, 見《哲学評論》, 第 17 卷, 1914 年第 1 期, 第 84—141 頁。

Łempicki Z., *Wilhelm Dilthey*, w "Przegląd filozoficzny", R. 17: 1914, z. 1, str. 84—141.

斯·洛斯:《基督降生前二世紀到一世紀羅馬的土地問題》, 卢布林 1946 年版, 第 24 頁。

Łoś S., *Sprawa agrarna w Pzynie II-go i I-go wieku przed Chrystusem*, Lubl., 1946, str. 24.

斯·洛斯:《轉变时期的海拉达》, 华沙 1938 年版, 第 171 頁。

Łoś S., *Hellada na przelomie*, W., 1938, str. 171.

斯·洛斯:《馬里和苏拉》, 見《圻字杂志》, 第 4 卷, 1949 年第 3 期, 第 123—139 頁。

Łoś S., *Mariusz i Sulla*, w "Meander", R. 4, 1949, z. 3, str. 123—139.

A. M. 馬克尔弗:《历史解釋的特征》, 亚里士多德学会增刊, 第 21 卷, 倫敦 1947 年版, 第 33—50 頁。

(在《历史解釋的特征》主題下面包括三篇論辯文, 其中之一是馬克尔弗的言論。)

- Maclver A. M., *The Character of a Historical Explanation, a Explanation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The Symposia Read at the Joint Session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and the Mind Association at Cambridge, July 4th-6th, 1947. Aristotelian Society. Supplementary Vol. 21, London, 1947. p. 33—50.*
- M·曼台尔邦:《历史知識問題》(对相对論的解答), 紐約 1938 年版, X, 340 頁。
- Mandelbaum M.,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An Answer to Relativism, New York, 1938, p. X, 340.*
- 卡尔·曼海姆:《意識形态和空想》, 波恩 1929 年版, 第 XV, 250 頁。《哲学和社会学文集》, 第 3 卷。
- Mannheim K., *Ideologie und Utopie, Bonn, 1929, S. XV, 250. Schriften zur Philosophie und Soziologie, 3.*
- 卡尔·曼海姆:《認識社会学》, 見《社会学研究》, 第 5 卷, 1937 年, 第 66—101 頁。
- Mannheim K., *Socjologia wiedzy. Перевод в "Przegląd socjologiczny", t. 5, 1937, str. 66—101.*
- P·曼都:《历史学与社会学》, 見《历史綜合評論》, 1903 年, 第 7 卷, 第 20 期, 第 121—140 頁。
- Mantoux P., *Histoire et sociologie в "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 1903, t. 7, n° 20, p. 121—140.*
- 馬尔克:《現代哲学中的辯证法》, 杜平根 1929 年版, VI, 166 頁。
- Marck, *Die Dialektik in der Philosophie der Gegenwart. Tübingen, 1929, S. VI, 166.*
- F. 梅涅克:《历史上的意識和历史意識》, 萊比錫 1939 年版, 第 120 頁。
- Meinecke F., *Vom geschichtlichen Sinn und vom Sinn der Geschichte, Leipzig, 1939, S. 120.*
- 恩斯特·梅斯特:《論历史規律的可能性》, 萊比錫 1928 年德文版, VII, 88 頁。
- Meister E., *Über die Möglichkeit historischer Gesetze. Eine*

- geschichtslogische Untersuchung, Leipzig, 1928, S. VII, 88.  
《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論》，芝加哥 1931 年版，第 XIII, 822 頁。
- “Methods in Social Science. A Case Book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Committee on Scientific Method in the Social Sciences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Edited by Stuart A. Rice, Chicago, 1931, p. XIII, 822.
- 爱德华·迈耶：《亚历山大大帝与君主专制》（历史理論与古代經濟、政治历史），哈勒 1910 年版，第 283—332 頁。
- Meyer E., Alexander der Grosse und die absolute Monarchie: Kleine Schriften zur Geschichtstheorie und zur wirtschaftlichen und politischen Geschichte des Altertums, Halle. 1910, S. 283—332.
- 爱德华·迈耶：《古代史》，什图特加特 1907—1909 年版，第 1 卷，第 1—2 册，XII, 250 和 XXVIII, 894 頁。
- Meyer E., Geschichte des Altertums, Stuttgart, 1907—1909, Bd. 1, Hälfte 1—2, S. XII, 250 и XXVIII, 894.
- 爱德华·迈耶：《古代經濟的发展》，見《国民經濟学与統計学年鉴》，1895 年，續集 3，第 9 卷，第 5 分册，第 696—750 頁。
- Meyer E., Die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des Altertums. Vortrag, gehalten auf der dritten Versammlung Deutscher Historiker in Frankfurt a. M. am 20 April 1895, в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1895, Folge 3, Bd. 9, Heft 5, S. 696—750.
- 爱德华·迈耶：《史学理論与方法論》，哈勒 1902 年德文版，第 VIII, 56 頁。
- Meyer E., Zur Theorie und Methodik der Geschichte. Geschichts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Halle. 1902, S. VIII, 56.
- K. 米哈尔斯基：《現代历史哲学問題》，見《現代研究》，第 10 卷，1931 年，第 115 期，第 161—180 頁。
- Michalski K., Zagadnienia współczesnej filozofii dziejów. в “Przegląd współczesny”, R. 10, 1931, nr. 115, str. 161—180.

- 恩斯特·米拉尔:《历史規律》, 1—4 卷, 布魯塞爾 1903—1908 年版。
- Millard E., Une loi historique, Vol. 1—4, Bruxelles, 1903—1908. Vol. 1: Introduction, les Chinois, les Égyptiens, les Français; Vol. 2: Les Juifs, les Grecs, les Italiens; Vol. 3: Les Allemands, les Anlgais; Vol. 4: Causes de la loi, considerations finales
- W. 莫克:《黑格尔和黑格尔学派》, 慕尼黑 1930 年版, 第 491 頁。
- Moog W., Hegel und die Hegelsche Schule, München, 1930. S. 491.
- 查·穆拉澤:《經濟史緒論》, 巴黎 1948 年版, 第 216 頁。
- Morazé Ch.,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économique, éd. 2 revue et corrigée, Paris, 1948, p. 216.
- 亞·賴維爾:《历史規律的概念》, 見《历史綜合評論》, 1904 年, 第 9 卷, 第 25 期, 第 1—6 頁。
- Naville A., La notion de loi historique, в “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 1904, t. 9, n° 25, p. 1—6.
- 查·阿曼:《論历史的編写》, 倫敦 1939 年版, IX, 307 頁。
- Oman Ch., O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London, 1939, p. IX, 307.
- S. 奧索夫斯基:《社会学中的历史規律》, 見《哲学研究》, 1935 年, 第 38 卷, 第 1 期, 第 3—32 頁。
- Ossowski S., Prawa “historyczne” w socjologii в “Przegląd filozoficzny”, 1935, R. 38, z. 1, str. 3—32.
- J·柳比奇—巴洪斯基:《1798—1799 年的法拿战争》, 克拉科夫 1947—1948 年版, 第 1—2 卷, 第 XXXVIII, 480 和 X, 372 頁。
- Pachoński J., Wojna francusko-neapolitańska 1798—1799 r. udział w niej Legionów Polskich, Kr., 1947—1948, t. 1—2, str. XXXVIII, 480 и X, 372.
- A. 巴文斯基:《保克耳》, 見《华沙图书馆》, 1894 年, 第 4 卷, 第 349—395 頁。
- Pawiński A., H. T. Buckle в “Biblioteka warszawska”, 1868, t. 4, str. 349—395.

- “Pierwsza Konferencja metodologiczna historyków polskich. Przemówienia, referaty, dyskusja”, W., 1953. t. 1—2, str. 535, 585
- K. 比瓦爾斯基:《資產階級史學危機和歷史唯物主義》,見《歷史季刊》,第57卷,1949年,第1—4期,第3—42頁。
- Piawski K., Kryzys historiografii burżuazyjnej a materializm historyczny, w “Kwartalnik historyczny”, R. 57, 1949, t. 1—4, str. 3—42.
- M. 普朗克:《動態的與靜態的規律性》,萊比錫1914年版,第32頁。
- Plank M., Dynamische und statische Gesetzmässigkeit, Leipzig, 1914, S. 32
- J. 普列邦斯基:《論尤利烏斯·柴查爾的歷史意義》,見《華沙圖書館》,1865年,第3卷,第169—209, 429—463頁;第4卷,第322—366, 544—612頁。
- Plebański J., O historycznym znaczeniu Juliusza Cezara, w “Biblioteka warszawska”, 1865, t. 3, str. 169—209, 429—463; t. 4, str. 322—366, 544—612.
- 格·瓦·普列漢諾夫:《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 格·瓦·普列漢諾夫:《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 R. 比爾曼:《古代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史》,慕尼黑1893年版,第1卷, XVII, 618頁。
- Pöhlmann R., Geschichte des antiken Kommunismus und Sozialismus, München, 1893, Bd. 1, S. XVII, 618.
- 米·尼·波克羅夫斯基:《歷史科學與階級鬥爭》,第1—2卷,莫斯科—列寧格勒1933年版,第325—448頁。
- Покровский М. Н.,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и борьба классов, выпуск 1—2, М.—Л., 1933, стр. 325—448.
- K. 包勃爾:《開通的社会及其敌人》,倫敦1952年版,第1—2卷, VII, 318和375頁。
- Popper K.,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London. 1952

Vol. 1—2, p. VII, 318 и 375.

《反对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的历史观》文集，第1部；《反对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文集，第2部，苏联科学院，莫斯科—列宁格勒1930—1940年版，第417—506頁。

《Против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концепции М. Н. Покровского》，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часть 1；《Против антимарксистской концепции М. Н. Покровского》，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часть 2, АН СССР, М.—Л., 1930—1940, стр. 417—506.

《反对历史科学中的客观主义》，见苏联《历史问题》，1948年，第12期，第3—12頁。

《Против объективизма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науке》（《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No. 12, за 1948 год, стр. 3—12）.

列·兰克：《宗教改革时代的德国史》，维也纳1934年德文版，第1287頁。

Ranke L., *Deut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 Ungekürzte Textausgabe*, Wien, 1934, S. 1287.

列·兰克：《1494—1514年罗曼斯和德意志民族史》，全集，第3卷，莱比锡1885年德文版，第33頁。

Ranke L., *Geschichten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 von 1494 bis 1514: Sämtliche Werke*, 3, Gesamtausgabe, Leipzig, 1885, Bd. 33.

А. Б. 拉諾維奇：《希腊化时代及其历史作用》，苏联科学院，莫斯科—列宁格勒，1950年版，第381頁。

Ранович А. Б., *Эллинизм и е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роль*, АН СССР, М.—Л., 1950, стр. 381.

康·李特：《史学家的社会责任》，见《美国历史评论》，1950年，第55卷，第2期，第275—285頁。

Read C.,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Historian*, в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50, Vol. 55, No 2, p. 275—285.

G. 兰尼埃：《历史，历史的目的和方法》，伦敦1950年版，第272頁。

Renier G. Johannes, *History, Its Purpose and Method*, London,

- 1950, p. 272.
- 亨利·李凯尔特:《历史哲学,二十世紀初期的哲学》,海德耳堡 1907 年版,第 321—422 頁。
- Rickert H., *Geschichtsphilosophie*, в “*Die Philosophie im Beginn des zwanzigsten Jahrhunderts*”, Heidelberg, 1907, S. 321—422.
- 亨利·李凯尔特:《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圣彼得堡 1903 年俄文版。
- Риккерт Н., *Границы естественно-научн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понятий*, СПб, 1903.
- 亨利·李凯尔特:《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圣彼得堡 1903 年俄文版。
- Риккерт Н., *Естествоведение и культуроведение*, СПб. 1903.
- 亨利·李凯尔特:《历史哲学問題》,海德耳堡 1924 年版,第 X, 156 頁。
- Rickert H., *Die Probleme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Eine Einführung*. 3, umgearbeitete Auflage, Heidelberg. 1924. S. X, 156.
- 亨利·李凯尔特:《哲学体系》第 1 篇:《哲学的一般原理》,杜平根 1921 年版, XVI, 419 頁。
- Rickert H., *System der Philosophie*, tl. 1: “*Allgemeine Grundlegung der Philosophie*”, Tübingen, 1921, S. XVI, 419.
- О. 雷歇尔:《精神科学的因果考察》,波恩 1901 年版, V, 138 頁。
- Ritschl O., *Die Causalbetrachtung in 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 Bonn, 1901, S. V, 138.
- A. 罗貝特逊:《怎样讀历史》,倫敦 1952 年版,第 246 頁。
- Robertson A., *How to Read History*, London, 1952, p. 246.
- W. 罗歇尔:《国民經济原理》,什图特加特—柏林 1906 年版,第 XV, 895 頁。
- Roscher W., *Grundlagen der Nationalökonomie*. Stuttgart—Berlin, 1906, S. XV, 895.
- 阿·罗森堡:《羅馬共和国史》,萊比錫 1921 年版,第 117 頁。
- Rosenberg A., *Geschichte der römischen Republik*. Leipzig, 1921, S. 117.



- M. 罗斯托夫采夫:《古代世界史》, 萊比錫 1941 年版, 第 1 卷, XI, 500 頁。
- Rostovtzeff M., *Geschichte der alten Welt*. Deutsch von Hans Heinrich Schaefer, *Der Orient und Griechenland*, Leipzig, 1941, B. 1. S. XI, 500.
- M. 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的社会和經濟史》, 第 1—3 卷, 牛津 1941 年版, XXIV, 602 頁。
- Rostovtzeff M.,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Vol. 1—3, Oxford, 1941, p. XXIV, 602, tabl 50 и VIII, 603—1312, tabl 32 и 1313—1779.
- M 罗斯托夫采夫:《羅馬帝国的社会和經濟史》. 牛津 1926 年版, XXV, 695 頁。
- Rostovtzeff M.,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Oxford, 1926, p. XXV, 695, tabl. 60.
- E. 罗塔凯尔:《精神科学緒論》, 杜平根 1930 年版, XXIII, 288 頁。
- Rothacker E., *Einleitung in 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 2. Photomechanisch gedruckte, durch ein ausführliches Vorwort ergänzte Auflage, Tübingen, 1930, S. XXIII, 288.
- 阿·罗斯:《历史的用途》, 紐約 1948 年版, XI, 247 頁。
- Rowse A., *The Use of History*, New York, 1948, p. XI, 247.
- 古斯塔夫·呂梅林:《論历史規律》, 弗賴堡 1881 年版, 第 118—148 頁。
- Rümelin G., *Über Gesetze der Geschichte: Reden und Aufsätze*, Freiburg, 1881, S. 118—148.
- 亞·沙夫:《个别与社会研究的論证法》, 見《哲学思想》評論栏, 1952 年, 第 3 (5) 期, 第 221—259 頁。
- Schaff A., *Metoda dokumentów osobistych a społeczne badania terenowe. Szkic Krytyczny, w "Myśl filozoficzna"*, 1952, nr 3(5), str. 221—259.
- 沙尔·謝尼奧博斯:《給斐迪南·洛特的最后一封信》, 見《历史評論》, 1953 年, 第 210 卷, 第 1 期, 第 1—12 頁。
- Seignobos Ch., *La dernière lettre à Ferdinand Lot*, в "Revue

- historique”, 1953, t. 210, fasc. I, p. 1—12.
- 沙尔·謝尼奧博斯：《1848 年的革命和 1848—1852 年的法国反革命》（《19 世紀史》第 5 卷，莫斯科 1938 年版，第 5—41 頁）。
- Сеньобос III., Революция 1848 года и реакция во Франции 1848—1852. («История XIX века», т. 5, М., 1938, стр. 5—41).
- М. 謝列伊斯基：《展望 20 世紀初期資本主义波兰的史学》，見《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1950 年，第 1 卷，第 98—121 頁。
- Serejski M., Rzyt oka na historiografię polską w dobie kapitalizmu do pocz. XX wieku (Stan badań, główne tendencje ideologiczne) в, “Przegląd nauk historycznych i społecznych”, 1950, t. 1, str. 98—121.
- G. 謝迈尔：《历史哲学諸問題，認識論研究》，慕尼黑 1923 年第 5 版，IX, 229 頁。
- Simmel G., Die Probleme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Eine erkenntnistheoretische Studie, München, 1923, 5. Auflage, S. IX, 229.
- G. 謝迈尔：《历史認識的本质》（中央教学学院夜校历史讲义），柏林 1928 年版，第 5 分册，第 31 頁。
- Simmel G., Vom Wesen des historischen Verstehens, в Geschichtliche Abende im Zentralinstitut für Erziehung und Unterricht, Berlin, 1928, Heft 5, S. 31.
- A. 斯卡尔科夫斯基：《家族史料館中的亚历山大·魏洛波斯基（1803—1877）》，波茲南 1947 年版，第 1—3 卷，第 VII, 215, 301, 412 頁。
- Skalkowski A., Aleksander Wielopolski w świetle archiwów rodzinnych (1803—1877), Pozn., 1947, t. 1—3, str. VII, 215, 301, 412, Pozn. Tow. Przyj. Nauk.
- 弗·斯摩梭斯基：《庫茲尼查·科隆塔育夫斯卡通信选集，附蔡尼娜·鮑賓斯卡为选集所作序言》，华沙 1954 年版，第 267—413 頁。
- Smoleński W., Kuźnica Kollatajowska: Wybór pism. Wybór i wstęp Celina Bobińska, W., 1954, str. 267—413.

- 弗·斯摩梭斯基,《十八世紀波蘭的思想變革》,1949年版,XIX,382頁。
- Smoleński W., Przewrót umysłowy w Polsce wieku XVIII. Studia historyczne, Wyd. 3, 1949, str. XIX. 382.
- 弗·斯摩梭斯基,《波蘭的歷史學派》,弗勞茲拉夫1952年版,XC,155頁。
- Smoleński W., Szkoły historyczne w Polsce (Główne kierunki poglądów na przeszłość). Oprac. Marian Henryk Se-rejski, Wrocl., 1952, str. XC, 155, Bibl. nar. Seria 1.
- S. 斯莫爾卡,《論歷史》(歷史論文集),華沙1882年版,第279—354頁。
- Smolka S., Słowo o historii: Szkice historyczne, Seria 1, W., 1882, str. 279—354.
- M. 斯莫魯霍夫斯基,《根據蓋然性來理解偶然性和物理規律的起源》,見《數學知識》,1923年,第27期,第27—52頁。
- Smoluchowski M., O pojęciu przypadku i pochodzeniu praw fizyki, opartych na prawdopodobieństwie. "Wiadomości matematyczne", 1923, t. 27, z. 2, str. 27—52.
- 瓦·索貝斯基,《德國歷史哲學片斷》,華沙1904年版,第251—316頁。
- Sobleski W., Z historiozofii niemieckiej (Uwagi o pojmowaniu dziejów K. Lamprechta): Szkice historyczne. W., 1904, str. 251—316.
- 皮·索羅金,《湯因比的历史哲學》,見《蓋爾,湯因比,索羅金論文集》,《過去的面貌:我們能決定它么?》波士頓1949年版,第95—126頁。
- Sorokin P., Toynbee's Philosophy of History, в «Geyl Pie-ter, Toynbee Arnold J., Sorokin Pitirim A., The Pattern of the Past: Can We Determine It?» Boston, 1949, p. 95—126.
- 奧·施賓格勒,《西方的沒落(世界歷史形態學綱要)》,慕尼黑1923年版,第1—2卷,第XV, 557和第VII, 666, 734頁。
- Spengler O., 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Umriss einer Morphologie der Weltgeschichte, München, 1923, Bd. 1—2, S. XV, 557 и VII, 666, 734.

- 埃·施普朗格：《生活方式。个性的人文科学的心理学与伦理学》，哈勒 1922 年版，XV，403 頁。
- Spranger E., *Lebensformen. Geisteswissenschaftliche Psychologie und Ethik der Persönlichkeit*, Halle, 1922, S. XV, 403.
- 尔·斯塔台尔曼：《雅各·布尔克哈特与中世紀》，見《历史杂志》，1930 年，第 142 卷，第 457—515 頁。
- Stadelmann R., *Jacob Burckhardt und das Mittelalter* в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930, Bd. 142, S. 457—515.
- B. 苏赫道尔斯基：《德国人文学方法論的研究状况》，見《历史研究》，1927 年，第 26 卷，第 3 期，第 417—479 頁。
- Suchodolski B., *Stan badań nad metodologią nauk humanistycznych w Niemczech*, в “*Przegląd historyczny*”, 1927, t. 26; z. 3, str. 417—479.
- D. 斯台英巴：《人文学中的非决定論問題》，見《哲学研究》，第 36 卷，1933 年，第 77—106 頁。
- Sztejnberg D., *Zagadnienie indeterminizmu na terenie nauk humanistycznych*, в “*Przegląd filozoficzny*”. R. 36; 1933, str. 77—106.
- J. 舒依斯基：《我們历史中的几个真理》，克拉科夫 1887 年，第 271—288 頁。
- Szujski J., *Kilka prawd z dziejów naszych. Ku rozważeniu w chwili obecnej*, Kr., 1885, str. 271—288.
- J. 舒依斯基：《論虛假的历史是虛假政策的教师》，克拉科夫 1894 年版，第 79—105 頁。
- Szujski J., *O fałszywej historii jako mistrzyni fałszywej polityki. Z powodu artykułu p. L. Wolskiego pod tytułem: Diagnoza: Dzieła. Wydanie zbiorowe. Seria 3, t. 3, “Pisma polityczne”*, Kr., 1894, str. 79—105.
- J. 舒依斯基：《論国会任务》，見《波兰研究》，1871—1872 年，第 1 卷，第 2 期，第 226—245 頁。
- Szujski J., *Słowo o zadaniach sejmowych*, в “*Przegląd polski*”,

1871—1872, t. 1, z. 2, str. 226—245.

叶·塔列列:《塔列兰》,莫斯科—列宁格勒 1948 年版,第 295 頁。

Тарле Е. В., Талейран, М.—Л., 1948, стр. 295.

W. W. 塔恩:《希腊化文明》,倫敦 1927 年版,第 320 頁。

Tarn W. W., Hellenistic Civilisation, London, 1927, p. 320.

W. 塔塔爾凱維奇:《哲学史》,第 3 卷,(19 世紀和現代哲学),华沙 1950 年版,第 602 頁。

Tatarkiewicz W., Historia filozofii. T. 3, Filozofia XIX wieku i współczesna, W., 1950, str. 602.

哈·泰勒:《历史是一門科学》,倫敦 1933 年版,第 138 頁。

Taylor H., History as a science, London, 1933, p. 138.

F. J. 台加特:《历史理論与处理方法》,伯克利 1941 年版, X, 323 頁。

Teggart F. J., Theory and Processes of History, Berkeley, 1941, p. X, 323.

《历史研究中的理論与实践》(史学委员会的报告),紐約 1946 年版, IX, 177 頁。

“Theory and Practice in Historical Study: A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1946, p. IX, 177.

J. 蒂森:《历史的一次性, 历史邏輯研究》,波恩 1924 年版, VIII, 259 頁。

Thyssen J., Die Einmaligkeit der Geschichte. Eine geschichtslogische Untersuchung, Bonn, 1924, S. VIII, 259

阿·湯因比:《經受考驗的文明》,紐約 1948 年版, VII, 263 頁。

Toynbee A., Civilization on Trial, New York, 1948, p. VII, 263.

阿·湯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 1962 年版,上册,中册。

埃·特雷耳奇:《历史主义及其克服》,柏林 1924 年版, XIII, 108 頁。

Treeltsch E., Der Historismus und seine Überwindung, Berlin, 1924, S. XIII, 108.

卡·台曼涅斯基:《李凯尔特的历史个别論, 历史过程中的一般与个别事实》,华沙 1953 年版,第 1 卷,第 79—80 頁。

- Tymieniecki K., Idiografia historyczna Rickerta. Fakty ogólne i szczegółowe w procesie historycznym, w "Pierwsza konferencja metodologiczna historyków polskich. Przemówienia, referaty, dyskusja", W., 1953, t. 1, str. 79—80.
- 卡·台曼涅斯基,《古代波兰的領土,最古老的民族和文化》,波茲南 1951 年版,XXIV, 834 頁。
- Tymieniecki K., Ziemie polskie w starożytności. Ludy i kultury najdawniejsze, Pozn., 1951, str. XXIV, 834.
- 皮·王德里埃斯,《論历史的可能性》,巴黎 1952 年版,第 364 頁。
- Vendryès P., De la probabilité en histoire. L'exemple de l'expédition d'Égypte, Paris, 1952, p. 364.
- W·福格尔,《論西欧历史生活的节奏》,見《历史杂志》,1924 年,第 129 卷,第 1—68 頁。
- Vogel W., Über den Rhythmus im geschichtlichen Leben des abendländischen Europa, w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924, Bd., 129, S. 1—68.
- M. 华尔菲希,《現代方法論中对人文学的捍卫》,見《哲学研究》,1922 年,第 55 卷,第 1 期,第 95—142 頁。
- Walfisz M., Obrona humanistki w metodologii współczesnej, w "Przegląd filozoficzny", 1922. R. 25, z. 1, str. 95—142.
- 塔·华列克—契尔涅茨基,《希腊史》,見《大通史》,华沙 1934 年版,第 2 卷,第 XII, 1112 頁。
- Walek-Czernecki T., Dzieje greckie, w "Wielka historia powszechna", W., 1934, t. 2, str. XII, 1112.
- 塔·华列克—契尔涅茨基,《古代世界經濟史》,华沙 1948 年版,第 1—2 卷,第 222—357 頁。
- Walek-Czernecki T., Historia gospodarcza świata starożytnego, W., 1948, t. 1—2, str. 222 i 357. Bibl. Meandra 4—5.
- 瑪·韦伯,《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認識的“客观性”》(科学讲座論文集),杜平根 1922 年版,第 146—214 頁。
- Weber M., Die "Objektivität"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und

- sozialpolitischer Erkenntnis. Ges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Tübingen, 1922. S. 146—214.
- 亨·維列錫茨基:《政治百科全书中的約瑟夫·毕苏斯基》, 华沙 1939 年版, 第 4 卷, 第 256—262 頁。
- Wereszycki H., Pilsudski Józef, в “Encyklopedia nauk politycznych. (Zagadnienia społeczne, polityczne i gospodarcze)”, W., 1939, t. 4, str. 256—262.
- G. 莫尔頓·怀特:《对历史方法的抨击》, 見《哲学杂志》, 1945 年, 第 42 卷, 第 12 期, 第 314—331 頁。
- White, Morton G., The Attack on the Historical Method, в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45, Vol. 42, No 12, p. 314—331.
- G. 莫尔頓·怀特:《历史解釋》, 見《思想杂志》, 1943 年, 第 52 卷, 第 207 期, 第 212—229 頁。
- White, Morton G., Historical Explanation, в “Mind”, 1943, Vol. 52, No. 207, p. 212—229.
- G. 莫尔頓·怀特:《历史的哲学分析》, 見《法国与美国的现代哲学动态》, 第 1 卷,《美国哲学》, 巴黎 1950 年版, 第 416—442 頁。
- White, Morton G., Vers une philosophie analytique de l'histoire, в “L'activité philosophique contemporaine en France et aux Etats-Unis. Etudes publiées sous la direction de Marvin Farber”, t. 1. La philosophie américaine, Paris, 1950, p. 416—442.
- J. 維拉烏姆:《华沙公爵弗利德立克·奥古斯特(1807—1815 年)》, 波茲南 1939 年版, 第 405 頁。
- Willaume J., Fryderyk August Jako książę Warszawski (1807—1815), Pozn., 1939, str. 405.
- 威廉·文德尔班:《黑格尔主义的复兴》, 杜平根 1924 年版, 第 1 卷, 第 273—289 頁。
- Windelband W., Die Erneuerung des Hegelianismus. (Heidelberger Akademierede am 25. April 1910): Präludien.

Aufsätze und Reden zur Philosophie und ihrer gesshi-  
chte. 9. photo-mechanisch gedruckte Auflage. Tübingen,  
1924, Bd. 1, str. 273—289.

威廉·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序曲》,圣彼得堡 1904 年俄文版。  
Виндельбанд В., История и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е, “Прелюдии”, СПб,  
1904.

威廉·文德尔班:《偶然性論》,柏林 1870 年版,第 80 頁。

Windelband W., Die Lehren vom Zufall, Berlin, 1870, S. 80.

威廉·文德尔班:《論現代邏輯学与科学和历史》,見《历史綜合評論》,  
1904 年,第 9 卷,第 26 期,第 125—140 頁。

Windelband W., La science et l'histoire devant la logique  
contemporaine, Traduit par S. Jahkélevitch, в “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 1904, t. 9; n° 26, p. 125—140

阿·賽諾波尔:《因果关系》,見《历史綜合評論》,1904 年,第 8 卷,第 24  
期,第 265—295 頁;1904 年,第 9 卷,第 25 期,第 7—21 頁。

Xénopol A., La causalité dans la succession, в “Revue de syn-  
thèse historique”, 1904, t. 8, p. 24, p. 265—295; 1904, t. 9, n°  
25, S. 7—21.

阿·賽諾波尔:《历史基本原理》,巴黎 1899 年版,VI, 348 頁。

Xénopol A., Les principes fondamentaux de l'histoire, Paris,  
1899, p. VI, 348.

斯·扎克热夫斯基:《历史問題結構的意識形态》,里沃夫 1936 年版,第 1  
卷,第 151—188 頁。

Zakrzewski S., Ideologia ustrojowa i Zagadnienia historyczne,  
Lw., 1936, t. 1, str. 151—188.

斯·扎克热夫斯基:《历史文化》,里沃夫 1936 年版,第 1 卷,第 1—67 頁。

Zakrzewski S., Kultura historyczne: Zagadnienia historyczne,  
Lw., 1936, t. 1, str. 1—67.

E. 齐尔塞:《物理学和历史社会学規律問題》,見《科学的哲学》,1941 年,  
第 8 卷。

Zilsel E., Physics and the Problem of Historico-Sociological



- Laws, в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41, Vol. 8.
- 弗·茲那涅茨基,《社会学入門》,波茲南 1922 年版,第 467 頁。
- Znaniecki F., Wstęp do socjologii. Pozn., 1922, str. 467. Pozn. Tow. Przyj. Nauk, Prace Komisji Nauk Spol., t. 2.
- 弗·茲那涅茨基,《世界和人类发展的意义》,华沙 1913 年版,第 4 卷,第 283—354 頁。
- Znaniecki F., "Znaczenie rozwoju świata i człowieka, в Świat i człowiek", W., 1913, z. 4, str. 283—354.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第一编 马克思主义和把史学变成一门科学

第一章 马克思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是史学上的一个变革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的理论对历史研究的实际意义

第二编 对资产阶级史学否认历史规律客观性的批判

第三章 资产阶级史学否认历史规律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四章 对个别论的批判

第一节 个别论的方法论否认历史规律 威廉·狄尔泰的观点是个别论概念的基础

第二节 论所谓个别科学（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概念的批判）

第三节 被理解为偶然性的汇集的历史（迈耶的概念的批判）

第四节 在史学实践中否认历史规律

第五章 对历史规律的唯心主义神秘化的批判

第一节 客观唯心主义派（把历史发展规律神秘化地说成是客观精神发展的规律）

1. 黑格尔及其追随者

2. 循环发展和阶段发展论

第二节 主观唯心主义派（用个人心理或个人心理创造的发展规律的形式来使历史规律神秘化）

1. 实证主义的社会规律学说
2. 玛·韦伯的“理想典型”学说
3. 社会规律的心理学说
4. 作为思辨公式的规律

第三节 历史规律的神秘化和史学实践中的公式主义与社会学观

第三编 从历史客观规律理论中得出的几点方法论上的结论

第六章 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理论来看历史中的个别对一般的关系

第一节 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

第二节 历史过程中的个人和群众

第三节 对史学家创作的结论

第七章 从历史客观规律的理论来看历史预见

第一节 历史规律的客观性是历史预见的基础

第二节 历史预见和历史类比

第三节 历史预见和历史可能性的问题

第四节 历史预见对工人阶级政党革命活动的意义

义

参考书目